

# 我的回忆

张 国 焘

(第 三 册)

我的回忆

张 国 焘

第 三 册

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

一九八一年一月印刷

工本费 1.40 元

# 我 的 回 忆

张 国 焘

第 三 册

(供内部参考)

## 第三册目录

第十六篇	鄂豫皖苏区 .....	1—126
第一章	到鄂豫皖的途中 .....	2
第二章	初次参加游击战 .....	11
第三章	推行新政策 .....	25
第四章	金家寨之行 .....	43
第五章	新集的盛会 .....	70
第六章	整肃 .....	90
第七章	鄂豫皖区的末期发展 .....	109
第十七篇	川北苏区 .....	127—205
第一章	四次围剿与西行五千里 .....	128
第二章	入川之初 .....	153
第三章	关于苏维埃的争执 .....	171
第四章	建立新苏区以后 .....	181
第十八篇	会师与内争 .....	207—274
第一章	渡过嘉陵江 .....	208
第二章	懋功之会 .....	217

第三章	毛儿盖会议 .....	248
第四章	分裂 .....	265
<b>第十九篇</b>	<b>由分到合 .....</b>	<b>275—321</b>
第一章	在西康 .....	276
第二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292
第三章	北上 .....	305
<b>第二十篇</b>	<b>国共和解 .....</b>	<b>323—376</b>
第一章	西安事变 .....	324
第二章	延安百态 .....	341
<b>第二十一篇</b>	<b>抗日战争 .....</b>	<b>377—432</b>
第一章	洛川会议 .....	378
第二章	边区政府 .....	394
张国焘敬告国人书		
	并与中共同人商榷抗战建国诸问题 .....	433—441

## 第十六篇

# 鄂豫皖苏区

## 第一章

### 到鄂豫皖的途中

我在上海仅仅工作了两个多月，便踏入了苏维埃战争的前线；从此，开始了我五年的游击生涯，我所亲身经历的，也可象征当时各地苏维埃红军的实况。

一九三一年三月中旬，我和沈泽民陈昌浩准备进入鄂豫皖苏区。我和陈昌浩拟经汉口前往黄安，沈泽民和他的太太张琴秋则拟经安徽合肥去六安。当时，我们对于鄂豫皖苏区的情况，知道很少，我们只知道那里有两个小苏区，一个以黄安县北部的七里坪为中心，包括黄安麻城光山罗山四个鄂豫交界县份的一些乡区，另一块则以金家寨为中心，包括六安霍山商城三个豫皖边县份的一些乡区。这些苏区与中共中央之间建立了交通网，但彼此间互相联络的情况，却只有周恩来才清楚，周恩来因此委托顾顺章为我们安排这次秘密旅行的各种事项。

顾顺章一直主持中共中央的特务部，归周恩来指挥，是周的得力助手。这时，顾顺章又实际主管中共中央通往各地和各苏区间的交通网。顾顺章原系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清帮的活动分子，五卅运动时即系工人领袖之一；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三次暴动，他任工人纠察队总

队长，周恩来曾一度任顾的副队长；此后，周经常是顾顺章的领导者。我还是在五卅运动时与顾顺章认识的，那时我就欣赏他的能干，这次重逢，已相隔五年多了，他的才华更是令人佩服。不过他的仪表谈吐，多少有些海派气味；也许这点是他为人美中不足之处。

顾顺章为我服务，十分卖力，他决定亲自护送我到汉口，沈泽民的行程则由他的助手料理。他告诉我，有一艘来往沪汉之间的野鸡船，与他有密切关系，这艘船将于三月底开赴汉口，他要我坐那艘船，他自己则先赶到汉口物色人员护送我去黄安，他并详细向我说明每一细节所应采取的步骤，我决定照他的计划实行。

那艘野鸡船定于四月一日启碇，三月三十一日晚九时左右，顾顺章的助手雇了一辆街车来接我，于是我和我的太太告别，离开我的秘密住所，搬到南京路新世界旅馆。这家旅馆也是与顾有密切关系的，常为他利用作为活动的据点，这时他早为我预定了一个房间，连旅客登记表也代我填好了，注明我是由香港刚来的，以应付可能的盘查。我预定在凌晨三时上船，顾则搭夜车往南京，再转船赴汉，可先我一日到达。

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凌晨三时，我扮成普通商人，顾顺章的助手扮成我的伙计，街车司机虽与我互不相识，却也是一个同志。我们在夜深人静时直驶杨树浦码头，到达码头时，曾有一巡捕来查问，我的伙计下车应付了几句，便通过了，此外，并没遇着甚么阻挠。到达船上水手舱中时，陈昌浩已先我在那里，并为我在他铺位的旁边占了一



席地作为我睡眠的地方，陈昌浩也是扮成我的伙计，他在那里摆出一副侍候老板的神气，为我多方张罗照料，我们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了上海。

晨光普照的时候，船开出了吴淞口。这是一只货船，十几位客人都是水手们私带的“黄鱼”，我们这两条“黄鱼”，虽同是商人打扮，但又有点不象。水手和客人多猜测我们是贩卖鸦片的巨商，于是我们将计就计，和同船的人一起打麻雀，我们立定主意，输一些钱，而我们的技术确实蹩脚，输钱时也显得很自然。几天工夫，我们输了近百元的大洋，同船的人皆大欢喜，认定我们是一掷千金的大鸦片商。

四日下午，我们的船快要到汉口了。顾顺章嘱咐船主要在下午六时后靠码头，因为顾顺章认为六点多钟是暗探们用膳的时间，那时登岸，危险性可能少些。果然，这艘船马上减低了速度，直到六时过后才停泊好。我和陈昌浩各提着简单的行李，走出码头的时候，天已近黄昏，码头外的要道上，有一个年青人手里拿着一张当天的报纸，向我们投射了一个暗号，这就是顾顺章派来接我们的。那青年人旋即坐上一辆人力车，我们也跟着坐上人力车，直向离码头不远的日租界驶去。

在日租界一条较僻静的街道上，我们走进一所房子的二楼，顾顺章已在那里等候我们，他知道我们一路上没发生过甚么困难之后，便和我们研究下一步的步骤。他告诉我们，从这里到鄂豫皖区，不能由汉口交通站的人护送，须由鄂豫皖派出来的交通迎接进去，现在已确知那个可靠

的交通，至少还要三天才能赶到，因此，我们至少要在汉口停留三天。

接着他又告诉我们，这个交通据点，住着一对可靠的夫妇，一向是很稳妥的，但据最近的消息，这里已引起日租界暗探的怀疑，因此，他对我们是否可以住在这里，颇表踌躇。他还告诉一件我向来不知道的事，他说他是有名的“花广奇”大魔术师，曾在汉口表演多次，轰动一时，汉口有些大商人和富人曾拜他做老师，其中有几个和他来往亲密，完全不知道他就是顾顺章。他建议如果这里不好住，可以搬到他的一个学魔术的学生家里，那是一位大商人的家庭，不会引起人们怀疑的。我不同意顾顺章这个建议，我对他说：如果我住在大商人家里，不能躲藏着不见客，汉口认识我的人很多，商人中也有不少人认识我，万一遇着了，反为不妥。这里虽已为日租界暗探所怀疑，但不见得在这几天内就会出事。我们就藏在这里，决不露面，也许要妥当些。我们研讨的结果，一致认为还是一动不如一静。

在这个仅有两间卧房的二楼上，主人夫妇住在后房，我们则住在前房。我们不敢凭窗外望，以免为人所发现，只有在房里阅读书籍报纸。当日一份中文报纸上，译载一篇外人所作“剿匪”的文章，其内容大致是赞扬蒋介石将军剿灭共匪的努力，并说到中国历史上曾屡次采用封锁政策剿匪，获得成功，现在蒋氏也注意封锁，沿着匪区，筑碉堡，坚壁清野，使匪不能向外发展，以图逐渐缩小包围，这是一个稳健而有效的办法。我读了这篇东西，便开始考

虑对策。

七日傍晚，顾顺章领着刚由鄂豫皖区来的交通到我们的寓所。这位来迎接我们的青年人，身材矮小，沉默寡言，倒象一位经过磨练的商店伙计。我们商定翌晨启程，乘公共汽车向目的地进发，顾顺章因不便在汽车站露面，决派他的助手到站照料。

八日上午八时，我和陈昌浩跟着那位交通，离开日租界，穿过中国地界的小街小巷到汽车站。我们各自提着包袱雨伞之类，前前后后各自行进，似乎并不相识，在车站分别买票，我们很顺利的搭上了经黄陂到麻城李家集的公共汽车。车开行到郊外时，曾停车经过两次检查，我们没有遇着困难就通过了。

同车的旅客，在通过检查以前，是鸦雀无声的，似乎惧怕将要发生甚么岔子。检查完了之后，大家就有说有笑。车中有人说，车抵李家集时，还有一次更严厉的检查，不过有店铺在那里的人，就没有甚么麻烦。他们纷纷议论，李家集街上驻扎的军队和民团太多了，买卖不如以前好做了，共匪常在李家集附近骚扰，被绑架去的人不少，某商店的老板某某，就是前几天被绑去的。我听了这些话，知道我们的游击队，确是很活跃，但绑票的行为，不但会失去人心，而且是土匪的作风。我这个不会说湖北话的人，只有装着重听，不和人交谈。

下午四时左右，我们到达了离李家集八华里的一个小站，就在那里下车。交通领着我们循小路向乡村走去，翻过几个小山坡，离公路已经远了，那位交通才放慢脚步与

我们同行。他告诉我们现在大致没有危险了，从那个小站到我们所要到的村庄共十五华里，现在还须走一个钟头才能到达。我们最好是在黄昏后到目的地，以免为人注意，因而我们慢慢的走反较好些。

这时我才有机会和那位交通谈谈关于交通网的情形，他虽不知道我的姓名，但他知道我们是他的重要上级，因此他也不避嫌疑的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他就是本乡的人，这里的农民协会，从前组织得很好，反动以后，农民协会被禁止了，一切的活动也没有了，但农协的影响仍是很大的。现在我们所要到的村庄住着同姓的二十多户人家，都是同情革命的，其中有两户与中共有关系，其他各户则暗中掩护。我们的游击队，也把这个乡村当作同情区，从不在这里打土豪，因而维持着友好的关系，他每次出入鄂豫皖区，都是以这个乡里的两三个村庄为落脚点。

他又告诉我，有一个交通站，设在李家集附近大路旁的一间小铺里，汉口的总交通站，只知道那个地点，这次就是汉口总交通站于几天前通知那个小店铺，转知他来接送我们的。他自己只知道汉口一个接头的地方，他每次赴汉就是到那里接头。他推测在鄂豫皖的周围，有好几条直达中共中央的交通线，他自己知道这一条。

他又说，在我们所要到的村庄上，藏着一个鄂豫皖苏区的特务队，是专来迎接我们的。我们今晚还要走一晚的夜路，沿途要穿过白军和民团驻防的地方，才到达鄂豫皖苏区南端的高桥区。平常他走路的时候，无论是带领人员或运送东西，总是夜晚悄悄偷过去；因为我们是重要的人，

所以特派一个特务队来接。

在暮色茫茫中，我们从后门进到这个村庄的一个人家。进门后，立即看见有几个雄赳赳的青年人在那里守候着，那位交通将我们的身份告诉他们之后，那个特务队长，立时命令全体武装起来，顷刻之间，那些人都由普通农民变为佩带短枪的红军了。队长慎重向队员宣布：要严防民团来巡逻和敌人的任何袭击，誓死保卫这三位新来的人。

我们所到的这家人家，房屋相当的大，有好些个房间，男女老少一大群，都用惊奇而带喜悦的眼光望着我们。女人们忙着为我们料理食物，男人们则分别到外面去放哨。特务队队长和副队长带着八个队员藏在屋内把守前后门。

饭后，特务队长在征得我们的同意之后，下令出发，预定在拂晓前到达目的地。在行进中，队长带头，副队长殿后，我们则走在中间，沿途不说话，不吸烟，严防为敌人所发觉。

在没有月亮的黑夜里，我们这一队人，从村庄后面的小路，走过满布松林的小山冈，为了远离村庄和敌哨，我们必须绕道走，有时走山冈小径，有时走曲折的田畦，有时走的简直不是路而是碎石沟。一路看不见灯火；听不着狗吠，我们一意急行。

我此行的心情，轻松而又愉快，和我在南昌暴动失败后，夜奔甲子港的狼狈状态，恰恰相反。我觉得我此后的生活是改变了，用不着提心吊胆严防暗探的追踪了。我面前这十个敏捷矫健的游击武士的英姿，使我想起明早将要会见上万个同样的人物，我将和他们一起奋斗，我为此感

到骄傲。

我这个不惯于行夜路的人，越走越觉得我这两脚有些不济事。我在黑夜中急行，高一脚，低一脚，有时脚被石块打着发痛，有时跌交，我用尽气力还不免掉队几步。走在我后面的队友，老是鼓励我不要掉队，甚至轻轻的哼出一首掉队歌，其中一句我记得是：“掉队的人儿，哎哟哟！不怕羞！”我不甘落后，决心锻炼自己能和他们一样的矫健。我虽满头大汗，走上坡道时还有些喘气，但我咬紧牙关，竭力赶上去。

这一整夜的行程，我们中途只休息过一次，并用缸子在一个小溪中汲取了一点水喝。高大个子的陈昌浩有较多的体育锻炼，也要费尽气力，才勉强跟得上。特务队长曾向我表示，他知道初走夜路是一件辛苦的事，但我们如果耽搁了，就要准备与民团开火。我鼓起勇气，请他放心，我会努力跟得上的。

天微明——这是一九三一年四月九日，我们的队伍才放慢脚步，队长选择了适宜休息的地方，要我们解下包袱，多休息一会。他指着前面一座高山告诉我们，那是木兰山，高桥区就在那座山东面脚下，我们已经走出了民团的防地，前面那座小山冈上，就有我们的哨兵，到黄安独立团团部则还有十里的路程，昨夜我们所走的路，按大路计算是八十里，但我们弯弯曲曲的走小路，约计有一百二十华里。

这最后的十里路，我们可走得慢了，而且时走时歇，队长也不再督促了，全队行进的速率都随着我的脚步为转移。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好不容易的向前移动，快到八点

钟了，我们才走到山窝的一个小祠堂内，这里就是独立团的临时驻地。

独立团团部的人们，围拢来欢迎我们，但我已没有精神和他们周旋，我赶紧解脱我的鞋袜，看看我的双脚，使我自己也为之惊奇，原来两脚已布满了水泡和由鞋带子所勒成的血渍印。我的同志们看见了也只有把我当作伤兵来服侍，忙着让我吃东西和休息。这个团里只有徐政治委员是在一九二七年武汉时期会见过的，他除了为我介绍这个团的王团长和徐政治部主任以外，并安排我有几个钟头的休息时间。这就是我踏进鄂豫皖苏区的起点。

## 第二章

### 初次参加游击战

我一踏进这个苏区的边缘，就参加了游击战。初次参加游击战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九三一年四月九日近午，团部的大厅里有二三十个人在聊天；长官与士兵杂坐着，毫无拘束的谈笑。他们彼此互称同志，对于长官则在“同志”之前加上一个官衔。他们的总称是“红军战士”，没有在军队中工作的人，则称军队里的官兵为“红军同志”。官长和士兵的服装是一样的，使人分不清那一个是长官，那一个是士兵。独立团官兵的服装不及特务队的整齐。官长和士兵起居饮食都在一道，待遇也是平等的。他们这种同甘共苦的生活，滋生了他们活泼与乐观的团结精神。

先我起床的陈昌浩，已在大厅里和他们高谈阔论了。他们想知道鄂豫皖苏区以外的情形，特别对于我们这两个新来的人，大感兴趣。我听见有人问陈昌浩说：“国涛同志不是机会主义吗？”陈说：“这是早就过去的事。”并告以现在我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能全权代表中央，此来是任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的书记，兼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他要他们称我为“主席”，一切听从我的指挥。他自己也自我



介绍，说他初从苏俄返国，任少共中央委员；此来是担任少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的书记。但他自己则不仅注意青年工作，对游击战争亦极感兴趣，而且身体强健，曾受过一些军事训练等等。

我起床后步入大厅，间杂在他们当中坐着，全厅的视线都集中到我的身上来。王团长为我一一介绍，并告诉我那个护送我们来的特务队，是直属军委会的，不过现在拨给他指挥，现在已到别处去休息了，并且已经分派他们新的任务。我请他代我嘉奖他们，并向在场的人说：“这里许多同志，都是我的老战友，我初来，许多事要学习，请随便告诉我一些情形吧。”同志们撇开我的问题，先向我叙起旧来了。徐政治委员说到一九二七年在汉口和我会见过。王团长接着说，一九二七年他到汉口，知道湖北区委由我负责，但没有见着我。此外还有两三个同志说在汉口听过我演讲，他们说比我从前胖了些。

我们一面进餐，一面互道情况。饭后，王团长提出了一个军事行动的建议。他说这个黄安独立团只有六个连，共五百余人。现在驻扎在这里的是第一营的三个连，约有三百人，枪枝只有一半。他们在两天前到这里，任务是护送我们到苏区中心去，可是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离这里约三十里的某地，驻扎着新开来的白军一连，他想带着队伍，去解决那个连。独立团的最大困难是缺乏子弹，每枝枪平均不到十颗子弹。他想我们今晚应在此间休息，独立团则去行动，以期虏获一些枪枝子弹补充军械。

我赞成王团长这个建议，并要他画一个行动略图给我

看。王团长和在座的长官都很熟悉这一带的地形，但却不会绘图。我告诉他们学会绘图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行动战略图，我就不会了解他们的行动计划，部队长官的指挥，也不一定会准确。他们于是遵照我的意思画了略图，画得实在不高明，他们确是第一次学习，官兵们在那里七嘴八舌的纠正偏差，好不容易才把这张图拟定了。

接着，我告诉他们白军这个连已在那里驻扎了好几天，可能建筑了工事，最好能派一位干探去侦察一下敌军驻地附近的情况。那位瘦小的徐政治部主任，自告奋勇的愿意去，预计黄昏时可以赶回来报告。他在我们同意之后，就化装去了。不一会，这个原穿着军服的徐政治部主任，居然维妙维肖的化装成一个手提粪箕的拾粪农民。我非常高兴的看着这个“拾粪农民”的背影，向对面的小坡走去。

午后，我休息了片刻，又更多的了解了这个独立团发展的经过。这个独立团是由农民自卫军蜕变而来的。鄂豫皖苏区各乡村都有农民自卫军的组织，按连营团的编制，每乡至少有一连，多的有一营；每区多数有一团，还有多于一团的。自卫军的士兵就是各乡村的壮丁，平时务农，有事时集合行动。这些自卫军统归各县苏维埃政府下的军区指挥部指挥，又名为“不脱离生产的地方武装”，各区乡的自卫军夺取了敌人的少数武装，便由自卫军中的精干分子装备起来，形成某区的独立连，独立连的士兵于是脱离生产，经常行动；这又名之为“脱离了生产的地方武装”，也就是由自卫军转化为红军的一种过渡组织。这种独立连通常人数是足额的，武器最初只有一二十枝步枪，多数无

枪的士兵仍携带梭镖作战。步枪逐渐增加的结果，也就能够单独担任游击的任务。这个黄安独立团，就是由这样的六个独立连编组起来。

那位农民出身的黄安独立团王团长，在他的同伴中，资格算是最老。一九二七年初，他已是中共党员，当地农协的负责人。武汉分共后，他是高桥区一带率领农民打游击的少数领袖之一。那时他已是这里唯一的土生土长的游击健将了。他的同伴们都敬佩他，但也有人批评他“老大”（即自视资格老有些自高自大的意思）。那位徐政治委员被称为“大徐”，而徐政治部主任则被称为“小徐”；他们都是学生出身，在这一带工作很久，游击战的经验则不算丰富。团部里参谋文书等人员都是本乡的低级知识分子出身（有的是道士的徒弟，有的读过几年私塾或小学）。连排班长多数是因战功而提升的，少数则是红军中的战士，因不愿背乡离井乃留驻当地，或因作战受伤，痊愈后便被派到这里来。

正规红军在鄂豫皖区只有第四军，组织比较健全。地方武装的独立团在组织上则远不如正规红军，它没有机关枪，这是与正规红军不同的第一点。它没有单独的卫生组织，伤病兵都得交由当地苏维埃政府处理。它也没有单独的补给组织，全团官兵从来未领过薪饷，只是按时由当地苏维埃政府，杀猪宰羊，犒赏一顿。全团所需被服鞋袜，也由政府发动农民代为制办。他们在苏区内驻扎时，由政府供给伙食，到白区行动时，就自行打土豪，解决补给问题。

到了黄昏，我们的“拾粪农民”回来了。他手舞足蹈的告诉我们，一切都侦察清楚了。他在那连白军驻地附近，拾了满筐的粪，白军士兵就地拉矢，其驻地四周的粪真是多极了。他已将满筐的粪交给前面一家农户，赢得农民的谢意。他侦知这一连白军都驻在那个山坡上的一所庙里，庙旁的山冈上筑有一个圆形工事，但没有设置障碍物。通往那个庙的道路，以及构筑工事附近的情形，他都弄清楚了，沿途民团驻地也没有甚么变动。

王团长根据徐主任所侦知的情况，下达夜袭命令，时间算得十分准确。十时，这个独立团的第一营，就已集结在团部门前的广场上。我对他们作简短的讲话，嘉许他们的英勇，鼓励他们努力争取胜利。这个队伍旋即按计划悄悄出发了。我、陈昌浩和那位交通以及几个病兵留在团部内休息，由留下的几个兵为我们警戒。

翌晨，天将晓，一个从前线归来的传令兵，高声向我们报告胜利的消息，并说王团长带着队伍，随后就到。不久，得胜归来的王团长向我报告，他们已歼灭那连白军的大部分，获步枪四十余枝，子弹约五千发，俘虏五十余人；除已将所获枪枝弹药，由各连分配外，俘虏经过简单的宣传后，已经释放了。我方仅有几个轻伤，已送往高桥区苏维埃政府照料。

王团长等都向我道贺，说这次胜利是我的正确指导所获致的。徐政治委员更说到这次行动因有徐主任的侦察，没有经过甚么激烈的战斗，就进入了敌人的驻地。除黑暗中逃跑了一些人以外，敌人概被包围缴械。以前每次行动，

多是带着队伍出发，看见情形有利，就干起来，否则退回来，不免空跑一趟。这次计划准确，因而获得空前的胜利。他们在回途中，检讨战绩，大家一致认为如果没有我的提示，似不会有这样圆满的结果。

我同样为他们祝贺，并说这是全团官兵和苏区民众一向英勇奋斗的结果。我还向他们说到下次行动时，要注意缴获敌人的文件，并带回一两个俘虏，以便询探敌情。敌人弃置的军用品，如工作器具等，都要虏获回来。他们赞成我的意见，也承认他们自己“游击习气”过甚，只注意虏获枪枝子弹，其他就不大注意了。

十日午后，这个得胜的队伍护送我们向北进发。由独立团驻地（苏区的边缘）到高桥的中心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有三十华里之遥，那是我们所要到达的目的地。我开始领略苏区的一般情况。

这一营人装备着新虏获的枪枝子弹（每人平均有三十发了），精神抖擞。在苏区内行进，不用戒备，可以时行时歇。我这个走坏了脚的“伤兵”，坐在临时用竹竿扎好的轿子里，随同团部在队伍中间跟进。我们胜利的消息，早已夸大的传遍了各处。沿途的农民争着来看我们所虏获的枪枝子弹，和我这个来自中央为他们所称誉的“赛诸葛”的丰采。

当地农民与独立团的官兵相处得水乳交融，沿途有不少农民伴着队伍一同走一段路，祝贺胜利之声不绝于耳。他们和独立团官兵的谈话，也是极其亲切，看见我坐在轿子上，他们有的以为我是被俘的土豪，因而说：“为甚么不

把他四脚朝天？”或者说：“好一条白肥猪！要值串把大洋吧！”战士们抢着纠正说：“不要瞎说，他是我们的中央。”农民们听了“中央”二字，仿佛是“真命天子”似的，不禁伸伸舌头说：“中央呀！领导我们打胜仗的中央呀！了不得，我说错了！”

我们的队伍在沿途村庄上休息的时候，农民们兴高采烈的将准备好了的茶水，供给战士们解渴。村庄上男女老少都围拢来观看，战士们也非常和蔼的告诉他们，我们是新从中央来的人，特别将他们新缴获的枪枝子弹，夸示一番。这种与农民亲若家人的情趣，是国民党区域里所看不见的。

这些事使陈昌浩高兴得了不得，他觉得出乎意外的发现了许多奇迹，特别是战士与农民的亲密关系，军民对中共中央的信仰，军民一致进行游击战争等，为之赞赏不已。他在那里注意了解实况，也觉得他过去所学的军事知识，许多是不适用的，要从新学习游击战术。后来他终于担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的重要职务，成为灵活敏捷的游击健将。

下午五时左右，我们到达了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的一个大村庄上宿营。这一营人旋即分散住到各民房里去了。也有一些战士请假回家，情形显得有些凌乱。王团长曾向我解释，在高桥区中区，不用戒备，一切可以随便些；各排班纷纷找他们所熟悉的人家去住，但他们都会集住在大厅里，不会出乱子的。有家在附近的战士，请假回家了，明早必能按时归队。

我们和团部驻扎在高桥区苏维埃政府的办事处。这是

幢较宽大的房子，门口挂着两块大招牌，一是“高桥区苏维埃政府”，另一是“中共高桥区区委会”。房子里面除了陈设简单的办公室和卧室以外，还有一间仓库，里面堆满了农民所捐献的布鞋草鞋袜子之类东西。苏维埃政府人员，正忙着将这些东西分发给战士们。这些鞋袜大小不一，由各战士选用合适的，很费时间。当天，政府还宰了三条大猪，按人分配，犒赏全体官兵。一切放哨做饭等等勤务，概由政府指定本村农民执行，使全团官兵都能充分享受一晚的休息。

我在这里第一次会见了现任中共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李先念。他那时担任高桥区中共区委会的书记兼该区苏维埃政府的主席。这个细长身材的青年人，原系木匠，是一个党龄较老的能干游击家，他的态度严肃，说话也很谨慎。他向我叙述了高桥区发展的经过，现有人口的数字，党员团员人数，自卫军、少先队等等组织的概况。这些事我现在自然已记不清了。

他特别向我说明，高桥区孤悬在鄂豫皖苏区的南端，要经常向四周打游击。如果这个黄安独立团离开了这个区域，白军和民团就要乘机来侵袭。高桥区各地都布满了放哨的单位，敌人进袭时，顷刻之间，他们就会知道；于是区委和区苏维埃的人员，都擎起武器（自然多数是梭镖），携带文件包，上山去了：一面在山上办公，一面指挥作战，还要指挥男女老幼“跑反”（意即掩护老百姓向敌人不易到的地方藏躲）。自卫军则在敌人的四周骚扰并乘机反击。因此，敌人不敢分兵深入，有时他们能缴获敌人少数枪枝，

有时也遭到失败，人畜被掳去，村庄被烧毁。

李先念所说的，使我对当时苏区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我敬佩他的能干，后来他被调任红四军某团的团政治委员。从此，我们总在一块对敌作战，他也逐渐成为红四军少数领导人之一。

十一日清晨，王团长率领这一营人护送我们继续北行。徐政治委员则率领其他人员留驻高桥区，办理该团官兵所需夏服等类的事。我们当天的行程是八十里，北行二十五里后，便出了高桥区境，要通过约五十里的“灰白区”，然后才能到达七里坪苏区边境的一个村苏维埃宿营。在高桥区内，我沿途所见情形，与昨天所见一样，只是再没有人误认我是土豪了。那些消息灵通的农民，在我轿子旁边走过时，多向我表示亲切的敬意。

将近走出高桥境以前，王团长命令他的队伍改为备战行军。他向我解释甚么叫“灰白区”，就是在本质上仍然是白区，不过区内人们不积极反对苏区而已，我们与灰白区的关系大体上是互不侵犯的。黄安县城离高桥区边境不过五十里，董必武就在这个城里生长，他在城里办过学校，在地方上很有声望。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府时期，国民党黄安县委部和农民协会都很左倾。这个灰白区的一些绅士和知识分子多曾是国民党左派，后来国民党反动了，他们有些受牵连，遭到国民党的迫害。因此，这个区域的人们，对“剿共”十分消极。苏区的人也不在灰白区打土豪，彼此一向相安无事。

王团长表示他对灰白区的情形相当熟悉，白军驻在黄



安城内和交通要道的据点上，民团虽散布各地，但也很难到偏僻的地方来，平常我们的便衣人员可以在晚上安全通过，白天有几条枪的队伍，也可以去得。只有黄安通河口<sup>①</sup>的要道是敌人的交通线，我们横过时，要特别警戒。

我们进到灰白区后，情况显然不同了。在路上见不到老百姓，更没有人为我们准备茶水。在田野间照常工作的农民，不敢理会我们。我们停留在村庄做饭的时候，村庄中的妇孺，并不躲避我们，男子则站得远远的，不敢和我们接近。我们向妇女借用东西，或购买粮食蔬菜，她们不仅不拒绝，而且态度和善。王团长解释，这里的男子躲开我们，是怕我们去了后，会遭到“通匪”的惩罚。

午后，我们的队伍快要横过黄安通河口的大道时，发现大道上有大队敌人正向河口前进，王团长侦知这是驻在黄安城内白军萧之楚部第四十四师的一旅人，开往河口换防。他征得我的同意后，开始分散队伍向敌人袭击。我也下了轿子，参加这场战斗。我在苏区唯一的一次坐轿子，至此就结束了。

我们的队伍以排班为单位，分布在一个很广泛的区域内，我和陈昌浩等随着王团长行动，身边也只有十个战士。我们爬到一个山坡上，观察战况。我看见我们的队伍东一堆西一堆，这里放一两枪，那里放两三枪，向敌人骚扰。这就是被人们称誉的“麻雀战术”。敌人表现得很惊慌，不敢向我们反击，他们占领阵地，交换掩护前进，正向一个高山上的寨子集中，我们的队伍紧紧环绕着敌人的四周活动。敌人用机枪四向扫射，枪声愈来愈热闹，仿佛是一场

大战。

黄昏时，敌军都集中到那个寨子里去了。这个寨子四周的城墙系用大石砌成，四个城门也很坚固。据说这类古老的寨子在附近是很多的，大多是太平天国时代，当地人民建立起来作为避难之用。这个寨子里面尚留有一些破旧的房屋和水井，白军就利用这里作为据点。

我们的队伍就集结在这个寨子外一处山腰的平地上休息，王团长派出两个小队，分头摸到寨子城门附近，放了几枪。于是敌人都跑上城墙，向四周放枪投弹，枪声炸弹声彻夜不休。其实，我们方面并没有一个人受伤；我们的战士有爱惜子弹的良好习惯，不轻易放枪，这一夜，敌人损失的弹药自然又是不少了。我们的战士纷纷讥笑敌人胆小，这一夜必定不能安睡。

王团长侦知敌人已将城门紧闭，认为今夜再也没有事了，因命令队伍就地睡觉，连哨兵也不派，似是不愿他的士兵有不必要的疲劳。他在临睡之前向我说：“请睡吧！现在可以好好休息一晚。”不久，他真的睡着了，我这个初参加游击战的人，在震耳的枪声中睡不着。我心中也对阵前睡觉的事，不以为然，便独自起来，环绕这个宿营地巡视一周，所有战士似都睡着了，没有一个人和我打招呼。我向寨子走去，敌人的子弹飞过我头上呼呼作响，我没看见一个哨兵，我在那里慢慢踱着，心里想：让我权充哨兵吧。王团长悄悄走到我的跟前，轻轻地向我说：“你还不放心吗？敌人缩到寨子里面去了，决不敢出来；我们屡次这样阵前睡觉，绝未遇到过意外，而且我们打惯游击的人，说

睡就立即睡着，有甚么风吹草动，马上又醒过来。”我告诉他要严防万一，如果疏于警戒，总有一天会吃亏的。王团长的神情，似仍不以我的话为然，但也只得勉强派出一班人来警戒。

拂晓以前，我们的队伍，已准备好继续打游击。敌军也开始走出寨子向河口方面移动，我们包抄到敌人的右前方去了。当晨曦初露时，我在一个高地上忽然听见成千上万的农民的呼啸声，震动了四周的山谷。王团长告诉我，这是七里坪区的农民自卫军到了。果然，独立团第二营的第四连有一个传令兵来报告，他们这个连知道我们在这里作战，马上赶来配合行动，还带来几千名自卫军，他指给我们看，他们的指挥所就设在前面那座山头上。

这场似真似假的战争是一幅奇景。全副武装的敌军沿着大路，占领高地，踉踉向他们所要到的目的地移动。由于我们的活动，敌军有时被逼停在高地上，不敢前进；除了放枪以外，不作任何进攻的尝试。另一方面，星罗棋布的农民队伍，却极其活跃，四面威胁，企图使敌军陷于混乱，以便乘机夺取武器。

我观察全盘情况，觉得敌军似旨在避免我们的袭击，是消极的逃避。我们的行动却非常迅速，到处试探敌军的弱点，是积极的攻击。但我们也有弱点，就是轻视敌军，不注意自己的隐蔽。我曾向王团长指出，我们如果能注意隐蔽，将更能增加敌人的惊疑和避免可能的伤亡。但一般战士总以为隐蔽是不够勇敢的表现，而且也没有这种训练。我知道要纠正这种缺点，并非一朝一夕的事。

我了解了独立团的作战行动后，就要去看看自卫军。我冒险通过了为敌人机关枪火网所控制的田阪，到达对山的自卫军的阵地，我在那里会见了七里坪区农民自卫军的团长和独立第四连连长等指挥干部。那些自卫军是按连分别集结在各丛林里，每连都有不少的红旗，插在敌军视线所及的地方。队员则拿着梭镖隐伏在树林中。他们时而移动，时而叫喊，也还有些携带箩筐的农民随着自卫军一同行动，这是准备缴获了东西，迅速挑往苏区之用（自卫军到白区去打土豪例带箩筐，以便挑走谷子）。自卫军的团长向我解释，他们的任务是协助独立团威胁敌人，要等到敌人混乱了，才能去参加战斗。

近午，王团长因敌军无懈可击，便将大部分队伍，收缩到敌人较远的后面山头上来了。我代表中央慰问了自卫军之后，也由前线回来和王团长会晤。我们商定由王团长仍带着他的队伍监视当前的敌人，以便等到黑夜再行活动。我和陈昌浩等则继续北行，这里到七里坪区一个边境村苏维埃，不足十里路，只须几个兵护送就够了。再过去全部都是苏维埃的辖区，单身也可行走，不必再由人护送了。至此，独立团护送我们的任务，已告结束。

在我们（我、陈昌浩和那位交通）三人离开前线向苏区中心行进途中，陈昌浩觉得仅仅两天多的时间，看见了不少的新事物：如对敌军的夜袭，高桥区的活动，农民武装向强大的敌军进行骚扰战等等，这些事，他在上海时，从文件中虽也曾看见一鳞半爪，但究竟不太了解，现在亲身经历，才有深切的认识。

陈昌浩向我说起，他混在战士中，听见他们的种种议论，知道他们对于中央十分敬重，对于我们新来的人非常关切。他转告我所听得的一些事情。战士们看见我坐轿子，有点觉得知识分子经不起苦，直至昨天下午我从轿子上跳下来，参加作战的时候，他们又高兴的说：“主席也下轿和我们一道作战了。”今早我要他们注意隐蔽时，他们多觉得好笑，等到我通过火线，到自卫军那边去，有人在那里说：“这位主席真负责，连自卫军作战都要亲自去看一看！”王团长还说：“以前上级不了解实况，乱下命令，以致难于执行。现在张主席遇事谨慎和负责，看来，以后不会再有那类不切实际的命令了！”陈昌浩觉得王团长这种议论，是值得注意的，也是我们所要肃清的立三路线的残余。

不到一个钟头，我们到达了那个村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这是鄂豫皖苏区的边缘。我此后所要说到的，便是这个苏区的概况。

① 河口在黄安西边四十华里，是黄陂县一重要市镇。

## 第三章

# 推行新政策

我到达这个苏区中心后，立即考察实况，开始试行改革，这种改革的性质，用中共当时的术语来说，是反对立三路线的军事冒险，实施巩固苏维埃和红军的正确路线。同时，用这个苏区的术语来说，是反对“游击习气”，亦即反对土匪军阀的倾向。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而且受着许多条件的束缚，不易完全实现。

四月十二日午后，我和陈昌浩由那位交通引路，向七里坪进发。七里坪苏区是鄂豫皖苏区的发祥地，位于黄安北部的大别山麓。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这里便是中共党员农协干部和农民自卫军的逃遁藪，也是一九二八年秋收暴动的一个主要地区，成为长江以北的“井冈山”，它的发展经历是很有代表性的。

从这个边境村苏维埃到七里坪是五十里，沿途村庄都遭受过破坏；特别是那些寨子祠堂庙宇等较大的建筑物，大多只剩下断垣破瓦，都是白军进攻时，为了不让游击队利用来作为据点而特别破坏的。人们往往根据这些遗迹，告诉我们一些英勇战争的往事。当地到处布满了岗哨。我们每走二三里路程，就会遇着岗哨的盘查，比高桥区的岗

哨组织，似乎还要严密些。这些岗哨都由路旁村庄的少年先锋队担任，他们三五成群，日夜轮流看守岗位，盘查行人，传达警报。

我们通过岗位时，要出示路条，答复盘问。那位交通往往指着我说：“这位是中央！”指着陈昌浩说：“这位就是你们小鬼队<sup>①</sup>的总头目！”那些天真的农家孩子，年龄多不满十六岁，颈上系着一根红布带子，手里拿着木棍，听见“中央”二字时，肃然敬礼。我拉着那些孩子，笑着问他们：“甚么是中央？”他们所知的，似是最大的管他们的，甚至比总司令还大的就是“中央”，我故意问：“是不是蒋介石呢？”他们都知道蒋介石是他们所要打倒的反动派，而中共中央才是他们所拥护的。

陈昌浩这个少共中央的负责人，很注意那些少先队的活动。他很详细的询问那些孩子们关于少先队的情况。少先队是少共所领导的，按乡、村和个别村庄分大队中队小队编组起来。每一个村庄至少有一个小队，人数十余人至数十人不等。这个组织专门担负岗哨的责任，在道路上设明哨，在偏僻的山野间则设暗哨。这项工作几乎花费了各乡村的孩子们的全部时间。

陈昌浩认为苏区的孩子们竟能负担着“警察”“海关”等等繁重任务，真是想不到的事。他注意考察他们的工作效率，那些孩子们向他夸耀，捉拿间谍，防止走私，传达白军团进攻消息等项，是他们常做而又很具成绩的。陈昌浩知道那些孩子，多数失学、不识字，便问他们如何识别路条的真伪，他们都是记住路条的暗号和印信的特点，稍

有可疑，就详加盘问，因此，很少漏网。他还问他们如何对付携带武器的敌人，他们的答复是随时能获得村中成年人和自卫军的援助，只要一声喊叫，就有很多人围拢来。

我们走了约一半路程之后，所遭遇的就不是盘问，而是欢迎了。我们所过村庄，总有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少先队列在列队欢迎。我们检阅这些仪仗队时，乡村中的负责人往往向我们解释，乡村中男女大人，都忙着公私工作去了，剩下的只有在家休息的少先队。这无异告诉我们苏区的人力十分缺乏。

黄昏时，我们到达了著名的七里坪。这个小市镇上的房屋，多半历经战火的破坏。虽经苏维埃动员人力先后重建起来，但不能说已复旧观。七里坪区苏维埃政府和中共少共七里坪区委会等机构都设在这里。好一点的房子都被这些机关占据了，穷苦的农民们都挤住在为数很少的房屋里。市镇上已没有买卖，气象显得十分萧条。

我们住在中共区委会的办公处。饭后，区苏维埃主席和中共区委书记以下的党政负责人，都来和我们聊天。我经过这三天行路的锻炼，不再有不惯的感觉，精神抖擞。我向他们说：“先将你们所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提出来谈谈吧！”那位区苏维埃主席回答：“粮食问题是最困难的。现在刚整田插秧，离夏收还有三个多月，全区所存粮食，约计能维持一个月，要缺两个多月的粮，看来要发生严重的饥荒。”在座的人都众口一词的支持这位主席的看法。

他们分析粮荒的原因，认为这一带水田少，山地多，盛产花生，由于苏区和白区的隔离，花生卖不出去，粮食



换不进来。土地已经分配了，因人力和耕牛农具的缺乏，有些田地荒芜。苏区许多壮丁参加了红军和地方武装，剩下的乡民所担任的任务也太多，如自卫军、担架队、运输队等。妇女要做鞋袜供应红军，小孩子要站岗放哨，老年人也要忙着打草鞋，因而人力极感缺乏，耽搁了生产工作。此外，敌人侵袭苏区的时候，牵走耕牛，捣毁农具，更是这些东西不足的主要原因。上级虽然号召加紧生产，并没有解决实际困难，何况鄂豫苏区各机构都设在这个区域内，人数在五千以上，红军经常在这里经过或停留，又增加粮食的额外消耗。这里附近各苏区又都缺粮，没有互相调剂粮食的可能。

他们一向靠到白区去打土豪来解决粮食困难。每当红军向白区行动的时候，农民都踊跃参加，大批自卫军和运输队，满筐满箩挑着谷子回来了。挑回来的谷子，按成分配；自卫军和运输队通常分一半，另一半则缴交苏维埃作为公用。但是现在四周已无土豪可打，除非到很远的白区去，才能取得粮食。

他们也认为到白区去打土豪，引起了白区人民的反感。依照打土豪的原则，是应发动白区当地的农民，自动起来打，由此所获得的粮食，也应该分给当地的穷苦农民，这才不会招致多数人的反感。可是现在是由苏区的人去打，粮食也全部运走，这不仅失掉了打土豪的意义，而且被打的区域，因为粮食被运走了，粮食供应就会不足，粮价也要上涨；此外，自卫军和苏区农民到了白区之后，那里还能分辨土豪不土豪，还不是见粮就“打”。糟蹋粮食的事也

是在所难免的。因此，白区的农民往往站在民团方面来对付我们的游击队。鄂豫皖苏区的周围，有些地方民团势力日渐强大，可以说主要是因打土豪而引起的。我们明知如此，但也没有其他可以代替打土豪的办法。

我觉得这是急须解决的严重问题。不过这里只是一个区的范围，一牵涉到整个政策，在这里就无法解决。我因此提出增加生产的主张，来和他们商讨。我问他们，你们这里有些甚么早熟的农作物，尤其是在一两个月内可望收成的东西。我还告诉他们，井冈山在缺粮时，一般战士和农民有好几个月只有南瓜吃的故事。

我的意见引起在座者的兴趣，在座的老农们说到他们已往加紧生产工作，是一般性质的。重点也是放在增加稻谷的生产上，其实，这一带盛产瓜菜，一些荒地上，还可种山芋玉蜀黍豆类等，其中多数是早熟的，既不需很多的人工，种籽也是现成的。如果发动老幼妇女注意生产这些菜蔬杂粮，对于渡过这段青黄不接的粮荒时期，将大有助益。

我们商谈的结果，决定了增产早熟农作物的具体措施。我们要求这个区域内每一个人至少都要种五棵南瓜，每户都要增种一块地的蔬菜和杂粮，并要求少年先锋队员们，在放哨或在家休息时，都要尽力做这些事。其他成年男女也应利用片刻的闲暇时间，在住地附近进行这些工作。各户对于种下的农作物，应随时照顾。此外，区苏维埃还应注意不浪费人民的时间，减轻他们的劳役，并厉行节约粮食等等。

在座的人觉得这些办法是可行的，认为加紧生产再也

不是空洞的号召，而是要切实去做的。我也警告他们，到白区去打土豪的办法，在原则上很不对，须要停止。如果他们不在增产和节约两方面努力，那就只有等着饿死。在座的人由于他们已有经验，对于这个问题，似也认识得很清楚，后来事实证明，他们也执行得很起劲，收到了很大的实效。

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和中共特别委员会是这个苏区的最高机关，设在距七里坪北面十五里路的村庄中，由七里坪向北走三十里即是鄂豫皖交界的地方。翻过大别山，再走十五里便到了河南光山的一市镇——新集（后为国民政府改称为经扶县。当时鄂豫皖区的中心机关，就散设在七里坪北面的一些村庄上，不到一个月就迁到新克服的新集来了。这就是后来知名的鄂豫皖区的首都）。十三日早，我们由七里坪中共区委书记陪同向北进发，这是我们这次旅行的最后路程。

我们那天早上走了约一半路程，便到了这个区域的军医总院。我们看见一个大村庄，面临着一条小溪。村庄内有一千多个伤病兵，这是由军分会军医处直接管辖的。在这个村庄的广场上，有成百的伤病兵，晒着春日早晨和暖的阳光，解开衣服在捉虱子。这使我联想到这里的卫生问题，当时是十分严重的。一路所见的战士和普通人们，多患着满身干疮，我想这与虱子很有关系。这里的人无法抵抗虱子，因而有一种荒谬的说法：“身上的虱子愈多，革命资格就愈老！”我这个来了不到五天的人，也曾在衣服上捉到几个虱子，足证这个小动物是无处不在的。

村前小溪边，成百的妇女在替伤兵洗涤衣服。七里坪区委书记告诉我，这些洗衣妇女，便是妇女慰劳队。这种组织为鄂豫皖妇女运动委员会所领导，也是依地域分编为大中小队的。这里附近村庄的妇女慰劳队，轮流来为伤病兵洗衣服，缝补衣袜，帮助料理伙食，并为医院洗绷带。因为绷带不易得到，所以一条绷带必须常洗，一直用到完全破烂为止。不在医院附近的妇女慰劳队，经常也是工作纷繁，如代红军缝补鞋袜织补衣服等。反动派造谣说苏区的妇女慰劳队是营妓性质，其实，这是与事实不符的，她们不仅工作忙得很，而且有很多是老太婆。

那位区委书记，提起这个医院，就觉得很伤脑筋。他告诉我们，这个医院院长，前几天就被伤兵打伤了。伤兵特别暴躁，伙夫的伙食做得不好，护士照顾不周，都会引起伤兵们的不满。他和其他同志到这里来慰问伤兵的时候，也曾遭到他们的奚落。其实，医院所欠缺的东西太多了。医生、护士、药品、以至医疗用具无一不缺，也难怪伤兵要闹别扭。尤其是动手术的时候，因为缺少麻醉剂，接受手术的伤兵往往会痛得惨叫起来。这又使其他伤兵听了寒心。这个医院的政治部成为伤兵责骂的对象，军委会也毫无办法，老是要医院负责人忍耐，不要触怒那些伤兵。

我们在这个医院巡视一周，觉得医院的负责人大致上做到了他们所能做的事。那些伤兵们都住在民房的大厅和较好的房间中，窗户都已经改大了，也增设了新窗户，空气和阳光是充足的。伤病兵都是按伤势和病情来分类居住。约有半数睡在木板上，其余则睡在稻草上。所有病房都很

干燥，也收拾得很干净。各种娱乐设备，在当时条件许可之下，也是应有尽有，伤病兵在这方面相当感觉兴趣。因此，我想到引起伤病兵不满的原因，大概不是医院当局的力量所能克服的困难。我只有向伤病兵和医院负责人，表示一般慰问的意思，也不敢作过多的承诺。

由这个医院再往北走七八里，便是鄂豫皖边区政府所在地。这里的最高领导机关在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设有组织以前，是中共鄂豫皖特区委员会。特委会之下，设有组织部、宣传部、军事委员会分会等机构。黄埔第四期学生曾钟圣担任特委会兼军分会书记，郭述申任组织部长，徐立清任宣传部长（郭徐二位都是湖北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军事委员会分会虽是特委会的一部份，但又直接接受中共中央军委会的领导，它的权力很大，机构也很庞大。所有这个区域的红军、各县苏维埃政府的军区指挥部、地方武装、自卫军和其他军事机构，概由它直接和间接领导。军分会之下设有军司令部、参谋部、政治部、军医处、军需处、军事学校等直属机构。

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那时实际还没有健全的组织。一般人觉得政府还不过是由军队所撑持出来的。政府机构的负责人员多是这个区域有声望的老同志。政府委员会之下，设有财务、土地、内务等委员会，和政治保卫局等。政府主席是王平章，财委会主任是郑位三，内务兼土地两委会主任是戴季英，政治保卫局局长是周纯全。

我们由医院出发北行。不一会，王平章、郑位三、戴季英、周纯全、郭述申、徐立清等都在大路上迎接我们。

这些同志们都与我会过面，但有些我已记不清他们的姓名了。我们久别重逢，份外亲切。他们告诉我这里最近的一些军事胜利消息，主要是离这里三十里北面的新集，原是地主民团的坚强堡垒，不久以前被我们围攻下了。由于这个胜利，使我们在河南光山罗山等县的工作更易于发展。曾钟圣还带着一部份军队继续围攻新集以西的几个寨子，目的是要打通新集与罗山宣化店苏区的交通，扩大苏区范围。现在他们已通知曾钟圣赶回来和我会面。

我和这些负责同志会面之后，很注意了解当地的实际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但同志们所希望于我的，却是告诉他们这个区域以外的好消息。每次从中共中央来的要人，首先都要作一篇冗长的政治报告，描述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夸大这个区域以外的胜利，作为振奋人心的法宝。这似是立三路线所养成的作风。我也曾很持平的告诉他们一些各地的实况，他们似觉得不够刺激。我乃强调我们如能将当前的事情做好，就是推进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切实步骤。

我们的讨论仍是从粮食问题开始。我告诉他们我在七里坪时所知道的粮食情况，和已采取的急救办法，要求他们告诉我整个区域粮食问题的现状。

他们告诉我鄂豫皖苏区有两个主要部份：一是以七里坪为中心的鄂豫边区，一是以金家寨<sup>②</sup>为中心的鄂皖边区。在鄂豫边区内，较老一点的苏区有黄安的七里坪区和高桥区，麻城的北区，罗山的宣化区，这些地方缺乏粮食的情况，大致是相同的。其中高桥区因四周连接白区，比较容易解决些，至于新开辟的光山新集区和在新集以东的沙窝

区，粮食的情况还要坏些。这都是经过长时间打土豪的结果。现在那两区的北面，布满了民团势力，而新集沙窝两区的人民大半为民团威胁走了，土地荒芜了，粮食也没有了。

至于豫皖边区，包括六安的金家寨区，麻埠区，霍山的流破幢区，商城的南区，和英山北部的游击地带，粮食状况，大致要好些，因此大部红军，已开到那里去行动和就食去了。他们认为那里的情况也和七里坪一带有相似的地方。六安一带盛产茶叶麻竹材等，但不易运销出去，所需粮食和其他日用品，也不易运进来，而且军队在那里驻扎久了，到处打土豪，同样会增大白区和苏区的对立形势。

关于粮食问题的讨论，迅即扩大为一般经济问题，乃至整个政策问题的讨论。在一般经济政策问题上，除增加粮食生产外，还要解决苏区内部和苏区与白区之间的商业问题，市场价格问题。那时苏区盛行一种强迫规定商品价格的办法，价格也规定得很不合理，如粮食价格一般规定得很低，这就造成了粮食外流的状态。我的同志们告诉我，尽管苏区内粮食缺乏，但仍有少数粮食从苏区流出去。因而我们觉得，要解决粮食问题，就要废除限价，抬高粮食价格，活跃市场，使苏区以外的粮食，有流入的可能，同时使区内的粮食不会流出。土产流出去，换粮食进来。而且苏维埃政府，要全盘改变它的经济财政政策，即由打土豪转变到税收制度的建立，但这又非一时所能完全做到的。

就在这些问题上，表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少数同志如具有立三倾向的戴季英，认为改变经济政策并不能解决

粮食缺乏的实际问题，只有注意军事发展，继续打土豪，同时纠正一些打土豪所发生的缺点，才是比较有效的办法。多数同志如郑位三、王平章等，则觉得打土豪已经造成赤白区的对立，如果继续下去，不仅不能巩固苏区，而且将危及苏区的存在，只有逐渐建立财政经济制度，加紧节约和生产，逐渐废除现在打土豪的办法，才是根本之图。

不两天，曾钟圣从前线赶回来了。他告诉我一些军事情况和他正在执行的军事计划。当时红四军是由邝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军政治委员。这个军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等三个师。第十第十一师各有三个团，第十二师则仅有两个团（其第三十五团尚在扩编中），人数约一万人，枪枝六千多一点；再加上地方武装的枪枝，合计鄂豫皖全苏区约有九千条枪。

邝继勋带着第十一师全部和第十师的两个团到金家寨去了，他们的任务是相机解决驻扎在流破幢、麻埠<sup>③</sup>这些市镇上的驻军，以期夺取敌人武器来壮大自己，并扩大苏区的地盘。那一带粮食较充足，可以在那里多行动一些时候。但从此地到金家寨去，中间隔着约一百里的白区，交通阻隔，因此，无法知道他们行动的近况。

曾钟圣认为国民党政府现在并无进攻鄂豫皖苏区的整个计划，只在边缘上有少数白军配合民团经常骚扰。在新集克服后，他会同余笃三和第十二师师长徐向前，指挥第十二师和第十师的第三十团在新县西北一带地区活动，企图扩大光山星山的苏区地盘。谁知那里的地主们坚守着一些寨子，不肯放弃，我们围攻高山寨时，伤亡竟达千人，



最后还不得不放弃围攻。他觉得要进攻那些寨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当地人民都被胁迫到寨子里去了，粮食和其他的一切也被他们搬到寨子里去了。我们军队所遇到的是严格的坚壁清野，旷日持久，粮食无以为继，攻坚又无重武器，不免招致伤亡。他也承认贫民们追随地主民团，坚决抵抗我军，是由于打土豪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军分会本身组织并不算是健全的，面临的困难也很多。据曾钟圣告诉我，因为干部缺乏，只有优先充实作战部队。这样，军分会本身在人手上更相形见拙了。担任参谋长的蔡申熙，原任第十师师长，因负伤未愈，才改任参谋长，现在他又兼任军事学校的校长，经常在校里授课，不能实际执行参谋长的职务，现在参谋部只有一位年轻的李参谋主任负实际责任，参谋人员少得可怜。军分会政治部主任由余笃三兼任，余到前线去了，政治部的人员多随同前往，剩下的也为数无几了。军事学校学生不到两百人，驻在离这里有六十里的沙窝区，这些学生除上课外，还要担任繁重的警戒任务。军医处和军需处的组织倒是很庞大的，军医处所属的医院经常有四千伤病兵；军需处附设有许多小工厂，如修械厂、被服厂等，还看守着上千个被抓来的土豪，总共的人数要逾二千人。因此军分会的直属机关就超过了五千人。

军需处所看守的那些“土豪”，是按他们的身份，分别予以“优待”，希望他们能设法缴出一些罚款、医药用品以至军用品等。但日子久了，在他们身上愈来愈榨不出甚么油水来了。赤白区的阻隔，白军民团的封锁，以及那些土

豪确缴不出东西等等困难，使军需处这项工作的效果，逐渐缩小。

被俘虏来的岳维峻师长，似是一个最突出的“土豪”。军分会曾向他表示，如果他能供应红军二十万元的物资，就可以释放他。岳也欣然接受这个条件，认为这个数字是他能力所能做得到的。据曾钟圣告诉我，岳维峻这件交易被国民党武汉行营知道了，因而从中作梗。其后运进来的物资，如医药品，不是贗品逾期品，便是有害的东西，而且经手送物资的人，也多是武汉行营派来的特务。曾钟圣也判断不出这是由于国民党政府不爱惜岳维峻，抑是岳维峻有意捣蛋。

根据这些情况，我提出了初步改革计划。我向我的同志们指出，中共中央所给予我们的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这个苏区的根据地，建立坚强的苏维埃政权和壮大红军，以期配合中央苏区（即江西苏区）和其他各苏区一致行动，争取更大的胜利。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中共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方针，检讨我们的工作。某些错误应当纠正的，某些政策应当改变的，都应当立即采取具体步骤。

我表示我初来，许多事还不完全了解，而且沈泽民等同志也还没有到这里，因而我建议俟沈泽民等到达后，再行改组，建立中央分局和鄂豫皖边区省委。在没有改组以前，仍由特委会负责，我则暂以中央代表名义，参加特委会工作。特委会应从速准备召集一次特区党员代表大会和苏区工农兵人民代表大会。这两次大会的任务是厘定我们的全盘政策。

现在所要立即解决的有下列几个问题：一、纠正乱打土豪的风气，立即释放一部份已拘禁的不重要的“土豪”，以期改善赤区与白区间的关系。二、厉行增产节约，解救粮荒，依照我在七里坪所提出的办法，予以适当的补充，立即通令全苏区实行。三、实施新经济政策，其要点是：取消限价，奖励经商，活跃市场，提高粮食价格，输出土产品，建立税收制度和苏维埃银行，发行苏维埃纸币。四、土地政策、苏维埃制度和党的组织的健全等，也应立即研讨其利弊得失，以期实施相应的改革。

曾钟圣对我的主张表示疑虑。他显然轻视了打土豪所发生的错误，认为既要打土豪，偏差是难免的。他还认为我的办法缓不济急，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他以军人的头脑，认为我所说的这些偏差，只有在军事有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才能纠正。他向我说：“我素来认为国焘同志雄才大略，一定有方法取得军事上的惊人胜利，不料他现在竟注意一些不易解决的次要问题。”我觉得这些话正是立三概念的标本，但也不便直接指出来。的确，我那时是不愿意轻易给同志们戴帽子的。像“立三路线的残余”这类的术语，我就没有用过。我强调只有政策正确，又能纠正明显的错误，尤其是不可保有土匪作风，才能获致军事胜利。决不可因果倒置，误认在军事胜利后才能整饬内部，注重政治纪律。

曾钟圣这样的观点，在这个苏区内是具有代表性的，也是不容易完全纠正过来的。我们后来就为了要纠正这些错误，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另一方面，在这个苏区里也有不少深明大义的人如王平章、郑位三，他们极力支持我的全盘主张，认为这是他们早想做的事。周纯全根据他在政治保卫局工作的经验，认为打土豪发生了严重的流弊，主张立即释放拘押中的大部份土豪。蔡申熙是另一位具有声望的军人，同样支持我。他向我指出红军干部中游击习气甚深，邝继勋余笃三的领导软弱无力，师团级干部中有不少个人英雄主义在作祟，他要求我首先注意红军干部的工作，以纠正他们的游击习气。

我认为在讨论中所揭露出来的问题，都不简单。我了解了一些实际状况，更觉得立三路线并非偶然发生，其出发点就是将迅速争取军事胜利放在不适当的首要地位，利用南京政权的混乱和各派军阀相互战争的时机，急剧发展红军，向武汉进攻。这种计划实说不上是无产阶级的近代军事行动，也无胜利之望，但李立三总以为值得去冒一下险。曾钟圣的说法也是基于许多实际情况，有理由可以自圆其说。我设想毛泽东大体采用了宋江在梁山泊聚义的做法，将逐渐扩大自己实力一点放在首要地位。这虽然是惟一可取的途径，但其实际策略，则甚少说明，也许含有甚多农民叛乱的色彩，缺乏无产阶级的气味。

我认真检讨了一番，以厘正我的基本态度。我曾经自己问自己，我能向立三路线让步吗？或者说，是大吹一阵革命的好消息，强调不顾一切争取胜利的方针吗？答案是不可能。因为一九三〇年九、十月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战事结束，蒋氏获得胜利。南京政权内部虽然

仍有许多纷扰，但蒋氏势力是加强了，他可以集中更多兵力，来对付苏区和红军。中共中央搬往各苏区，也并非是因为苏区不久可以有惊人的发展，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在上海和整个白区不易立足之故。此时此地，我如果重复一些李立三的论调，岂非十分可笑。

我能像毛泽东那样，仿佛自己是纶巾羽扇，身怀无字天书，装作未卜先知的军师么？或者说，既然要领导农民，自己就要农民化一点。我认为不可为，而且不屑为。共产主义，显然是一种近代革命思想，而梁山泊主义，显然包含封建迷信等等农民叛乱思想，两者如何能混为一谈。如果用另一种观念来说，也许可以说我太不懂得共产主义的中国化了。

我这个人对共产国际，特别是对斯大林，深怀不满，而且又是不为他们所信任的人，我能以手持共产国际的令箭自居么？我不能、也不愿意一开口就搬出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来吓服那些“土共”。我更没有扮演过手持“正确路线”的“上方宝剑”、处罚那些立三分子和那些形形色色不听话的人。五年以后，和我一直共事的陈昌浩向我说过一些带批评性质的话，其大意是，我是他所最敬爱的领导者，有一些特长为他们所不及，但他直说，他从未听见我吹嘘共产国际，甚至连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名字都很少说到，这是使他心情不安的。当时我承认他所说的合乎事实，但也指出有些经过情形他不完全知道（上文大致叙述了这些经过情形）。

接着我发表了一次总结式的重要演说，我向这个区域

的全体负责干部阐明了我的态度和工作方针。我表明我自己支持巩固苏区和壮大红军的方针，但如何实施，除已有决定外，仍须由我们自己去研究并草拟计划。我自己就抱着一面工作一面研究的态度。我说明江西红军在本年一月间消灭张辉瓒师的胜利，虽令人鼓舞，但是苏维埃走向红军胜利，还有一段漫长的时间。增加自身力量不仅要从量的方面，而且也要从质的方面下工夫。我们应当努力争取战争胜利，扩大苏区和红军，一刻也不能放松使红军成为“王者之师”。我们要淘汰一些地主富农分子，使其完全为中共领导；加强战斗力，不乱打土豪，经济上一点也不乱来，使苏区成为模范政治区，分好土地，政治清明，官吏廉洁，以自别于国民党政府那种鱼肉人民的作法。要完成这些繁重任务，首先要努力使特委会下的所有组织布尔什维克化。

我的主张获得特委会大多数委员的积极支持。我素来的信誉，使那些多少知道我的同志们相信我会领导他们走上较妥善的胜利道路。他们听了我的解释后，表现得心悦诚服，即使是抱怀疑态度的曾钟圣，也转而表示支持。接着我接管了军委会主席的职务（曾钟圣则退居军委会委员）。我也经常参加特委会会议，推行我的新政策。首先是从拘押中的一千多个土豪中，第一批无条件释放了三百多人，其余陆续清理，不久又释放了一大部份。增产蔬菜和早熟农作物的办法在全苏区内，积极推行。苏维埃负责人忙着调配一些粮食，分配给那些极度缺粮的人。苏区内的几个主要市镇，商贾卖贩活跃起来了。有关财政经济的条

例，陆续制定颁行。印刷厂也在筹设之中，准备发行纸币。

军委会的军需处是一个最保守的机构，其负责人对于我的改革甚感惶恐。他们认为释放土豪，使主要财源断绝，将无法解决军队的供应，目前最急迫的就是军队的夏装问题无法解决。我不得不亲自去考察这个问题，清查了军需处的库存，找出积弊和浪费所在。我和他们详细研究如何节省用料，如何利用旧存服装，如何控制发放等办法。结果发现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制成一万五千套，比原拟制成的一万套，多出三分之一。就由于我的这些努力，证明了军队供应不会受到重大影响。同志们的忧虑减少了，改变政策的障碍也减轻了。

我在这个苏区中心，忙了约两个星期，一切工作的进行，大体上已建立了一个新秩序，但我仍没有与红四军广泛接触。我决定到金家寨去，看看那里的红军主力，试图推行同样的改革，去掉一些游击习气，灌溉一些革命的作风。同时，特委会也准备将所属机构迁移到新集去，并在那里筹备党和苏区大会的举行，以讨论我所开始试行的新政。

① 即少年先锋队。

② 金家寨在安徽省六安县西南一百二十里，接河南省商城县界。

③ 麻城亦称麻埠镇，在安徽省六安县西南九十里。

## 第四章

# 金家寨之行

一九三一年四月底，我由七里坪区出发，前往豫皖边苏区中心金家寨，并在红四军中工作了一个短时期。我了解了这个苏区及红四军更多的情况，为我后来提出全盘改革计划，作了进一步的准备。

我翻过鄂豫交界处一座并不很高的山腰，首次莅临我们即将作为本区首都的新集。这个城堡式的小市镇，原系地主们的坚强据点，现在正好为我们所利用。这里的城墙，经历年培修，高大坚固，超越一般的县城，市镇上当铺商店粮仓以及多数住宅，均建筑得颇具规模，为这一带所罕见。在这个赤区中心，这里自然是最适宜于作为首都之用的。当时，地主们早已逃走了，房屋多未遭破坏。同志们正从事于整理市政，计划迁移。

红四军政治委员余笃三率领着第十师的第三十团在这里迎接我。他是从新集西北面的前线赶回来的，他所率领的第三十团则预备护送我到金家寨去。这位工人出身的余笃三，原是武汉时期汉口一个工会的领袖，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为反米夫派的积极分子。四中全会后，米夫派在中共中央得势，使他颇为不安。他对第十二师攻打高



山寨招致重大伤亡一事，引咎自责。对于他的现任职务，他也觉力不胜任。我曾嘱他暂居新集，指导这个区域内的军事活动，一切俟我自金家寨归来后，再行解决。

翌晨，我偕第三十团继续东行。我们这一日的行程共六十里，沿途可以从容浏览。我当时已接任军分会主席，有马代步，一切杂务，也有随从人员料理。因此，我这次旅行，不若前次步行的艰辛，可以专心致力考察各方面的情况。任三十团团长的王树声成为我的向导，他一路向我叙述他在这个区域里所经历的事，使我对这里的发展，有更亲切的了解。

王树声团长在这个区域内是参加游击队最早的一个。他自始就参加这里一个基干的游击队，从队员积功升到团长。因此，他的个人经历也就是这里游击队成长的经过。这个团长，身体强健，行动敏捷，对于本区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谈吐处事，充分流露出久经历练的游击健将的才气。他所率领的第三十团跟他一样，也是在游击战中成长起来的，在红四军中算是资格老而又最有战斗力的一团，共有官兵一千一百多人，步枪八百余枝，重机关枪四挺，这些实力远非黄安独立团所能比拟。全团官兵对于王团长十分敬重，资望较浅的团政治委员也唯他马首是瞻。

王树声眉飞色舞的描述当地游击战的最初发展，现在就我所能记忆的，略志于后：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占领武汉不久，麻城也光复了。那时农民协会开始组织，他正在麻城中学念书，成为C Y的团员，并参加农协工作。他旋因工作积极，升为农民自卫

队的大队长。他们干得非常起劲，“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减租减息”等口号更是叫遍各地；也曾捉过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行。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又提出“分配土地”要求，但没有实行，就发生了国共分家的惨剧。

该年七月间，武汉政府宣布分共，鄂东北黄安黄冈黄陂和麻城等县农协，都遭受到反动势力的压迫。这些农协干部、中共党团员，也有一些国民党左派分子，纷纷向黄安麻城北部的的大别山“跑反”<sup>①</sup>。他们有些带着农民队伍，托着破烂的枪枝和梭镖之类的武器，东一股，西一队，没有统一指挥，也没有一定的行动方针，时而抵抗，时而躲藏，情况相当混乱。

不久，中共中央指示各地，举行秋收暴动，提出“平分土地”，“杀尽土豪劣绅”，“组织工农苏维埃”等口号。他们乃集合这些分散的农民队伍，进攻黄安麻城等县城。那时农民队伍还是乌合之众，毫无作战经验，敌人枪声一响，他们便四散奔逃，受到好几次的重大损失。而中共中央，不知当地的实际情形，常鼓励他们去暴动，未免近于儿戏。

一九二七年的下半年和一九二八年，白色恐怖十分厉害。夏斗寅的第十三师开到黄安麻城一带驻防。夏本人就是麻城人，这一师的官佐也多是本地人，地方情形既较熟悉，又与当地地主民团势力相结。他们捉到农协的人就杀，有全家被杀的，有房屋被焚毁的，并且分区分乡实行搜山清乡。中共党龄较老一点的党团员和重要的农协干部多被杀害，而无辜农民之遭殃者就更多了。这种白色恐怖，自

然也逼着一些人不能不跟着农民的队伍上山。

面对这种白色恐怖，似无法与之抵抗。一般同志不是怕死，就是失望，纷纷逃亡。不少的人埋藏枪枝，改名换姓，逃出这个恐怖区域；另一些人藏在山林深处，每晚更换几个地址，以免遭到杀害。王树声所参加的那一支农民队民，算是最坚强的，藏在深山之中，昼伏夜出，有时集中行动，有时分散战斗，偶尔还能予敌人以打击。但队员损失和逃亡者甚多，他们由百余人，减到五十人，最后只剩十八人了。

王树声这支队伍的十八个人，九个是党团员，其余九个便是大别山中的绿林好汉。那些好汉们原在农民队伍中只占少数，大体还能循规蹈矩的跟着多数走。现在他们占了半数，也就原形毕露了。

在一个月明之夜，那九个土匪坐在王树声等九个共产党员的对面，声言要开谈判。土匪中的头目说：“你们共产党都是傻瓜，性命朝不保夕，还谈甚么‘土地’‘苏维埃’，我们要的是‘吃喝乐’，再也不能跟着你们共产党做傻瓜了。把你们九个人的枪枝子弹和钱财都交给我们，好好分手，否则，我们就来分个高低！”原任这一队的队长看形势不对，和颜悦色的对土匪们说：“请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我们商谈一下。”

他们九人得到土匪的同意，进行密商。结果认为如果火拚的枪声响起来，四周民团必乘机围捕，那时同归于尽。即使民团不来，他们与那些枪法高明的土匪火拚，也是凶多吉少。他们处于劣势，不得不采取让步政策。那个队长

只得向土匪说了一些好话，要求不要火拚，应允将所有钱财，全部交出，但枪枝子弹则须保留，以便对付白军。几经谈判，结果将全部钱财交给土匪，所有九个同志的子弹，还分一半给土匪，才获得了妥协。他们在分手的时候，还相约以后不互相敌对，不互相破坏。

他们九人与土匪分家之后，更是垂头丧气。每人子弹只有十几颗了，又无法补充，形单势孤，前途茫茫，不知所措。王树声当时是队员，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也埋怨队长无能，没有好好驾驭土匪。幸好，当时有一个名叫符定一的队员，是广东籍的老农民干部，提供了一些新的希望，他劝同志们不要悲观，认定打游击是有前途的；他指出土匪迟早要离开我们，现在能和平分手，就是不幸中之大幸。他说他自己在广东办农协时，就有些游击战争的经验，这里的情形，经过近一年来的经历，也已相当熟悉，可以帮助同志解决许多游击上的困难。而且他善于夜间识别方向，懂得江湖上的窍门，必要时他自己可到汉口去购买枪枝子弹。他们听了符定一的话，才又振作起来，并推举他担任副队长。

王树声很敬佩符定一，认为是先进的广东农民运动，产生出来这么一位杰出的人物。符定一在他们最艰苦的初期，以远见、忠诚、勇敢等资质，对这个区域的游击战，发生了起死回生的作用，最后还贡献出他自己的生命。王树声说到这里还问我：“主席认识这个人吗？”我回答：“认识的，他是广东同志，初系广东农协的职员；武汉时期，他被调到湖北农协任干事。矮矮个子，一声不响，很老实，

倒很有干劲。”

王树声继续告诉我，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虽然打了许多游击，经验仍感不足。符定一任副队长后，一切安排都较妥当，他还教他们一些有关这方面的知识。不久，符定一坚决建议，要他们设法去劫夺一些金钱，他好到汉口去购买枪枝子弹。这样，他们又过了一段短时间的土匪生涯。

有一次，队长派王树声和另一个队员去抢劫。这两个知识分子想了半天，觉得无处下手。最后王树声想起他自己的家乡，那里有一个地主家庭，主人是他的远房叔父，他小时候常去他家，一切路径都很熟悉。他们两人躲在那家屋后的树林中，等到天黑，他们蒙着面从后门溜进去，掏出手枪，禁止事主声张。不料这家的老太婆认出这两个蒙面客中有一个是王树声，竟叫出他的小名，这使他羞惭得无地自容。这位老太婆是王树声的叔祖母，知道了他们的来意之后，似减少了畏惧，转头和他的儿子商量，认为这个侄孙子大概是急得无法才来的；如果让清乡团知道了，就要弄出许多是非，不如赶紧给他们所需要的，让他们快些走。于是这个老太婆拿出密藏的一筒袁大头五十元和一包金银首饰，要他们拿走。王树声此时不忍拿那包首饰，只拿了那筒现洋，并冲口而出的说：“谢谢您家！”便与他的同伴，急从后门溜走了。

符定一带着他们几次劫夺来的金钱，前往汉口，购办武器。这是一件极危险的工作，尤其是由说广东话的人来担任，更是令人耽心的。可是符定一很有自信，约定十天准能完成使命回来。谁知到了第十天，仍无讯息，多数人

在耽心他的安全，也有人在怀疑符定一是骗钱跑了。直到第十一天晚上，符定一背着两支新驳壳和几百发子弹回来了。这件事，使全队的人大为振奋。

原来符定一在来回汉口的途中，完全不走大路，也很少走小路，都是在夜间认定方向，通过没有路的地带，逢山过山，逢水涉水。他昼伏夜出的弯弯曲曲行进，避免了一切的盘查，甚至就没遇见过行人。他饿时，便偷吃一些田野间的瓜果之类；忍饥挨饿，吃尽艰苦，回来休息几天之后，才恢复健康。他在汉口时，用江湖窍门，找到广东同乡，介绍他与日本军火商人接洽，才成交了这笔买卖。

由于他们能购买军火，他们的观念也随着改变了。他们在计划如何扩充实力，如何展开行动。他们将这个好消息传播出去，要那些藏躲起来的同志们，把他们埋藏的枪枝和金钱拿出来，重行参加队伍。同志们知道他们所缺乏的子弹，可以得到补充，也可望获得新的枪枝。这样，大家都乐于参加，他们队伍的人数便陆续增加起来了。

符定一从此专门担任这项“跑汉口”的工作，每月至少跑两次，有时还带一个助手去。他这样做了约半年的光景，使他们增加了三十多条短枪和各种子弹；其他如指北针、望远镜、表以及救急药品等，均赖他获得了相当的供应。而且由他恢复了他们与白区党的联系，建立了交通线。从此，他们可以获得中央和湖北省委的指示。可惜符定一的计划还没有全部完成，就在最后一次赴汉口的工作中，再没回来了。后来才知道，他是被国民党杀害了。

一九二九年三月间，武汉一带发生蒋桂战争，黄安县

的七里坪镇和麻城北部的张店镇的驻军撤走了。于是，他们的队伍，开始到处向民团进攻。他们虽仍缺乏游击经验，军事行动不一定很顺手，但已逼使民团集中到较大的市镇，不敢分散行动。他们仍能占有的一些乡村，组织苏维埃，发动农民打土豪，分土地。

一九二九年夏季，王树声所参加的这支游击队扩大到了三百多人。中共中央所派去的徐向前到达了他们那里。徐向前是山西籍的黄埔第一期生，参加过广州暴动和海陆丰的农民暴动。他随后就成了他们的大队长。这个大队新编为三个中队，王树声就升任为其中的一个中队长。据王树声说，他初时听不懂这位大队长的山西腔，常要借助于纸笔。徐向前教会了他们许多军事知识，并发挥他那优越的军事天才，指导他们打游击。从此，他们的军事行动便节节胜利。大队的人数也迅速增长起来，由几百发展到一千到二千……苏区也跟着扩大，其他各地的同志也聚集到他们这里来。

同时，以金家寨为中心的豫皖边区，也由一些当地的同志，和他们一样的艰苦奋斗，建立起另一支游击队伍。在蒋桂战争以后，这支队伍也获得迅速的发展，中央又派了安徽籍的黄埔一期生许继盛去领导，组成一个大队。

一九三〇年中央命令将“鄂豫边区”和“豫皖边区”这两块苏区合组“鄂豫皖苏区”，归中共特区委员会领导，并设立军分会。他们这些游击队合组为工农红军第一军，不久又改为第四军。由曾在四川任过旅长的邝继勋任军长，徐向前的大队编为第十师，徐任师长；许继盛那个大队编为

第十一师，由许任师长。由于军事的继续发展，不久又编组第十二师，调徐向前为第十二师长，以担任编组的重任。第十师师长则改由另一黄埔第一期生蔡申熙担任。此时，红四军师以上的干部大多是由中央派来的，团以下的干部则多系由这个苏区老游击干部担任。

王树声对于许继盛那个大队发展的经历，虽然知道得不多，但总觉得那个大队在发展中的遭遇，似不如他们这个大队在成长中所受的困难之多。他觉得曾钟圣邝继勋蔡申熙等对于本区的成长，并没有甚么了不得的贡献。但他确是推崇符定一，视之为最先的开路者。其次，他认为徐向前是红四军的第二个功臣，是他的长官，也是他的老师，总之，是领导他获得胜利的人。

在一个临时宿营的地方，夜深人静，油灯如豆，王树声滔滔不绝的叙述这些可歌可泣有血有肉的故事，我为之神往，只可惜事隔多年，我的补记自然遗漏甚多，对于王树声当时叙述时生气勃勃的神情，更难一一形之笔墨，不无遗憾。此外，我们也谈到许多当前的问题，这里，我再择要说说。

我们从新集东行，是从河南光山县南部新集区，通过沙窝区，再到商城的清区，然后再进到商城南区的苏区。我和王树声骑着马，先先后后在队伍中行进，我们走了约二十里，便出了新集区境，再在沙窝区走了四十里才宿营。沿途看不见老百姓，路旁村庄有些久已没有人烟，有些仅有少数的老年人。这些村庄的房屋虽还算完整，但因无人照料，屋内泥地上甚至已滋生青草，田地都已荒芜，山头



上的寨子都被毁掉了。这一带的荒凉景象，使我为之慨叹不已。

据王树声告诉我，这一带是他们以前常来打游击的地方。他们初以湖北麻城黄安北部为据点，向北打游击，只要翻过大别山，就进入了河南境。湖北的农民到了河南境，就象到了外国一样，确实有些乱来，这就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感。这一带现已在我们军事力量控制之下。一般农民虽有不满，但谁愿离乡别井，不过由于地主民团百般威胁，宣称那一个不逃离苏区的就杀无赦，因此，除很少的老年人留在家里看家以外，以万计的农民都逃到这里北面的白区去了。

王树声还指点我，如何从破坏的遗迹来识别系红军抑系白军经过的地方。譬如寨子，双方均不愿完整的留下供对方作据点之用，必须予以破坏；但红军破坏必很彻底，而白军的破坏则仅系数衍命令，略事点缀而已。又譬如祠堂，白军也为了不留给红军作营房之用，加以破坏；而红军则为避免引起农民家族观念的反感，不加破坏。再譬如庙宇，白军也常加破坏，而红军则仅捣毁庙内的菩萨，以破除迷信。至于普通民房，白军也有任意破坏的，红军则绝不损及民房，因为我们已不再采用烧杀政策了。

王树声说到他们曾号召这一带逃走了的农民，回家安居，但尚无显著的效果。这一带的农民逃得并不远，多数群聚在距这里几十里路的白雀园区一带，沙窝区北境。地主民团把守着几个寨子，作为对我们的封锁线，每个寨子里都住着成千逃亡的农民。我们红军的政治工作人员和苏

区的工作人员，常向这些寨子喊话，要他们回来，但结果总是双方对骂一阵。

王树声也承认以往“乱打土豪”的行动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曾和他详细计议这件事，我主张向苏区和红军干部进行广泛教育，纠正乱打土豪的作风，号召逃亡的农民回家，并保障他们的安全。所有回家的农民，只要不再采取行动反对苏维埃和红军，一切旧账，都可置之不问。王树声和他的同僚们都觉得这是应该采取的步骤。后来我们在这一方面作过不少的努力，好不容易这一带才有半数的农民陆续返回他们原有的村庄。

苏区周围各个区域的情况极不相同。我们即将进入的清区，要算是一个特别的区域，为改良主义的民团势力所统治。该区首领是大地主顾某，他任区长和民团队长，我们的人称之为“顾狗子”。我的同志们常说：“顾狗子这条老狗，是我们最厉害的对头。”

王树声也称许顾狗子是一个反共能手。顾的一个外甥在武汉政府时期曾是C Y团员，有些社会主义的知识，回到清区后即脱离了团的关系，成了顾狗子的智囊。他提出了一套改良主义的办法，为顾狗子所采纳，制定成为他这一区的公约，约二十余条，其要点是：实行二五减租，借贷利息不准超过百分之二十，保境安民，阻止兵匪官吏入区骚扰，区内人民如参加红军游击队杀无赦等等。

顾狗子实施这个公约，一面安抚农民，另一面建立他个人的独裁，简直成了一个土皇帝。他将他家里的大厅布置成为一个公堂，大小事务，概由顾狗子坐堂解决。他家

门前的广场上，竖了一根大旗杆，挂起一面“大将军八面威风”的旗子，并私设一座断头台，如捉到通匪奸细，即铡掉人头示众。

顾狗子对付我们的办法，是以游击对游击。他将这个区域内原有山寨都毁掉，他从不采用坚守寨子的策略，认为这是防御的下下策。他主张利用熟悉的地形，和我们在野外作战。他搜括了不少钱财，购置了长短枪三百多条，组成一支坚强的民团。红军进入这个区域，如果人数少，他便动员民团和一般老百姓，四面包围来解决我们；如果我们的人数多，顾狗子的队伍便躲在山林深处，相机踩我们的尾巴，或实施夜袭。他们打游击的工夫与我们不相上下，因此，王树声认为需要有一团人，才能护送我安全通过清区。

翌日清晨，我们走了十五里，便进入了清区。我们在一个山冈上的茶店休息，这个茶店内只有一个老年人照料。我的同志们告诉我，我们进入清区，男女老少早已躲到山林去了，这个茶店的老年人便是顾狗子留下的侦探。第三十团政治部主任特别找那个老年人说：“快去报告顾大老爷，说我们是借路经过的，只在休息地点喝水造饭，不会损害一草一木，叫他不要留难；否则，当心我们的报复！”那位政治部主任还坦率的告诉那个老年人说：“我们是有名的第三十团，全部在此，有枪八百多根，有重机关枪四挺，不要讲错了！”那个老年人果然抄小路去报告。

我看见这种情景，颇为奇怪。我问王树声，是否彼此之间有互不侵犯的谅解，王树声说：“没有。”他们确曾派人

与顾狗子接洽，要求成立互不侵犯的谅解，但被顾狗子拒绝了。因此，我们与顾狗子之间经常接火；现在告诉他我们的实力和企图，无非是要他不要轻举妄动，来阻碍我们的行程。果然，我们一直通过清区，没有遇着甚么阻拦，只在我们离开清区时，他们才无目的的放了几枪，我们大家笑着说：“这是欢送我们出境的礼炮哩！”

我一踏进清区，便觉得这里的情况，与前此所经过的沙窝区迥然不同。沿途所见阡陌都是绿油油的，很少荒地，山上还新种着参差不齐的小树，道路平坦，桥梁坚实，足见顾狗子对于农村建设十分注意。路旁农舍也都相当完整，我所进入过的民房，屋内布置也大多井然有序，有的人家厨房炉火熊熊，大概屋主人是刚上山去了。我看见顾狗子所统治区域的这些情况，觉得这个土皇帝在安定农村方面，比蒋介石还要高明些，如果蒋介石能向他学习一些办法，也许我们的困难更多了②。

清区这种情况，使我忧虑起来，觉得苏区发展不易。我详询王树声其他各区的情形。王树声说在这个苏区的东面系麻城东八区，是地主势力的坚强堡垒。这个区域内到处是寨子，地主的武力相当雄厚，自太平天国以来，历经世变，那里就一贯在实施保境安民的政策。那里的地主们虽没有顾狗子那一套改良办法，却也维持着半独立的状态。我们如果进去，他们便全力抵抗；他们除了完粮纳税以外，也不奉承官府，更不轻易放白军入境骚扰。他们区域内没有土匪，秩序安定，因而农民尚能安居乐业，我们的农运也一直没有发展到他们那里去。

鄂豫皖苏区的北面，是淮河流域的平原。从新集往北走约一百里，都是山寨子林立的区域。再过去便是水寨子的势力范围了。地主们在平原上建筑城堡式的房屋，周围挖有宽而深的护城河，出入设有吊桥，经常有人防守。这些水寨子也是多年来为防匪患发展起来的，尤以太平天国时为最盛。王树声觉得这些水寨子比山寨子更能持久防守，挡住了我们向北发展的道路。

这个苏区的南面是长江，沿江又有武汉等重要城市，西面则是京汉铁路，都是国民党驻有重兵的地方。邻接苏区的那两方面，到处都有民团，它们编制大多是小股的，只能配合驻军行动，远不如清区和东八区那样有战斗力。此外，如豫皖区的六安霍山英山一带的民团势力，则比较脆弱，因而是我们发展阻力较小的地方。

光山有一个民团，人枪在千数以上，算是我们周围编制得最完整的一个最大民团。其首领以办理团练，救平太平天国的曾国藩自比。他主张联合鄂豫皖区周围的民团，充实战力，统一指挥，负起剿灭我们的重任。王树声觉得国民党军队与民团之间，也是互有矛盾的；蒋介石要排斥杂牌部队，似不会让民团获得发展，也不会让曾国藩再生。

王树声提供了上述这些重要资料，使我初步了解民团与农运相互消长的关系。我觉得武汉时期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得那样快，湖南民团势力薄弱是一个重要因素。毛泽东在赣湘闽一带能大展游击雄才，也许与该地民团势力较弱不无关系。先进的广东农运就受着地主民团势力的沉重打击，一时无法抬头。后起的鄂豫皖苏区，又在强劲的地主

民团势力包围之中，这对于它的发展，不免有重大影响。

清区横亘在鄂豫边区和豫皖边区两片苏区之间，简直是我们极大的障碍。后来我们不知花了多少气力，企图拆掉这片墙，仍无大效。我后来也几次重履清区，并和顾狗子较量过游击本领。如果我们的队伍不是长于此道的话，也许要吃他一点小亏。

我们那天还是安全的通过了清区，从宿营地出发，走了一百里，到达了商城的南区苏区，在一个边境村苏维埃宿营。我们的队伍，受着苏区人民的欢迎，沿途人民，送茶送水，杀猪宰羊，犒劳我们，其情绪之热烈就象在高桥区一样。我们的队伍，一进到苏区也就像回到家乡，与父老兄弟团聚一样的兴高采烈。王团长因护送任务完成，也就带着队伍到第十师的驻地去了。我则另由苏区人员陪同，直往金家寨。

第三天，我和随从人员通过商城南区，走了七十里，便到了金家寨。这是安徽六安县的一个市镇，与河南商城南区毗连。商城南区和六安金家寨区是较老的苏区，而以金家寨为中心。中共豫皖边区地委会就设在这里。和我同时由上海出发的沈泽民夫妇，也于两星期前到达这里。

据沈泽民告诉我，他由上海转浦口，搭津浦车到蚌埠，再坐船到正阳关，然后步行到这里。一路都很顺利，没有像我那样夜间通过白区的艰险镜头。的确，这一带赤白区对立的情况，没有鄂豫边区那样激烈。原来安徽的农运本来就有些落后，在苏维埃运动中，阶级斗争的进行，也不算得激烈。所以这一带民间建筑物破坏的程度，不若七里

坪区之甚。

沈泽民对该区的工作不表满意。他认为这里的中共组织简直不像共产党，一般同志既不知马列主义为何物，也未严格遵行中央指示。这里党团机构、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中，都有不少地主富农分子混入。土地分得很马虎，尤其没有发动群众，自下而上的分配土地。地主富农仍保有很多土地财产。红军将领态度跋扈，瞧不起党和苏维埃，只知将地方武装改编为红军，却又不注意地方武装的发展。乱打土豪的现状相当普遍，粮食倒不是严重问题。

沈泽民主张立即展开党内斗争，改组这里的领导机构，一切要从根本做起。我同意他的看法，却不赞成他采取激进的手段来改革。我告诉他一些我的观感和我已经采取过的步骤。我婉词劝告他，不要抹煞这里同志们的艰苦奋斗的成就。我们要耐心帮助他们，不要过份的批评他们，如果采取激进手段，反易与当地干部形成对立，一切将难于下手。沈泽民旋即接受了我的意见，表示他将缓和他的论调，暂不提起改组的事。

接着中共金家寨地委会书记李某，要求约集全体地委委员和我恳谈，却不愿让沈泽民参加。我答应了他的要求。他们纷纷向我陈述，沈泽民同志一到这里，就批评他们，这样不对，那样也不对，却又没有提出具体的纠正办法，使他们大为不安。

这个地委会相当幼稚，委员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有的入党不久，有的刚从团员转为党员，才具经验，均嫌不足。原来这里的游击战争，是由外来同志发动起来的，

本地的中共组织却是新的发展，而且较老一点的党员多到红军中工作去了，留下的自然多是一些新手，沈泽民对他们严格批评，未免过份。

我鼓励这些同志，说他们过去的努力已是难能可贵。我向他们解释我和沈泽民等来到这里，是帮助和指导他们工作，决不会打击或排挤他们。沈泽民对他们有过批评，也无非是求全切，并没有不信任他们的意思。而且我还直率告诉他们，我已与沈泽民获得谅解，将一致采取具体步骤，帮助他们工作，并说明我们将如何做的大要。

经过我的解释，地委同志们才转忧为喜，他们声言将拥护即将成立的鄂豫皖区中央分局和省委的领导，并与沈泽民和好共事，表示乐于学习和纠正过去的缺点。这个小纠纷解决之后，我的注意力也就转到红军方面去了。沈泽民则负责指导党和苏维埃的工作。

沈泽民与金家寨当地干部间的间隙，虽暂时获得弥补，但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后来还是发生过许多矛盾。沈泽民是一个爱好文学的老同志。他虽是留俄学生中“二十八宿”之一，但与我友谊较为密切，大体能和谐共事。他也许受莫斯科的影响太深了，往往拿联共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山区的“土共”。他是缺乏工作经验的书生，却会背诵马列主义的教条。而当地游击好汉却一切都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懂得甚至不多理会什么马列主义，所以这两者间的矛盾，一直没有彻底解决。

第四军军长卞继勋率领他的军部人员驻在金家寨，我就住在他的军部内，和他朝夕相处。我听说他的领导力不



够，这次我自然特别注意这一点。邝原是四川军队中一位行伍出身的军人，做过很久的团长和一个短时期的旅长。他虽参加过四川兵变，但也缺乏游击战争经验。这回我初次和他见面，觉得他对于下级军官所应有的经验，很是丰富，但作为一个军事最高指挥者，则不免有些缺点。他对战术问题如夜间动作之类，多有独到之见，但谈到战略问题，则创见甚少，也不如蔡申熙那样注意这类问题。

对豫皖边区军事上有过很大贡献的第十一师师长许继盛，率领着部队驻在金家寨东面七十里的地方。他听见我来了，派他的政治部主任到金家寨来见我。这位政治部主任黄同志，资历较浅，一切惟许继盛之命是听。他向我传达许继盛的三点意见：第一，许不满沈泽民，认为这个苏区是红军打出来的，金家寨一带的党和苏维埃的负责人，都是红军提拔出来的后进，沈泽民不先和红军干部接头，企图以党统军，而且对地委委员又采取打击态度，这是不应该的。第二，许不满邝继勋的领导，认为后来的邝继勋缺乏能力，以致军队的领导重心，落在几个师长身上。第三，许有取邝而代之的野心。黄同志说明前此曾钟圣处理这个区域内的军事和政治，都先征求几个师长的同意，师长之中又以许继盛为最能干，是以由邝领导军事的局面，必须有所改进。黄同志特别说到许一向敬重我的领导，但希望我也尊重他的意见。

我再三问明黄同志，知道这些话确系许继盛要他讲的之后，颇为生气。我觉得许继盛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的倾向，非予以纠正不可。我要黄同志先行赶回前线，转告许

继盛，要他尊重党的领导和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不好乱说话，不要表现国民党的军阀习气。我会立即到前线和他详谈。

我在金家寨耽搁了约三天，就和邝继勋及其军部人员到前线去。沈泽民则留在金家寨，指导地委会工作，并等待时机立即到新集去。金家寨东面约九十里的麻埠，驻有国民党军队陈调元部的一旅人，这是最接近该苏区的一支敌军。我方第十第十一两师就隐蔽在麻埠西北约三十里的地方，等候机会消灭麻埠的敌人。我们从金家寨出发，走了约七十里，便到达了我军驻地。

沿途经过的都是山陵起伏的地带，到处都是茶林。这一带盛产六安茶叶，多经由麻埠，独山到苏家埠出口。当地流行着“金麻埠，银独山，苏家埠就是金銮殿”的谚语，描绘出茶叶贸易的盛况。沿途农舍和茶园没有遭受过严重的破坏，各小集镇的买卖，也颇热闹，市面上流通的是银元和铜板，粮食并不缺乏，而且还有些粮食从白区流进来。

这些情况与七里坪区显然不同，使我为之兴奋。但当我细细考察，也发现了沈泽民所说的一些事实：土地改革并没有深入，耕地曾以劳动力为标准草草的分配了，小地主和富农仍保有较多的耕地，有些已分得土地的农民，还暗中向地主缴纳一部份租金；至于茶园竹林等山陵地带，则未分配，大多仍属原主所有。沿途村庄苏维埃政府和民众团体的负责人，多半是比较富裕农民出身的，其中也有小地主和富农。乡村中的一些组织，与七里坪区的相类似，但对中共中央的向心力，远不若七里坪区。沿途人民虽也

同样欢迎我们，但表现得不很热烈。

这里没有赤白区的明显对立，离金家寨愈远，苏维埃的色彩愈淡。据当地同志告诉我，这是许师长的“德政”。最初在这里领导游击战争的，多是由寿县一带来的同志，只有许师长是六安本地人，他提倡“兔子不吃窝边草”，红军游击队在六安境以外可以大打土豪，在商城南区他们就进行得很激烈，赤白区的对立也很分明，可是在六安境内，许师长只赞成打击那些为富不仁的人，打土豪的范围也就缩小了。

我们到达目的地时，这两个师的官长们都集合在广场口欢迎我们。我会见第十师师长刘英，他曾任冯玉祥部的骑兵下级军官，也是被冯派往苏俄的三百多个留学生中的一个。他具有冯部优良风格，善于管理和训练部队，严格服从命令。他的同僚们称赞他身体强健，熟谙许多军事技能，英勇善战。他原是第十师副师长，师长蔡申熙受伤后，他才升任师长。我初次和他见面，也觉得他是一个标准的军人同志。

我早认识的第十一师师长许继盛，是一个才华毕露的军人，爱谈政治。我们见面之后，他很热烈的和我叙旧。他提到他从参加黄埔第一期学习起，历任连排长工作，曾跟我见过好多次，受过我很多熏陶。南昌暴动前夕，他任北伐军团长，因在河南前线负伤，羁留九江，还是我去南昌路过九江时，送他往上海去医治的。此后，他在上海躲了两年，才被派到这里打游击。那天他还准备了丰富的晚餐，为我们洗尘。

当晚我们举行高级军官的军事会议，通过了许继盛提出的作战计划。许鉴于我军在这里驻扎很久，麻埠的敌人已侦知我们的策略，并已严密设防，因而主张绕道去进攻独山，消灭驻在那里的敌军一个团。麻埠离苏家埠五十里，独山则位于这两者的中间。驻在那里的一团敌军，是维持他们后方交通的。我军以一部袭击独山之敌，大部分则用以对付麻埠和苏家埠前来救援的敌人，但对苏家埠敌军（约一旅人）又隔河予以严密监视，主要是诱麻埠之敌救援独山，我军乘机予以歼灭，占领麻埠。

邝继勋军长根据这种计划，下达作战命令，定于第三天绕道袭击独山。第十一师以主力进攻独山敌人，并以一部监视苏家埠敌军，军部则率第十师全部埋伏在独山麻埠间的要道旁，俟麻埠敌军出动救援独山时，即在野外歼灭之，并乘机占领麻埠。

第二天是我们休息的日子。我大部份时间和许继盛恳谈，他向我说明他的主要见解。他批评中央一意巩固苏区的政策，认为这带有保守的色彩，更易被一般苏区同志误解，仿佛红军的主要任务，就在保护他们。他主张红军自由发展，不要负担“巩固苏区”的包袱，应该到很远的地方打游击，以期获得迅速的发展。他认为中共中央派邝继勋任军长，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邝的军人资格虽老，可是游击经验却不如红军的老团长，现在由他担任红四军的最高领导，就失去了发展的前途。许继盛不重视政治工作，并说军政治委员余笃三能力薄弱，其他各级政工人员，又多为后进。因此，许继盛主张中共中央给予他们那些军官

以全权指挥军队的权力。

许继盛也承认红军有缺点，譬如对妇女态度就不对，甚至高级军官，包括他自己在内，也有一些罗曼史。但他觉得这些事都要在军事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才能获得根本的改善。

我曾向他多方解释，指出不可将苏区与红军，党和红军分别开来看。不可有单纯军事发展的观念。红军无论到什么地方都需要有后方的补给，否则便无由发展。因此，需要根据土地革命的政策，巩固作为红军后方的苏区。事实上能否如是，固有待于力量的发挥，但我们在原则上总应如是想法。红军如果失去统一的党的领导，即使有一些很好的军事指挥同志，也许仍会和国民党军队一样，在行动上溢出主义的轨范。红军到远处发展的观念，很可能被误解为只是找一个富庶区域去享受一番，或者专靠军事力量去打江山，那也不过是流寇式的行径。

经过我这番解释，许继盛也自觉理屈，表示接纳我的指示，也没有再提不满沈泽民的话了。我更进而指出，一个中共军人与土匪军阀是不同的，并劝告他不可一味以为能行王道，就比国民党军人高，他还要勉力做一个近代的为人民服务的军人。至于邝继勋同志如果力不胜任，自有正当的解决途径，但不可有取而代之的英雄思想。政治工作应予以重视和充实，不应根据现状轻视它。我也说到我欢迎同志们提供意见，但不愿他们固执成见。许继盛虽满口接纳我的意见，但他后来并没有依据我的承诺办事。

第三天，我军少数部队配合地方武装，由正面向麻埠

之敌佯攻，主力则暗中绕道移向独山。我方军事行动大体布置得很妥当，但沿途的乡村苏维埃组织却充分暴露出了弱点，对我们的照料并不热烈，有的甚至连负责人也躲避了。我发现这些苏维埃组织，不过是空招牌，那些负责人，有的畏惧敌军，有的也许暗通敌军。我们为了保密起见，就连我军此行目的地也不告诉他们。

第四天拂晓，我们很顺利地解决了独山之敌的大部份，获枪约六百枝，但已出麻埠救援独山的敌军，则因我军过早暴露目标，折回据守麻埠区的高山阵地，凭险抵抗。在这些战役中，我也觉得邝继勋的指挥不够精细。他的第一个错误就是过早命令第十师出击，等到麻埠敌军退回阵地坚守，又指令第十师攻坚，因而我不得不向邝建议暂停进攻。这件事，当时在场的高级军官都认为我的处置适当，减少了不必要的伤亡。

果然，麻埠敌军因我军占领了独山，后路已断，不两天就绕道向苏家埠撤退了。我们原料到麻埠之敌，不几天就要逃走，我们正好中途截击，但我军却迟了一步，敌人已先期跑了。这件事又与邝继勋的指导有关系，因为他估计麻埠之敌不会这样快就逃走，所以没有作必要的准备。这使我觉得邝委实不够机警，而且还表现了固执的好胜心。我当时没有表示任何批评，但对红四军领导之改进，已认为是必要的事了。

我乘我军集结在独山一带休息的时候，考察了各单位的内部状况。我觉得这支军队确是中共领导的农民队伍，它有不少优良传统，是从斗争经验养成的，但也有一些缺

点。这些缺点是旧式军队的遗风，并杂有一些土匪倾向，但有些也是由于游击战争滋生出来的。

我军官兵成份百分之八十左右是真正的农民，其中最大多数是穷苦农民。另外百分之二十则是失业的或染有流氓习气的农村游民，其中有些是从国民党军中俘虏过来或哗变投来的。工人成份微不足道。我抽查过好几个连，士兵中带有显著流氓色彩的，也不过各有二三人。我很满意这种情况，认为是有优良的基础。

营以上的干部都是中共党员，连排级干部则有少数非党员。严格来说，这些入党的军事干部，有些也只是形式上的。红军干部的升迁，概凭战功和政治的坚定性，如一个排长要升任连长的时候，团长须根据战功，鉴定他的指挥能力，团政治委员则须鉴定其在政治上的坚定与否，再由师部军部核准任用。红军因经常作战，干部的流动性颇大，但这种鉴定大体上还是适当的。

红军每个连都有中央的支部组织，党员人数由几人到一二十人不等。红军的政治工作，以连为基本单位。连政治指导员指导党支部的工作，平时要讲授政治课，战时要鼓励士气。有时动员全连官兵，帮助驻地农民进行组织苏维埃或分土地等工作。连政治指导员也有时召集全连战士大会，检讨作战经验、政治工作的得失和改善生活等问题。在改善生活问题方面，战士们发言有较大的自由，例如伙食的改良，就由战士们所选出的伙食委员会负责处理。战士们也可对连排长提出批评的意见，但不能作出任何决定。

红军富有团结力，这就是最显著的优良传统。官兵之

间，同甘苦，共患难，大体上确能做到。战时协同动作，大家认为天经地义；如某一连在战争中陷于险境，附近的连必不顾任何危险，全力支援。官长爱护士兵，士兵之间也实行互助，扶病救伤，不计艰险。行军时遇有战士稍感不适，连排长必代其背负枪枝。优待新兵成为普遍的风气，新兵初入营时，老兵必百般安慰，以免新兵生活不惯，新兵被委派的任务，也较轻易，又能获得老兵的协助。新兵如犯错误，也能获格外原恕。凡此，都是与国民党军队显然不同的地方。

但红军中的军阀土匪倾向，也相当显著。红军的制度法规极不完备，有些原则也不能严格执行。军官们恃功而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旧观念还在作祟，他们瞧不起苏维埃，认为这是由他们扶植起来的，应为他们办差。他们虽不敢公然瞧不起党，但却自视为特殊党员。他们到了白区，对乱打土豪，特别是“打土豪不归公”<sup>③</sup>，多少有放任的态度。调戏妇女的事，在苏区内也常发生。在优待俘虏的原则之下，虽没有虐待或杀害俘虏，但私搜俘虏荷包据为己有，则是司空见惯。即或偶尔执行纪律，也只凭高级军官个人的意志，没有什么固定的法律手续。

这种倾向尤以第十一师最显著。从鄂豫边区发展起来的第十师，一切成规较为先进，军政干部地主富农成份较少，党员党龄较久，又能尊重中央已有的决定，这与徐向前的领导有关。反之，从豫皖边区发展起来的第十一师则较落后，军政干部地主富农的成份较多，党员的党龄也较浅，许继盛的声望有时高出于党和苏维埃之上。当我们在



独山一带发动当地农民起来分土地，组织苏维埃的时候，地主与富农常出入于许师长之门，许有时也公然袒护他们。

红四军的一般干部，也很佩服毛泽东在井冈山所提出的“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但有些也以能坚强作战而自豪。红四军缺乏训练，在战场上往往由连排长领导着集团冲锋，因此伤亡颇重，尤以下级干部为甚。干部伤亡了又不易获得补充。在红四军中有一句最流行的话，说：“什么是革命成功，在战场上牺牲了性命，就是革命成功。”这句话的起源，也许就是为了鼓励一般战士，英勇作战，不要怕死；但我觉得这代表着失去前途的消极观念，是有害的。在剧烈的游击战争中，自然养成这种冒险轻生的观念。另一方面，这与李立三的薰陶，也很有关系。我曾坦白指出，这是由游击战争所养成的失败主义观念。我们奋斗，决不要轻易牺牲自己，而是要获取胜利。后来朱德也告诉我，在江西苏区的红军干部中，也发生过同样的观念，他也曾设法纠正。

我知道了这些现状，设计各种改革方案。我觉得这个工作万分艰巨，有些是要拟出计划和制度，有些要进行耐心教育，有些甚至要经过斗争才能改善。我曾召集几次军事干部会议，就红四军中立即可以采取行动的事项，先行提出讨论执行。如严密执行纪律，各师各团实施干部训练，强化政治工作，规定在每一战役前后，尽可能举行军事会议，俾能讨论作战计划及检讨战争经验等等。其他牵涉较多的问题，则拟俟党的大会举行时再行讨论解决。

至此，我在鄂豫皖苏区的考察工作，大体可算结束了。

所有应兴应革事项，我胸中也已略具端倪，急须召开全区党的和其他的各种大会，以推进工作，向更高的阶段发展。

- ① 乃逃避战火的俗称。
- ② 据说顾狗子后来也被蒋介石杀害了，这大概是因为顾狗子“保境安民”的宗旨，被蒋认为是据地自雄的缘故。
- ③ 即将打土豪所获得的财物，没入私囊。

## 第五章

# 新集的盛会

一九三一年六月开始，我们在新集举行了一连串的会议。首先是鄂豫皖区中共党员代表大会，接着是苏维埃代表大会，CY代表大会，妇女代表大会和其他专业性的会议。这些会议的作用都是为了苏维埃运动的正规化，事实上也是这个区域整个工作转向的一个重大关键。

独山战役结束之后，我在豫皖边区作了一些必要的布置后，便随着红军主力向西移动。我们积极筹备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这是该区第一次的盛举。

为了这个大会的举行，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暂时停止。红四军第十第十一两师由独山移驻到新集北面的白雀园区，第十二师也从新集西北地区开到这里来会齐。红四军驻在白雀园区，是因为这里地处两个苏区之间，遇有紧急，易于调动；而且给养也较易解决。红四军这时的主要任务，是休息整理，实施训练。同时也可就近发动白雀园区的群众，建立苏维埃，并打通两个苏区之间的通路。

五月下旬我返回新集。那时鄂豫皖区党政军各机构都搬来了，沈泽民等也先我到达了。从此，新集便成为这个区域的首都。由于机构的集中，工作效率随之增加，气象

为之一新。当时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仍未正式组成，我的主要时间花在军分会的工作上，沈泽民则负责指导特委会和苏维埃政府的工作，陈昌浩则专致力于少共的工作。

至此，我才会晤了阔别已久的徐向前。他在黄埔第一期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露锋芒的人物，我们接触不多，在我并无深刻的印象。这次重逢，我们深谈数次，我发觉他确实具备做这个苏区游击战争的领导者的条件。他的军事见解切合实际，游击战的经验丰富，指挥作战极负责任，对下属则严谨谦和，不失大将风度。他对党和苏维埃极为尊重。他自己的私生活很严肃，没有军阀恶习。他和我讨论政策和实际工作的问题，不像许继盛那样，任意批评邝继勋等领导之不当。

我在军分会的工作很繁忙；因为人手不足，机构不健全，往往要花许多时间去处理次要和技术性的工作。我们的军队数量虽然不多，但单位繁杂，我每天要批阅从各方面来的军事情报，和处理各处临时发生的紧急事件。

在我的同僚中，蔡申熙是具有战略见解的人才。他是老同志，在没有进黄埔第一期以前，就和我一起干过工会工作了。我知道他的头脑冷静、精细，此次我们在这里重逢，他的左手已在作战中残废了，但仍任军事学校校长，工作十分积极。他厌恶军阀土匪习气，主张红军正规化。在军事指挥方面也许不如徐向前，而在战略见解上则往往有独到之处。可惜他不能实际主管参谋业务，我只有在作重大决策时，事先找他商讨一番。

在党员代表大会举行以前，我们即在各方面从事改革，

但效果并不显著，只有经济方面已可看出一些成果。饥荒的恐惧心理已减少了，各地所种瓜菜均已结实累累，十分缺粮的户口，已获得适当的救济，节约的办法也在普遍实行<sup>①</sup>，各市镇的买卖活跃起来了，食盐和布匹等日用品在市场上也不感缺乏，甚至军队所需医药品也可在市场上买到一部分。苏区内的土产在大批的输出，苏维埃纸币的发行额在逐渐增加，在苏区内流通无阻，比白区的现银币的价值还高百分之四。

这种经济开始复苏的现状，对这次党的代表大会是一个莫大的鼓舞。一般同志已不再认为这是缓不济急的书生办法，毋庸等待军事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就可以进行的。他们已不再对中共中央的政策怀疑了，觉得循此前进，前途无限光明。

六月下旬，鄂豫皖苏区党员代表大会在新集一个广场上临时搭盖的竹篷中，隆重的揭幕了。代表人数约九百人，红军和地方武装每个连支部，地方上各村支部等都选派代表参加，（当时该区党员七千余人，团员四千余人。）此外还有列席的和旁听的人员二三百人，济济一堂，可称盛会。

但大会事实上有类于农民的群众大会，代表们不识字和略识几个字的占最大多数，这就使会议的进行特别困难。我们决定每举行一次正式大会之后，必须跟着举行好几次的小组讨论。在小组讨论会上，由知识较高者担任指导，将会中案件讲解给那班文盲听，经过几次的讲解和背诵，如果多数代表，能够记住这一案件的要点，就算是很大的成功了。对案件有意见的，也多在小组会上先行提出

来，以便整理一些要点，在大会上提出讨论。这样，这次大会花的时间就多达三个多星期了。

“什么是共产党？”这个问题是最难解释的。农民和城市工人的观念大异其趣，他们多不知道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因此，苏区的中共同志往往说：“共产党是穷人的政党。”“穷得一无所有，就叫无产阶级。”“每个穷人都能分得一块土地。就是共产主义。”这些解释显然是农民的观念，是不合于马列主义原有的界说的。我们最初还想纠正一些不正确的地方，但愈解释，他们愈不清楚，也只好让他们作这样简单的了解了。

我向大会提出了一篇浅显易懂的政治报告。我说明了这个苏区当前的任务，从中共政策、苏维埃与土地革命和健全红军三个角度来阐释今后工作的大要。我特别解释红军与军阀土匪的区别，要求我们的军队，成为一支中共所领导的、真正为人民福利、能担负革命任务的铁军。纠正一切游击习气（按即土匪作风），要尊重党和苏维埃。纠正乱打土豪、对妇女乱来、自私享乐的观念。尤其要求干部，要以身作则。

这个纠正游击习气和严整纪律的问题，成为大会热烈讨论的项目。许多代表对两个多月前攻打高山寨，伤亡千余人而宣告失败的事件，展开批评。有的检讨说，我们的宣传完全无效。我们向寨子内的人们喊话，说我们维护农民的利益，但寨子内的答话，却是骂我们乱打土豪，甚至将平民的粮食也没收了，又指责我们在某某地方强奸妇女，骂我们言行不一致，接着就是大批石弹射将出来。有的人

又检讨说，无论红军官兵或苏维埃人员都有过破坏纪律的行为，寨子内的指摘，不完全是反动派的造谣，而是有些事实根据的。

许继盛成为批评的对象，是这次大会最紧张的一幕。沈泽民在发言中指出许继盛在多方面保有军阀土匪的习气，单就其对妇女的态度来说，就是最不应当的；许的私生活糜烂，有许多姘头。他质问许道：“你的姘头中，是否有有夫之妇？又是否有被强迫的？这种行为是否破坏纪律？这是不是土匪的享乐主义？又是不是军阀横霸的习气？这配作为一个中共党员和红军的高级将领吗？”

在大会中公开指斥高级将领，在鄂豫皖区还是空前的创举。许继盛极感不安，他辩称他没有过强奸妇女的事，不过是行为较为浪漫而已。他以自我检讨的口吻说，他原是党龄较老的党员，只因打了几年游击，就染有土匪习气，今后他将彻底改正错误，已往过失请大会严予处分。

大会展开的斗争愈烈，牵涉的范围也愈来愈广。原任军分会主席的曾钟圣和任军政治委员的余笃三，也受到斗争狂浪的波及，他们被指责没有及时纠正许的错误，难逃纵容之责，同时他们也自承犯有同样性质的错误。新集有一个新从七里坪迁来的酒店商人，他是“拉皮条”的老手，也受到严厉的制裁。这次批评大会在整饬军风纪方面，发生了积极的作用。一般人都觉得今后不能再乱来了。

最后，我出来结束这一场斗争。我向大会提议，我们最主要的事是要使同志们了解这些错误的严重性，订出共同遵守的纪律规范，并不是要对过去犯过错误而又表示能

悔改的同志立时予以处罚。有些同志曾犯过轻微的错误，只要能改正过来，就可不咎既往，不必恐惧。

根据我的提议，大会转而致力于纪律规范的建立。首先对妇女态度问题，规定犯有强奸妇女罪行者，应受苏维埃法律的制裁，严重的要处以极刑。对于妇女的其他非法行为，按情节轻重依法予以制裁。除法律的制裁以外，我们还规定应进行广泛教育，提倡男女的正式结合，并在红军驻地附近和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设置接待室，供有夫妇关系或正式恋爱者住宿或谈话之用。

大会通过一些条例，建立苏维埃政府的革命法庭和工农监察委员会，军分会之下设立军事法庭，中共鄂豫皖区省委设置监察委员会。就由这些机构来执行维护纪律的责任。

我们主张，说服教育和严格执行纪律要相辅而行。我们反对发动苏区内自卫军和农民到白区去打土豪，以解决苏区内粮食不足的问题；只有红军为了实际的需要，可以在白区征发土豪的粮食，但须发动当地穷苦人民一致进行。我们反对：乱打土豪，打土豪不归公、和私搜俘虏荷包等等，认为这都是不法行为。我们要求所有苏区的人，都要尊重苏维埃的法律，尤其是红军官兵，不可有违反苏维埃法律的行为和藐视苏维埃的态度。我们反对苏维埃工作人员倚势欺压老百姓。我们要提倡党内民主，反对党的干部任意强迫命令一般党员。

土地问题是这次大会另一个重要项目。沈泽民就这个问题向大会提出报告，主张重行分配土地。他说明这个区



域的土地虽已大致分配了，但分配得不好，主要是：一、分配的原则系以劳动力为标准，仅依土地面积的大小来计算，而忽略了土地的肥瘠良莠问题。而耕牛、农具、山林、茶园等，还多未分配；二、在分配的时候，没有发动群众反地主富农的斗争；地主富农虽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但在有些地区，他们仍在经济上占着优势，保有政治上的潜势力；三、分配得不确定，经界不显明，仅凭分配时所插的标志来认定，而这项标志历时稍久，多已湮没无存，引起许多混乱，因而必须重行分配，另以土地使用证为凭；四、代耕制度原是优待红军的好办法，但被滥用了，苏区内参加红军的人员已经很多，苏维埃工作人员和地方武装人员的田地，也多援用红军条例要老百姓代耕，这样，使老百姓的劳力更感不足，影响了生产，应严格拟定代耕制度，缩小代耕制度范围。

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是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给穷苦农民；富农多余的或出租的土地也在没收分配之列。在理论上说来，平均分配土地，本与社会主义无涉。中共中央认为这种做法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应采的政策，既可以满足一般穷苦农民的土地要求，更可以发动广大农民起来斗争。其实土地国有和农业生产社会化，才是社会主义的起点。每家农户分得同样一份土地，不过是将地主富农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分散的小农制而已。每个分得土地的农民都不过是小所有者。

实行平分土地，是很复杂的工作。因此，各个苏区推行得并不完全符合理想，步骤也参差不齐。主要原因是农

村的阶级分化并不明显。从主观去划分阶级，本是极困难的。一般说来，中国农村中，大地主为数不多，土地分得很零碎；中小地主占相对的多数。有一片很小的土地出租，不能不说他是小地主，可是他的境况，也是贫苦的，甚至还是靠出卖劳力为生的。农民穷苦与否，有时也不能单凭有无土地来划分，往往一个自耕农甚至有点土地出租，家境确不是富裕的；而另一个佃户虽无土地，但租种大片土地，要雇用一些雇农代为耕种，家境却是比较富裕的。还有乡村中商贾负贩和一些手工业者，也附带经营农业，有的被视为农民，有的又被视为商人或手工业者。就由于这些复杂的经济因素，要去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确非易事。

中国农民历来所希望的，是买田置地安居乐业。平分土地的口号，对于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苦农民，确是富于吸引力。可是，受过革命洗礼的鄂豫皖区的农民，对于平分土地，了解得更清楚。我曾询问过许多农民关于平分土地的观感，他们多数说到要苏维埃站得住，土地分了才能算数。有的却说单分得一块土地，没有耕牛农具和本钱，还是不济事。这些简单的答话，道出了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没有政治保障和必需的经济条件，单凭分土地，不能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

从莫斯科到中共中央的教条主义者，却夸大了平分土地这个政策的魔力，认为只要能正确的实行平分土地，就能创造出苏维埃政权。其实，没有一个反帝国主义和反南京政府的广大联合战线，单纯的土地革命也是形单势孤，

不易成大事。另一方面，立三主义者，则以军事胜利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先决条件，所以对于平分土地，不予以必要的重视。

我们在这次大会中，曾极力鼓励同志提高农民对于分配土地的热情，指出：平分土地与巩固苏维埃政权是相互影响的；广大的农民群众，热烈的起来分土地，才能巩固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稳固了，农民分得的土地才更有保障。此外，各个苏区土地革命所形成的力量，汇合全国各地反帝反南京的力量，才能获致苏维埃政权的胜利。我们这些努力获得相当的成效，我们虽不能将平分土地的运动扩大为到处泛滥的狂风巨浪，但却鼓舞了这个区的农民，勇敢地平分土地，与反共势力对抗。

这次大会决定：不问已否分配土地的区域，概须发动群众，按新规定来分配。分配的标准，是以土地的收获量所值市价计算，每个穷苦农民分得一份大致有同等收益的土地（田与地混合来算，肥瘠搭配来分）。此外，这个区域在以前分配土地中，也有很多优良的传统，如贫农雇农分好田，中农土地不动，地主富农分坏田，商人手工业者分得田后必须自己耕种，大口分一份，小口分半份等等，这次大会决定将这些传统办法尽量予以保留。

此外，各乡村中也还有一些土地不能完全分配的或不易分配的，如大片的森林、茶园、竹林、水塘或其他水利设备，较大片的荒田荒地，则由各乡村苏维埃经营，名之曰苏维埃公田公地等。在立三路线时代，曾利用这些公田公地，组织所谓“集体农场”。我们不赞成这种办法，提倡

出租或组织合作社经营，由苏维埃征收租金；大体是经营者获得必要的报酬，其余则为苏维埃所公有。

大会还决定了耕牛农具也要分配，但鉴于这类东西分配不易，又规定了一些实际处理的办法。由于耕牛农具的缺乏，每个农户也不易分得同等的一份，因而提倡共有共用，如几户人家共分得一条耕牛，则由这几家拟定办法，规定饲养和工作的方法。以后在赤区内所通行的换工互助办法，大致就是从共有共用的制度演变出来的。

重分土地的实行方法，是先由各村苏维埃召集农民大会，检讨从前平分土地的得失，再由各乡村苏维埃的土地委员会予以评定。已经适当分配的则大体不予变动，不适当的则迳行变更。为了防范地主富农对于土地改革的反抗，大会主张充实贫农团，用斗争方法强迫地主富农交出被没收的土地房屋和耕牛农具等，但并没有订出任何故意打击地主富农的威风等手段。

土地分配定了，就由各乡村苏维埃造具地籍簿，颁发土地使用证。大会中许多农村代表曾主张颁发土地所有证，以确定一般农民分得土地的永久所有权。但大会主席团认为中共更进一步的目的是土地国有，如果颁发土地所有证，将强化农民的私有观念。大会终于采纳了颁发土地使用证的办法，并规定农民对于土地的使用权，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是长期性质的。所有持有土地使用证的农民，可以自由使用土地，但不得出租或出卖。

硬性规定土地不得出租出卖，似是这次大会土地决议的一个重大缺点。不待说，土地是农民的主要财产，如果

不能自由出卖或出租，这就使土地的使用价值大大打了一个折扣；而且分得土地的农民也会觉得他虽可以耕种这块土地，但是不能自由处理它。不准出卖或出租土地的理由，主要是不让农民重行失去土地和产生新的地主富农，但这种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又是不能抑制的。事实上，当时分得土地的农民还是有些违反这种决定，私自出租或出让这种土地使用权。

在剥夺地主富农的政治权利上，我们倒采取了有弹性的政策。一般说来，地主富农是打击的对象，大会强调不让地主富农分子混迹于苏维埃和红军之中，但对于出身地主富农家庭而在红军中有战功、或系中共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而有工作成绩的，则视为已经革命化了，属于例外，不受歧视。其余拥护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的，纵然是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也可享有普通公民的权利。

大会在缩小代耕制度的范围上也有具体的决定。一个农家的壮丁因参加红军去了，这一家的耕作能力失去了或减少了，因而需要邻近的农户为之代耕。但现行代耕办法是很混乱的。大会规定这种制度仅限于优待红军战士，而且多数是带补助性质的，换句话说，战士家属的劳动力仍须用于耕作，代耕者仅居帮忙地位，并非全部代耕。代耕者与被代耕者之间，必须互相商定何地何时需要补助劳力，以免浪费代耕者的劳力和适合被代耕者的需要。至于苏维埃工作人员和地方武装人员（即不脱离生产者），概不得援用红军条例要求代耕，但奖励他们与各农民间的换工互助，以解决他们缺乏劳动力的困难。

此外，我们还制定了统一的农业累进税，取消过去实行过的征收和借贷余粮等不正规的办法。农业累进税规定每一农户平均每人所收谷子在四担以下者，免征租款；全户所收谷子超越这个基数一担至三担者，征百分之八，循此累进直到收谷子超过基数四十五担者，征百分之四十三<sup>②</sup>（如五口之家收谷子二十担者，免征；收二十二担者，征一斗六升，约为全收获量百分之点七三；又如收四十五担者，规定征百分之三十五，即九担二斗五升，合全收获量百分之二十强；再如收七十担者，则须征二十一担五斗，约为全收获量百分之三十强）。至于杂粮的收获则免征或减征，富农按比例附加百分之五，军属烈属则减征或免征，均另有规定。

这次党代表大会举行时，鄂豫皖区各领导机构都实行改组。大会选举了一个中共鄂豫皖区省执行委员会，委员人数为二十余人，除原特委会委员大多联任省委员外，还提拔了约半数的工农干部担任省委，京汉铁路工人刘琪，当地农民领袖高俊亭等就是这次被选举出来的。沈泽民被选为省委书记，徐立清郭述申分担宣传组织两部工作。省执委会的常务委员会则由书记及宣传组织两部部长、以及苏维埃政府几个主要负责人王平章郑位三周纯全等组织而成。常委会之下，除宣传组织两部外，还设有秘书处职工妇女委员会等等。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鄂豫皖区军分会也同时改组，并改名为鄂豫皖区军事委员会，直隶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委员为：张国焘、沈泽民、蔡申熙、徐向前、曾钟圣、王

平章、郑位三、徐立清、郭述申、邝继勋、周纯全、陈昌浩等。我任军委会主席，蔡申熙任参谋长，陈昌浩任政治部主任。红四军改由徐向前任军长，曾钟圣任军政治委员。原任红四军军长的邝继勋，调任第七十三师师长（初名第十三师，不久改为第七十三师）。原任军政治委员的余笃三，调任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主任。

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的委员人选几乎与军委会的委员是相同的，它只是一个决策机关。我任中央分局的书记，直接指导鄂豫皖省委会和军事委员会两个主要机构工作，不另设置执行机构。中央分局的任务原是很广泛的，须在长江以北发展党和苏维埃的组织、正规红军和游击部队，但事实上它的工作始终没有走出鄂豫皖区的范围，因而显得相当空洞。

我们的组织虽然庞大起来，但我们的组织力量还是很薄弱的，我们的人手也十分缺乏，每个负责干部都兼任几个职务，工作过于繁忙，党员的文化水准十分低落，我们的决议到达县一级的组织，便往往停顿下来，各乡村党和苏维埃的组织，甚至看不懂上级的决议。知识分子极感缺乏，命令的下达往往需要上级的委员步行到各乡村去，向下级负责人详加讲解。这样，工作效率很低，决议的执行也要大打折扣。

省委急谋解决这方面的困难。它调集一些得力的干部，充实它属下的地委和县委的组织，它在一般贫农和雇农中争取新的党员，花了很大的力量，来推进训练和教育工作。省委之下设有党校短期训练班补习班乃至识字班

等。它也奖励各县委办较低级的党校。苏区内的小学，命名虽是列宁小学，但内容则很落后。省委所出版的《党生活》等刊物，也必须经过讲解，一般同志才能了解。

沈泽民觉得要将这样幼稚的党组织，提到布尔什维克的水准，不知要花多少力量和多少时间。他取笑说这是“愚公移山”的工作。的确，这样的党员和干部，缺乏共产主义的观念和一般应有的常识，自然还保有一些旧迷信和旧观念。多数正直的党员只是瞎忙，一知半解的传达命令，这就不免犯“强迫命令”的毛病。少数干部仿佛是“地保”，利用职权来实现自私的目的，如分土地便不难上下其手，自己先分一份较好的土地。这真是哭笑不得的事情，严办与优容，都易发生毛病。

军事方针的确立和领导干部的变更，是刻不容缓的重要措施。我个人认定我们当前的军事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这个鄂豫皖苏区，和适宜的配合各个苏区红军的行动。我们计划将鄂豫边和豫皖边两片苏区打通连接起来；另在已有一些游击基础的英山罗田沂水一带形成新苏区，并使之与上述的两片苏区衔接起来，形成一个较大的鄂豫皖苏区。这样做，我们可以威胁汉口至九江的长江交通线，对于江西红军是一个有力的支援；也可以与湘鄂的红军互成犄角之势。这个计划对于当时红军干部乃至一般同志，都有过极大的鼓舞作用。

徐向前被提升为红四军军长，一般干部为此极为兴奋。红军中军阀土匪习气受到批评，代表这种倾向的许继盛受到压抑，这就给予一般同志一个深刻的印象。一般同志觉



得我们极力提拔那些思想行为都被视为正确的同志，来负担军事领导责任，是十分恰当的。同时，我们并没有排斥那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以对立三路线采取调和态度著称的曾钟圣仍任军政治委员；许继盛受到批评，仍任第十一师师长。这在事实上说明，我们的同志若能改正错误，就不会受到组织上的处罚。邝继勋领导能力不够，似是一般同志所公认的，现在改任第七十三师师长，负担逐渐改编地方武装，形成一个新的师，进一步发展为第二十五军，这仍是一个独当一面的重要任务。而且邝继勋这一师是直接由军委会领导，暂不受曾是他的部属的徐向前指挥，这对邝个人也不是太难堪的事。一般同志觉得这样处理，是煞费苦心而又十分周到的。

我曾向一些军事干部说明这些措施的意义，并要求他们根据上级决定，强化军中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广泛的实施训练和教育，反对游击习气，严格执行军事计划，争取胜利。后来，这种军阀土匪倾向，经过了长期的和广泛的斗争，才逐渐改变过来。我们在大会里的努力，不过是个良好的开端。

建立苏维埃政权是一件更艰难的事，这个区域的人们大多不知什么是苏维埃政府，他们的了解是相当可笑的。少数知道苏维埃是工农政府，“苏维埃”这个字是由俄文翻译过来的。有的说到苏维埃政府是共产国际创立起来的，总机关在莫斯科，中国的总机关在江西，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只是一个分机关。更可笑的，当我和一些普通同志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猜测着说：“苏维埃就是苏兆征的

别号，苏兆征是广州暴动中苏维埃政府主席，因而我们的政府以苏兆征的别号来命名。”另一位则反驳他说：“苏兆征同志已经死了，鄂豫皖乃是苏兆征的儿子。从前皇帝死了，便由儿子继承；现在我们的苏兆征主席死了，也由他的儿子‘苏维埃’继承，因此，我们的政府叫做苏维埃政府。”的确，这个由俄文翻译过来的名词“苏维埃”是太生硬了，一般农民不易懂得。

不用说，一个政府的命名，是有重大影响的。苏维埃政权在这个区域已经有了约三年的历史，仍不为一般人民所了解，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大的憾事。由此，我们也可以推知这个政府的名称，在更广泛的中国乡村中是如何的陌生；甚至在城市中，也不为多数工人所了解。一般人只觉得这不是中国固有的名字，而是从俄国输入来的。他们既不能了解这个政府的真正意义，更说不上有什么同情了。

在党代表大会尚未闭幕时，我们还举行了苏维埃代表大会（其他如C Y代表大会，妇女代表大会以及许多专业性的会议，也都次第举行了，各该会议的详情，这里从略）。这个大会是在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开幕的，为了使一般人易于了解起见，我们叫它为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的代表多半并非经过选举而产生，而是由各级苏维埃政府民众团体和红军各单位推派出来。大会的任务偏重于一些紧急动员的工作，如强化苏维埃各级组织，重分土地，解决粮食困难，推行财政经济政策等。

在这次大会上，一般代表最注意的是粮食问题。不少代表批评已往向农民借贷粮食的办法不妥当。他们根据

事实指出借贷粮食的混乱情形。有些热心革命的农户，粮食被借出去了，现陷于饥饿的困境，得不到偿还，而且因此也减低了一般农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情绪。党和苏维埃的负责人，都在大会上承认了这是一个重大的过失。我们也指出过去在这里所实施过的征发粮食办法固然要不得，后来改采的借贷粮食办法，也是要不得。这都是立三路线的遗毒，今后要改采征收累进农业税的办法。

当年十一月七日，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又在新集举行，这算是一次正式的大会，共到工农兵代表三百九十七人，是由苏区内一百七十万工农兵选民选举出来的。这个区域周围的工农团体也派有约二百名代表前来观礼。这次大会的作用，算是完成了鄂豫皖区苏维埃政权的奠基工作。

大会发布了正式宣言，阐述这个政府的任务，制订了临时组织大纲<sup>③</sup>；根据组织大纲，选出人民委员会的负责人及其所属的各委员会的负责人。农民出身的高敬亭被选为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原任主席的王平章当选为人民委员会委员长。人民委员会之下，设有外交、军事、交通、财政、经济、内务、土地、粮食、文化教育、劳工、革命法庭、政治保卫局、工农监察委员会等十二个机构。各县乡的苏维埃组织，则较为简单；通常一个县苏维埃，设有经常性质的土地财政经济和军区指挥部等重要机构，其余则按需要设置。

这个区域的苏维埃政府只是一个省级的地方政府，当然不发生根本法的制订问题。这个政府所设计的是区域性的政策和实施的条例的制订问题。许多重要的条例，如农

业商业税务等条例，土地分配的条例，军区制的条例，审判制度等，都是由这次大会制订的。

概括的说，使苏维埃政权规模具备，政令推行无阻，是我们那时努力的中心。我们要求军队和人民尊重政府的职权，如果人们不依照政府法令行事，便不能摆脱军阀土匪的恶习。红军高级将领，尤其要尊重政府法规，他们的身份不是特殊的，而是和普通人一样的。纪律对于一切人是平等的，只有党的共同意志可以领导苏维埃政府，但党也不能因此轻视苏维埃政府的职权，一切政令都由政府根据党的决议颁行。

我对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实际体验愈多，愈是为它的前途担忧。我觉得这个政权的能够存在，是以国民党政权的不统一、混乱和残酷的统治为其主要的凭借。这个政权的发展前途也是受着限制的。中共组织力量的薄弱，红军因缺乏补给而不易迅速壮大，土地革命不易冲破赤白区的对立而泛滥到更广大的区域去。苏区面临的众多困难，也需要长期的努力，才能克服。加之敌人的势力远较我们为优厚，我们一时无法瓦解它。

我觉得中共的土地政纲，有其根本的缺点，既不易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斗争，而且偏于对内。经由游击战争发展红军的方针，也为各种条件所限制，难有速效。苏维埃政权的基础更是过于窄隘。这个政权被孤立在地土地革命的小天地之中，不易为广大的工农群众所了解和同情，对于全国各地知识分子和一般小资产阶级，也缺乏号召的力量。对于以城市为中心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更无法建立适当的

联系。

特别在当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占东三省的事实为我们所知悉之后，我更认为中共所领导的苏维埃运动远离了反帝国主义的路线。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规定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是两个并重的主要任务，但苏维埃政权却偏到土地革命的一面去了。我想起斯大林的没有远见，我又想起布哈林在中共六次大会中重视反帝国主义以及不抹煞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等主张，若拿现在的事实来证明，就更为正确了。

我设想如果苏维埃政府能改名为“人民政府”，也许可以开辟出更有希望的途径。我所假想的人民政府仍应由中共领导，以工农势力为骨干；但它的政纲尺度则不妨放宽些，以便号召那些反日本侵略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来与我们合作。如果我们孤立于反日本侵略之外，反会被人民视为不顾国家前途，专以土地革命来损害民族的命运。我曾不只一次向我的同僚们提起过这种意见，我在下文中还要说到这一点。但我自己无法作这种根本改变。苏维埃运动这个根本计划是从莫斯科到中共中央，都屡次肯定了，而且已在各处实行，鄂豫皖区不过是其中的一部份，如果我们自以为是的独断改变过来，那自然是极不好而又是不可能的事。

后来历史证明，中共所领导的苏维埃运动，只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在这个运动中，中共发挥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学习了领导政权和军队的重要一课。但这个运动的本身是失败了。它不是被国民党消灭了，而是在抗日战争之始，

我们自动的转变了方向。斯大林这个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苏维埃运动的公式，也是立三路线和中共内部一切左倾行为的根源。因为这个运动本身是左倾的，所以才产生李立三以军事冒险去促其实现的想法，其他教条主义者更只会在这条公式下兜圈子。我这个较早体验到这个运动的根本缺陷的人，后来竟为此被指为“右倾”或“叛徒”。但我自信我那时的看法是出自爱护中国革命的真诚。

- ① 当时苏区内许多农户的粮食被红军出具借条借去吃了，现在由苏维埃政府酌予偿还一部份；赤区的农民一般每天改吃两顿粥和一顿饭。
- ② 这就是以劳动力来计算的，对于以收获量为计算标准的原则，自然又有辅助的作用，实行时又富有伸缩性，由各乡村土地委员会按各户需要和其劳动力的多寡来评定。鄂豫皖区农业累进税制，详见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通令第七号（载《红旗周报》第二十七期——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版）。
- ③ 我手边已无临时组织大纲的原文，《红旗周报》（第二十七期）曾载有一篇说明这个组织大纲的文字，题为《蓬蓬勃勃的中国苏维埃运动》，可以参阅。

## 第六章 整肃

新集党代表大会反军阀土匪倾向的斗争，曾引起被批评者或明或暗的反抗，终于酿成一次轩然大波的整肃运动，并肃清了一些私通国民党改组派的分子。这种风波之来，与我们所遭遇的内外困难是相联系的。

在党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领导层的内部意见常有参差。沈泽民的态度显然是偏于急进，他主张对那些犯过重大过失的同志，给予各种不同的处分。他不善于根据实际情况来处理问题，爱援引马列主义和中央决定，来批评一般同志观念上或行为上的错误。甚至在讨论军事策略问题的时候，他也提出过红四军力不胜任的主张，这引起一般同志或多或少的不满，认为他的主张不是太过急进，就是有些外行。

沈泽民却不是一个坚持己见的人，也公开承认他的工作经验不够，需要学习；事实上他的左倾空谈也在逐渐减少之中。我常要在会议席上缓和他的急进主张，我们有时甚至要公开辩论，虽然结果沈泽民总是撤回或修正其自己的意见，但使一般同志不无领导层内部意见不尽一致的观感。

在党代表大会将闭幕时，由曾钟圣提议，我和曾钟圣蔡申熙许继盛四人有过一次恳谈。曾许在这次会谈中，尽情发泄了他们胸中的郁积。

许继盛表现得有些伤感，表示他将改正错误；但他的错误已在大会上毫不留情的被揭露出来，到会的军事方面的代表，势必会把它传播到军中去，因而影响他的指挥威信。他感谢我对于他的信任，表示愿意仍任原职，到前线去戴罪立功，不过他总有点耽心沈泽民等不会谅解他的过失。

曾钟圣接着表示，他赞成大会各项决议，愿意忠实执行；但批评沈泽民见解不切实际，动辄给人戴上帽子，打击早已在这个区工作的老干部。他自然不满沈泽民对他的抨击，也为许继盛所受批评鸣不平。

我利用这个机会，向这两个受批评的负责干部详加解释，并予以劝慰。我指出大敌当前，应团结一致对外，一心去争取胜利，不应心存芥蒂。批评错误，在原则上是必要的，批评的技术纵有不当，也只是次要问题。这次大会主要是反右倾的军阀土匪倾向和富农倾向以及立三路线的左倾残余，不应转移目标来批评沈泽民，因为他最多不过是缺乏经验，说话有时不完全恰当，这是可以谅解的。我对他们俩人表示遵守决议这一点，感觉欣慰，鼓励他们努力奋斗。

蔡申熙以老战友的身份，亦多方劝慰曾许二人。他首先表示对于过去的过失不能及早纠正，他自己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能够认真纠正，这就是天大的喜事；而



且过去的错误积重难反，不经过这次大力斗争，很难生效；决不可从个人荣辱出发，抹煞这次批评的意义。如果没有这次批评，我们的前途是“死路”；现在批评出来了，大家如能照此改正，那末党和个人的前途都是光明的。因此这次大会决不是打击了我们，而是救了党和我们。他进而表示充分的信心，认为国焘同志能把握住这支舵，泽民同志也会从工作中学得经验，大家必能毫不顾忌的改正错误，团结一致奋斗。

曾许二人都为我和蔡申熙的劝告所感动，笑逐开颜，一致表示愿毫无芥蒂的上前线去为党的决定而努力。我和蔡申熙也为此高兴，认为内部的隐忧是大部消除了。可惜后来事实的发展，又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我们不愿因会议举行过久而延搁我们的军事行动。七月中旬，党代表大会刚刚闭幕，新任军长徐向前和新任军政治委员曾钟圣，就率领红四军全部向前线进发。他们由白雀园经金家寨开往英山，准备消灭驻在英山罗田沂水广济黄梅一带之敌，在那里发展苏区，并乘胜向北发展，与原有的鄂豫皖区打成一片。邝继勋则仍驻白雀园，编组原有的地方武装第七十三师。他那时还只掌握一千多人，正编组第一个团。这就是红四军出发后，留下保卫这个苏区的一支主力部队。

红四军出发英山以后，敌军自然乘机向这个苏区的周围进袭，我们感到四面八方而来的压力。新集之北二三十里就常有敌人的踪迹，白军民团鉴于苏区内地方武装实力雄厚，不敢贸然深入，但在苏区边缘的骚扰，则无所不用

其极。他们拖去耕牛，掠夺粮食，甚至杀害壮丁，强奸或掳走妇女。我们的地方武装必须经常戒备，我们的大部份精力也就花在应付这些事情上。

苏区被封锁了，区外的报刊不能进来，消息隔绝。我们与其他苏区没有任何联系，与上海中央的交通也陷于瘫痪状态。护送我进入苏区的那一位交通，第二次到汉口去了之后，便再也没有回来，大概是被杀害了。我们往往要派特务队到白区去行动，以期获得一些区外报刊，有时甚至要为此损失生命。

我们不知道中央仍在上海抑或已迁往江西苏区，中枢的安危令我们甚为耽忧。那位曾照顾我安全抵达汉口的顾顺章，就在我由汉口乘汽车向苏区进发的那一天被捕了。顾顺章是中共的特务首脑，掌握着中共中央与各苏区交通的总枢纽，曾在汉口以花广奇魔术大师的身份出现，现在终于被国民党的特务识破了。可能他要以出卖中共来挽救他自己的生命，他竟然投降了。他在武汉向国民党当地最高当局泄露了中共的秘密；据说当晚李家集就特别戒严，搜捕我和陈昌浩一行，自然这也是由于顾顺章的口供。不久，他被移送到南京，由蒋介石亲审。

顾顺章的叛变，是震动中共的一件大事。上海的中共中央很快便获知这件事的真相，避免了更重大的损失。当时中共中央和各地组织都因之大为混乱，所有机构和各同志的住处，均即时迁移；人事上也多调动，以逃避国民党特务根据顾的线索来进袭。当时已被禁在狱中，但国民党尚不知其确实姓名的恽代英，就被顾顺章指证而遇害；其

他因顾的口供而被害的，人数也颇不少。中共中央乃亦采残酷手段来泄愤，顾顺章在上海的全家被中共的行动人员暗杀了。

这件事给予鄂豫皖苏区的影响也很大。预定由中共中央调派大批干部到这个区域来的计划不能实现了。继我和沈泽民之后，来到这个苏区的只有少数的干部如陈赓（接替徐向前任第十二师师长）李特（任军委会参谋主任、后来又任参谋长）傅钟（任军委会政治主任）黄超（任军委会秘书长）朱光（任政治部宣传处长）和王子纲等三个无线电技术人员，总共不过十多人。他们先后到达，途中比我们还要辛苦些，有的利用河南信阳和安徽寿县一带的中共地方组织，辗转引导进来，有的不凭交通线，冒险径行偷混进来。

其次，我们与中共中央和各个苏区建立交通网的计划也无由实现。建立无线电的交通是这个计划中最重要的部份，我们在积极训练无线电工作人员，但所需要的无线电器材，却因交通线的被破坏，一时不易运进来。我们所编定的密码本，又为湘鄂西红军在作战中遗失了。直到当年年底，我们才有第一架无线电，迟延了好几个月，才与江西苏区商定了一本不能完全信赖的密码，致使地面上运输和交通线，一直无法畅通。中央老在警告我们，要深刻认识顾顺章叛变的严重性，不要信赖残存的交通线，即原非顾所知道的，也要严防波及。

我们所受到的打击有增无已。我们风闻中央书记向忠发被捕了，但不知何时被捕，是否与顾顺章的告密有关，以及牵连什么同志。我们约摸知道向忠发被捕后，他的表

现和中央所受到的影响都很不好。中央是凶多吉少，有可能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我们只有互相勉励，即使失去了中央的领导，我们也要单独奋斗。

直到一九三二年春，我们才接到关于中共中央情况的可靠消息。周恩来秦邦宪张闻天等中央负责人，于一九三一年八月间先后到达江西苏区的赤都瑞金。中共中央政治局即在那里继续执行职权，并于当年十一月七日召开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我和项英当选为副主席。这时，江西中央苏区曾获得一些军事上的胜利，冲破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尤其是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孙连仲的大部二万余人的转变，参加红军，使江西红军的实力大为增强。

中共中央搬到江西苏区之后，中共的力量也大部投到各个主要苏区去了，扩大白区的工作一时便随之减弱。中央给我们的函件也说到白区工作，一时不易发展，尤其是发生了顾顺章叛变、向忠发被捕等严重事件之后。中央还要求我们不要过份相信留在上海的中央分局及其拥有的交通线，要严防敌人的渗透。

由于消息隔绝，江西苏区胜利的消息，我们隔了很久才知道。反之，我们的不幸又往往被敌人利用来发动宣传攻势。敌人宣扬中共中央是被摧毁了，甚至造谣说周恩来也已投降了。敌人利用赤区与白区的通商关系，派遣一些奸细到处造谣：不是夸说国民党已调集主力军携带大批飞机大炮，不久要来进攻这个苏区；就是离间人民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号召军民人等反正。国民党这些做法，生效

虽然不大，但对这个尚未稳定的苏区，确有动摇人心的作用。

苏区内部的困难，数不清，说不尽。即以疾病的侵袭来说，带给我们的损害，有时会比敌人的打击更为重大。我们的环境卫生很坏，食水不洁，苍蝇蚊子臭虫虱子是有名的四害，疟疾痢疾和皮肤病等猖獗流行。许多工作人员患了疟疾，依然照常工作，他们得不到医治，久而久之，也就不把它当作一种病了。我们的营养也很坏，吃的只有大米杂粮和花生之类，缺乏蔬菜，更缺乏肉类。

一九三一年七月中旬（这是党和苏维埃刚闭幕的时候），我就病倒了。这是我有生以来拖延最久的一次大病。我在大会时，就已患疟疾，但我在体温恢复正常时，仍抱疾工作，不久便并发了肠胃病，下痢不止，而又呕吐，饭食药品，随服随吐。我的身体日渐瘦弱，已无力起床。在大城市中我的病也许不算是严重的，但在偏僻的乡间，医疗药品，均感不济，几乎使我丧失了生命。我自觉身体的抵抗力太弱，经不起考验，也为我在这紧急关头所肩负的责任而耽忧。其实，愈是焦急，病就愈难痊愈，缠绵约两个月，病况才有转机。

我的卧病，对这个区域工作的发展，自然不无影响。在我身边的同志为我的病耽忧，甚至他们曾想到万一我一病不起，善后步骤应如何安排等。特别是在前线的同志，更因此为之不安。后来曾钟圣曾承认因闻我病重，深恐这个区域的领导权，将为他所最不满意的沈泽民所掌握，所以他有带着红四军脱离这个苏区的企图。

鄂豫皖区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工作，并未因我的病而停顿下来。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会主席职务，分别由沈泽民和蔡申熙代理。这时，我们在各地传达大会的决定，采取一面斗争一面说服的较温和的方法，来纠正已有的错误。虽然只有极少数的人受到处罚，但党的内部竟因此发生了一种反中央分局领导的暗流。

这股暗流以金家寨为起点。大会后，豫皖边区地方委员会的一些负责人，开始散布对这次大会不满的言论。他们说：“这次代表大会利用一些枝枝节节的问题，来打击老干部；新来的干部反对早在这个区域工作的干部，也就是黄安麻城人反对安徽人。”他们批评沈泽民是不懂世故的留俄学生，只知挟中央以压制地方，其实中央是否存在，还是问题。他们知道了我病重的消息之后，更表示不能信赖沈泽民的领导。中央分局觉得金家寨这些反党的言论，似是许继盛播弄起来的。许在路过金家寨时，并未表明遵从大会决定的态度。相反，他表示爱好醇酒美人，乃是英雄本色，言外之意，似乎不满大会对他的批评。

红四军于七月中旬开到英山前线后，接二连三的击溃了那一带的国民党驻军，缴获大批枪枝，俘掳敌军约两千名左右，乘胜占领了英山沂水两个县城。八月上旬曾钟圣由前线送来的报告，描述那一带富庶的情形。红军吃得很好，而且正在沂水搜集布匹，解决冬服问题。他还说到，据他们所知，国民党军队正在围剿江西苏区的红军，军情甚紧。红四军准备向广济黄梅行动，相机截断长江交通，并乘势在武穴附近渡过长江，直指赣西北，会同江西红军，

消灭国民党的围剿。

与此同时，一位随军出发的省委委员送来报告，与曾所说的又大有出入。它说到红四军高级干部中有渡长江向南发展之议，是否由于中央分局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它还批评红四军的政治工作不得力，只知解决红四军所需的物质问题，不重视在这一带发展苏区的任务。又说到不赞成改变原有的计划，红四军干部也多有同感云云。

这件要案提到中央分局和军委会时，我因病重没有出席，沈泽民等也因耽心我的病，而没有告诉我。会议决定由沈泽民草拟一封答复的信，内容大致是说红四军仍应照原定计划，在英山沂水一带发展苏区，扩大已有的胜利，壮大红军，决不可渡江南下；并说明配合江西红军行动，虽是红四军的主要任务，但红四军脱离了原有根据地和地方武装，孤军渡江南下，不仅不能给江西红军以有力的支援，反会因红四军的离去，使鄂豫皖遭到损失，这也是立三路线的军事冒险的想法。若照原计划执行，则不但鄂豫皖苏区可以扩大，红四军也可以壮大，而且能牵制更多的敌军，这是对江西红军最好的配合方法。

这封复信不过是重申原有的计划，本是无可非议的。不料曾钟圣许继盛等竟提出进一步的反对意见。曾钟圣说到这封信是泽民同志起草的，国焘同志病着不知道，泽民同志素来将红军视为保护他个人的工具，这种右倾的保守观点，是有害于红军的。许继盛更强调红四军的行动，应该由将领们为军事的前途打算，不必理会新集来的指示。

在红四军的将领会议中，曾钟圣将他的渡江南下的主

张，描述成为原有计划的一部分。他说明原有计划并未规定红四军不能越过长江。在他看来，长江不过是一条小河沟，红四军可以随时偷渡过去，也可以随时偷渡回来，国民党的海空军是不能阻拦的；因而他认为渡江南下的行动，可以由前方将领商决，不必征得新集的同意。以徐向前为首的多数将领，虽不赞同这种主张，但也不愿在军中展开政治性的讨论，因而表示仍须事先获得新集的批准。同时，红四军中一般官兵，也都是这个苏区的子弟，有不愿远离这个苏区的乡土情绪。这样，资望较高的曾钟圣也无法贯彻他的主张。

曾钟圣终于再向新集来一个哀的美敦书的报告。他夸大渡过长江和切断长江交通的重要性，表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到某月某日仍未得到军委会的明确指示，便径行渡江。这个报告约于九月上旬到达新集，使我们大为震动。

这时，我虽仍不能起床，但病况业已好转。中央分局和军委会两机构的委员们，齐集在我病榻之前，举行紧急会议。蔡申熙首先说明，在国民党重兵监视之下，偷渡长江是冒险的行为；即或偷渡成功，在江南孤军也难展布，而且要再渡江北返，则更困难。这种举动显然违背了原定计划。他判定曾钟圣之所以坚持这种错误主张，是立三路线在作怪，也是别有用心的。他追悔他曾保荐曾钟圣许继盛等人担任要职，以致发生这次严重的抗命事件。他提议派陈昌浩去接替曾钟圣军政治委员的职务，并纠正他的错误行为。



我们一致赞成蔡申熙的主张。陈昌浩和其他委员，建议派蔡申熙去接任红四军军政治委员，以收驾轻就熟之效；但蔡则以体力不逮为理由辞谢，并坚持由陈昌浩继任。最后我表示完全接纳蔡申熙的意见，并说党代表大会虽曾批评了曾钟圣和许继盛等，但因他们表示悔改，仍任要职，党对犯过错误的同志，并不贸然采取惩罚的态度是对的。蔡申熙爱护那些老同志，也是应有的态度，而且他曾屡次函劝曾许等，放弃成见，遵守新集的决定，是以蔡同志毋庸引咎。现在曾许竟到了公开反抗的地步，那是他们的执迷不悟，除了撤换以外，别无其他办法。

这次会议决定派陈昌浩为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全权代表，赶往前线，处理这一事件，不仅应制止渡江的行动，必要时并可将部队撤回原有苏区来。军委会又命令陈昌浩继曾钟圣为红四军军政治委员，曾则调回新集；至于许继盛等应否免职，由陈昌浩相机处理。除这些正式的决定和命令外，我们还共同签名写了一封致各高级将领的信，鼓励他们遵守党的正确决定。我也当场表示，一俟我能起床行动，当赶往前线，协助陈昌浩处理一切。

陈昌浩去了约一个星期，我不理会医嘱休养的劝告，力疾前往白雀园邝继勋师部，向那里的同志们说明这次曾许等行为的不当。邝继勋和他属下的负责干部，对于我们的决定，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沈泽民蔡申熙等，也在新集就这一件事向各方面加以说明，以期获得多数同志的支持。这正是“九一八”日本强占东北的时候，我们这个小天地却忙着处理内部可能发生的危机。

不到几天，陈昌浩由前线送来了急报，说明一切都已照军委会命令顺利执行，红四军全部即经由英山金家寨开回白雀园休息整理，要我不必再带病赶来前方。我因此就留在白雀园，等候红四军的到来。

又过了两三天，陈昌浩带着一支先头部队，押送曾钟圣和许继盛回到白雀园。他向我报告，他这次前方之行，不仅纠正了反党的行动，而且破获了反革命的阴谋案件。他为此惊奇、兴奋，觉得幸能及早发现，否则要闹出大乱子。

陈昌浩叙述他花了五天工夫，赶了七八百里路程，到达驻在沂水的军部，立即将中央分局的决定和军委会的命令向红四军的高级将领宣布，获得了以徐向前为首的高级将领们的完全支持。曾钟圣见大势已去，只好表示服从，陈昌浩也就顺利的接管了军政委员的职务。这样，党的主张贯彻了，渡江南下的论调也被打消了。这是表示红四军中党的领导力量很坚强。在这次争论中，一般干部，都能深明大义，尤以徐向前的立场坚定，起了领导作用。

陈昌浩接任军政治委员后，立即进一步调查红四军的内部状况。多数高级干部认为曾钟圣的主张是错了，但大体上还是忠实于党；许继盛和他少数亲信的态度，却有可疑之处；甚至第十一师中有人传说：“第十一师在渡江后，要脱离红四军另找出路。”徐向前等认为，第十一师中多数干部是拥护党的，但许继盛和他的少数亲信的言行，应当彻底查究。

陈昌浩根据一些干部的提议，执行军政治委员的监察

职权，亲自率领少数政治工作人员，搜查第十一师师部。陈昌浩向我追述这一幕时，说他是提心吊胆的，深恐许继盛会反抗。可是当他到达十一师师部，宣布要搜查的时候，多数师部人员表示服从，师部的唯一直属部队特务连，更表示了欣然支持的态度，这使许继盛吓得面无人色，不敢有任何反抗。

第十一师师部有一个吴参谋，是人所共知的许继盛的亲信，平日与许一道冶游，言行乖谬，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个年轻的吴参谋自以为得着许师长的庇护，想不到有这次搜查，是他没有预先消灭证据的原因。陈昌浩就在他所保管的公文箱中，发现了私通敌人的证据，主要是新近由白区来的两封信和一份通讯的密码。

陈昌浩于是邀约许继盛押着吴参谋到军部来，实行讯问。当时红四军的高级将领都齐集在那里，象是举行高级军事会议，也象是在开特别军事法庭。旁听的官兵，更挤满了整个大厅，气氛甚为紧张。吴参谋因信件密码俱在，证据确凿，而且信中词句多是用这个密码写成的，不能不承认通敌的罪行。他承认他是国民党改组派，他的所作所为许继盛是知道的；他供认他被派来，主要负有运动许师长向白军投诚的任务；而且利用党内纷争的时机，已联络了一些党羽，准备在渡江南下，红四军遭受挫折的时候，实行反叛。

由于这个惊人案件的发现，红四军将领们会议决定：立即罢免许继盛的师长职务，并押送新集审理。曾钟圣虽证明没有反革命的嫌疑，但他的反党言行，显为反革命者

所利用，应一同前往新集，听候查办；红四军立即班师回白雀园；所有各师各团参预这一反革命阴谋的党羽，概由各级政治部暂行看管，一俟到达目的地，再行一并整肃。

陈昌浩向我报告这些经过之后，并将搜获的信件和密码等整个案卷交给我，要求我先问问曾钟圣和许继盛，就知道他这次在前方的处置是事在必行的。

我首先约曾钟圣单独晤谈，要求他毫无顾忌的说明真相。他向我说明审问吴参谋这个奸细的时候，他始终在场，一切证据他都细心看过；他认为案情毫无疑问，大致吴参谋还只是一个拉线人，真正的首脑当然是许继盛。他自悔他任军政治委员时，对于这样一件重大的反革命阴谋，毫无察觉，而且他的渡江主张反为许继盛等所利用，几乎中了奸计，自请处分。我也坦率的向他指出，他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但不是反革命的同谋者。后来他返回新集，受到反党和助长反革命发展的指责，撤免了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委员的职务，改任军委会参谋，主管地方武装的训练工作。

我又约集陈昌浩曾钟圣共同与许继盛会谈。许继盛这时已是垂头丧气。我向他说明他有充分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他说到前方的同志对他是很优待的，没有正式审问过他，更没有威胁他，但事实俱在，他承认他犯了包庇反革命的严重罪行，不过他自觉他还没有做出反革命的行为。

许继盛说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他在上海曾与国民党改组派来往，一九二九年他由上海被派来豫皖边区打游击的时候，他的一个国民党改组派的朋友曾向他表示，

现在奉着中共的命令去搞军队打游击是可以做的。将来改组派得势，推翻蒋介石，夺取政权，许可以带着军队投靠过来，与改组派合作，许说他当时并未接受这个约束，也不知这个改组派的朋友，后来投靠了蒋介石。

许继盛继续说明这件往事：他到苏区打游击后，早已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了。不料一九三〇年他在金家寨一带打游击已搞成一个局面的时候，那位改组派的朋友便介绍吴参谋来了。他认为吴是老朋友介绍来的一个军人，因而就委他当参谋。他们彼此嗜好相同，一块玩女人，生活打成一片。新集大会以后，吴某要他不要向党低头，并对他常有要挟。他承认他已经知道了吴某确是一个奸细，但他受了他的威胁，不敢举发，只在那里糊里糊涂的混下去，并没有背叛的意思。

在这次谈话中，曾钟圣很愤慨的质问许继盛，说许仍然企图隐瞒真相，避重就轻，只说了吴参谋所已说出来无法否认的部分。曾钟圣为了洗清本身的责任，一再严词质问许本人是否事前知情，要许明白交代。许继盛也不得不承认，这件事他确是完全瞒着曾钟圣的。

我了解了这件事的真相之后，立即派人押送许继盛连同全部案卷，前往新集。并要曾钟圣也去参预许案的审理，同时对自己的错误，作一个交代。我向新集建议，许案应由中央分局指派人员组成特别法庭来审判，并根据已有线索查明各部分的同谋者；但肃反不可与党内斗争混为一谈，曾钟圣和其他犯有这种、或那种错误的同志，就只应受党纪的制裁。

徐向前率领着红四军继陈昌浩之后，缓缓的撤回到白雀园来了。其时军中弥漫着肃反的狂热。各师各团在行进中就曾逮捕了一百多个嫌疑犯。红四军中发现有国民党改组派的大新闻传到了苏区，肃反的浪潮，就跟着泛滥到各个角落。“肃清反革命”、“肃清国民党改组派”的声浪，高唱入云，法兰西大革命时清除贵族反革命的热浪，不期然重现于这个苏区。人们多分辨不清甚么是国民党改组派，甚么是反革命，只要有人指证，谁就要受到这股热浪的冲击。红四军中各师各团的军政干部对于嫌疑人犯，不问情由，便严加审问。审问的方式多系群众性的，被审问者在群情愤慨之下，几乎无法为自己辩护，甚至刑讯的事也发生不少。

我目击这种情况，深恐因此发生重大流弊，立即设法制止。我首先以军委会主席的身份，下令各军事单位，不得擅自捕人和径行审问。所有已被捕的嫌疑人犯，概交高级政治部所组织的军事法庭审理，禁止用刑逼供。此后各师团非事先得到军部或高级政治部的允许，不得看管任何人。在肃反斗争中，我们并应广泛采取奖励自首或悔过的方针。这个命令的颁行，才抑制住了这股狂流的泛滥，也使我和其他的首脑们，有机会去研究事态的真相。

我研究了 this 案件之后，不久即召集了一次几百人的军事干部会议，每连均有代表参加。在这次会议上，我发表了关于肃反的报告。我以最浅显的词句，解释甚么是反革命，甚么是国民党改组派，而甚么又是普通的过失。现在事实表现出来，同志们往往将反革命与普通过失，混为

一谈，我进而指出，有各种资料证明参与反革命阴谋的不过是一小撮的人，现都已被捕了，其余多数被牵连的，却只是犯过这种或那种或轻或重的过失，有些也受过反革命者的影响，有些则与此毫无关系。

我根据中共中央肃反的方针，说明要分别首从；换句话说，首要者严办，胁从者从宽，胁从而又真诚悔过者免罪。我又根据很普遍的事实指出某一个嫌疑犯，曾因他的家长有反苏维埃的行动，就被视为是反革命者。又有某某仅因他的家属对革命有过动摇的表现，就也被视为反革命。我提醒与会者，苏维埃的法律是不追究曾反过党的农民的；而且苏维埃和红军的势力，还不算十分强大的时候，一般农民有过这种或那种的动摇，乃是意料中事。红军战士家庭所作所为，不应由该战士负连带责任，他自己既有过战功，决不能视为肃反对象。即使动摇过的农民，也不能视为反革命。

我还根据较普遍的事实，指出某一个嫌疑犯，在某一次合法会议中，听见反党言论，没有起来指摘，这自然是不好的事，但他就因此被视为知情不举，竟被视为国民党改组派，这样判断就未免过份了。又如某个嫌疑犯曾和某个反革命者在一块玩过妇女，因而被视为是改组派的党羽，这同样也是过份的株连。

根据上述分析，我着重指出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继续在军中展开反军阀土匪倾向的斗争，在苏区内，继续展开反富农、反官僚、和其他左倾立三路线和右倾动摇思想的斗争等等。就由于这些坏的倾向，滋生了反革命。但

反革命者究竟不过是少数人，而反革命的核心又已被毁灭，因此，我们切不可任意株连，自相惊扰。现在已被捕的嫌疑人犯，除少数案情严重者外，多数均应按照情节，予以较轻的处罚或无罪释放。

我的这篇报告，大大感动了我的同志们，他们有些觉悟到在肃反的狂热中，不免过于感情冲动，有些觉得如释重负，再不会因某些小事而被牵连了。徐向前陈昌浩等重要干部，也在会议中表明，决根据我的指示，继续深入党内斗争和肃反。他们承认在肃反的火头上，不免感情冲动，任由各师团随便抓人，今后决不会如此了。

在新集的中央分局，旋即接受了我这篇报告，制成了决议，通令各地施行。在这个苏区内虽然也破获了一些许继盛的同谋者，但多数被整肃的，均系一些利用苏维埃职权，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等的违法者。后来据中央分局的统计，这次的肃反案，被捕者约六百人，军人占三分之一；实际被整肃的有许继盛等百余人，其中判死刑者约三十人，判处各种刑期的徒刑者约百人。

后来中共中央认为鄂豫皖区的肃反进行得非常成功，可为各苏区的模范。江西苏区自富田事变开始肃反起，历次进行都不免失之严苛，几乎酿成能发不能收的局面。当时周恩来等到达江西苏区后，曾批评毛泽东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内情究属如何，因我未曾与闻这件事，所以至今还不知其详。

总括说来，我们在鄂豫皖区的这次整肃斗争，主要是肃清了军阀土匪倾向，也打击了立三路线的残余，纠正了



一些右倾的和堕落的倾向，并铲除了一个反革命的阴谋。但是在执行时，也发生了若干偏差，如倚轻倚重的判决，甚至刑讯逼供。我们没有能够一一纠正过来，这不仅与中国的落后环境，有其不可分离的关系；也是中共宁左毋右的观念，起着重大作用之故。

## 第七章

### 鄂豫皖区的末期发展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起，到一九三二年七月，蒋介石发动对鄂豫皖区大规模的围剿，也正是鄂豫皖区和红四军欣欣向荣的发展时期。我们的发展，显然是我上面所说各种努力的结果。后来，我们终于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力下遭受挫败。这似乎也是由于苏维埃运动的先天缺陷有以致之。

这个时期，我们在军事上获得多次大大小小的胜利，红四军的实力也随之膨胀起来。我们在肃反运动中，曾极力整饬红军内部，清除了红军中一些地主富农出身的和不可靠的分子，提拔了许多贫苦农民出身的干部。我们的军官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员，政治工作也大大加强了，我们将充实军队内部的措施，视为最主要的工作。

我们是内线作战，因而军事策略是集结优势兵力，分别击破包围这个区域的敌军，向四周扩展苏维埃的领域。我们的军队每日均在战斗之中，大小战斗不知凡几，这里不能一一叙述，我仅就比较重要的几次战役，略加说明。

当时敌军对于我们这个区域，大体是采取守势的。蒋介石的剿共方针，重点似是放在江西苏区，尚未重视鄂豫皖区。我们的周围大多是一些国民党的杂牌部队，他们的

将领有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心理，他们的装备虽不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战斗力则并非都是弱的，如吉鸿昌等所率领的原冯玉祥的西北军，就以善战著称。这些敌军都依据城镇设防，联络民团驻守的寨子，同时又沿线建起碉堡，形成对这个区域的纵深包围圈。

我们经常讲求打破包围圈的军事策略。我们觉得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所倡导的游击战术，多已不适用，如“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敌人穷追，我兜圈子”的战术，就只能适用打野战，不适宜于对付采取守势的敌军。我们要主动的进攻防守的敌军，但我们又缺乏攻坚的重武器，因而我们采取“围困一点，消灭来救援的敌军”的策略，我们认为这才是“以包围对付包围”的办法。

我们根据红四军的特长，来发展我们的游击战术。我们的军队能够发挥奇袭的力量，主要是靠行动迅速和秘密行动两个条件。我军装备很轻，运动力很强，就具备了运动神速、能对付多方面敌军的条件。我军行动原是很秘密的，又有地方武装的掩护和佯攻，往往使敌军不易了解我们的真正企图。我们特别注意夜间行动和夜袭的战术，发挥奇袭的作用。我们也讲究构筑工事，以减轻伤亡和节约防守的兵力。凡此，似都是劣势兵力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下，所应采取的战术。

我们将每一次的军事行动看作是一场实地演习。在作战以前，不惜详拟计划，各方动员，以期发挥狮子搏兔的力量。在作战以后，又详加检讨，认识错误和偏差，拟出下一次行动所应采取的新方法，使我们能在行动中求得进

步。

红四军在白雀园整饬内部的期间，即曾向驻在潢川商城光山一带的敌军实施压力；并在潢川附近的一个小市镇上，消灭了吉鸿昌部一千余人。吉鸿昌因此以“剿匪不力”的罪名，被蒋介石免职，愤而到了上海。他对红军的观感，因亲身的经历，似有了根本的改变。他与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员发生联系，对于孙连仲部后来投降红军，起了拉线的作用。后来，他参加了冯玉祥在张家口所组织的反日同盟军，为蒋介石所杀害。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我军南移，围攻驻在黄安县城的敌军梁冠英师。我们很重视这一行动，认为是拔除老苏区的眼中钉。我们的准备工作也做得比以前周到些。这次行动既有军委会主席的命令，又经过高级将领会议详细研讨，决定整个行动的计划，最后又由高级军事长官召集中下级军官开会，详细讲解执行这一计划的每一步骤。

政治工作在这次战役中，也显著的发挥了作用。中共军中的政治委员，有监督同级军官的特权，同级军官的命令，非有政治委员的副署，不生效力，必要时，政治委员并可撤换或逮捕同级军官。但在红四军中，军官都是同志，我们认为政治委员的监督特权，只能适用于那些非同志的军官，因而改采同级军官与政治委员，分负军事与政治责任的平等制度。

由于这种平等制度，在决定军事行动计划时，军委会政治部和各级政治委员，须提供有关这一行动的政治情况的资料，并制定政治工作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从政

治方面来鼓励全军官兵执行计划的信心；动员当地的居民和地方武装等，配合军事行动；瓦解敌军；鼓励敌军官兵投降等等。同级政治部等于同级政治委员的办事机关，也就是由它来执行上述政治工作计划。政治委员平时指导政治部工作的进行，战时则参加作战。能干的团政治委员往往是太上团长，否则亦等于副团长。至于军中中共的组织，则隶属于政治部，在官兵中起带头作用。

在这次黄安战役中，我们决定以各团的政治委员和团政治部，为实施政治工作的主要环节，所有鼓励士气，动员民众，瓦解敌军等政治工作，都以团为单位来进行。这样，军政治委员的工作，也就有了头绪。他只须指导各团的政治委员，工作就能分头进行。中共军中党的组织是以连支部为基本单位，团政治委员指导各连政治指导员和连支部书记，就能如臂使指。

我军按计划到达黄安城下，首先扫荡了城外的敌军梁冠英部前哨据点，敌军全部退守城内。我军重兵则驻在黄安城的西南面，其余东北两面则由地方武装监视。我们的目的是断绝城内敌军的粮食供应，一俟敌人粮食缺乏、离城退却的时候，实行在野外予以歼灭。

我军战斗力远较梁冠英师为优，在数量上我们也多一倍。我们经常能分半数以上的兵力，压迫黄安以南宋埠李家集一带的敌军，使之不敢前来救援。黄安城内之敌军曾屡次出城，企图夺取粮食，但我们已在城的周围，坚壁清野，使他们无法如愿。如果他们离城稍远，即有被我们消灭的危险。

我们很注意改善七里坪区与高桥区之间，灰白区（在黄安城附近）内居民和我们的关系。我军的运输担架队均来自苏区，不在灰白区征用，我军所需粮食，半数也是从苏区运来的。我军在灰白区打土豪只限征发粮食，而且要当地居民公认为土豪的，其粮食才予以征发。我们到处公告，不准军人侵扰当地居民，准许居民举发，损坏了物件要赔偿，借用东西要还，公平交易，不许强买强卖。由于这些措施，灰白区的人民迅即改采亲近我们的态度。

我们动摇敌人军心的工作也做得很有成效。我们并不禁止人民出城进城，我们所捉到的敌军官兵，仍然放进城去。我们用各种方法告诉敌人，外援已绝，粮食将尽，只有缴械投降，这将受到红军的优待，不愿从军者，并可给资遣送还乡。敌军士兵携械投诚或被俘后参加红军，一向是红四军的一项兵源。黄安战役之时及战役之后，敌军士兵投靠我军的人数有显著的增加。

这样包围黄安一个多月，敌军果然因粮食不济，乘夜向西南逃窜。我们消息灵通，早获情报，而且追击迅捷，敌人如陷天罗地网，几乎全部为我们俘虏了。陈昌浩在这次进击中，又表现了他机警敏捷的才干。他奉命在离黄安约四十里的地区，抄袭败窜之敌，最大多数的敌军都为陈昌浩部所解决，只有师长梁冠英单身漏网。

我军在这次战役中，占领了黄安县城，俘获敌军官兵约五千人，缴获枪枝三千余。黄安县城从此被我们改名为红安，这也是我们占领得最久的一个县城，它一时成为我们胜利的标志，对于苏区人心的振奋，是有极大作用的。

这一带的灰白区，也从此变为新苏区，这个苏区的南疆也为之大大扩展。高桥区不再是孤悬在南部的孤岛，已变成了那一带新苏区的核心。

我军正在黄安附近扩大战果的时候，敌军两个师（原属西北军系统，指挥人姓名我已忘记了）由宋埠李家集路线向黄安进逼，这似是蒋介石知道黄安失守以后，严令这两个师恢复失地。这两师的将领们在严令之下，只好特别卖力。

当我军屯驻在黄安以南约四十里地区的时候，敌军这两个师竟采取主动，乘夜向我军实施正面突袭。敌军突破了我军一团人所据守的阵地，直向我们的军部所在地挺进，使我军陷于险境。我和徐向前陈昌浩急起应战，可是身边所能指挥的部队已只有百余人，徐向前就在这次战斗中，为流弹击中，左肩骨受伤，但他仍是沉着应战，直到这次战斗转败为胜为止。

这次战斗也表现了我军自动协同作战的精神。我们驻在左右翼的部队，虽未得到军部命令，但根据战况，纷纷向突进之敌的左右两翼抄袭，于是敌军不得不向后退却，我军乘胜追击，沿途又缴获敌军人枪各一千以上，敌军迅即退至黄陂附近。

我们检讨这次战斗经验的时候，对自己疏于防范，深自责备。我们嘉许徐向前，他在受伤时，虽经临时包扎伤口，体力显感不支，但仍强自镇定，继续指挥，卒挽危局。这种不计生死坚强沉着的精神，确是红军的宝贵品质。接着他还在军中带伤执行军长职务，只在职务稍闲时，略事

休养而已。至于各师各团的指挥员，这次能在危急时互相联络，相机对敌抄袭，更是我们应当继续发扬的自动协同作战的精神。

我们的军事胜利，以苏家埠一役为最著。我军以少胜多，战果极丰。这不仅标志红四军战斗力的旺盛，也表现我们整个政策的成功。

一九三二年初，我军由黄安经金家寨麻埠独山，渡过淠河，进围苏家埠。我军占黄安，又击溃了救援黄安的敌军后，我们估计敌军已暂时不能向黄安进攻，因转向安徽西部的淮河流域发展。邝继勋师仍留在鄂豫边区行动，这个师的力量虽已有充实，但还只适宜于负担一些较小规模游击战的任务。

我军渡过淠河后，逐渐压迫敌军退守苏家埠六安霍山等重要城镇。苏家埠这个重要市镇，驻有陈调元部两个旅，这是我们上次占领麻埠独山后，最接近我们东面的一个敌军据点。敌军在这市镇的周围，筑有永久性的工事，有些系城堡。我军在苏家埠外围，同样广掘交通壕和建筑防御工事，并利用交通壕，逐渐缩小包围圈。

我们的计划是围住苏家埠这一点，断绝苏家埠敌军粮食的供应，逼使他们投降，并消灭从合肥六安一带来救援的敌军。这一带地区地主民团的势力颇大，一般人民畏惧与红军接近，而且我军的兵力又远较敌军为少，我们须从各方发挥我们的力量，才可望获致胜利。

我们极力争取当地居民的同情，孤立地主民团的势力。我们宣传红军所到的地方，农民可以安居乐业，都不要向



地主交租和还债，一俟情况安定，将实行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我们宣布红军决不会侵犯当地穷苦人民的利益，只向土豪征发一部分粮食。我们也要求地主民团势力不要与红军作对，否则就要受到我们的惩处。

由于这些较温和政策的实施，当地人民多半留在家里，没有被地主民团胁迫逃避。一部分农民还对我们采取友善的态度，虽然还不敢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实行分配土地，但极愿不露面的帮助红军的某一个行动。我军所需要的粮食，全部要就地解决，这一带确也是盛产粮食的地方。我们征发粮食，事先由当地穷苦人民的代表鉴别那些人家是真正的土豪，实行征发粮食的时候，由当地人民带路。我们并不征发土豪粮食的全部，只斟酌情形，征发半数或大部分。征发来的粮食，也有一小部分用来救助当地穷苦人民。

当地人民对于我们的同情，日渐增加。我们在军事上获得许多方便。我们不须派遣军队去征粮食，只由政工人员率领少数武装人员去办理。一般人民开始感到，红军来了，他们的日子过得较好了，首先是免去白军和民团在乡间任意滋扰。务农的和经商的熙来攘往，多希望陈调元部队失败，赶快离开这儿。当地人民还供给我们一些有价值的军事情报。

我们很注意节约兵力，利用密如蛛网的交通壕和工事，只须一团人，就可以胜任愉快的包围苏家埠。敌方经常有少数飞机来轰炸我军，但由于交通壕的掩护，不特不能予我们以重大的损伤，也没有妨碍我们的行动。敌军知道我们包围苏家埠的兵力，小于守军的四倍，经常向我们突袭；

有时还借助于飞机的掩护来进行。但我军在交通壕内，行动神速，使敌人的策略成为画饼。敌机也常向苏家埠投掷粮食，补给守军，但为数很少，而我们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投掷的物品经常就落到我们这边来了。

这样，我们经常保持八个团的机动部队（红四军共有九团，除一个团包围苏家埠外，还剩有八个团）。当时六安和霍山各驻有敌军陈调元部的一旅，多次企图策应苏家埠的守军，每次我军都以优势兵力将之驱退。后来，我们只需少数地方武装，就能监视这两处的敌军。

苏家埠的守军被困两个多月，弹尽粮绝，已无逃出的希望；他们求援的电报，如雪片飞出。驻在蚌埠的王钧部奉命经合肥六安驰援。王钧部三个师进到苏家埠附近时，我军以全力向敌右翼抄袭，王钧部大部被歼灭，总指挥励世鼎被俘。守军至此完全绝望，乃不得不开城投降。

这次战役，我军战果极为可观。励世鼎所率援军被俘一万二千余人，枪枝被缴九千余枝，其残部退回合肥去了。苏家埠的守军，投降的约五千人，缴出枪枝约三千五百枝。此役总共先后获枪约一万五千枝（包括几次小的接触所缴获者），等于我们全军枪枝的两倍，不能不说是一次空前的大捷。

这使国民党当局大为震动。蒋介石似乎觉得，那些杂牌部队是不能济事了，开始调用他的嫡系主力来对付我们。我们获知汤恩伯部第二师正由河南许昌信阳一带，向潢川集结，企图乘虚进袭新集。同时，这正是一二八淞沪对日战争刚结束的时候，蒋氏高唱“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我

们在六安军事行动，当然被视为是扰乱后方安宁的罪行。

我们检讨这次战役，觉得战斗力大大增强，特别是“包围一点，消灭援军”的军事策略，在这次战役中，运用得极为成功。政治工作也发挥极大作用。我军本可以乘胜占领六安霍山等县城，向合肥进逼；但认为汤恩伯部如果进袭新集，将动摇赤区的根本，因此，我们移师西向，以制机先。

我军旋即由苏家埠直趋商城潢川，找寻汤恩伯主力决战。我们抵达商城城下时，城内守军据城防守。我们首先故作包围商城的姿态，然后全军循商潢公路，向潢川挺进。驻在潢川的汤恩伯似已得着商城的告急电讯，拟会合商城守军，里应外合来夹击我们，汤恩伯由潢川率第二师等三个师的兵力，向商城进发。敌我两军相遇于“豆腐店”，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遭遇战。

两军前哨接触后，敌军迅即就地展开，匆匆占领阵地应战。我军原擅长遭遇战，立即表演暴风骤雨式的冲击，经过短时间的肉搏，敌军的阵势已呈动摇；我军攻势再接再厉，敌军就全部瓦解了。敌军兵力超出我们的两倍以上，机关枪火力更远较我们的为强，但作战意志却远非我军可比，一经较量，优劣立辨。敌军大部向潢川溃逃，一部据守公路两旁的一些水寨。担任总指挥的汤恩伯，也杂在乱军之中，退到一个水寨里去了。

在这次战役中，我军因受沿途水寨里敌军的阻挠，不能展开有力的进击，结果，我们在这一役中只俘获敌军人枪各近两千，我军的伤亡也超过五百人，这是我在这个区

域参加作战以来，我军伤亡最大的一役。敌军溃退时，把那些来自外国的优良装备，沿途抛弃到水塘和水田里，以期迅速逃离火线。著名的汤恩伯师，就在这一战之后，调离潢川整补去了。

就在这次战役之后，蒋介石似觉得鄂豫皖区的力量，再也不可轻侮了。而且鄂豫皖区地处冲要，红四军动辄可以威胁武汉，截断长江和京汉路的主要交通线，无怪乎他把这个区域看作是心腹大患。因此，鄂豫皖区和红四军成为蒋所急于要进剿的主要对象。蒋乃在武汉设置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司令。这样，鄂豫皖区在蒋的“剿匪”日程上，已列为第一位。

一九三二年四月间，我们对蒋的企图虽然还未详细知悉，但已隐然觉得我们将要面临更大规模的战争，便加紧部署红军力量。邝继勋编组第七十三师的工作，进行得颇为迅速，得到一般同志的赞许。这时，我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扩组本区的军队为第四方面军，辖原第四军及新编组的第二十五军，以徐向前为第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他们两人仍分别兼任第四军的原职。邝继勋升任第二十五军军长，率领已编成的第七十三师前往豫皖区金家寨苏家埠一带，利用在苏家埠一役中所缴获的武器，从速编组第七十四师及第七十五师。其第二十五军军政治委员一职，则暂由蔡申熙兼任，但蔡原为参谋长，且为红军学校的职务所羁，军政治委员的职位，暂时只是挂名而已。

我军最重大的缺点，是缺乏训练，便积极在这方面谋

求补救。我军作战，军官们身先士卒，因此干部伤亡数字较大，这种情况一直不能纠正过来。我在上面说过，徐向前受过伤，师长如刘英陈赓也先后受伤，团级以下的干部伤亡更不可胜计。我们干部的补充十分困难，我军乃抽空实施战斗教练，以期士兵能散开利用地形作战，改正由军官率领密集冲锋的作风，这也是减少伤亡的要着。

我军的装备是增加了，有了几尊山炮，几十尊迫击炮，以百计的机关枪。我们需要训练炮兵和机关枪兵。同时，也缴获了一些无线电台器材，正在一架一架的拼凑修理起来，训练编组人员来使用。我们缴获来的枪枝，一部分已发交地方上的独立团，但尚存有一部分。兵工厂也能修理枪枝和制手榴弹之类的武器，正在日夜开工。新兵也随着武器的增添而增加，训练工作也就繁重而复杂化了。

我们的军事工作暂时分成两个区域来进行，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军在鄂豫边区四周行动，加强训练，并充实地方武装。以邝继勋为首尚待充实的第二十五军军部，则会同金家寨一带的党政机关，在豫皖边区负担同样的任务。这个分工对于邝继勋说来，似是相当沉重的责任：他要单独对付那方面周围的敌军；他的二十五军军部和第七十三师尚须继续加以充实，还要编组两个新师，又要扩充训练那一带的地方武装，并指挥他们作战。工作之繁忙和他的才干，本不是完全相称的，然而一时又没有其他办法可想，也只好暂时听之。

除军事工作外，这个区域其他方面的工作也获得若干进展。首先是粮食不再感缺乏了。一九三一年中国各地发

生了很大的水灾，但我们的苏区因雨水充足和努力生产，反而是大大的丰年。没有了粮荒忧虑，社会秩序也显得安宁了。当时苏维埃政府的粮食工作，主要是征收粮税，储藏粮食，储备种籽等等。

老苏区的土地经过重分以后，大有改善。土地使用证也发到了各个农户手里。一般农民觉得他们有了一块可以长期使用的土地，工作情绪为之高涨。代耕制度有了相当的改善，农民们的劳役负担，也相应的减轻了。一般人都庆幸本乡本土不再受到白军民团的侵袭，边疆上的粮食也不会受到敌人的掠夺。

财政经济政策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尤为显著。苏维埃政府的收支，日渐接近平衡。一九三二年三四月间，我们的军队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月可以领到一元大洋的零用费。敌人虽然加紧封锁，但我们的日用必需品大致仍不感缺乏。苏维埃银行经常存有五十万斤以上的食盐，这是用苏区土产向白区换来的。

国民党统治的混乱，也是我们能冲破经济封锁的一个重要因素。驻在金家寨北面固始三河尖一带的敌军，就是不认真执行封锁法令的杂牌部队。那支敌军因国民党军事当局对他们待遇不公，军饷缺乏，在当地实行走私，以辟财源。这个敌军旅长并与我们订了一个通商条约，其要点是彼此互不侵犯，经他的防地进出的货物，准他私收定额的税款，我们的商业机关每次奉送他五千元，以补偿初办时税款的不足。这样我们出入口的货物，就在这个缺口通行无阻了。

此外，苏维埃政府各级机构的行政效率，逐渐提高。不可靠的分子和不法的行为，以及捉土豪迫缴罚款的事也大为减少了。苏区农民到白区去抢粮食的事从此绝迹。党团员的数量增加了，党团和民众组织加强了。苏区内到处在修桥补路，建置驿站和各种小型工厂合作社，以及发展文化教育工作等等。

这些进步发生相当大的影响。我访问过老苏区内一些老农民，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大致表示苏维埃政府的新章程新办法，与他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从前的一些造反行动，如白莲教、白狼、红枪会等的举事，显有不同，即较之一九二七年的农协运动，也有进步。现在这里一片兴旺的气象，这样下去大有成功的可能。他们所耽心的，是力量仍然太小，不知道还要若干年，天下才能太平。老农们的这种观感，刻划了当时那里的真相。

我们最大的苦恼，确是力量不易扩大。一九三二年四月间，这个区域的人口大致在二百万以上，比较稳定的区域（即老苏区）拥有人口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多数新发展的区域，政权机构大致上还不算健全，土地还没有分配好，地方武装的力量还很薄弱，我们当时称这类地方为“尚未稳定的区域”，但它占了我们全区的三分之二。我们的努力主要放在这些区域的基本工作上，但收效很慢。

我们不能单靠发命令去解决一切问题，主要的方法是发动群众斗争。一个新苏区，如果我们下命令实行分土地，若是农民不起劲，还是无济于事的。因此，我们着重于派遣一些干部，去发动当地农民，自行分土地。农民们固然

赞成分土地，但往往心存顾忌，如苏家埠附近的农民，就常常这样说：“等到合肥六安打下来了，再分土地罢！”

扩大红军是我们经常进行的重要工作。我们需要大量的兵源来补充缺额和编组新军，单靠老苏区地方武装人员来补充红军是不够的。在新苏区我们经常举行军民联欢大会，动员壮丁来参加我们的队伍。红军中的官兵也常用交朋友的办法，吸引青年到军队中来。这些办法效果固然相当可观，但仍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也有一些青年农民抱着观望的态度，他们似觉得在胜利尚极渺茫的目前，就贸然参加造反，那是过分危险的事。

这些事令我烦恼。我觉得这个苏区主要是靠军事力量来维持。我们是在大胆尝试土地革命究竟有多大的燃烧力，苏维埃政权究竟有多大的优越性和适应性。我们鼓起信心，开足马力，争取最大限度的胜利。在这些方面，我认为我们已经是竭尽所能了。作为一个领导者，我不得不考虑究竟能否、和如何获致决定性的胜利。这就更使我联想到苏维埃运动的前途问题。

这个苏区被隔离在偏僻的乡村里，使我们失去政治的感应能力。这种苦恼似是当时整个中共和各个苏区所共有的。我们对于这个区域以外的动态，漠然无所知，往往要在事件发生后一两个月，才从所搜获的报刊中，获知一鳞半爪；我们又缺乏通讯设备，将我们的心声，传达到外面去。我们与中共中央和各个苏区也互相隔离，彼此无法交换意见，就是互通情报的事，也非常少。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迟了两



个月之后，我们才能根据一些材料检讨这一暴行。十一月在一次中央分局的会议上，我指出现在反日情绪在全国已激成极大的浪潮，我们应当重视这件事。土地革命是反地主豪绅的，也是捣毁南京政权基础的步骤，可是与反帝运动不易发生密切的联系。各地爱国人民会觉得：既要举国一致对日，中共就不能在乡村中专揽土地革命。苏维埃政府对于反日的知识分子缺乏吸引力，更不易将反日军人团结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

我虽然提出了反帝与土地革命相互关系这个严重问题，但也没有说出具体的结论。同志们大体也受到中共中央既定政策的约束，不能有甚么新的阐明，我们仍认定南京政权是卖国媚外的，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是真正反帝的。有效的反日运动，必须以打倒蒋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为先决条件。这样，我们就无异置身于反日运动之外，主要是放弃了争取爱国人民的同情。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爆发了淞沪战争，驻在上海的十九路军积极对日作战，举国反日情绪达于沸点。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国策的国民党政权，居然也参与对外的作战，这是出人意外的。我军那时正围攻苏家埠，我们大致仍认为国民党一部分军人和全国人民是抗日的，南京政府则是阻挠抗日的。我们也提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国民党军人应来参加红军一致抗日”的主张，但这种口号仅属宣传性质，我们并不能在政策上有所变更。这使我对中共的苏维埃政策有了更大的不满。

当年四月间，淞沪抗日战争早已结束，我军在潢川地

区也击溃了汤恩伯部，正准备应付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蒋氏那时以红军捣乱后方为理由，更加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的论调。他在庐山积极训练剿“匪”军官，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对共政策，并在武汉调兵遣将，准备厮杀。我们针对蒋的政策，也提出了“抗日必先反蒋”的口号。不过我们也觉得蒋之将“抗日”与“剿共”联在一块，是很厉害的一着。在中央分局研讨冲破第四次围剿的时候，我曾暗示我的同志们，我们可能暂时要受到打击，主要因为我们在反日运动上，没有占到适当的地位。

我们的最高军事策略，向来不在中央分局公开讨论。为了机密的理由，只由少数巨头——我和蔡申熙沈泽民徐向前陈昌浩——密商决定。蔡申熙被委为这方面的草拟人；他所拟议的常常与我的看法不谋而合。蔡拟具了在顺利发展的条件下、一些积极性的军事方案，但他的根本看法是不乐观的。他认为鄂豫皖苏区过于狭小，在敌军优势兵力压迫之下，没有回旋的余地，不易实施化整为零的游击战术。他主张必要时红四军应向京汉铁路以西行动，这虽是退却行动，但为必要步骤。就在蒋的四次围剿前夕，蔡申熙更认为非这样做不可。

我们对付四次围剿的军事策略：积极方面，是以这个苏区为根据地，分别消灭进攻的敌人；消极方面，是失利时退到京汉铁路以西，占领襄樊鄂阳一带鄂北地区，与大江以南湘鄂边区的贺龙部互相呼应。我们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时，不能向南北东三方面发展，因为南有长江，北有黄河，东面是津浦线，这三方的军事要点，都有国民

党重兵驻守。因此，我们在军事观点上，只有向西，西面是国民党军力较弱的地方，也有广大的后路。

蔡申熙参谋长为了我们的退路问题，曾花了不少时间，研究京汉路西面的情况。那时，原在洪湖一带的贺龙部因军事上的失利，退到湘西桑植去了，我们很难与他取得联系。京汉路以西、孝感、云梦、安陆一些零星游击队，早被国民党军队摧毁，其中有些逃到鄂豫边境大别山脉的西段。蔡曾派遣人员企图与这些游击队联络，也派了一些人深入鄂西北和陕南一带地区，调查情况。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有可观的成绩。后来，蔡在四次围剿中阵亡了，这对我军西向行动，是莫大的损失。

当年七月间，鄂豫皖苏区，终被蒋介石优势兵力的四次围剿所压碎。红四军的主力被逼向京汉铁路以西行动，经鄂北陕南辗转到了川北巴中通江南江一带，才立住脚，在那里建立起新的“川北苏区”。鄂豫皖苏区从此不仅发展中断了，而且成了蒋介石的屠场。留在这个区域的游击部队，在那里坚强奋斗，所受牺牲极其重大。沈泽民等重要干部就是在那里殉难的。后来留守在这个区域里的徐海东部也被逼辗转到了陕北，成为各地红军集中陕北的先行者。最后剩下的高俊亭部到抗日战争时，改编为新四军的第二纵队。

上面所说到的，就是鄂豫皖苏区和红四军披荆斩棘，艰难缔造始末的大要。行文至此，我这个鄂豫皖苏区的园丁，真有感慨万千之叹。

第十七篇

川北苏区

## 第一章

# 四次围剿与西行五千里

川北苏区是红四方面军在敌军压力之下，不能在鄂豫皖区立足，因而突破敌军的包围圈，经鄂北豫西南陕南，到达川北后建立起来的。红四方面军这次行动，是苏维埃运动向西北转移的先声，后来，它接应各地红军，先后到达西北地区。

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四次围剿，是他对各地苏维埃前后五次大规模围剿中的第四次（第一、二、三及第五次是以江西苏区为目的，第四次则是以鄂豫皖区为主）。一九三二年五月蒋氏在武汉组成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旋即制定了作战计划，调集了约五十万兵力，等于我们四方面军力量的二十倍，企图围攻消灭我们。他的计划是将他的兵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防守部队，为数约二十万人，依据苏区周围的军事要点设防，并建筑碉堡，配合进攻部队，步步为“营”，向我们逼近。另一部分为进攻部队，组成刘峙、卫立煌、徐庭瑶、陈继承等纵队。每个纵队的兵力都超过红四方面军的三倍，以分进合击的策略，与红四方面军主力决战。其余如胡宗南、李延年、李默庵、黄杰等师则为预备队。

那时南京政权较为稳定，日本的侵略也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团结，蒋氏更能集中全力对付中共。他调集来进攻我们的部队，是他在长江以北精锐兵力的大部分。他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策略，似仍在试办期间。为了使剿共军队有一致的行动，他以严刑峻罚来对待他的军队。对于苏区人民，则是安抚与镇压兼施，不过后来在实际执行中，仍表现出步调不一致的现象。

我们当时高唱保卫鄂豫皖苏区的口号，事实上，我们也动员了最大限度的力量，企图粉碎这一次围剿。红四军是我们的主力，那时共有枪支九千余，新扩大的二十五军，约有五千支枪，至于地方武装，在我们看来，只是辅助部队，类似白区的民团，只能担任游击任务，我们共有八个独立团，和其他零星的独立连，约共有枪五千支。

我们自知力量薄弱，保卫苏区的任务十分艰巨。但我们绝不气馁，决心鼓起勇气，争取胜利，从各方面发挥我们的力量，如加强地方武装，动员民众配合作战等等，都做得很起劲。我们预先警告苏区人民，在四次围剿中，苏区可能暂时遭到侵犯，敌军飞机可能到处轰炸，要求大家预为准备。

我们的力量这样薄弱，是经不起挫折的，任何挫折都会影响全盘计划，可是我们在霍邱的第二十五军竟遭到空前的惨败，这实非我们始料所及。当年七月间，国民党徐庭瑶军开始向霍邱进攻，目的似只在占领县城，以为进攻的据点。但二十五军军长邝继勋竟违背军委会的命令，采取以主力防守县城的错误策略，使七十三师因之损失三分

之二。这对我们的整个局势说来，无异是丧失了一条左臂。

我们的军事计划，邝继勋是知道的，我们注重在野外消灭敌军，不大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这点邝也赞成，但他大概有点胜利冲昏头脑了，因为自四月间奉命率部在苏家埠一带去行动时起，他获得不少零星的军事胜利，扩展了那一带的苏区，并占领了霍邱县城。他的第七十三师成为劲旅，七十四师也大致编组完成，地方武装也有可观的发展。也许就是由于这些事情使他信心百倍，以为可以作惊人的表演，一举而吐气扬眉。

当徐庭瑶向霍邱进军的时候，邝继勋决定以霍邱为据点，消灭进犯敌人。他低估了敌军力量，不计算敌人的强大后援部队。他似为“保卫苏区”的口号所迷惑，强调不让敌人侵占苏区一寸土地，事实上却忽略了他的军队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

我获悉他这种决策之后，立即去电纠正，并指出他的决策会招致包围，遭受严重的损失，要求他立即放弃霍邱县城，将部队撤到霍邱湖以南地区，以便在野外消灭进犯的敌军。邝的回电谓正与敌人接火，如情势不利再行撤出不迟。

邝继勋的回电使我和蔡申熙参谋长大感焦急，蔡乃赶赴霍邱前线，实际执行军事政治委员职权，以谋补救。不料蔡申熙尚在途中，霍邱的失败，已成定局。徐庭瑶军以优势兵力，包围了三面环水的霍邱县城，并以飞机大炮向城内轰击，城垣多处崩陷，邝不得不乘夜率部突围，第七十三师伤亡及被俘各千余人，城内地方武装及运输队的损

失更不可胜计，随邝安全脱离火线者，也不过是千余人而已。所幸第七十四师，驻守城外，尚未受到重大损失。

因此，蔡申熙赶到前线时，只有收拾残局了。邝继勋因这一次违令失败事件，曾经自请处分。整个苏区和红军都为这件事轰动起来，纷纷要求以军纪制裁邝继勋。军委会根据蔡申熙的建议，终于从宽处理，免去了邝的军长职务，从此邝再不是红四方面军的要角了。至于二十五军因损失过大，不得不将第七十三、七十四两师，合编为第七十三师，由蔡申熙以军长兼政治委员的名义，直接指挥。

霍邱的失败，影响极为重大，我们的东线，整个豫皖边区大为震动，都认为敌人不难长驱直入。而敌军竟将在霍邱俘虏我军的一千多人，迅即释放；这些人回到苏区，使苏区一般人民，感觉国民党斩尽杀绝的政策是改变了。这对苏区同仇敌忾的心理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蒋氏和国民党军队受着这次意外胜利的鼓励，士气为之一振，旋即展开了全盘进攻的行动。

红四军在潢川豆腐店战役以后，即针对国民党的进攻计划，展开行动。我军到处侵袭敌军的据点，切断这些据点间的联系，并着重破坏京汉铁路，阻挠敌军的调动。七月间，我军主力埋藏在麻城附近地区，这时天气炎热，部队中疾病流行。我们特别注意防止疾病的威胁，以期全军能养精蓄锐，准备敌军深入到这个苏区来的时候，实行迎击。

八月初我们侦知敌军正分路向苏区进犯，乃移师黄安，向河口前进。这次敌军行动亦特别迅速，与我军相遇于黄



安河口间，遭遇战就这样展开了。我军击溃了敌军的先头部队约三个团，敌军损失颇大，任敌军指挥的团长阵亡。但敌军后续部队据守沿途山头，构筑工事，形成兵力一层多于一层的纵深阵地。我军攻势虽然猛烈，但仍为敌军火力所抑止。

大战展开了，正面敌军抑制住我军的主力，而敌方另一支主力部队则由罗山的宣化店向七里坪挺进，抄袭我军后路，宋埠李家集的敌军，袭占了黄安县城，麻城敌军也袭占了北区的张店，并出动大批飞机狂炸助战。我们的地方武装出动，到处骚扰进袭敌军。当我夜间从七里坪附近赶往前线的时候，四周枪炮声彻夜不停，似乎无一处不是战场。

翌日，我和徐向前等在前线一个山头上，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我们所望见的正面敌军数量，远超过于我军，他们正在山头上构筑坚强工事，并向我军左右两翼伸张。我们判断敌人的策略是在这里吸住我们的主力，而分兵由宣化店黄安张店三处抄袭我军七里坪的后路，我军既不能迅速击溃正面敌人，后路又岌岌可危，乃决定立即撤退到七里坪。

我军撤至七里坪东西一带阵地的時候，敌军卫立煌陈继承刘峙三个纵队，由河口宣化店等处进展到七里坪西面，与我军隔河相峙。黄安的萧之楚军则进到七里坪以南二十里的地方。张店方面敌军夏斗寅部则仍停留原地。刘峙所率的另一部正向新集的西北面移动。七里坪是这个苏区的坚强据点，是我们最能发挥力量的地方，便决定在这里与

敌决战。

不两日，我们选定了七里坪南面五里路的柳林河为发动攻击的地点。开始进攻的那天黄昏，我军倾全力实行中央突破，旋即展开大规模的夜战。午夜时，我们推进了十五里，打到卫立煌的总部。敌军在一个很宽广的阵地上，陷于混乱状态。我们的地方武装也四出袭击，约二平方公里的阵地几乎同时成为战场。敌军似不习于夜战，而夜战正是我军所长。我军只派了两个游击队员，乘夜由山沟丛林中深入到敌人阵地，在敌军两师之间，放了几枪，便引起敌军两师双方互相误击，一直到天明才知道上当。

著名的柳林河战役是一次空前的恶战，至少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们，从未参预过这样猛烈的战局。当时陈赓就说：“柳林河战役，比任何一次内战都更为猛烈；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程度，也是毫无逊色。”

我军方面所有能投入作战的力量，都用上了。拿红四军来说，只有我率领少数随从人员，坐镇在柳林河指挥所，其余如参谋人员，政治工作人员，以至伙夫等都托着枪上火线了。在 frontline 指挥的徐向前，攻到卫立煌总部时，敌军坚守不退，他鉴于天色将明，如果再继续攻击下去，敌军的优势火力，将易于发挥力量，而且我军所击溃的敌军也还只是敌军的一部分，他们仍有强大的后续部队。他判定已无完全击溃敌军的可能，乃下令退却，天明时，我军主力都撤回柳林河的东岸来了。

据说：当时敌军将领意见分歧，陈继承主张退却，但卫立煌反对，力主坚守以待天明，陈只好照办。如果敌军

在夜间实行退却，那将是我们极大的胜利。卫立煌在这一战役中，因主张坚守，受到蒋氏的嘉许，不久金家寨被敌攻下时，蒋命令改称为“立煌县”，似乎就是为了嘉奖卫立煌在这次战役中的战功。

这次战役，红四军伤亡在两千以上，地方武装的伤亡也在三百人左右。敌方损失似远较我们为重，他们在夜间互相误击所招致的伤亡也相当严重。

翌日，天刚明，以汉口为据点的敌军飞机，对我们展开比前更疯狂的轰炸。敌机以九架至二十七架的编队，在苏区上空川流不息，不加任何选择，看见目标就炸。我们在医院所在地铺着极大的红十字标记，但敌机看见这种标记，轰炸得更为激烈。

我们就在敌机狂炸之下，积极整理我们的部队。红四军的战士们经过整夜作战，自然相当疲劳，他们分散在战壕里休息。我们检讨这次战役之未能获得彻底胜利，主要是由于力量不足。我开始作情况逆转的准备。我们迅速动员地方武装部队和苏区人民来参加红四军，以补充这次损失，将伤病兵分散到山林深处的村庄里去，并通令那些疏散在山林深处的苏维埃政府和地方武装，储备粮食，照顾伤兵，准备各自相机行动。

敌方也在积极整理部队，不敢立即向我军反攻，各处的枪战显得平静了。敌将前线已陷混乱的部队，在飞机掩护之下，向后撤退。敌方似觉得在前线布置过多的兵力，在遭受夜袭时易于引起混乱，乃将主力撤到第二线去，前线只留少数部队，执行监视的任务。正面敌军虽一时没有

进攻我们的企图，但北面敌军，则向新集挺进，显然是要抄袭我们的后路。

我军经过两三天的休息和整理，元气又恢复了。我们考虑形势，认为敌军主力后撤之后，我们将更难于正面袭击，乃决定将红四军潜移新集以北，去消灭那一方面的进犯敌军，因为新集北面的敌军，为数较少，或许比较易于击破。

敌军大规模的进犯，也使红军战士的心情为之不安。他们觉得家乡被毁，家属存亡未卜，房屋庐墓成了废墟。我们针对这种情形，多方解释，指出这样强大的敌人，必须经过多次战斗才能消灭；家属遇难，田园破坏，只会更坚定我们奋斗的决心；因为除此一途外，我们没有其他出路。

苏区一般人民，似与红军战士的观感有些出入。当红四军潜向新集以北移动的时候，我轻骑向新集行进，沿途慰问各地农民，遇到的农民都向我们表示，这次柳林河战役，红四军英勇作战，已尽了保卫苏区最大的努力，敌军这次确是满山满谷的倾巢而来，七里坪前面群山，几乎没有一个山峰不为他们所据守，所有村庄都遭到严重的破坏。农民们觉得这个苏区的灾难，是无法逃避的，只希望能保全红四军的实力，农民将来才有翻身的一天。

我在新集镇外一个民房里，召集最后一次的中央分局会议。当时新集已给战火摧残得面目全非，我在那里巡视一周，全镇弹痕累累，到处是断垣破瓦，敌机狂炸程度可想而知。我的办公处所也被炸了。新集的各机构已搬到附

近的乡间，不少负责人都分别到各处指挥作战，参加会议的便只有少数中央分局和省委委员，其他大多为各机关的留守干部。

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们，表现了团结一致、坚决奋斗的精神。他们都认为鄂豫皖苏区已不能保卫，即使红四军化整为零，打游击战，勉强担负起保卫苏区的任务，也会在军事上招致更多的损失，因而多数主张红四军在必要时，不妨转到苏区外围去行动，保卫苏区的责任可由地方武装担任。

就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决定委派原任第三十六团团长、负伤未愈的徐海东，为鄂豫皖整个苏区军区指挥部的总指挥，全权领导区域内所有的地方武装，采取游击战术保卫苏区。红四军则相机冲破敌军的包围，转到敌军后面去打击敌人。至于各县各区的党政机构，则就地指导和参与游击战争，中央分局和省委以及苏维埃机关实行改组，将许多重要干部分派到各县各区，以期加强各区域的指导。

红四军已移往新集西北四十里的晏家河，并与敌军接触。我赶往前线，视察战况。在前线的山头上，我看见敌军正在阵地上构筑工事，纵横二十华里的区域内，屯着大量敌军，似乎当地村庄的民房还不够容纳军队，因此在阵地附近支起了许多帐篷。敌军数量远较我们为多，但也不敢向我军进攻。我们看见敌军铺设的飞机符号，于是便在我们自己的阵地上，照样铺设起来。这样，敌机的炸弹，便落到无人的山林地带。

我们的前线阵地，一时乃成为最安全的处所，便在那

里举行军事会议。这是重要的会议，团以上干部多数参加。同志们纷纷发言，检讨战局，一致认为我军在黄安河口间的遭遇战和柳林河的夜战中，并无错误。他们根据亲身经验，认为敌军兵力过于雄厚，我军既不能在黄安河口地区击溃他们，反使自己陷于被包围的危险，因而退到七里坪是必要的。柳林河夜战中，敌军虽在很广泛的战场上陷于混乱，但仍有雄厚的兵力，据守着许多重要据点，而我们的力量则已使用到最大限度。因此徐向前总指挥下令我军在天明前撤回原阵，是十分恰当的决定。参加会议的人，估计现在我们前面的敌军也是不易击溃的，即使我们孤注一掷，尽全力将当前敌人击溃，我们的后路——新集，也会被敌军抄袭；我军将在一个窄隘的阵地上，陷于进退维谷的困境。

因此，会议决定停止攻击正面敌军，红四军应在敌军兵力较薄弱的地方，冲开一个缺口，转到敌军的背后去，相机各别对敌军击破。各将领并表示在军情这样紧急的时候，不必再举行军事会议；一切由军委会主席和总指挥部命令决定便可。这次会议以后，我们的军事会议，一直到了川北之后，才继续举行。

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决定下令全军脱离晏家河阵地，向东往白雀园到金家寨去。沿途并没有遭受敌军的严重截阻，就到达了金家寨。蔡申熙军长与在那里会面，他完全赞成我们将红四方面军迅速移到京汉路以西去的决策。我们在金家寨部署了留守人员和地方武装的游击战任务。为了扰乱敌人耳目，我们向外透露我军将向东发展，或向南

渡江到江西苏区。

蔡申熙所率领的第七十三师，在金家寨参加了我们西行的队伍。（西行部队有第四军的第十师第十一师及第十二师以及第二十五军的第七十三师，总共一万六千余人。）我们由金家寨南向英山行进，在英山附近我们冲破了敌军郝梦麟、上官云相等师的阻搁，再由英山折而向西，经仓子埠<sup>①</sup>等地到达黄安以南的高桥区。我军就这样晓伏夜行，以最高速度绕着苏区兜了一个大圈子。

我在高桥区会见了沈泽民，这是我最后一次与他晤谈。他早已知悉我们决策的大概，积极支持我军迅速移往铁路以西。当时敌军全部占领了新集七里坪一带的老苏区，我们的地方武装和留守人员正与敌军展开剧烈的游击战争。我们商谈的要点，是人事配备问题。我要求沈泽民和其他重要干部随军到京汉铁路以西，但沈泽民以本身系鄂豫皖省委书记，不顾身体多病，坚持留在这个区域内打游击。不料后来他竟在游击战争中丧失了生命，为了他的职务而殉身了。

我们侦知河口一带敌军大部已推进到七里坪方面去了，防务比较脆弱，我军乃不在高桥区停留，移师河口附近，冲破敌军在那里的防线，直指京汉路。担任掩护任务的蔡申熙，就在这次阻止敌人截击的战斗中阵亡。他是我军公认的一位老谋深算的战略家，他的死亡使我们大为震悼。

我军乘夜绕到了河口东北一带地区，敌人的追击部队也就分路撵来。我军经过好几天的夜行，已大感疲劳，但

大敌当前，只得占领阵地应战。敌军的一部迅即冲进我们的阵地，使我军各单位难于互相联络。但我军究竟是坚强的，立即分途截击。在这场混战中，我军伤亡逾千；但突入我阵地的敌人，也遭到歼灭性的打击，伤亡约为我们的两倍，这样才抑制了敌军的猛进。

我们到达离京汉路不远的夏店时，曾对鄂豫皖区的工作，作了一些最后的安排：先通知沈泽民，告诉他我们分手以后所遭遇的情况，着重指出因遭受敌军的追击压力，我军势将远离苏区，何时能再回鄂豫皖区，实难逆料。现在我们只有各自为战，留在鄂豫皖区的游击部队，不能指望四方面军的救援，在不利情况之下，可以到铁路以西来与我们会合；一部分干部可以脱离鄂豫皖区，到旁的苏区去或来找我们。这就是我对留在鄂豫皖区同志们最后一次的指示。

一九三二年八月下旬，我军乘夜在京汉路王家店附近越过了铁路，当敌军铁路线上的装甲车赶来截击我们时，我们已在铁路以西二十里的地区了。我军的殿后部队，亦只听到敌人追击部队的零星枪声。从这里起，我们脱离了鄂豫皖区，开始西行五千里的长途。

敌机一直是跟随着我们的，目的主要是侦察我军的行进路线和宿营地点。敌军的追击部队也根据敌机的情报紧紧尾追，而前进路上的驻军又在设防阻拦我们，沿途各地的民团也随时对我们作骚扰性的行动。沿途居民被逼不敢与我们接近，这使我军的给养大为困难。

我们虽在敌军压力之下退出了战场，但我们的目的，



仍在分散敌人兵力，以便乘机反击。我们希望在离鄂豫皖不太远的地区，找到新的据点，但这只有在消灭了敌人追击部队的情形之下，才能实现。我军经由随县以南洛阳店一带地区，且行且战，向西移动。沿途安置伤病兵，以减少行军的负担（重伤未痊的刘英师长，就在洛阳店附近化装到上海去就医，后来我们再无法知道他的消息）。为了节劳，我们也尽量减少夜行军，另一方面，又因为减少夜间行军，无法避开敌机的侦察。我们经常派遣少数游击部队，沿途与敌军纠缠，使敌军疲于奔命，不能迅速尾追我军。

行进到枣阳县南面吴家集一带地区时，我军与敌军发生了此次西行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战斗。吴家集在枣阳县城南约九十里，西距汉水与襄阳约一百里，敌人选择了这个地区，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军，企图压迫我军退到汉水边，在那里加以歼灭。

我们在吴家集附近宿营的时候，敌军乘夜逼近。翌日黎明，两军即开始大战。当时处境，我们陷于被动地位，非予敌军以重大打击，不易脱离火线。我军抱定有胜无败的决心，经过两天一夜的混战，终于在敌军北线，冲破一个缺口，脱离了包围圈。

两天的战斗在一个很大的战区内展开，正面肉搏，拚命冲击。这次战斗最惊险的一幕，是敌军攻到了我和徐向前的指挥阵地不及五十码的地方。敌军似已侦知我军的总指挥所，于第二天下午集中强大兵力，向我指挥所猛扑。由于我军正面一部约三百人伤亡过重，连排班级的指挥人

员均告阵亡，无法继续作战，纷纷向指挥所败逃。眼看敌军向指挥所蜂涌而来，徐向前沉着应付，立令整理队伍，指定其中精神较强健者，担任连排班级的指挥人员。我则动员所有参谋政工以及各种直属部队约三百余人，临时编组，当敌军逼近到我们指挥所的地方，徐向前一声号令，我们这几百名临时编组起来的部队，便冲杀出去，手榴弹一齐向正在疯狂前进的敌军抛掷，烽烟起处，血肉横飞，敌人就这样败下去了。这最惊险的一幕，竟使我们化险为夷。

敌人最强烈的攻势，被我们抑阻住了，敌军的北线也被我们冲破，战局顿呈胶着状态，我军乃乘夜向北撤离。指挥北线作战的陈昌浩，担任撤退的先头部队，徐向前率大部推进，我则殿后。这一次撤退工作极为艰苦，撤退的行动自天黑时开始，原定晚上十时可以完成，谁知夜中在一个广阔的战场上撤兵，竟发生了一团人走错路线的事件，我们追寻这团人的踪迹，直至午夜以后才脱离战场。

当晚我们循小路走一百多里，才能在枣阳以西二十里的板桥店附近，通过敌人的第二道防线。我带着十余骑，成了全军的后卫。到达板桥店时，天已大明，马匹也累得走不动了，乃略作歇息，让马匹在小河沟上饮水。但从枣阳追来的敌军，这时突然出现，占据着我们左右的高地。机关枪的子弹像雨点般，从我身边飞过，我们前进的道路也给封锁了，幸好我军的后卫团迅速转头来接应，否则我们这次真是不堪设想了。

在后卫团的掩护下，我们下马步战，向北行进，走了

二十里后，在一个山冈上与徐向前陈昌浩等会合，因连日过度疲劳，我一看见他们之后，不由自主的便倒卧在地上了。陈昌浩等大多数人也已累得不能动弹。只有徐向前等少数身体特别强健的军人，还能支持得住。徐向前立即向我报告，我们向北的去路，给敌军堵住了，还有从河南来的刘茂恩部两个师，已组成包围我们的第三条防线，我们要立即击溃刘茂恩部，才算完成了突围的任务，他准备立即率部与刘茂恩部决战。我那时已累得不能说话，只有用手势表示同意而已。

于是，徐向前带着只休息了片刻的部队，向刘茂恩部进击，陈昌浩等休息了一会，也跟上出发接战，我则还是殿后。幸好刘部战斗力异常脆弱，饥疲交加的我军，竟没有费很大的气力，就把刘茂恩部打得作鸟兽散。我们循着北进的去路，又前进了八九十里，到达枣阳与新野交界的地方（即鄂豫两省交界处）。这一日一夜的行动，前进了二百里以上，把自吴家集追击我们的敌军，远远抛在我们的后面。刘茂恩部再也无力阻拦我们。

在大路两旁干燥的田亩上，我军就地宿营。此时休息第一，连吃饭都觉得是次要的了。伙夫也已无力作饭，马匹也只有任由它们在田野散荡。我的十余骑是全军的后卫，到达宿营地时，已是深夜。我一听完徐向前陈昌浩所拟翌日行动计划之后，也就倒在地上睡着了。

直到第二天晨曦射在我的脸上时，我才一下惊醒，起身一看，全军已经走得无影无踪。原来他们在五时前，已经出发，我身边十几个随从人员，仍在地上酣睡，我叫醒

他们一问，始知那位放哨的卫士，得到出发的通知，未及叫醒我们，而自己竟又睡着了。

我们立即找回马匹，配上鞍子，循着我军前进的道路，快马赶去。这时人马经过一晚的休息，精神抖擞起来。走了十余里，到达路旁一所大院的门口，发现有百余人的民团，在门前的广场上武装列队，我当下判断这些武装民团的行列，是准备接应追击我们的白军。我们快马加鞭，直向民团的行列前进。那民团队长立即呼口令全队举枪向我们致敬，我们在马上匆匆举手答礼，就冲过去了。离开民团行列不久，枪声便从后面响起。也许是民团初以为我们是白军的军官，旋即发现我们是掉队的红军，因此赶上来射击，可是我们已经走得远了。

风驰电掣的又向前赶了近十里，我们便与大队会合，徐陈等得到后卫人员的通知，知道我们离队甚远，就坐在路旁休息，等候我们。我们会面之后，纵声大笑，叙述这三天的有趣经历。眼看敌军是绝对追不上我们了。这场战斗至此告一结束，我们准备找一个适当的地点，让全军人员能够休息做饭。

这场战斗，敌人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对我军极为不利，我们损失兵员近两千，两个团长和两个团政治指导员阵亡。敌军虽也有一个旅长阵亡，士兵死伤似亦不少于我军，但我们素来的观念和原则，认为消耗多而无所获即是失败，何况我们难于再经受消耗了。尤其是一千个以上的伤兵就地被抛弃的事情，使全军十分痛心。

我是全军的殿后部队，在后面亲自安置这些伤兵的时

候，为之大恸。伤兵自知只有留在当地，绝不可能再随军前进了，也不愿因自身的创伤而拖累全军，然而对于即将面临敌人的危害，极感不安。我们的政工人员，只有百般安慰，要他们安心，如敌人有虐待杀害伤兵等情事，可以据理抗议。

遗弃伤兵的事件，迅即成为全军议论的题目，大家都极感痛心。有的检讨没有根据地作战是不智的，要求迅速脱离敌人追击，以期有喘息的机会。又有不少士兵动了思乡之念，想着不如仍回到自己家乡鄂豫皖区去打游击，就是死也希望死在本乡。

我们这些军事首脑，针对这种情况，修正了我们原来的策略，决定如一时没有消灭敌人的机会，又不能鄂北一带立足，不如前进到更远的西部去。沿途如在情况不利下，应极力避免与敌人战斗。另一方面，须高度发挥我军行军的效率，使尾随敌军在竞走中疲于奔命。

我们向全军解释，打回鄂豫皖区既一时无此可能，便只有向西寻找新的根据地。我们要求全军人员，将平日行军随身携带的干粮袋子，装足三天的用粮，缺乏子弹或破旧的枪炮，伤病的马匹等，都须抛弃，一批受伤干部，也加以遣散，（在河口附近负伤的陈赓，就是在那时离军赴沪就医的。）这样，我们的队伍就轻便得多，作战行军，两得其便。

我军经河南的西南——新野邓县浙川——向陕鄂边境进发。豫西南一带是民团势力统治的地区，各村落多筑有城垣防御，对于兵匪的骚扰，他们有抗拒的力量。我军第

一次在新野境内宿营时，他们就闭门不纳，经过交涉和显示我们的射击技术之后，才获得民团的让步，和我们成立了协议。其要点是：我军可以在沿途各村庄借宿一宵；购买粮食，须付现款，损坏东西，按价赔偿，不得利用村庄作战等等。民团一方则应允不勾结白军来向我军暗害。这样一来我们在鄂西南行军，就一直没有受到民团的阻挠。

我军由浙川到达豫陕交界的紫荆关，为敌防军所阻。我们表演了一番佯攻动作，马上即折而向西，以漫川关<sup>②</sup>为目的地。这一带是崇山峻岭地区，历来为绿林好汉出没之所，土地贫瘠，居民稀少，除玉蜀黍外不产其他农作物，交通更只凭羊肠小道，漫川关就是这块鄂陕边境上的险隘所在。

我军到达漫川关附近时，又为敌军凭险设防所阻，一经接触，我们就知道这是敌军嫡系主力的一部，便立即停止前进。先行查明敌情，好不容易在山林中寻着了三个老百姓，略加讯问，就发现这三个人原来就是敌探。我们予以优待，保证决不加害，只希望他们能吐露一些敌军的情况。这三名敌探中的一人，曾因欠缴捐款，在数日前被当地保甲长私自打了几十军棍，背上尚留有伤痕，我们没有费很多的唇舌，他就尽情说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

据他说，敌军准备把我们逼到漫川关附近的山谷中，截断我们的出路，使我们没有粮食，然后以强大的火力，歼灭我们。他们所部署的兵力，在漫川关正面的是刚从郧阳大路来的胡宗南师，在我们后面追击的则为××两个师，山谷南为××两个师，山谷北是萧之楚的两个师。两天以

前当地保甲长并曾严令居民带着粮食逃避，实行他们坚壁清野的办法。他又告诉我们，漫川关的右侧离这里三十里地方，有一条险要的小路，通山谷外的陕西境，如果萧之楚部尚未赶到那里布防，是比较容易通过的地方。

这个敌探所讲的话，证之于我们所直接获得的情报，相当可信。于是，我立即下令由陈昌浩率领一团人，迅速夺取漫川关右侧的小道。陈昌浩的行动极为敏捷，约一个半钟头，他就带着十余骑扼守住那条小路的隘口了。萧之楚部迟到了一步，那里的高地已由陈昌浩这十余骑占领，居高临下，萧部先头部队成为我军俯击的目标，乃不得不转而占领隘路口对面的一带高地，这样，他们还是可以控制这条通向陕西的险径。但陈昌浩所统率的那团人跟着赶到了，立即与萧部展开了山头争夺战，结果，所有能控制这条小路的山头都为我军所占领。

我们控制了这条小路，脱离了敌人的圈套，避免了一场可能不利于我军的战争。尽管敌人的包围部署并不算得严密，就是发生更大的战斗，我军也可能有其他办法与敌周旋，但循小路溜走，究竟是当时最便利的途径。敌军却白辛苦一场，毫无所获。追击我们的敌军数量显然减少了，他们经过长期的行军作战，特别是在山岳地带行进，显得疲劳不堪，掉队的极多，现在又不能如愿以偿，更显出了垂头丧气的狼狈之态。

我军的避战行动，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当我们乘夜通过这条小路向北行进时，因道路崎岖狭窄，仅能容一人一骑通行，前进速度极低，直至翌晨，我军的“大行李”

还没有通过（“大行李”是军中通用的俗语，主要是指炊事班和炊事工具），敌军的机关枪却已射到小路上来了。为了避免人员的伤亡，我军迫得放弃难于运输的炊事工具，让炊事人员迅速的跑过去。此后，失去了炊事工具，我军就只有借用民间的锅灶了。这样一来，引起了许多困难，而且因此降低了我军的政治纪律。

与我军争夺这条小路的萧之楚部，疲惫不堪，行动相当缓慢，但因奉着严令，仍积极向我掩护部队进攻。我军志在迅速通过小路，无意与敌纠缠，因此，我们掩护部队的数量很少，最前线的一排只有官兵共二十六人，不幸在这次山头争夺战中，全部阵亡。他们完成了阻拦敌人前进的伟大任务而捐躯，使全军大为感动，锡之为“英雄排”。敌军至此知道我军的英勇斗志并未稍减，便也就气馁了。

那时已是九月下旬，秋风瑟瑟，我军由鄂豫皖区而来一直都穿着夏服。通过高山隘路时，全军战士都感觉寒冷彻骨，乃破例准许战士在山地上烧玉蜀黍秆子取暖。添配冬服是我们燃眉之急的问题。

陕鄂边境的山岳地带，虽然利于与敌周旋，但异常贫瘠，粮食布匹均感缺乏。我们为了解决冬服问题，乃向较富庶的陕南地区——丹凤商县雒南等县行进。

我们这个大探险队在这一带过了一段流浪生涯，有时与敌军玩玩捉迷藏的“游戏”。当时敌机侦察已大为减少。敌军占据了各个县城和重要市镇，并扼守要道，拦阻我军前进。我军忽而向东，忽而向西，到处钻敌军的空隙，以小股游击队，四出活动，出没无常，使敌军穷于应付。



我们要在陕南地区找寻立足之地，但旋即失望了。这一带的粮食虽然不感缺乏，盛产柿子等类水果，我军几个月来没尝水果滋味，乃大啖柿子，朵颐为之大快。但冬衣问题仍然不能解决。此地不产布匹，纺织手工业少得可怜，当地人民平素布料已经不足，自无力供给军用。而重要城镇既为敌军所占，也无法从外地补充。

眼看严冬就到，冬服不能补充，我们便都要冻死陕南山头，乃决定前往川北。但东面是敌人势力雄厚的地区，西面北面则气候严寒，更不能获得布料，我们必须由陕南越过秦岭，先到关中平原地区，将尾随我们的敌军吸引开去。翻过秦岭进入汉中之后，再越过巴山而到川北。这样兜一个大圈子，才能摆脱无数的追兵，在川北立下足来。

厘定这个计划的时候，我曾求教于一位绿林老英雄。他住在商县之北的一个村里，是一位年约六十的老者，当年是杨虎城等好汉的前辈，现时退休在家，务农为业，他熟悉这个广大区域的情况，对造反者也极为同情。

这位老英雄根据他的常识，再三剖析，认为到汉中地区是上策，但他说由这里向西到汉中都是险道，沿途给养不易解决，更要提防少数敌军凭险扼守通路。如果路经关中，再翻过秦岭到汉中，要谨防关中敌军据险阻拦。如果我们一停留，包围的敌军将愈聚愈多，更无法解决冬服问题。他这些看法，坚定了我们必须直到川北去立足的打算。

我军循着商县通西安的大道前进。经临潼西安南境，沿秦岭北麓西行。在子午镇与陕军作战，在盩厔县附近又

与胡宗南部混战一昼夜。胡宗南部尾追不舍，由漫川关跟踪我们，由西安到盩厔县的途中经常拦锁我们的去路。我们一一突破了敌人的关口，最后在盩厔县西面地区，翻越秦岭，向汉中城固县进发。秦岭这座大山，崎岖雄伟，山峦重叠，翻越极为不易。我军两次宿营山中，穷山荒野，似乎都在考验我们的体力和勇气。

在秦岭的南麓，汉中陕军凭险设防，扼守山口，意图将我们困死山中。但我军以势不可当的冲锋，将敌人打得四散奔逃，更乘势追击到城固附近，沿途尽是敌方溃兵，大路上到处是遗弃的枪枝子弹。但当时我们已无余力去照顾这类东西，乐得做个顺水人情，要溃败的陕军，捡回他们的枪枝，赶快回南郑去，并告诉他们，我们的敌人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无意与陕军为难，亦不愿争夺陕军地盘。

在城固附近休息的时候，我们向全军宣布到川北去的计划。我们向同志们解释，汉中之敌虽被我们击溃，但关中之敌将接踵而来，我军仍不能在这里立足。川北情形则不同，该地由四川军阀盘据，素不愿外省军队入境。我们一旦进入川北，敌军因对四川军阀有所顾忌，不会追击我们，他们只能停留在汉中，大致也够疲劳不能与我们纠缠了。即使他们再来进犯，我们也可凭巴山险要和他们周旋。因此，我们选定了川北作为我们休息建立基础的地点。

虽然我们人力马匹极感缺乏，但我们再不遗弃伤病兵了。在最近一次的战斗中，有一百名左右伤兵，及一些无法步行的病兵，要带走这些伤病兵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我们放弃没有弹药的枪炮，尽量拨出人力来抬架伤病兵。经理处用骡马载运的一部分重要财物也忍痛抛弃，抽出了三十几匹骡马给轻伤病兵乘骑。这种措施大大振奋了军心，一般战士才感到以前我们所以放弃伤病兵，确是万不得已的事。

这时已是十一月初，战士们的手脚多已冻裂了。在城固附近赤足涉渡汉水的时候，河水冻冷，疼如刀割，但我军除伤病兵外，没有一个人是骑马过去的。从那时起，马匹也只为伤病兵骑用，我和徐向前等都一概步行。诸如此类同甘共苦的行为，在当时至为必要，这是维系军心的不二法门。

这时，前无拦阻，后无追兵，由城固附近向西乡的南面行进。沿途供应也较易解决。我们恢复了政治工作，全军战士精神抖擞，为了到川北后与这里的邻人保持亲善关系预留地步。对于城固西乡一带的人民，我们极力表示好感。

我军在西乡南部休息两天，即翻越巴山，以川北通江为目的地。著名的巴山，须要两天的行程才能越过。第一天傍晚我们在山顶宿营，那里只有两间破屋，容纳伤兵亦感不敷。于是我将全部重伤兵安置住在那两间破屋内，其余的人连我在内，一概露宿。谁知那些重伤兵们，认为我是全军首长，军旅倥傯，心力劳悴，他们大声呼喊，我应与他们同住屋内。我在盛情难却之下，乃第一次挤住在伤兵的行列中。那天夜晚，伤兵们因要避免扰我睡眠，连呻吟声都忍扼住。今天我回忆当时的情景，觉得我的战友们，

对我爱护的真挚之情，仍觉得十分感动。

翌日，约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中旬的某一天，我军由巴山山顶下行约一百里，到达川北通江县北的一个市镇——两河口。我军即以该地为据点，经营我们的新根据地——川北苏区。我军自八月下旬越过京汉路西行，以迄抵达两河口，为时约八十日，穿越鄂豫陕川四省，路程在五千华里以上。沿途与追击和阻拦的敌军战斗不下十次。我军人员武器的损失约百分之四十，原有一万六千余人，枪枝一万二千余；到这时只剩九千多人和八千枪枝了。机关枪原有百余挺，到川北时只剩下一半，大小炮三十余门都全部抛弃了。

这是一场惊人的退却战。我当时认为造成这场不可避免的退却战，是由于中共中央的苏维埃政策发生了严重的缺陷之故。我们没有完全被消灭掉，是有赖于中共组织力的坚强和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基于这一认识，我与中共中央之间，在苏维埃运动的根本方针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这点，我在下文还要详说。

在这里，我必须声明，因为时间和材料所限，我只叙述了红四方面军西征的概要，至于许多同志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的搜集、整理和描述，还有待于史家的努力。至于我个人当时这一点基本看法，我想参与这次行动的和后来参与江西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同志们，也会有同样的体验，并能证明这是合乎事实的。

- ① 仓子埠在湖北黄冈县西北一百二十里，西濒武湖，接黄陂县界，东有大路，北通黄安县，亦称仓埠镇。
- ② 漫川关在陕西山阳县东南一百二十里，接湖北郧西县界。

## 第二章

# 入川之初

疲累的我军，走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区。这个地方，无论从那方面说都是落后的，人民所受的痛苦十分深重。鸦片烟的毒害，更是首屈一指。我们要在这里建立基础，一切事都得从头开始。我们当时最需要的是休息，其次是补充军队所缺乏的装备，第三才是建立根据地。这些迫切的需要，都联系到建立政权问题。如何能建立一个为当地人民所拥戴的政权，乃成为我们内部讨论的中心问题。

我们全军当时真像一群叫化子。除了有些战士穿着沿途补充的五颜六色的服装外，我们身上都只穿两套单军服，而且污秽破烂不堪。脚上多无鞋袜，只用破布裹足，早晚都披着破旧的军毡御寒。我们满身征尘，面目黧黑，手脚冻得裂痕累累，全身都是跳蚤。兼之三月来没好好梳洗，头发又长又乱，配上满脸胡须，看来真有点可怕。

对这种狼狈景象，我一路都在寻求解决办法。摆在眼前的问题，不是军事的而是政治的。对于我这个主持者来说，解决现实需要，重要性远过于死板的教条。在建立政权上，我决心扬弃苏维埃的公式，因为这个公式不适合于西北落后地区。我们要寻求一种革命的人民政府的新形式。

我军必须先求康复整顿，如果可能的话，甚至应与四周敌军暂时休战。我这些理想，在入川之初，开始试行。

在两河口一个茶铺里，我们草拟入川纲领。两河口这个小市镇只有二十多户店铺，商人大多已走避，只剩下几个鸦片瘾君子。为了查问当地情况，他们便都成了我们的座上客。这几个人都穿着一件空心单长衣，看来连内衣都没有穿。每人手里提着一个小火炉，吊在裤下取暖，这是当地瘾君子的一般装束。他们满面烟容，瘦得不成人形。其中可能有田颂尧<sup>①</sup>的侦探。我们并不调查这些人的来历，一律款以酒肉，又让他们过足鸦片烟瘾。这样，他们和我谈话时便显得相当融洽了。

在两张油渍甚厚的方桌周围，坐着我和其他几位同志以及这几位客人。我首先向客人说明，红军是纪律严明的部队，并不杀人放火。我们到这里来，也不要与田颂尧作战，只希望他能让出一小块地方，供我们在这里休息过冬。希望客人们将这番话传说出去，使老百姓都能在家安居乐业。田颂尧也不必多所疑虑。跟着我请客人随便谈谈本地的风光。

这些客人擅长词令，这原是四川人的特长。他们在军阀彼来此往，割地自雄的局面下，养成了随机应变的才干。在烟瘾过足之后，更说得头头是道。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的身份，只觉得我们这些衣衫褴褛的人是些下级军官，不如田颂尧部一个班长。田部一个班长下乡，要坐“滑竿”<sup>②</sup>，有十个兵前呼后拥，老百姓见着，要称为“班长老爷”。在他们眼光中，我们整个军队是这样狼狈，穿着又奇形怪状，

确像是被打败了的军队；但另一方面，又觉我们气度举措都相当有派头，精神也很振作，枪枝齐全，子弹充足，这又使他们大感惊奇。尤其是我们态度谦和，他们见所未见。他们问东问西，我们一一详加解释，乃使他们说话毫无拘束。

田颂尧的虐政确是天怒人怨。他们异口同声的说：“田颂尧那个狗入的。把我们老百姓整得好苦啊！”他们这样骂田颂尧，也许含有向我们讨好的动机；但确是义愤填膺，愈说愈激昂。尤其是说到苛捐杂税，更是切齿痛恨。他们指出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特别是鸦片捐更是重得吓死人。不仅种者要纳烟捐，不种的也要纳“懒民捐”；不吸的要纳“禁烟捐”。田颂尧约有五六师人，防区却只有川北的十余县，兵多地窄，这也许是他不计死活搜括的原因之一。

他们描述田颂尧逼捐税的手段，也骇人听闻。一个老百姓欠缴一块大洋的捐款，保甲长便把他抓去打一百板屁股，按此比例，多欠多打，如欠三元即打三百板，打完之后，欠捐仍须照数缴清。这个区域的保甲长职位多系以金钱买来，专门以收缴捐款为职务，有任意抓人打人的特权。如果保甲长不能向田颂尧缴足捐款，田颂尧就派军队下乡追缴；不用说，那会弄到鸡犬不宁，老百姓还得分担一份庞大的军队招待费。

这一带的乡绅、军官、放债者以及吃衙门饭的人，也和田颂尧一样的丧尽天良。据那几位烟客描述，这里土地不值钱，不少的人因为缴不起捐税，典田当地，逃亡到陕



甘一带去，有钱的人便乘机贱价收买土地，土地死当的事到处都有。地租多系铁租，无论收成如何，不能短少分毫。借款利息更是重得可怕，按月对本对利的是常事，按年对本对利的还算是很轻的了。

我们得到了所需要的这些材料，便开始草拟《红四方面军的入川纲领》。这个纲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红军所到之处要立即实行的，共有下列三点：第一废除苛捐杂税，即红军所到处，不再收原有的苛捐杂税，也不准任何人征收。第二减租减息，地租以百分之四十为标准，年息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第三保障人民安全，红四方面军决不任意捕人，也禁止任何人捕人杀人，废除笞刑及一切体刑，人民非犯法不能拘押。以上三点，我们名之为入川的“约法三章”，是最低限度的政治纲领，要立即不折不扣的实行。

纲领的第二部分是号召四川人民与我们共同实行的，名为《入川十大纲领》。这个纲领的最大特点，是要求全川父老人民和红四方面军一起共同组织一个四川全省人民政府（其中没有只字提到苏维埃政府）。其次，是属于一般政策方面的，如分配土地，职工利益，男女平等，统一税则，提倡文化教育，反对帝国主义和日本侵略，打倒蒋介石等等，这些都是中共的一贯主张。再次是关于四川特有情形的，如废除防区制度，各军互不侵犯，和禁绝鸦片等。

我军从两河口沿着大通江河向通江县城进发<sup>③</sup>，抵达距两河口约一百二十里的苦草坝时，我们举行西行后的第一次高级军政干部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我们今后行动的方针。

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致认为可以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这个区域一片崇山峻岭，大通江河两岸，矗立着连绵不断的石崖陡坡，从山脚到山顶，约有二十至三十里，使人望而生畏。但一经考察，这一带的田地村庄多在山林之上，人们在山林中依着地势开辟了许多梯田和土坪，种着水稻和各种杂粮，他们并未因我军的到来而有所惊恐，照常耕织如故。从这些情况判断，我们认为这一带是我们可以立足的地方。

汉中方面的敌军，尚无跟踪入川的迹象，我们估计他们都已疲劳不堪，一时不敢再和我们接触，不能阻拦我们在这一带的行动。通南巴一带田颂尧的部队防务空虚，战斗力也很脆弱。通江东面的刘存厚部，兵力较小，更是不堪一击。根据这些军事情况判断，我们是可以在这里喘息一下的。

虽然如此，我们仍是小心翼翼的处理一切问题。决定暂时只占领田颂尧防地的通南巴一带地区，以免多树敌人。对田颂尧我们也决定采取避免战争的态度，俾我军有多一些休息的时间，解决急切的供应问题。为了这当务之急，我们愿付出相当代价，不惜致函田颂尧，要求不要以兵戎相见，让我们在通南巴休息过冬。对于东面的刘存厚，北面的杨虎城，我们也准备多方疏解，以期相安无事。

这些政治策略会收到多大的效果，我们不抱幻想的乐观态度，所以同时还是积极备战。军队数量虽减少了，但在编制上加以扩充，以壮声势，我们决定将第四方面军原辖四个师，扩大为四个军，仍归徐向前陈昌浩统率。将原

第十师改称第四军，以王宏坤周纯全分任军长及军政治委员；原第十二师改称第九军，由何畏詹才芳任军长及军政治委员；原第十二师改称为第三十军，以陈世才李先念分任军长及军政治委员；原第七十三师改称为第三十一军，以王树声张广才分任军长及军政治委员。此外还作了很多人事上的调动，主要是从军中调出一批干部，准备建立当地的党组织和政权机构。

我们又决定这四个军分散行动，各当一面之敌，而以通江为指挥中枢。第四军进驻通江以东一带地区，对付绥定、万源方面的刘存厚部；第九军向通江西南发展，以占据巴中县为目的；第三十军向通江以南地区行动，对付营山渠县方面的杨森部；第三十一军向西北方行进，以占领南江县为目的。我则率领军委会机构暂驻通江县，策划党政军各方事务的进行。第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也暂随军委会同驻通江，苦草坝则为全军的后方。

苦草坝是对北面的军事要地，也是我们的后方据点。这个小市镇虽只有四十多家店铺，但地形险要，附近又盛产粮食，是一个易守难攻的所在。它的后山上，正有一个大山寨，寨内房屋甚多，我们将全部伤病兵和经理处属下的机构，都安置在这寨子之内，后来我们还在这里设置了兵工厂、被服厂等等。这里只要有少数兵扼守，就有一夫当关的气概。苦草坝之北正是我们入川的来路，有广阔的巴山山脉为屏障。在两河口一带我们只留驻少数兵力，以监视汉中之敌，这是由于兵力不足不能不如此的。

在商决上述军事策略和布置之后，就进而研讨我在两

河口所草拟的入川纲领。同志们大体赞同我所提出的草案，会议上对于立即施行的“约法三章”，异口同声的表示是一个杰作；对于十大纲领中不提苏维埃政府而主张建立人民政府一点，原则上大家虽觉得这是根据环境所必需的改革，但也有一二人觉得这与中央的整个策略，有些出入，颇有踌躇不能决之意。

但急待解决的问题迫眼而来，在军事紧急情况下，不容我们从长计议。大家乃决定先将我所提出的草案，付诸实施，并据此立即发布了一个红四方面军的入川布告，到处张贴。我们准备占领通江县城后，试行组织通江县临时人民政府，俟我们建立根据地的情况稍形稳定之后，再召集高级干部会议，作进一步的研讨，并报告中央。我军就在苦草坝附近，根据会议决定的军事计划，分别展开行动。

我们的总部——军委会及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在各军出发之后，便向通江县城进发，军行一百里，我们到了瓦斯铺宿营，我们愈往南走，所过集镇，就愈是热闹。瓦斯铺有百户以上的店铺，店内堆集着各种土产，如白木耳药材等。我们的战士并不知道白木耳如何吃法，这是全国有名的珍品，而在当地则很便宜。战士们买来一大桶，加水煮烂，以为可以作为稀饭充饥。其实，这种东西并不能果腹。这件事使我发笑，也觉得我的同志们还要花些时间，才能了解当地的实况。

田颂尧派出来的间谍，放火烧镇，帮了我们一个极大的忙。第二天早晨，当我们总部和随从部队约千余人集结

在瓦斯铺镇外广场上，准备出发的时候，镇上忽然发生大火。这个市镇的房屋多是木头建筑的，一遇火警，火势很快就蔓延开来。我军立即奔回市镇，竭力抢救，我和徐向前陈昌浩一时都成了这个大消防队的指挥人。我军救火的动作十分勇敢，效力也相当高，结果，我们保全了全镇小半的房屋，并为居民抢救了大部分的货物，战士中有好几个因救火而受了伤。

市镇上的居民在我军开到之前，有些人因为畏惧预早逃避了。留在镇上看守店铺的人不多。我们救火的时候，那些逃避的人最初只是站在山坡上观望，以后目击我们一心奋勇救火，也就赶来积极参加，市镇周围的人群于是愈集愈众。火势扑灭之后，我们又将抢救出来的货物，一一发还原主，并安顿那些被灾的人，这使居民大为感动。

就在这个时候，市镇上一间“鸡鸣早看天”<sup>④</sup>客栈的老板当众宣布，这次大火是由他们客栈烧起的，起火原因他亲眼目击是住在他栈里两个客人有意放的。这两个客人在起火后已逃跑了，但他确实认得他们是田颂尧部下的侦探。他这一宣布，群众大哗，大家才认识，杀人放火的并不是红军，而是田颂尧想栽诬红军，不惜牺牲瓦斯铺的人民。而红军英勇救火，大家有目共睹。这个消息立即传遍各处，从此各乡镇的老百姓，不再相信红军杀人放火的谣言，看见红军再也不逃避了。

我们当天由瓦斯铺南行六十里，就到达了通江县城。第九军已先我们一天占领该城。这是我们西行中第一次占领的县城，我们特别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入城式。这座县城，

偏处川北，枕山面水，面积不大。但城内竟修筑有几条水泥的小马路和一座中山公园，这是四川军人爱装门面的表现。在中山公园的高地上，还有一幢两层的小洋房，原系县政府的招待所，它即成为我的办公处。我在川北停留的期间内，多在里面办公。

第九军占领通江后，西向巴中行三十里，即与田颂尧部相遇于鹰哥咀。我军原奉有暂不与田部作战的命令，因此就地设防停止前进。以三台为大本营的田颂尧获知我军入川消息后，即派驻在阆中<sup>⑤</sup>的罗泽洲师向通江堵截。罗泽洲师到达鹰哥咀，此时尚仅有少数的先头部队，无力进攻我军，两军暂时按兵不动，互相监视。

我致函田颂尧，表示我军意向。首先说明我军入川并无与他作战的意图。我们所反对者是蒋介石，并非四川任何地方军人。到这里来的目的是希望暂时在通南巴地区略事休息，如果他能谅解不向我军进攻，明春，我军拟仍返回中原地区。希望双方协商划分防地，并请他不要轻启战端，以免两败俱伤。为了使这封信确能到达田颂尧手里，我曾抄录数份先后派专人递送。

约两周后，罗泽洲师全部已集中鹰哥咀。田颂尧的其他各师也纷纷到达各战斗地点。于是田颂尧向我们表示态度了。罗泽洲以傲慢的态度向我们的使者说：“共匪是打败了的军队，逃窜到了此地，我奉命毫不留情的予以歼灭。即使共匪再逃往别的地方，我也要跟踪围剿。”这样，我们与田颂尧的战争就爆发了。

自入川至战争爆发这段期间内，我军获得休息和整顿

的机会。这一带集镇上有相当数量的土布和棉花，我们大批搜购，赶制了大部分的冬服，所缺少的炊事工具，也获得了补充。此外我们也有余力注意清洁卫生，对于生冻疮以及伤病的兵士积极医疗，颇具成效。各军来的报告，都说战士们以往的狼狈情况，逐渐消除，恢复一贯的抖擞精神了。

客观形势大大改善，粮食不虞缺乏，而且易于征取。这一带粮食多集中在豪强者之家——四川称为“绅粮”，大多数老百姓则极为穷困。我军去打“绅粮”的粮食时，总有上百上千的穷苦老百姓背着篓筐，蜂涌的跟着一道去，形成一个热闹动人的场面。这些老百姓每人每次在我们征发得了粮食时，都能分得三四十斤粗粮，衷心的欢喜在他们面上尽情流露。这样，我军只需花少数人力，便解决了军粮问题，同时还有余粮救济当地老弱，因此获得了当地多数人民的拥护。

但我们感到头痛的问题，是当地鸦片的毒害。人民多半是烟鬼，据不甚精确的统计，成年男子百分之九十以上吸食鸦片，壮丁几乎找不出没有烟瘾的。连十二三岁的小孩子也有不少染上这种嗜好，成年妇女吸烟者约占百分之七十。这个事实使我们无限忧虑。

补充新的人力是我军一项极重要的工作，我军原没有一个吸鸦片的，在意识上也反对吸烟，我们素来也拒绝任何一个有烟瘾者进入我们的军队。但在此地却找不出一个不吸烟的壮丁来补充。虽有不少当地壮丁要求参加我军，但我们却难于接纳。一般战士认为在这里不能扩大红军，

如果勉强把这些烟鬼引进来，会降低红军的素质。因此，军中泛起不愿在这里久居的情绪。

中国西部地区多产鸦片，通江更是鸦片集中地。鸦片成为最有价值的货币，通江各个集镇上的买卖，多以鸦片为媒介物，巨商富户所积蓄储藏的是鸦片，全县较肥美的土地都种鸦片，农民对于鸦片的种植不惜投资出力，种粮食的却只愿听天由命。我看见烟田都弄得整齐肥沃，一根杂草都没有；而种粮食的田地则显然缺乏肥料和人力的加工，杂草丛生。鸦片也成为敬神的祭品，我看见许多庙里菩萨的口唇上，都被善男信女涂上鸦片烟。鸦片又成为包医百病的良药，人们有了疾病，首先都是用鸦片来济急。

这种骇人听闻的现状，主要是军阀统治的后果。拿通江县来说，全县人口约十一万，田颂尧每年要在这县里搜括二十六万大洋，而人民所付出的，则好几倍于这个数字。如要在通江做一任区长——三个月——最少要花三千元的运动费，那末这个区长向老百姓所搜括的自必多于三千元——通常必数倍于此——他才有利可图。通江县共有区长十人，其运动费姑以最低标准计算，全年即为十二万元。再则各区长转取于老百姓的数目，即以一倍计至少也在二十四万元以上。此外上至县长，下至乡镇长保甲长，以至税吏差人，无一不需付出运动费，也无一不转取之于老百姓。

通江县城是剥削老百姓的罪恶渊藪。城内约有一千户人家，其中两百多户是开设鸦片烟馆的，另有两百多户则是或多或少吃衙门饭的，他们的生活，多依靠各乡民来城



里打官司<sup>⑥</sup>花的费用来维持。我们到达通江时，县长和县政府人员都已逃避一空，但监狱里还禁闭着两百多人，我们全部予以释放。县政府的案卷里，还积压着一千多案子没有办完。

当地人民纷纷向我们诉说，田颂尧属下的县长，那里是甚么父母官，不过是可怕的吸血鬼。县政府奖励甚至强迫人民打官司，只要民间有点小纠纷，或者欠少数税捐，都要到县政府来兴讼。就是由于打官司的人多，于是城内烟馆及百业都随之兴隆起来，各级官吏也就有油水可捞了，甚至滑竿伕也有工作可做了。其实，中国人民，当然包括通江人民在内，都习于和平生活，不愿入衙门诉讼的。而各地乡间，多有调解人民纠纷的优良传统，但在军阀搜括的残酷统治下，逼得他们做损害自己的事——打官司。

我们占领通江后，对症下药，首先就是严禁鸦片。我们这些反对鸦片的人，走进这个鸦片世界，全身都极感不舒适，觉得禁烟实有极大的政治意义。不仅为了扩大红军，有此必要，对捣毁军阀统治的财源和实施社会改革，也都如此。但我们的革命任务十分繁重，如今竟要从禁烟做起，自也不免有革命旅途遥远之感。

我们开始禁烟宣传，接二连三的召集禁烟会议，但到会的本地人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瘾客，反应又是非常冷淡。他们有一种偏见，认为戒烟足以死人，他们也耽心如果真的戒烟，当地这种特出的土产就变成废物了。他们议论纷纭，希望能够延期办理。

但妇女成了戒烟的急先锋，这是我们始料所不及的。

在最初一次的妇女大会上，经过戒烟的宣传后，她们表现了出人意表的热忱，那次到会的妇女虽有不少吸烟的，但一致诉说她们所受着的痛苦。有的说她仅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因为丈夫无钱购烟，竟将儿子出卖了。有的说她的儿女病了，因为他们夫妻都吸鸦片，以致没有钱医治，结果死了。有的说她仅有的一条长裤，竟被她的丈夫拿去换烟吸，使她很久的时间无法出门。有的说她家因为吸鸦片欠了债不能还，欠了税无法缴，又打不起官司，结果把田地典卖光了，丈夫和儿子逃往陕甘去了，至今不知下落。她们这样互诉痛苦，弄得多数到会者号啕大哭起来。她们发誓彻底拥护戒烟。

妇女们对戒烟所表现的热心，大大鼓舞了我们。于是总政治部立即通令各地，普遍召开妇女戒烟大会，推进戒烟工作，参加这种大会的妇女特别踊跃。在通江县所举行的一次妇女戒烟群众大会上，就有五千以上的妇女参加，其中有些是从很远的乡村赶来的。我参加这次大会，那些老的少的，还有些缠足的妇女们，陈述她们的遭遇时，使我感动得流泪。

这样，戒烟的声浪就一天高过一天。不到几天，就深入人心，没有人再敢反对了。我们在各地设立戒烟所，并得到当地中医的合作，用按日递减含烟量的方法制造了许多戒烟丸，戒烟所成为最普遍而又最庞大的机构。通江县城戒烟所第一期的戒烟者约三百余人，其中不少是由他们的母亲或妻子送来的。第二期就增至千人以上。我们经常发布公告，说明戒烟的人，不仅没有一个死亡，而且开始

戒烟后多数的身体都健强起来。

我们拟订了戒烟的详细条例，主要规定壮年男女必需戒绝，五十岁以上男女或有病者可以缓戒，参加红军的和参加各级政权组织以及民众团体的男女，必须以身作则，彻底戒绝。为了使当地人民减少因戒烟所受的损失，我们没有焚烧过鸦片烟土，也不反对鸦片外销。

这样经过一年的努力，通南巴一带吸烟的人大大减少。据不甚精确的统计，当地不吸烟的人这时占百分之七十以上，没有完全戒绝的，约占百分之二十，仍然吸烟的老弱不过百分之十而已。这可以说是红四方面军到川北后所作的的第一件大功德。

由于戒烟运动的展开，我们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的信心就加强了。我们在通江县办了一个刊物，叫做《干部必读》，第一期在我们到达通江后约十天就出版了。我写了一篇文章登在第一期的卷首，题目大致是《建立川北新根据地》，我吁请全军将士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并扩大红军，不要有思乡或悲观失望的观念。我说明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特别是戒烟运动，收到良好的效果，要求他们对当地吸烟的人民不可稍存歧视，而且戒了烟的壮丁，将会是红军的好战友。我进而鼓励他们遵照入川纲领，努力展开各方面的工作。我的这个号召，发生了振奋人心的效用，这个刊物从此也成了红四方面军的最高指导刊物。一直到红四方面军离开川北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于懋功时，这个刊物才停办。

同时，我们开始组织通江和南江两县的县政府（我军

初入川时，只占领通江的大部和南江的一部分)，我们根据入川纲领先组织两县的临时政府，规定由当地人民公推公正人士参加，然后由临时政府办理选举，成立正式政府。那时与田颂尧时代的县政府有关系的人都销声匿迹，新出头的是一般穷苦人民，他们跟随着红军到各处征发粮食，并帮助展开戒烟运动，此外还有一批洁身自好的知识分子参加。不过通江县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一部分且依附田颂尧，所剩下足以协助我们的为数实在不多。

我们很重视这些少数知识分子，但结果颇感失望，他们多系老式的秀才人物，职业多数是教书和行医，他们虽然不满田颂尧的统治，但抱独善其身的哲学，在乡间度其清贫的岁月，做点与人民有益的事而已。他们头脑十分冬烘，对于传统不敢多表异议。他们佩服红军纪律优良，虽然这时红军的纪律因长途行军，已经有些松弛，但较之田颂尧的部队，还是有天壤之别。红军的戒烟行动，他们认为切中时弊，因此对我们抱有莫大的希望。我们曾接到一些万言书式的条陈，其中除对田颂尧表示愤恨外，满纸都是“王道”、“真命天子”、“五行”、“八卦”和“诸葛亮”等等过时的概念。我曾约集这些万言书的作者们谈话，我觉得这些好心肠的人，头脑究竟是太落后了。

在我们的政工人员策动之下，召开了通江县的临时县政会议，并组成临时县政府。参加这个会议的代表，就是由政工人员遴选、经各区乡群众大会推举出来的。临时县政府人选也是由总政治部提名的<sup>⑦</sup>。临时县政府委员会约有委员十五人，多数是各区乡的农民，手工业者和知识分

子各有二三人参加。当选任主席的熊某，系穷苦农民出身，他身体强健，不吸鸦片，也曾做过苦力，抬过滑竿。他在巴山打猎的时候，误被毒箭射中腿肚，他不顾痛苦，立即自行拔出，始得保全性命，因而被乡人视为勇士。他平素确也急公好义，红四军到来后，更表现了积极的革命精神。

由于这次选举，当地人民内部开始了分化，特别是那些秀才们为之大哗。秀才们觉得，只有念书的人，才能做父母官，他们纷纷议论，抬过滑竿的人，那里能当一县之主呢？他们也埋怨红军，表示红军什么都好，可是不懂当地情形，现在居然捧出一个目不识丁的滑竿伕来主持县政，未免太藐视通江人了。秀才们这种“斯文至上”的传统观念，也为一般乡下人视为当然，一时也难加以说服。

临时县政府甫告成立（这是我们到通江后两个多星期的事），田颂尧部罗泽洲师即由鹰哥咀向通江城进攻。田部的战斗力究竟薄弱，一经接触，即告土崩瓦解，退守离鹰哥咀六十里的清江渡，不几天，我军乘胜向清江渡进击，敌军再度溃败。我军继续推进，占领巴中县。前锋已过巴中约五十里，与敌相持于恩阳河。

巴中是较通江富庶的大县，人口约五十余万，我随军进驻巴中县城，浏览数日，深觉这是有可为的地方。城内的街市，人群熙来攘往，市场交易，因苛捐杂税的铲除，立呈蓬勃现象。我们入川纲领的布告在全城各处张贴着，人民川流不息的围观，有的是从很远的乡间来的，有的在那里朗诵讲解，人们纷纷议论，多数认为如果真能照着布

告兑现，那就天下太平了。事实上，巴中不少人已经知道了我军在通江的一些措施，因而我们不必多费唇舌，就能很快的照样推动起来。

为了军事上的理由，我们还只能将巴中视作前线。罗泽洲师虽被击溃，但田颂尧的大部分兵力正向着我们这里集结，我们不能把全力用到巴中来，要以通江为基地与敌周旋，因此，我们留下第九军驻守巴中，我和徐向前及大部人员均返回通江总部，以便策划全局。

巴中的胜利，也促进了通江南江工作的推行。新成立的通江临时县政府的威望，一天高似一天，颁布了一些布告，规划出许多应兴应革的事项，例如规定要重新编组地方武装，全县人民应将所藏枪枝，送交县政府统筹办理。全县各区乡无论远近，均毫无隐瞒的将枪枝（多数是破旧的）送来了，为数有一千余条，足证县政府的命令已能推行全县，这是过去军阀政府所不易做到的。

凡此一切，都是根据入川纲领逐步实施，通南巴三县的面目，为之一新。但中共中央来电，坚决反对入川纲领，我们的努力，成为昙花一现，不得不仍走苏维埃的老路。从此，川北也成了苏维埃区域了。

- ① 田颂尧系四川许多军阀头子之一，两河口一带即系他的防地。
- ② 四川人通用的一种轿子称为“滑竿”。
- ③ 两河口距通江县城为二百八十华里。
- ④ 这是四川本地小旅店所共同使用的招牌。
- ⑤ 三台离通江约四百八十华里，阆中在三台与通江之间，离通江约三百

华里，巴中是在阆中与通江之间，离通江约一百二十华里。

- ⑥ 当时四川县长兼理司法。无论民刑案件，非讼事件以及催缴捐税等行政，都由县政府处理，民间俗语统称之为“打官司”，这比法律上所谓诉讼行为的含义，更为广泛。
- ⑦ 红军政治部在某地域初解放时，原有代行地方政府职权的权力，所以临时县政府的人选，例由政治部提名。

## 第三章

### 关于苏维埃的争执

中共中央对于红四方面军的脱离鄂豫皖区，西行到川北，甚表不满，认为是右倾的逃跑主义。它获知我们的入川纲领之后，竟来了一个哀的美敦式电报，要求我们立即改正，仍用苏维埃政府制度和一贯的既定政策。

我们与中共中央之间，无线电的通报，原是极为稀少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不敢信赖我们的密码。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湘鄂西苏区作战时曾失落了我们原有的密码本，后来经过一些努力，仍不敢相信续订的密码的可靠性。最后我们不得已才由双方的报务员，利用电台通话，订定了一个新的密码本，但这是否已为敌方偷听去，则无把握。因此，我们与中共中央之间，一向不敢在无线电中涉及有关机密要事。

我们离开鄂豫皖西行，中共中央事先是不知道的。他们似是因为不知道我们的处境，对我们的行动颇感焦虑。最先是告诉我们一些敌情，等到我们到达豫西南一带的时候，就转而反对我们继续向西退却的指示。等我们越过秦岭进到关中时，中央来电的语气就更加严重了，甚至说“如果你们再继续向西逃跑，那我们就公开反对了”。



我们接到这个严重警告之后，曾详细加以研讨，仍不敢将我们的行动计划据实电告，仅以“正在寻觅新的根据地”的含糊语句作答，以免泄露军机。事实上，我们也只能根据所处环境，决定我们的行动。

我们越过巴山进入川北时，曾电告中共中央，准备就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中央复电告诉我们所用密码可以信赖，除机密军情外，要我们尽量电告情况。我们也就遵照指示做了。

到达通江后一个多星期，我发长电与中共中央商讨政策问题。首先报告入川纲领的原文，接着指出这个纲领是根据我们的实际经验而作的，试行以来，极适合于像川北这样的地区，相信在全国范围内也有很大的适应性。

正当我们与罗泽洲师作战的时候，中央的复电到了。

内容是：不能以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代替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的土地革命政策，更不能有建立人民政府的幻想，并进而指斥我们，这样做会助长向西逃跑的失败情绪，形成对苏维埃极有害的取消主义。中央要求我们立即扯起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分配土地。至于废除苛捐杂税、反对防区制度和禁烟等，只能当作附属的条款。最后并严重警告，如果我们能改正这个错误政策，中央仍信任张国焘同志为中央全权代表，在没有建立中央分局以前，代表中央指导党政军三方面工作。否则，中央将考虑撤换领导的必要措施。

中共中央这个电令，虽不完全出乎我们的意外，但在当时确像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在川北立足未稳，前途困

难重重，加之我们西行以来，红四方面军内部也酝酿了一些不同的意见，这些不同的意见，又与中共中央这次电令息息相关，因而更增加了我们处理上的困难。

红四方面军西进到达川北，事先并没有预定的计划，而是根据实际的需要，由我们少数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和我——临时决断，一步一步走到这一境地的。一般高级干部不仅没有机会参预决策，甚至不能完全明了决策的底蕴，大多数同志不赞成远离鄂豫皖苏区，他们宥于“坚决保卫鄂豫皖苏区”的口号，就不免多少忽视实际的困难。对于我们某些不得已的行动，往往不能完全谅解。

我军越过京汉铁路西进的时候，政治部的口号仍是强调在鄂豫皖区外围消灭敌人。有些政治工作干部，总以为我军在鄂北一带兜圈子，目标仍是指向鄂豫皖区。等到他们知道我军行动的箭头指向西面，就开始有所疑虑。他们纷纷议论，向西是没有前途的，远离了全国的其他苏区。这些见解与中央的指斥如出一辙。

在军事策略上，同志们也发生了或左或右的不同见解。有的低估了敌军的力量和他们追击我军的决心，反对向西急退。他们批评我们军事策略是“逃跑”，是“避战”，认为这会将红四方面军拖垮。与其拖垮，不如与敌军作孤注一掷的决战。有的同志又高估了敌人的力量和决心。他们责备我们没有采取更迅速的脱离敌人的步骤，在他们看来，如果我们真能向西急退，不利于我军的枣阳战役是可以避免的。

这些反对意见，终于汇集起来，形成不满现有领导的

反对派。我军进到汉中的西乡时，政治部的主持者张琴秋、傅钟，曾约集受过处罚的曾钟圣、邝继勋和政治部宣传科长朱光等十余人举行会议，检讨西行的得失。在会议上，张琴秋宣布了中共中央对向西逃跑的两次电令，他们表示对现有领导不满，要求从速召集军事委员会会议。

张琴秋向我申述他们的意见，她和某些同志不赞成西进，认为他们的意见与中央的指示相符合。对于军事策略，他们也有种种批评。她承认，这些同志有过几次商谈，但未组成反对派。反对者的意见也并不完全一致。在张琴秋看来，著名的立三路线人物曾钟圣的军事见解，采取右的立场与她的见解正好相反。她也不能信任屡犯错误的邝继勋，事实上她也不重视他的意见。只是为了借重他们的军事知识，才找他们参加商谈的。他们活动的目的，并不是要打击现有领导的威信，更没有推翻现有领导的企图，只是主张恢复军委会和高级干部会议，俾多数人都能参预决策。

我们翻过巴山，开始建立新根据地的时候，张琴秋等的反对意见，便消沉下来。我们共同为开展新局面而努力，没有工夫去检讨过去。但这些持不同见解的政工人员，对川北新根据地的建立，或多或少仍缺乏信心。他们觉得川北是偏僻的地方，即使在这里建立了根据地，也无法配合各苏区的行动，更不能打击蒋介石的要害。这个鸦片世界，也使他们觉得太落后了，对党对红军的发展，都困难重重。

要求我的同志们，对于建立川北新根据地有足够的决

心和信念，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川北人民热烈拥护红军，禁烟运动展开得如火如荼，我的积极号召，这些都不能完全廓清他们的疑虑心理。在川北建立根据地的条件确是不够充分，同志们举出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困难，有些困难确是影响深重，无法克服。但问题的中心是我们已势逼处此，并无任何其他选择。

例如，军火的补给问题，就使我们大为忧虑。我们只能靠缴获敌军枪弹来补充，但四川军队的枪弹多系土制，效力不高（四川军阀由民间搜括来的钱财，往往拿去向外国或长江下游购买军火，但又为蒋介石或其他军阀在中途扣留，因而他们的枪弹，多系土制）。我军在川北作战所消耗的弹药，大多是从蒋介石部队缴获来的，比较优良，在四川缴来的，则多系次货。四川军阀作战的特点，也带有游击性质，胜利便蜂拥而上，败北则一溜烟的跑掉了。要想大批缴获他们的武器，不是很容易的事。我们觉得红军在川北行动，不易解决军火的补充，而且会使红军装备转弱而影响战斗力。

我们当时致力于统一内部意志，策划对田颂尧的作战，实施建立根据地的各项步骤。中共中央这个电令的到来，立刻使我们进退失据。我们原应在新克服的巴中区多所努力，但不得不为了基本政策问题，匆匆从前线返回通江，召开会议。这次重要的高级干部会议，有些同志因军情紧急，不能赶来参加，到会的除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外，只有张琴秋傅钟刘琪周纯全等十余人。

在这次会议上，我首先将中央的历次来电，交大家传

阅，接着就发表了一篇答辩式的报告。首先检讨红四方面军，不能在鄂豫皖苏区立足，必须向西转动的种种原因和经过。我指出，我党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红四方面军，仍不能迅速壮大起来，抗击敌军远为优势的压力，正好说明蔡申熙和我经过长期周密计划的西进策略，目的是为了保存最大实力，在较边远地区获得时间和地盘以图振兴。我说明反四次围剿的经过，指出柳林河夜战是必要的和适切的，如果不是那次战役给敌军以沉重打击，红四方面军脱离鄂豫皖苏区将有更多的阻碍。如果我军在鄂豫皖区，内外分散打游击，或改采其他战略，也许我军的处境比现在还要坏些。我说到河口战役虽然伤亡重大，但成功的冲出了包围圈。对于枣阳吴家集战役，我承认是可以而且应当避免的，但结果激战两天，伤亡两千，其恶果甚至影响到我军以后的行动。应当严肃自承是自己犯了实际军事指导的错误，用人不当而“失街亭”。邝继勋不遵守命令，也应当受到纪律的追查。但我不赞成某些同志认为西进是逃跑主义的说法，我再三说明我军不能在陕豫鄂边境地区立足的原因，并说，指责我军为逃跑主义者，不仅不合事实，而且抹杀了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的精神。我力证在川北止步是较好的选择。

对过去的军事行动，作了必要的说明和答辩后，我进而评论入川纲领。我直率指出，苏维埃的基础过于狭隘，土地革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威力。事实证明，目前的土地革命并不足以壮大红军，不过是使红军得到暂时的、局部的胜利，鼓舞为数甚少的农民起来分配土地而已。苏维

埃运动的致命弱点，是不能与全国反帝和反日联系起来，而被孤立 在偏僻的乡村之中，失去了与各大城市广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系。入川纲领，就是为了纠正这些政策上的错误而发。入川纲领是在四川这样的省份，可以实行的唯一政策，因为“四川人民政府”的旗号，极具号召力，反之，苏维埃政府，则会使四川落后的人民，产生奇怪和可笑的感觉。接着我又说明，经过我党的努力，四川人民政府，如果有成就的话，也还是属于中华苏维埃政府的。难道在现代的革命运动中，除了苏维埃政府这个名称之外，就不能有其他的名称了吗？如果四川人民政府，真正建立起来了，事实将会证明，这个政策是对的。为什么在全国范围内，所有苏维埃政府不可以统统改成革命的人民政府？这种政策的改变，正是获致胜利所必需的政策。

第三个紧迫与重要的问题，是与田颂尧部作战所应采取的全盘战略。我向大家表明决心，由于我军决定留住下去，暂时不愿再流浪到其它地方，必须在这里击败田颂尧部，并以通南巴一带川北地区，作为我们稳固的根据地。田颂尧部的人数，大约等于我们的三倍，刘存厚、杨森、孙蔚如部，合计也等于我们的三倍，我军将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以便集中最大的攻击力量，在适当地区，歼灭田颂尧部。只有沉重的打击了田颂尧部，我们才可以立下脚来。根据这一中心任务，我进而指示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都应为此而努力。

这次演说，虽然事隔多年，但我依然还能记得大致的

内容，因为这件事太重要了。所有到会者，听了演讲之后，都为之动容，一致对我表示完全信任。

至此，他们都认定，反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决不是逃跑，而是英勇无比的抗敌奋战。并称许我在惊涛骇浪之中，把握住这只船的舵，不知道多少次的化险为夷。张琴秋等也当场声明，由于他们不了解情况，曾怀疑领导有错误，现在根据无可争辩的情况和事实，放弃他们向有的怀疑态度，完全信任我的领导。

在讨论中，有些同志赞扬川北新根据地选择得宜，入川纲领有号召力，无条件全面赞成，并提出具体的实施意见。有的指出，现在废除苛捐杂税运动，会很快的发展成为分配土地的土地革命。多数的到会者，对消灭田颂尧部的具体策略，踊跃研讨，但提到与中央意见分歧的事，大家都似乎心情沉重，不愿意多发表意见。

果然，徐向前、陈昌浩和其他两三位重要干部，深夜来与我密商，他们都表示不愿与中央争执下去，强调我军正在川北立足未稳，前途困难尚多，与田颂尧部的战争又日趋紧张，如果我们坚持入川纲领，批评苏维埃运动的不当，中共中央可能来电撤换领导人。那时，他们虽一致向中央抗争，甚至不遵从中央的命令，但不免引起红四方面军内部的动荡。他们以现实的态度，要求我避免与中央争执，让红四方面军度过了难关再说。

我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衡量全局，终于接纳了他们的意见，表示让步。我起草了一个简单的电报，对于中共中央的指责，概不答辩，只扼要表示遵从中央的指示，立

即建立川北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似乎也有些觉察，立即回电说了些好话，以示安慰，其要点是表示对我信任。我这个流产的主张，后来就被斯大林拾起来，取消了错误的苏维埃政策，改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乃至国共合作的共同抗日策略。我之所以不能改变中共错误政策，原因甚多，其中一点是我不够泼辣之故。泼辣的性格并不是完全优美的，而我也并不悔恨我所做过的事。

这一次严重的争执平息后，接着我们就另行发布宣言，修改入川纲领的原有主张。宣言里说明，四川军阀坚持一贯反动作风，不愿与红军合作共谋四川人民的福利，因此，红四方面军不得不首先推翻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我军除继续推行废除苛捐杂税等条款外，并号召穷苦农民立即实行分配土地，组织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

对田頌尧部作战的原定策略，亦以我军自身力量薄弱，决定暂时不宜占领通都大邑，以免增加军事上的负担。但我军很重视在通江已经建立起来的后方，认为凭借这个后方，可以解决兵源和其他补给问题。我们暂时只能依靠军事力量，来维持这个后方的安全。因此，我军对田頌尧的战略，是逐渐消耗他的实力，引诱他的主力到通江附近来，再行解决它。

从此，我们的方针已不是在川北休息一段时期，也不是与四川进步势力共组人民政府，而是将苏维埃的旗帜，在巴山南麓高高挂起，希望这面旗帜的光辉普照四方。



一般说来，川北苏区只是一个战争基地，它的群众基础远不如鄂豫皖区。我们在川北约两年半的期间内，都忙着应付战争，首先与田頌尧作战，接着又与全四川的军阀作战，很少闲歇的时候。川北苏区的设施大体是仿效鄂豫皖苏区，但因为这两个区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状况彼此有别，所以川北苏区也有它不同的特点。我们在川北苏区人力不足，所有工作，未能象鄂豫皖区那样深入开展，以致后来在红四方面军离去之后，川北苏区所表现的，就远不如鄂豫皖区那样能够持久奋斗。

一九三二年年底，我们在占领的区域内，自下而上的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开始分配土地。但政权机构的性质，大体还是军队的办差机关。我们在这种山岳地带作战，需要当地人力特别多，各级苏维埃政府都用全力来解决军队的需要。人民觉得苏维埃政府是红军建立起来的，红军的存在与否，取决于战争的胜利。

## 第四章

# 建立新苏区以后

一九三三年初，田颂尧部开始向川北苏区进攻，当时田颂尧仍坐镇三台，他的全部兵力悉数调到前线来了，由他的副指挥孙震任前敌总指挥，孙所统率的兵力约三十余团，由南江巴中的西南面向我军驻地挺进，为整个战局的主攻部队。此外，我军的南面，有杨森部十余团驻扎；东面则为刘存厚部、廖震师的九个团，配合田颂尧部牵制我军。在北面汉中区又有杨虎城部的孙蔚如师监视；驻守天水的胡宗南师一部进至广元昭化，作为田颂尧的后盾。

我军当时的人数略有增加，入川后两个月约增五千新兵，但缺乏地方武装的配合行动。我们又必须保卫这个苏区的四周地区，兵力因而相当分散。第四军驻守东疆，第三十军驻守南疆，分别对付刘存厚杨森两部，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又须各抽一小部监视汉中方面的敌人。因而与田颂尧部作战的就只有第九军第三十一军两部——六个团不足的兵力。

我们暂避与田部决战，但在每一道防线上，都给敌军一些挫折，然后再缓缓向后撤退。我们这样做，目的是逐渐消耗敌军的实力，战事愈拖得长久，敌军的创痕愈深，

而且敌军的补给线也愈拖愈长，然后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和地点，再行反攻。

战争开始后不到几天，我军即放弃了巴中县，敌军兴高采烈，夸耀胜利。事实上，巴中县的弃守确也是我们的一个重大损失。当地人民看见我军退却，人心也就不免动摇，即使是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也不一定了解我军的策略，心中总有点七上八下。甚至有人杞人忧天，准备着红军万一退出川北以后的打算。

在人心动摇的情况下，我们动员当地人民支援红军的工作就更感困难，在这个高山峻岭的区域作战，粮食往往要从相距百里的山路远处运到前线去，伤病兵又要从前线百里山路运回后方来。因此，我们经常需要一个强大的运输队——经常的和临时的共约五千人，来担负这个艰巨的任务。运输队既如是庞大，本身困难也是不胜枚举。即以疾病一项而论，有时就使我们感觉穷于应付。

总之，为了动员运输伙，使他们能够轮班休息，供应他们的给养，医治他们的病痛等等，已使各级苏维埃政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

敌军步步进逼，我军节节后退，战争是长期性的。到一九三三年七月间，我军又撤出通江县城，向苦草坝退却。这时敌军估计我们将从两河口的来路，退往汉中，于是田颂尧的前线总指挥孙震，集中他的主力，由南江的板桥口向两河口挺进，企图进攻我军的左翼，截断我们的后路。刘存厚的廖震师，也由万源县的竹峪关出动，与孙震部形成一个箝形攻势，威胁两河口右侧。可是，敌人的估计完

全错了，他们忽视了一点重要事实：半年来战争损失最大的其实是他们。另一方面，又没有料到我们诱敌深入的手法。

表面上看来，我军是在退却，但实际上，我军驻地愈缩小，便愈能集结更多的兵力来反攻。我军首先以一部打击右翼的廖震师，敌军立即败退到万源县境内去了。接着，我们集中全力从两河口抄袭孙震部的左背。攻击的那一天，我军分由巴山茂林密竹的小路突然冲出，首先是占领孙部左背上的高地，控制着孙部后部的总口，敌军在我军机关枪扫射之下，全部乱窜，溃不成军。

我们乘势攻击，不到几天，尽复通南巴失地，并扩展了一大片苏区。南江方面我们追击到广元附近，巴中一路我军追到了阆中境。我们沿广元至阆中组成一条防御线与敌人隔嘉陵江相持。田颂尧部在半年的战役中，损失了他们实力的大部份。我军前后虽只俘获人枪三千左右，但田部的损失则约为这个数字的五倍（士兵以伤亡疾病居多数，枪枝大多抛弃于山崖深谷中）。至于我军损失，则约为田部的十分之一，而且立即获得补充，实力较前更强。

这一次胜利，使四川军阀大为震动。他们感觉此后要想对付红军，必须集合全川的力量，尤其是负指挥责任的孙震，对于自己失败的原因，表示大惑不解。其实，在这样险要地区作战是不能使用大兵团的，孙震将约三十团的兵力集结到一个崇山峻岭的窄小地区，已是兵家大忌，何况他所指挥的部队战斗力极弱，我军数量虽少，却极精锐，胜败之数，自然不是偶然的。

军事的胜利，奠定了这个苏区发展的基础。四周的敌人暂时已不敢向我们进攻，遂成短时休战的状态。当地人民也为这次胜利而鼓舞，兴高采烈地积极活跃起来。我们迅即在占领区域内，到处组织苏维埃，并准备召集一次全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川北苏区的苏维埃政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这是省级的苏维埃）。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在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典章法制，只有根据当地情形，参照鄂豫皖区的经验，进行一切。为了争取时间，遇事都是迅速进行，工作自欠精细，我们很迅速的组成中共省委机构，开始在各地征求党员，并成立分支机构。在这里原没有中央分局的组织，由我个人以军委会主席的身份指挥军队，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指导省委工作。党政军事务，纷集一身，殊感忙迫。所以有很多事，我都酌交各方负责同志相机处理，以不失时机为第一要义。

川北苏区始终是被隔离着的。四川在中国地理形势上，偏处一隅，而“通南巴”地区更是全省的偏僻地方。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由东三省扩展到华北，一般四川人仍然懵懂的在过活，反日运动的浪潮，也还没有泛滥到这里来。存在于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更是人们闻所未闻。在四川人看来，四川就是一个国度，他们所注意和谈论的都是关于四川的事。甚至“国民党”、“三民主义”和“蒋介石”这类的名词，究竟内涵是些什么，不仅一般老百姓弄不清楚，就是当地的军阀，也不甚了然。

记得一九三三年底，四川一个“很能干”的军阀王陵

基，受任为剿共军第五路总指挥，率刘湘部向我军进攻，曾发布一篇剿共的洋洋檄文。其主要的內容大意说：“三民主义主张节制资本”，是救国救民的大道，共产主义则主张“平均地权”，显然是共产公妻的邪说。这样将孙中山民生主义中的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主张，割裂为二，张冠李戴，简直荒谬可笑！

四川这种闭塞的情形，对四川的中共组织也有影响。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在我们打垮了田颂尧之后，由成都潜行来到通江，一时成为我们大家欢迎的对象。他到处发表演说，着重指出田颂尧虽然被打垮了，但较田部实力为强的其他四川军阀，正计划动员所有力量围攻我们，因此，我们要准备应战。可是他也告诉我们，四川省委组织单弱，党员人数很少，工作还未展开，他并不知道中华苏维埃政府的详情和中共中央对反日运动的态度，因为他与中共中央之间，早已失去联系。他虽立即成为川北苏区省委的常委，是一个参与决策的要角，然而，这个新血，并没有能将四川省外的新变化，带到这个偏僻地方来。

仅仅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川北苏区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于八月下旬在通江开幕。到会代表在千人以上，都是由各乡村选举出来的农民，我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向大会致词。为了使代表们能够懂得这些问题的意义，并另行分组讲解和讨论，我花了半天的时间，用极浅显的词句，讲解有关苏维埃这类名词的内容及我们所推行的政策的大要。这些代表们的知识水准很

低，要使他们懂得大会所讨论的问题，是很费力的事情。

这里的乡下人没有直接受过革命的洗礼，根本不知道共产党和苏维埃是怎么回事。他们不像鄂豫皖区的农民受过革命风云的锻炼，他们不知道一九二七年有过国民革命，也不知道农民协会是怎么一回事。鄂豫皖区的农民大体还知道有一个中共中央领导他们革命，而这里的农民就不知道这一点。前者还知道有苏兆征这样的人物，因此会联想到苏维埃与苏兆征有关；而后者除了知道四川几个军阀的名字以外，对于苏维埃，是完全陌生的。

他们多数仍受神权命运等旧观念所支配，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一支与四川军队迥然不同的红四方面军，而这支军队竟又会到通南巴来。在他们的意识中，外省军队到了四川，总是胡作非为的，为什么红四方面军竟能一反其他外省军队所为，专为穷人打抱不平。他们不理解共产党和苏维埃这样抽象的名词，总希望找出一个具体的“人”来，用他们脑中的神权命运观念来牵强解释一番，这样，就发生过一个可笑的故事。

我这个领导人自然是一般乡下人所瞩目的，对我就有许多牵强附会的解释。他们联想到民国初年（二十年前）苦草坝地方，曾有一位姓张的青年农民，领导过一次劫富济贫式的暴动。不久暴动失败了，那位张某也就不知下落。最初是苦草坝附近的人，认为现在的“张国焘”，就是二十年前苦草坝暴动领袖张某，他们说两者之间身材年龄不相上下，那一定是苦草坝的张某流亡在外，经过神仙指点，现在脱胎换骨回来了。他们认为如果不是苦草坝的张某，

为什么红四方面军竟会来到通南巴，视通南巴如家园，爱护备至，足证此张某即彼张某了。这种讹传迅即传遍了整个川北苏区，为一般乡下人所深信。他们以为共产党、苏维埃这类名词，大致都不外是替天行道的“法语”而已。

这个讹传曾风靡一时，一般人觉得通南巴出了一个“真命天子”，这与通南巴的风水和人民命运大有关系，甚至那位农民暴动领袖张某的妻子，都曾来看看我是不是她失踪了的丈夫。可是我们不愿助长乡下人这种愚昧观念，我和其他同志们都极力否认这是事实，积极向人民解释共产党和苏维埃的起源，说明红军是由共产党创造出来的，而张国焘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共产党员，并不出生于四川。经我们多方解释，人们才渐渐了解到共产党和苏维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有的讹传也逐渐消沉下去了。

这个故事说明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当地人民的旧观念，其间的距离不可以道里计。我不想多耽误读者的时间，去发掘此中的详情。简单的说来，川北苏区后来虽然也产生了一些革命人物，但论到当地的中共组织，最多只能说是一个农民革命的团体。

这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建立了川北苏维埃政府，和鄂豫皖苏区政府一样，这个新政府进行着同样性质的工作。在工作进行中，所遭遇的困难有异于鄂豫皖区，表现了这里的特点。分配土地是首要任务，在这个区域内积极执行，一般说来，通南巴一带地广人稀，禁种鸦片之后，粮食耕种的面积增加了，但还有些山地，因为无人耕种荒废在那里。土地多于人口，在分配上就比较容易进行。我



们分配的办法是：原有自耕农的土地不动；佃户耕种地主的土地，即归佃户所有；然后截长补短，富农土地多余的或佃户耕种面积过大的，都匀出一部给土地不足的，此外还搭配一些山地给土地不足的。我们同样发给土地使用证，但认为现在的分配，乃是初步性质，将来仍可查田重分。

这个区域内红军战士家属，多分得较多较好的土地。因此，他们可以用半雇佣劳动或部分雇佣劳动，来代替耕作，没有发生像鄂豫皖区代耕制度的问题。这一带山区常发生妇女招“上门汉”<sup>①</sup>的事，甚至红军的逃亡士兵，有些也被山里的妇女招去当上门汉去了。这是过去苛捐杂税的压迫以及鸦片的毒害，加重了壮年男丁不足的现象，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为了红军家属的土地不致荒废，也只有任他采用雇佣劳动的办法了。

当地穷人对绅粮们极其痛恨，报复心理十分浓厚。在各乡村的群众大会上，都充满了报仇雪恨的事情。一个土豪劣绅往往被几十个乃至上百个的苦主控诉；甚至一个只是当过甲长的人也难免被农民控诉。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是希望农民分清主从，辨别轻重，不要将土豪们的小爪牙，也算成土豪。各乡村农民往往发生对土豪劣绅直接行动的事，苏维埃政府则要求群众应将这类案件，交县政府政治保卫局或革命法庭法办。

红四方面军的政工人员不直接惩办土豪，往往还纠正一些当地人民处罚土豪的偏激行为。拘押土豪追缴罚款的事，在这个苏区内并不常见。我军政治工作人员会同当地人民征发土豪劣绅的粮食的时候，也没收他们所储藏的鸦

片，其价值即足以供应我军。在禁烟高潮中，没收鸦片是天经地义，不会引起人们的反感。

分土地和打土豪这两项工作的进行，逐渐引起地主土豪们的反抗，也使苏区的人民发生阶级分化。地主土豪们最初也曾赞扬红军废除苛捐杂税的章程，但他们惧怕当地穷苦人民的报复行为。他们用请客等办法，联络当地与红军有关的新兴人物，希望少作些有关他们的报告和不要乘机报复。这些补救的努力失败之后，他们才认清穷人与红军原来是一体的，乃采取反对苏维埃政府的立场，暗中活动，造谣挑拨，离间苏维埃政权与人民的关系。

当地穷苦人民革命情绪虽然很热烈，但究竟缺乏组织力，特别在地方武装方面完全表现出来。这里也和鄂豫皖区一样，组织过人数众多的人民自卫军和少数的独立连等。可是自卫军往往不容易集合行动，独立连的战斗力也极薄弱，缺乏得力的干部是地方武装脆弱的主要关键。一九三四年夏季，巴中南区少数地主纠合了约百余人的武装力量，占据鲜家寨，发动反苏维埃的暴动。我们的地方武装竟无力抗拒，结果还是借助于红军的力量，才把叛军救平。

这个区域内的经济，本可自给自足。除了食盐要取给于外埠，其他的日用必需品大致本地都可以生产。工业产品如兵工器材缝衣机医药等，则感十分缺乏。市场情况和商品价格，当然随着战局而转移。当地人民普遍要求物价降低，往往任意限制市场价格，使市况趋于萧条。

我们的经济政策，不赞成限价，而是奖励贸易，繁荣

市况；只对那些高抬市价的投机商人，予以打击，不准他们任意兴风作浪。我们在这里也建立了苏区的银行，发行货币并征收农业税和商业税等。在各个集镇上却没有商业指导人员，往往由各区乡苏维埃政府的经济委员担任，主要任务是掌管标准的度量衡，废除商业上的许多陋规和中间剥削等等。这些设施有相当的成效。

各项紧急工作，始终耗费了苏区政府主要的力量，除我在上面说过的动员运输队协助军事行动外，还需与疾病作斗争。这是个疾病流行的区域，痢疾、皮肤病、感冒非常普遍，性病、眼病、伤寒等症也是很常见。一般人缺乏卫生常识，疾病的流行更为猖獗。川北苏区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即在各处设立医院。这里原是医疗人员和医药两缺的地方，人们又习于求神问卜和依赖鸦片，我们反对这些迷信和偏见，提倡卫生和医疗。这样做的结果，中医师成了人们尊敬的人物，各集镇中药铺的生意也随着十分兴隆了。

一九三四年秋，痢疾大肆猖獗，苏维埃政府属下的医院，简直无法收容所有的病人。川北苏区政府的总医院，住院病人多至二千二百人。其余各县医院每院普通也在五百病人左右，各乡区医院所收容的病人少则四五十，多者也达百人。医院里的病人，因痢疾而死亡的，以日计的最高纪录曾达一百七十余人。在各医院服务的近两百名的中医师也因传染了痢疾，死亡超过了三分之一。这次痢疾的侵袭蔓延约两个月之久，造成了恐怖状态。据当地老农们说，这一带近十年来就曾发生过两次这样严重的传染病，

因为没有像苏维埃政府这样照料人民的政府，所以上次的情形还要可怕得多。

这个区域的妇女们特别活跃。她们组织了妇女联合会，不仅可以做些女红军工作，有些参加运输粮食，有些担任防御性军事工作。她们的坚强，往往不亚于男人。她们不仅是戒烟的急先锋，而且积极参与苏维埃各部门的工作。为了满足妇女们的要求，我们曾组织一个妇女独立团（后来这个团还有一部分到达了延安）。这个团成立的时候，报名参加的为数极多，经过精选的结果，这个团还是有一千多人。这是我们第一次有了单独的女子军。她们在救护伤病兵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

这个区域内的最大困难，是缺乏干部，因为缺乏教练，我们始终没有建立起军事学校，也没有办过长期性质的党校，我们只得由各军各团自行训练干部。省委只能举办一些短期性质的训练班。苏维埃政府虽在各区乡都办有学校，但因师资缺乏，执教鞭的人大多还是三家村的老学究。

一九三三年九月，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我们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作，已经有了相当的头绪，便移师东指，去进攻刘存厚部的防地。盘据绥定垂二十年的帝制余孽——刘存厚，就在这次战役中，被我们打垮了。接着又展开了我们与四川全省军阀的战争。四川军阀虽叠次受着我们的打击，但他们有蒋介石的力量做后盾，战争纠缠不已，我们终于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是年七月，田頌尧部败退之后，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

阀，即调兵遣将，准备对付我们。这些军阀之间互有矛盾，因而他们的行动特别迟缓。刘湘为了保存实力，就不愿将直系部队，迅速调到最前线与我军硬拚，老在与其他军阀商谈各部“齐头并进”的计划。杨森部因实力不足，缩回营山去了。田颂尧已受沉重打击，防地朝夕不保，更是垂头丧气，内部意见又极纷纭。据说田颂尧深悔当初没有接纳我们所提避免战争的建议，以致弄到如今的惨败，暂时自然不敢和我们接触。汉中的杨虎城鉴于我们打垮田颂尧的声势，暗中迳行与我们联络，协议互不侵犯（杨虎城与中共军事方面的联络就是从一九三二年八月开始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单独对付刘存厚了。

我们不敢怠慢，决定先发制人。我们很讨厌刘存厚，因为他不特一直没有接受我们所提互不侵犯的建议，并曾乘我们被田颂尧进攻之危，出兵竹峪关。他在绥定颇有积蓄，而兵力却是不堪一击。我们的目的是夺取刘存厚的军火，以增强我们对全川军阀作战的实力。

我们集中过半数的兵力，袭击刘存厚的防地，一经接触，刘部即闻风披靡。不几天，我们就席卷了他防地的大部份。他所有的绥定宣汉和万源三个县城也先后被我军占领。刘存厚统治的残暴比之田颂尧，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地人民纷纷协助红军，解决刘存厚的残部。打土豪、分粮食等等摧毁旧势力的群众行动风起云涌。刘存厚从此也就湮没无闻了。他的残部改由廖震率领，转隶刘湘麾下。

这是红四方面军入川以来一次最重要的胜利。我军缴获近万破旧枪枝，上百万发的土制子弹。刘存厚在绥定城

内所建立的兵工厂、军火库和被服厂等，以及积存的金银物资，除被破坏损失者外，悉数成为我军的战利品，可算是我军一次最丰富的补充。

由于这一胜利，红四方面军也获得极迅速的发展。刘存厚防区内的人民成群结队涌到红军里来，我们也放宽收容的尺度；不问仍吸鸦片与否，只要身体不坏，就可入选。这样，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参加红军。不到两星期，全军战士人数已由两万增至五万，每军人数已由四千增至一万左右。不过新兵大量增加，训练力量极感不足，使部队的水准一时大为降低。

我军乘胜由绥定宣汉向刘湘的防地梁山进逼；曾使重庆万县为之震动，也促成了四川军阀的联合行动。刘湘就任四川全省剿匪总司令，以邓锡侯为第一路总指挥，由广元昭化向苏区进攻；田頌尧为第二路总指挥，由阆中向我们推进；杨森为第三路总指挥；李家钰罗泽南分任第四路正副总指挥，分向我们的南面进袭。刘湘的直属部队正当梁山的正面，由王陵基以第五总指挥的名义统率，这也就是此后战争中敌方的主力部队。此外，蒋介石也立即在四川设立了一个“剿匪”行营，派贺国光为行营主任，准备调遣在天水的胡宗南部和在汉中的杨虎城部，以配合刘湘的军事行动。

十月间，王陵基的第五路军集中梁山之后，即向我军反攻，战局开始逆转。刘湘直属部队的战斗力较田頌尧为强，尤以王陵基的第三师最为精锐（这个师约有普通两个师的实力，装备也都是来路货）。我军则因新兵过多，在最

初两次接触中，即遭受重大的伤亡，乃决定采用逐步后退的策略，以图整训。

当我军由梁山前线退守绥定河北岸防线时，王陵基部旋即全力攻击，强渡绥定河。在“束林河”<sup>②</sup>地区阵地，王陵基部开始受到我军的沉重打击，他将在万县历年所扣留的四川其他军阀由长江下游运川的军火，大部消耗掉了。他虽达成了渡河的目的，但较之他所付出的代价则有点得不偿失。他的攻击力从此也就逐渐转弱了。

我们退到绥定河北第二道防线后<sup>③</sup>，知道王部的攻击力也有限了，立即抓紧时机，紧急展开了训练工作。这项工作相当复杂，首先是射击技术和战斗技术，再则是军制军纪以及文化卫生等等常识教育，再其次是戒绝新兵的烟瘾。戒烟的办法是说服与强制并用，由各连的政治指导员，控制着戒烟丸子，逐渐减少供应量，以期有烟瘾的新兵在限期内戒绝。我和徐向前陈昌浩等都亲自督导这些训练工作的实施。

我们这项训练工作，收效很大，也曾引起敌方的惊异。我军在阵地附近演习实弹射击时，王陵基误以为我们发生了内乱，准备乘机进攻。但旋即发现我军的工事做得又快又坚强，前线士兵的战斗动作极敏捷，显然又不像有内乱的样子，似乎有些大惑不解。

在王陵基继续不已的攻势压力之下，我军被逼退却三次，退到了绥定以北约一百里的地区。但敌军的攻势所付出的代价，是一次比一次重大。王陵基在最后一次对我军的攻势上，损失兵力近三千，而我方的损失则不及敌人的

十分之一。这就挫折了王陵基的锐气，他不得不承认“共匪”虽在退却之中，战斗力并不稍减。

我军与王陵基部相持了约三个月，已是一九三四年一月下旬了。王陵基觉得他已不能迅速解决“共匪”，但低估了我们的反攻能力。到了快过阴历新年的时候，王陵基的太太姨太太和亲属，纷纷电催他返万县渡岁，并料理私人财产账务。他于二月上旬私自返回万县，他的秘密行动，上自刘湘下至他的部属都不知道。他只嘱咐他的参谋长，暗中代理总指挥的职务。我们因能译出他们的电讯密码，对他的行动了如指掌，乃积极计划乘机反攻。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四日清晨(阴历元旦)，我军开始反攻，袭击王陵基的右翼，驻守那里的一个旅，经我军猛攻后即告瓦解，旅长亦阵亡。其第二道防线上的守军，也因之溃乱。我军乘胜推进三十里，直抵王陵基的总部。王的参谋长仓惶率部急退，这时王部各师旅长始悉王陵基已在阴历年前私离防地，为之大哗。幸赖王部左翼指挥将领，尚能沉着应战，坚守防地，才挽回了王军全部崩溃的命运。王本人闻讯急返前线，从事补救并策划反攻；但刘湘再也不信任他了。

王陵基就这样被刘湘解职，并软禁了一个时期。刘湘与王陵基之间原有罅隙，主要是王陵基私通蒋介石并扩充实力，使刘湘觉得王有取而代之的野心。王似乎为了讨好于蒋介石，所以这次与我军作战，相当卖力，这又使刘湘觉得王陵基是在任意消耗他的实力。这次王陵基私离防



地，触犯军纪，正给刘湘处罚王陵基的一个好机会。

我军自一九三三年十月与王陵基部接触以来，至一九三四年二月间，可说是与川军作战最激烈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除了正面的王陵基部以外，其他如邓锡侯、杨森、田颂尧、李家钰、罗泽南等部，配合着王陵基的行动，纷纷向苏区进逼，也曾发生过一些激战。在这几方面的我军，为了缩短防线，也逐渐退到南江巴中两个县城附近。等到王陵基部受挫后，战局便暂呈胶着状态。

刘湘在无可如何之中，抬出了一个“刘神仙”，这是川军与我们作战中的一个有趣插曲。“刘神仙”原名刘崇云，是刘湘的算命先生兼“诸葛亮”。刘湘曾拜他做老师，四川大大小小的军阀，也跟着拜他做老师，因而权重一时，已能替刘湘做些纵横捭阖的工作。刘湘本人是孜孜计较四川各派军阀势力的消长的，遇有风云变化，不愿自己的实力受损，但求他人能为自己在火中取栗。刘神仙之被抬出，似是为了便于调动各派的军队。

紧接着王陵基的被撤，刘湘的阵容实行改组，刘湘本人仍坐镇成都，另在南充设立一个前敌军事委员会，指挥全盘战局，以刘神仙为委员长。原王陵基第五路总指挥的职务，则改由刘湘的亲信第一师师长唐式遵继任。军事委员会之设于南充，其目的显然是要刘崇云就近督促邓、田、杨、李、罗各部为进攻我军的主角。

三月间，这个妖言惑众的巫师——刘崇云，大摇大摆的进驻南充。他模仿诸葛亮出师表的口吻，发布了一篇誓师的洋洋大文，前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打气电令如雪片

飞出，无非是催促各军前进。事实上，杨森部也就向巴中通江的南部挺进。

我军的策略是要破坏刘湘这种计划，不让四川的军阀真诚合作，而以打击刘湘的直属第五路军为主要目的。我们集中了约三分之一的兵力，先给冒进的杨森部一点打击，杨森部在我军的攻势下，向营山败逃。我军进围营山县城，并以一部直捣南充，刘神仙只得仓惶逃回成都。我们于是向杨森等宣称，我军无意占领杨森的防地，只是不让刘妖怪猖獗，我们所要打击的是刘湘，希望四川其他军人不受刘湘的利用。事实上，我们也将军队撤离了杨森的防地。

刘神仙从此再也不露脸了；前敌军事委员会也被撤销了。刘湘这位剿匪总司令，虽仍不敢离成都，但刘神仙这个工具既已失灵，一切只好亲自处理了。

唐式遵任第五路总指挥之后，所表现的作风与王陵基显然不同。唐为人似较敦厚，更能团结部属，对刘湘则奉命唯谨，一切措施多向刘湘请示办理，第五路所辖部队之调来前线者续有增加。王陵基指挥时，其第一线的兵力，最多不过四万人，而唐式遵则使用到六万人。唐在指挥上似乎有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意味，所有作战命令均为例行公文，只是四平八稳。各部所担任务，亦只求平均分配，不敢有所轻重。

一九三四年四月起，唐式遵也曾组织过几次规模较大的进攻。我军仍用诱敌深入之计，步步后退，双方都没有甚么重大的伤亡。正月间，我军退到了最后防线，左翼以万源县城为最后据点。刘湘以为他的军事计划着着成功，

因严令唐式遵迅速夺回万源县城，企图由万源抄袭我军通江北路的后路，这样就爆发了为时三个月的万源争夺战。

万源附近地形特别险要，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我军希望在这里消耗敌军的实力，所以坚强抵抗。刘湘这时在梁山建立了飞机场，蒋介石也调来了几十架飞机，供刘湘指挥。唐式遵每周平均总发动一次攻势，每次都受到严重打击，最后，他终于不能支持了。

唐式遵的例行公事大致有如下的特点：他将他的部队轮流担主攻，每次攻势都是在拂晓时发动，等到八九点钟梁山的飞机（多为九架的编队）飞到前线的时候，乃蜂涌前进。进到山腰地带之时，就为我军的火力所抑制，进退两难，到下午四时左右，敌机不能再来的时候，我军就开始反攻。在肉搏中，敌军以手榴弹为主要武器，不过手榴弹抛出后至少要经过十秒钟才能爆炸，我军手榴弹较少，乃即拾起敌人抛出的手榴弹反投过去，正好爆炸。这样，敌军在手榴弹和我们的机关枪扫射之下，受到惨重的伤亡，败回原阵地去了。在这一段期间内，敌军每次伤亡至少三百，好几次超过一千。

敌军的实力是衰落了。这种情形不仅表现在战场上；唐式遵的部属都纷纷要求补充整理，唐本人也致电刘湘诉苦，说明伤亡惨重，请求停止攻击。我军的损失远较敌方为少，士气仍极旺盛，这就造成了我们反攻的良机。

八月间的一个拂晓，我军从万源竹峪间的地区，开始反攻，迅即冲垮了敌军的防线。我军主力转而包围万源正面敌军的后路，这是一个长距离的包抄。敌军没有等到我

军抄到敌人后路的要害所在，就纷纷向后逃跑，溃不成军。我军加速猛追，显有全部歼灭敌军的可能，惜因大雨如注，山洪暴发，阻延了我军追击的速度。追击至绥定宣汉时，敌军大部退过绥定河，控制了渡河工具，我军因水深无法渡河，敌军才得着喘息的机会。

这一次胜利又恢复了我军与全川军阀作战以来所失去的地区，我们原保有通江、南江、巴中、万源四县全部和绥定、宣汉、广元、苍溪、阆中、仪陇六县的一部分。当唐式遵进攻万源县时，西线的敌军乘隙占据南江巴中两个县城，唐式遵的第五路军被击溃后，西线的敌军，在我军压力之下，也向嘉陵江西岸退走。这样，川北苏区，北枕巴山与汉中为界，东达绥定河，西凭嘉陵江，南与杨森的防地——营山渠县相接。

刘湘所部各路先后败退后，战局又暂呈间歇状态。此时刘湘又重新调整阵容，以其第二师师长王钻绪继唐式遵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积极整编部队，一时无力反攻。我军经过长期的战斗，也要整补。

在这种山岳地带长期作战，对敌我两方都造成了极严重的灾害。不过敌方组织力较差，损害也更大。以梁山为后方的唐式遵第五路军，经常要使用八万名左右的运输伙始能供应全线需要<sup>④</sup>。这些运输伙却是强拉来的瘾君子，沿途死亡者，不计其数。绥定万源宣汉一带，唐式遵部所占领过的区域，遍地都是死尸，到处遗弃着伤者病者，其中自然有不少士兵，但还是运输伙占多数。当地村庄，经敌军骚扰后，居民多已逃亡，物资更是十室九空。

川北苏区的领土，也是一片荒凉景象，尤其是曾被敌军蹂躏过的地方。耕作受着战争的妨碍，田地不是杂草丛生，就是荒废了。居民的粮食和其他积蓄，一部分被红军消耗了，另一部分则为敌人所糟蹋。疾疫流行，我在上面说过的一九三四年秋季的痢疾，就是在这时猖獗的。苏区内各集镇上，冷淡萧条，赶集的人大大减少了，市场上的货物，更是寥寥无几，人民的呼声，不是疾病和死亡的哭泣，便是物质匮乏的呻吟。

我们集中精力挽救这些灾害，一面是追击敌人，一面是清扫战场，掩埋敌方遗弃的尸体，收容伤病，到处消毒。敌人败退时，竟将万源境内仓库的存粮，浇以火油，使我们无法利用，可是那些从山林中逃回来的人民，因饥饿难抵，竟抢食那些浇了火油的米粮，因此又增加了一些疾病。战争一告结束，我们即动员当地人民，抢救和补种晚秋农作物，调配粮食，救济灾害严重区域。经过了这次战斗，食盐尤为缺乏，我们甚至将老盐店地下的泥土挖起来煮，以期能够得着一点盐。我们到处作预防疾病的宣传，动员全力扑灭痢疾，红军战士们从各方面协助人民；军医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照顾生病人民。

我们各项抢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的时候，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江西红军脱离瑞金根据地，向西行动，不到几天我们就知悉了。这是使我们十分震动的事。七八月间，当唐式遵向万源进攻的时候，中共中央从瑞金叠次来电，对我们的处境表示忧虑，却没有一字提到江西苏区的情况。到了八九月间，我们将敌军先后击溃，中央来电表示十分

欣慰。从这些电报的字里行间，我们就感觉到了中央苏区处境不佳。

我们举行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中央红军（即第一方面军）退出江西苏区所引起的问题。他们这次行动，我们事先毫无所知，根据我们直接获得的资料，认为中央红军这次行动是在敌人的压力之下，不得已的退却行为。我们不敢断定他们是否能阻止敌人的追击，是否能在西南地区立足，但确认中央红军不能在江西立足，是整个苏维埃运动受着严重打击的表现。

根据这些估计检讨红四方面军今后的方针，我们都主张今后应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力求向外发展，不必死死守住这个川北苏区。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单凭这里要求发展是不易的。这种看法，有两个主要理由：一是我军的枪枝弹药，质素愈来愈低，兵力人数虽在五万左右，但实际能作战的枪枝不到两万，其中多半是土制货，是从四川军阀作战缴来的次等货色，而且枪枝在作战中损毁极易。因而，同志们多引以为忧，认为只有与蒋的嫡系部队作战，才能缴获较好的枪弹来补充自己。二是川北苏区经过战争的蹂躏，粮食及其他必需品均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红军死守在这里，不仅不能为人民解决粮食问题，恐将与民争食。

这次会议并未形成具体决议，只是由会议授权首脑部相机处理一切。我们为未来的行动开始作些准备。四川军阀受着江西红军被逼离开老根据地一事的鼓励，又蠢蠢欲动，到处发动规模不大的进攻。我军主力则集结在离前线

较远的战略要点上，仅用少数兵力在前线与敌周旋。我们抽调中级以上的干部，组成军事高级训练班，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全国各地的军事情况，特别是较广阔的西北地区的一般情况。

这个训练班最初是由负伤病愈的干部组成的，后来陆续从军队中抽调干部参加；直到我们与中央红军会师之后，才改组为红军学校。担任这个训练班主任的，就是负着重伤的原第九军军长何畏。他原系香港的洋服工人，参加过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罢工。在苏维埃运动时期，参加过广西越南边境的游击战争，曾与越南革命党人一起在越南与法国军队作战，一九三一年他被调到鄂豫皖苏区任红军的团长，先后负伤十一次。这多次的枪伤，使他成了残废。因此，这个训练最初还带有点休养的性质。

我们事实上放松了对四川军阀作战。仅有的侦察电台，日夜不停的工作，只有小部分时间用在侦察四川敌情，多数时间用来侦察中央红军行进所在及其四周敌情。中央红军行进到广西贵州边境地带时，我们即开始供给中央红军情报。这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侦察电台每天都译出敌军大批密码电讯，再由参谋人员扼要作成通报，经我鉴定后拍发给中央红军，我们的电台须守候中央红军电台出现，有时从晚七时余守候到翌晨三点左右。有时我自己也守候在电台旁，解答对方的疑难。

至少约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我们供给情报（特别是他们由遵义向云南方面行进时）。他们日夜在行进中，因而电台没有时间做侦察工作。每当他们宿营

或休息的时候，立即与我们通报。根据我们所供给的情形，决定行动，发布命令。而我们这种行动，对于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极尽了耳目的作用。

当中央红军退却到贵州境内时，所有消息，一天一天不利于我们了。追击的国民党军队所发出的电讯，夸耀他们胜利。蒋介石的部队，正从各方面移动，有些已经进到四川的重庆，有的经西安向汉中天水移动。四川军阀，一面表示恐惧，他们估量到达贵州的江西中央红军，将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境内会合；另一方面，蒋介石的部队也已大批的涌进到四川来，因此四川军阀觉得本身防地已不易保持，于是叫嚣先解决红四方面军，以免南北两路红军互相策应。

我们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间开始的。估计中央红军将与红四方面军在川北西地区会师，我们义不容辞的要策应他们。我们设想未来的根据地以川陕甘边区地带最为适宜，但驻守天水广元线的敌军胡宗南部，却是我们实现这个计划的最大障碍。

十二月间，我军主力进至汉中的宁羌地区，这是我们入川后第一次向川外的军事行动。驻守汉中的杨虎城部因此大起恐慌，派代表质问我们，为何违反原已达成的互不侵犯协议。我们告以违反协议的不是我方，而是杨虎城自己，因我军与刘湘部在万源相持的时候，陕军曾越过巴山，骚扰我北面的后方，近来陕军又积极布置，有响应蒋介石剿共的迹象。但我们也安慰杨虎城派来的代表，说明我们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并非占领汉中，而是别有所指。



的确，我们的第一个目的是在找寻胡宗南部队，相机予以打击。可是胡宗南部的的主力，远在天水，在川甘边境的碧口和四川的广元只各驻有一个旅。我们曾派小部兵力向碧口广元两处的胡部作试探性的进攻。敌军据险凭借优越的火力抵抗，不轻易出动。因此，我们没有获得在野外打击胡部的机会。

我们另一个目的，是找寻徐海东部的行踪。当时徐海东部也从鄂豫皖区西进到陕西地区，我们从敌人的电讯中，侦察得关于徐海东部行踪的一鳞半爪，不久又音讯杳然。我们估计徐海东是在追寻我们，因而我们想派点部队去接应他。但我们在汉中侦察的结果是失败了，不特不知道徐海东部的确实所在，即这支部队是否存在，亦未得到可靠消息。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我们在宁羌地区接到中共中央来电，告诉我们遵义会议决议的大要。其内容是确认中共中央苏维埃运动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军事路线却犯了严重的错误，主要是中央红军在江西苏区，误用保卫苏区的口号，采取了保守性的军事防御策略，放弃了游击战争的优良传统，因而招致了军事上的失败。此外，这个电报还告诉我们，中央政治局增选毛泽东为委员。

我们举行会议研讨这个电报，从最迫切的军事眼光来看问题，觉得红一方面军在江西苏区和此次西行，大致都遭受重大的损失，因而严重的批评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我们旋又得到消息，红一方面军由遵义正向西北方向的川黔边的赤水地区行进。我们判断他们正在设法偷渡长江，到

川北来和我们会合。于是我们放弃了在川陕甘三角地带与胡宗南部角逐的计划，仍回到川北苏区。是时四川军队已重占绥定万源一带地区，主力则由南面向仪陇巴中地区挺进。为了保卫这个苏区，我军也不得不迅速南撤。我们根据当时情况，决定了由苍溪地区渡过嘉陵江西进，实行策应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计划：徐向前率大部对付我们南面的敌人，陈昌浩驰返通江对付东面之敌。在我军渡嘉陵江后，通江自不易守，应先行部署当地游击战争的工作，我则驰往苍溪地区为渡江战作准备。

这是影响川北苏区存在的一个决定。我们曾向一般干部和苏区内人民预先解释，红四方面军主力必须执行策应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计划，这个苏区因此可能暂时要忍受敌人的骚扰。我们不敢宣布红一方面军处境艰难的消息，只强调红一方面军是较四方面军为强大的部队，它将与四方面军会同夺取成都。这个军事计划的实施，为我们与一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也是川北以通江为中心的苏区事实上归于结束的标志。

① “上门汉”即是男子入赘女家。

② 柬林河系一地名。

③ 这道防线距绥定河约有三十华里。

④ 这个数字系唐式遵部当时的公报所载，可能有些夸大；但即使以半数计，也是骇人听闻的。



## 第十八篇

# 会师与内争

# 第一章

## 渡过嘉陵江

渡过嘉陵江，支援第一方面军顺利进入四川地区，我们认为这是首要的任务。我们认为第一方面军是全国红军的主干，中共中央和许多重要干部也都随一方面军行动，他们正在艰苦挣扎之中，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赴援，可能招致中国革命的无比损失，也会使我们负疚良深。就因这种大义所在，我们不惜放弃可以保卫的川北苏区，蹈险犯难，以为应援。不料我们这种驰援行动所招致的，竟是一些不应有的责难，随之而来的，更是争执和分裂。

渡江计划是由我亲自部署的，我一面注视红一方面军的动态，一面作渡江的准备。当时一方面军正在贵州云南北部地区兜圈子，行踪飘忽，方向不定，而且敌军正沿着长江设防，阻拦一方面军的偷渡。我审度一方面军能否偷渡长江，如果他们无此力量，我们自不愿贸然放弃川北苏区。后来，从一方面军的来电推断，觉得他们必定渡江，因而我们也就决定渡嘉陵江西进。

嘉陵江宽而且深，水流湍急，两岸多是悬崖陡壁。敌军邓锡侯、田颂尧两部，据险设防；这对我们当时落后的装备来说，可称天险。我亲自审定各个可能的渡江处所，最后

选定由苍溪县城附近地区渡江。这里江面甚宽，对岸又有敌方重兵驻守，我的军事顾问们多不以这个选择为然，我则认为这个地方的条件最好，而且敌人决不会疑心我们会在这里渡江，我们正可以利用他们的疏忽。

我们利用这一带的优良条件，准备渡江战。嘉陵江上的船只尽被敌人扣留在对岸了，我们首先要解决渡江的工具问题，组织了一个特别工程营，调动五百多个懂得造船、把舵、熟谙水性的人员参加这个营，由这个营制造了一百只样式像登陆艇的小船，每只船头用沙包掩护，可供一班人（十二人）渡江之用。我们利用这些船只在苍溪东面五十里王家坝<sup>①</sup>地方，训练官兵的渡江动作，还修建由王家坝到苍溪的道路，以便将这一百只船，翻过高山，搬运到苍溪附近一条小河沟去。

一九三五年四月间的一个夜晚，我们一切准备好了，实行敌前强渡，不幸我们的渡江计划，事前已为敌人获悉。敌方的高级将领在苍溪对岸，一直监视到午夜，没有发现我们的丝毫行动，他们怀疑他们的情报不可靠，判定在这个宽逾三百公尺的急流江面，对岸并没有任何船只，红军决无渡江可能，因此，他们的戒备松懈了。

可是，就在这晚夜深三时左右，我们成功地渡过嘉陵江。我们运来一百条船，都隐藏在敌人所看不见的一条小河沟里，三时左右，一齐出动，直驶对岸，很顺利的夺得了敌人的滩头阵地。我军大队跟进，乘势扩展，一个接一个的攻下了苍溪对岸敌军所有的险要高地。我们这一渡江行动使敌人人为之惊奇不已。

由于我们渡江的准备工作，做得相当周密，我们夺得了敌人所扣留的大批船只，很迅速的在苍溪县城的嘉陵江渡口上，建成一座浮桥。等到第二天近午，敌机分批来轰炸的时候，我们建立浮桥的工程完成了。敌机的投弹技术似不高明，在浮桥周围投了几百枚炸弹，始终无一命中。

邓锡侯、田颂尧两部因后路被我军抄袭，乃尽撤嘉陵江之防，退守剑阁、梓潼、盐亭县城。我军控制了嘉陵江上下约一百里长的东西沿岸，并向剑阁、梓潼、盐亭追击败退之敌。

我们虽然成功的渡过了嘉陵江，但敌人所加予我们的压力是愈来愈强大。蒋介石本人在当年一月间即曾到重庆部署对付我们，他的军队分由长江及贵州入川的已不在少数。被蒋改编的原第十九路军的三个师，早已到了我们北面陕甘南部地区，这些新调来的敌军大约在几天之内就会迫近我们了。

敌人是了解我们的军事企图的。当我军渡过嘉陵江时，敌人即叫嚣：“共匪企图在川西地区会合。”其对策自然就是隔离我们。敌方的电讯中不止一次表示：“朱毛红军已成强弩之末，不难在滇黔地区予以歼灭，贺龙萧克的一股（即第二、第六两军，统称第二方面军）在川黔湘鄂边界流窜，实力最弱，只徐向前的一股在川北地区，极为猖獗……”事实上，敌方的主要注意力也移到红四方面军来了。

我们东面的川军，因我军主力渡过了嘉陵江向西移动，迅即占领通江巴中县城，正向南两江挺进。这时徐向前已

率部由仪陇前线后撤，经苍溪渡江。陈昌浩只能在这个区域部署少数游击部队，以巴山山脉为倚靠，作些牵制性的游击行动。陈本人则率殿后部队向苍溪急退，不到几天，我们三人又在剑阁附近地区会合了。

剑阁梓潼地区是川陕公路上的要冲，敌方很容易由南北两方来夹击我们，我们是不能在这里久留的。我军乃向西继续移动，以占领江油平武北川一带地区为目标。而另一方面，敌人见我们占有了川陕公路的要冲，可能南下成都，也可能北袭陕甘。我们也就将计就计，大肆宣传，并向南北两方作佯攻性的游击行动。就这样，川陕甘人心为之震动。

继扰乱敌人耳目的行动之后，我军主力即由剑阁经青虹坝，直指江油。江油南面三十里的中坝是川北商业荟集的地方，有“小成都”之称。从青虹坝向江油前进七十里的路程中，尽是平坦地带，种满了一望无际的罌粟，五颜六色的花朵，争奇斗艳，确是美观。这是我入川后所看见的最大幅的罌粟地，良田美土，竟为毒物所占用，不免感慨系之。

我军陆续向江油集中。江油、中坝两个据点是由邓锡侯部防守的，我们以一部分兵力围住这两个据点，大部则分驻在这个富庶区域内，以获得物质补充为主要目的。同时，我军又分两路向北夺取平武，向西夺取北川。这时胡宗南部已先我占领了平武县城，我军即在于平武附近与胡部相峙，保障我军北面的后路。至于北川则为我军占领，成为我军西进的踏脚石。



这时敌机的活动大大增加，四川各军阀的主力都从东面江油以南地区集结，他们的行动似不如我们的迅速。敌机的活跃表示蒋介石调集四川的飞机已续有增加，企图阻止我们向南进攻。我们曾在江油地区与敌机捉了一个时期的迷藏：当敌机来侦察的时候，我们故设疑兵，侦察机一走，我们又尽撤这些疑兵，并通知附近的老百姓立即趋避。因此，敌机在这个区域所投的大量炸弹，大多落在无人的山林空地上。

这已是一九三五年五月间，是我们决定今后行动方针的又一紧要关头。我们的川北苏区已经放弃，红一方面军能否渡过长江仍是一个疑问；我们现在所占的江油平武北川一带地区，本是一个民族复杂的区域，尤其是北川的村落中，番族比汉族的人口为多，如果我军再往西发展，更是藏族集居之地。

在江油附近举行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慎重考虑了这些问题。到会者都觉得我们现在只能根据我们自己的处境来决定我们的政策，不能一味采取观望的态度。于是，我们决定以北川一带地区为据点，向川西北、甘南、西康东部一带地区发展，形成一个川康根据地。

根据这个决策，我又向会议提出了西北联邦政府的主张。我说明在新占领区域内，只能实施我们初入川时所制定的入川纲领中废除苛捐杂税等条款，暂时还不能组织苏维埃和实行分配土地，对于少数民族，政策的尺度更要放宽些。我们不反对少数民族部落中的酋长头人喇嘛阿衡等，而且要帮助他们组织区域内的少数民族自治政府。这些自

治政府派代表会同汉族所推举的代表，共同组织一个西北联邦政府。

会议接受了我这个提议，我们就开始组织西北联邦政府，原任第四军政治委员周纯全，被推为这个政府的主席，并制定了一个西北联邦政府的纲领，布告各地。这次讨论，比较初入川时制定的入川纲领要详细得多。我们认为红一方面军离开江西以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事实上已不能行使职权，现在我们根据实际需要所组织的西北联邦政府，将来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能行使职权时，仍是它的一部分。

西北联邦政府的纲领，首先强调抗日反蒋的重要，继而说明这个政府的形式是适合于西北多种民族的地区的。这个纲领的条文，主要是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不乱捕人杀人，反对军阀统治，反对汉人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严禁鸦片，支援红军等。对于西北少数民族则规定，各民族各部落自治，由头人召集当地他本族的人民会议，组织自治政府。各自治政府均须遵从联邦政府的共同纲领，但联邦政府不应干涉所有各自治政府的习俗，如宗教自由和头人的特权等。

我们暂以北川县城为西北联邦政府的所在地。这个县位于四川省的西北角，汉番杂处（番族即藏族），汉人多聚居在交通便利的地方，番族各部落则散居在较广大的山区。番族中又有生番熟番之别：这一带的番族多能说四川话，生活习惯已多汉化，被视为熟番；在四川西北的西康地区则多生番，他们不会讲四川话，也很少与汉人交往，保持

着原有部落的语言和习俗。

北川县是一个崇山峻岭的地区，西接岷山山脉的大雪山，县道多是顺着石岩的形势雕凿而成，蜿蜒险峻，县内河流湍急，有类瀑布，有些地方为了河道的畅通，还经过石工的开凿。这里到处都表现出石工的伟大工程，令人惊服。当地人民崇拜历史上治水的圣人大禹，认为他出生于北川，全县大禹庙不少，我想这大概是与鼓励石工修道治水的事有些关系的。这一带地势高寒，稻米和粟的栽种都不适宜，只产些青稞（麦类）豆子和包谷等。

我们到这里好像是身履异域，我军中占最大多数的通南巴籍战士也不例外。我们在全军展开教育运动，主要是训练战士们与少数民族相处，要尊重他们的宗教和风俗习惯等。生活上要与当地人民打成一片，学习他们用手吃糌粑<sup>②</sup>。我军战士素以大米为主要食粮，改吃糌粑是很不习惯的，陈昌浩就曾许多次向战士们示范，吃糌粑一时成为他政治工作的主要项目。

周纯全所主持的西北联邦政府也积极展开工作。他在北川和北川西南的茂县，物色了各部落的代表，参加政府工作。他向这些代表解释，红军与各部落亲如一家，帮助他们解除军阀的压迫，决不反对他们的头人和宗教习俗，只要求他们与红军和平相处。他也说明西北联邦政治的远景，将来设立各民族的自治区，如藏族的自治区，回族的自治区和蒙族的自治区等。他要求这些代表将政府的纲领和红四方面军的意向，传达到西北各个部落去。事实上这件工作也已做到相当满意的程度。

我们在北川工作了约三星期后（这时已是五月底六月初了），即接到第一方面军偷渡金沙江的消息。我们立即实施策应的计划，将总部由北川移到茂县，第三十军奉命由汶川渡岷江，经过理藩懋功，直指大渡河，扫除这一带的敌军，以便红一方面军能够安全渡河。第九军和第三十一军，则由江油平武前线撤至北川茂县地区，对付这方面的敌人。第四军北向松潘，作为我军北面的屏障。

当时敌军对我们是如影随形的，我们退一步，敌人就跟进一步。我第九第三十一两军撤到茂县北川后，即与优势的四川军在这一带的东南地区发生激战。这是茂林密竹的山区，敌军到处钻我们的空隙，我军则分别截击。第四军挺进到松潘地区时，胡宗南的军队也赶到了，两军即在松潘县城附近激战。结果胡宗南部占领了松潘县城，我第四军则控制着松潘县以南的险要阵地，使敌人不能南下威胁茂县。

我第三十军兼程前进，在懋功以南约一百里的地区，与红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会师。这次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大渡河的行动异常迅速，大渡河是有名的天险，太平天国的名将石达开部，就是在这里渡河时为清军所消灭。我在茂县接到第三十军陈世才李先念已与一方面军会师，一方面军的全部正向懋功集结的电讯，当时，我和同志们都为之欣喜若狂。我钦佩红一方面军长期艰苦奋斗的精神，并商议如何慰劳红一方面军的战士，使他们得到充分的休息。我立即致电毛泽东等同志，向他们道贺，并告以我将赶往

懋功面谈一切。这样，红四方面军不顾艰险，策应一方面军的任务，算是达成了。

- ① 王家坝是一个集镇，在嘉陵江支流东河边。
- ② 糍粑系以青稞磨成粉，炒熟加上牛酪，用手揉成团子，这是当地人民的主要食品。

## 第二章

### 懋功之会

我与毛泽东等在懋功初会时，双方在政治军事以及两军的关系上，就表现了针锋相对的看法。这些情形，现在说来，有些似是可笑的，可是确系不折不扣的事实。自然，这些分歧也决不是偶然的，主要是统治着中共中央的王明路线（即中国的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的游击英雄主义，与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所产生的多年来对中央领导的不满（特别是对苏维埃运动的政策），彼此碰个正着。人们在患难中总想避免争端，实际却适得其反。特别是缺乏民主素养的中共，不善于解决内部争端。

一九三五年六月间，我以兴奋的心情，由茂县赶往懋功与久别的毛泽东等同志会晤。茂县方面则由徐向前陈昌浩等留守，我军的指挥机构也继续在茂县办公。

我由茂县经汶川理藩前往懋功，沿途多系藏族聚居的区域。这一带河流湍急，竹索桥、悬空架设的木桥、牛皮艇和吊索等便是河上的交通工具，行军自然极为不便。汶川以西更是一大片原始森林，四川军阀为了搜括钱财，组织木材公司，在这里任意砍伐树木，乱七八糟倒在地上，沿途河边道路上遍地皆是。他们要在水涨的时候才将这些

待我来共同商定今后军事方针。我们慢步走进了这个约三十户人家的抚边，住在那里的一些中央各单位工作同志，闻讯都赶出来欢迎，我笑着向他们挥手答礼。毛泽东和他那时的太太贺子珍住在集镇南端的一所房子里，中共中央、书记处、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等机构，则挤住在集镇的中段，他们将我安置在北端的一所店铺内。那间敞开门的店铺，柜台内是我的办公处，柜台外则住着我的随从人员。

这时一方面军大体在休息状态中，彭德怀所率的第三军，董振堂所率的第五军，罗炳辉所率的第十二军，正向抚边北面的卓克基地区集结，林彪的第一军则在懋功附近。所有各方面的主要警戒任务，概由第四方面军担负。第三十军在懋功以南，阻遏着雅安方面敌军的尾追，第九军第三十一军仍在懋功北川一带与东面的敌军激战，第四军则在松潘附近屏障北面，防阻敌军的南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那时大多集中在抚边。张闻天原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遵义会议时被选为中央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毛泽东是遵义会议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仍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兼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前者兼红军总司令，后者则主管军委会的日常业务。被遵义会议解除中央书记职务、仍任政治局委员的秦邦宪，这时代理负伤未愈的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他们五位和我是当时在抚边的六个政治局委员。此外，项英留在江西苏区，任弼时在川湘鄂黔边的第二方面军，王明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则赴卓克基疗伤去了。

规模相当大，表示出外人在这里的力量。

这所用石头建成的教堂，在当地可算是一座伟大的建筑物。有一位西人传教士，长住在那里。我第三十军路经这里时，他避开了。教堂内一切如故，没有受到任何损毁。这个教堂设有很大的养蜂场，教堂附近开垦了大片土地，栽种各种农作物，教堂内存放着成包的谷粮，和大批农具。这一切表示这个传教士曾雇用很多工人操作，竟是当地的大地主。他大概是很善于享受的，设有很精致的磨房，显示他所吃的粮食是经过磨房精制的。他还从外面运来了大批的舶来品，如整箱的金山橙苹果洋酒等，可供他个人长期之用。

我急于赶往懋功，无暇在沿途多所观察。我和黄超及十余骑兵卫士，翻越一座座的高山，穿过茂密的原始森林，跋涉一些杂木丛生的乱石坡。这样，走了三天多的时间，快要到达懋功北面约九十里的抚边，这里便是毛泽东朱德等暂时驻扎之所。

六月的一天下午五时左右，在离抚边约三里路的地方，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们。我一看见，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拥抱握手。久经患难，至此重逢，情绪之欢欣是难以形容的。毛泽东站到预先布置好的一张桌子上，向我致欢迎词，接着我致答词，向中共致敬，并对一方面军的艰苦奋斗，表示深切的慰问。

我和毛泽东等旋即并肩步向抚边，沿途说说笑笑，互诉离别之情。他们告诉我，他们在抚边已休息了四天，急



待我来共同商定今后军事方针。我们慢步走进了这个约三十户人家的抚边，住在那里的一些中央各单位工作同志，闻讯都赶出来欢迎，我笑着向他们挥手答礼。毛泽东和他那时的太太贺子珍住在集镇南端的一所房子里，中共中央、书记处、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等机构，则挤住在集镇的中段，他们将我安置在北端的一所店铺内。那间敞开门的店铺，柜台内是我的办公处，柜台外则住着我的随从人员。

这时一方面军大体在休息状态中，彭德怀所率的第三军，董振堂所率的第五军，罗炳辉所率的第十二军，正向抚边北面的卓克基地区集结，林彪的第一军则在懋功附近。所有各方面的主要警戒任务，概由第四方面军担负。第三十军在懋功以南，阻遏着雅安方面敌军的尾追，第九军第三十一军仍在懋功北川一带与东面的敌军激战，第四军则在松潘附近屏障北面，防阻敌军的南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那时大多集中在抚边。张闻天原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遵义会议时被选为中央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毛泽东是遵义会议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仍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兼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前者兼红军总司令，后者则主管军委会的日常业务。被遵义会议解除中央书记职务、仍任政治局委员的秦邦宪，这时代理负伤未愈的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他们五位和我是当时在抚边的六个政治局委员。此外，项英留在江西苏区，任弼时在川湘鄂黔边的第二方面军，王明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则赴卓克基疗伤去了。

除了五位和我朝夕在一块的政治局委员外，还有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刘伯承和任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等，那时也在抚边。其余如任中央宣传部长的凯丰，主要将领林彪、彭德怀，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叶剑英、左权，元老人物林伯渠、董必武等，因职务不在抚边，我都未曾见着。

一阵赤诚的欢欣过去之后，接着而来的就是勾心斗角的党内斗争。在当晚的聚餐中，要人们不谈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经过，甚至也没有兴趣听取我关于红四方面军情况的叙述。毛泽东这个吃辣椒的湖南人，将吃辣椒的问题，当作谈笑的资料，大发其吃辣椒者即是革命的妙论。秦邦宪这个不吃辣椒的江苏人则予以反驳。这样的谈笑，固然显得轻松，也有人讥为诡辩，我在优闲谈笑中则颇感沉闷。

饭后，朱德陪我回住所，他一坐下，打开话匣子就如长江巨流，一泻千里。他讲得有时兴奋，有时悲痛，和盘托出了当时的遭遇和心境。我们就这样谈了一个通宵。我与朱德当晚的剪烛话旧，假若当时能记录下来，也许是中共最有价值的史料。现在事隔多年，记忆依稀，我只能录其梗概。

朱德这位老战友详细叙述了红一方面军的奋斗经验，叹惜着向我说：“现在一方面军是不能打仗了，它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头。”他在说明这一点时，指出八个月前一方面军由江西西行，人数约为九万，中经数不尽说不清的险阻艰难，到达懋功时只剩一万人了。林彪的第一军团人数最多，约为三千五百

人，彭德怀的第三军团约三千人，董振堂的第五军团不到两千人，罗炳辉的第十二军只剩几百人了。再加上中央各直属部队，总计约一万人。而且所有的炮都丢光了，机关枪所剩无几，又几乎都是空筒子。每枝步枪平均约五颗子弹（少的只有两三颗，多的也不过上十颗罢了）。他觉得这些少得可怜的子弹，只能作保枪之用了。他认为一方面军奋斗至此，要不是有四方面军的策应，这次真是走到绝路了。

朱德叙述一方面军的遭遇，大为伤感。他想起了许多往事，说到八年前南昌暴动我们在三河坝分手时<sup>①</sup>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他追述那时的遭遇，一同打游击的同志们在敌军的压力之下，悲观失望，逃亡甚多。最惨的时候他身边只剩下二十八个人，甚至这二十八个人中还有人疑心他也会逃跑，因而放哨监视他。后来情形逐渐好转，经过多年奋斗，才造成了一方面军的局面，现在的情景，又与当年不相上下。可是他当年虽只剩下二十八个人，心情却是振奋的，现在人数虽较那时为多，但心情是郁闷的。何况时移势易，敌方力量远较七八年前为强。我们现在真是前途茫茫，能否杀出一条生路，化险为夷，还在未定之数。

他又说到这次长征中一方面军能保持大部分的干部是不幸中之幸，这似又冲淡了他悲观的心情。一方面军在云贵一带，遭受敌军追击，保存干部是不容易的。但朱德等采取了坚持保障干部的方针，男女干部受伤了，生病了，总是设法抬着走，甚至抽调战斗兵来抬他们。这件事曾引

起一般战士的怨言，说上级不爱护战士，沿途抛弃伤病兵，却要抽调战士来做轿夫，抬那些要人们和他们的妻子。朱德认为不顾战士的怨言，坚持保存干部的作法是有成绩的。现在一方面军中，是干部多士兵少，干部甚至降两级使用，如原任连长的现在任班长。因而朱德觉得一方面军虽只剩下一副骨架，却是极可珍贵。

朱德又谈到中共中央的一些情况。他说到一九三一年八月间中共中央搬到瑞金以后，老毛因受到批评不管事了。后来，毛对中央总表现出一些相左的意见，如反罗明右派路线，毛是不高兴的，尤其在军事问题方面，在应付闽变（即指福建人民政府事变）和反五次围剿的时候，老毛都提出过他自己的看法。到了长征以后，毛更批评中央军事策略是错误的防御路线。

他进而说到不必过于重视遵义会议。当时中央和一方面军都处境艰危，老毛有许多不同意见，也有正用得着的游击经验，因而遵义会议把他捧出来负责，内部的争论也就平息了。他觉得现在最紧张的是军事策略问题，即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采何种军事行动。（二方面军贺龙部第十军的方志敏部以及其他散在各苏区的游击部队，只有让他们自己奋斗了）。至于中央工作的检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前途究竟如何，这类政治问题，此时都无暇讨论，朱德这些话自然就是暗示我不要提到政治问题。

朱德以极兴奋的心情，描述他对第四方面军的观感。他说到在他没有看到四方面军以前，不敢作较高的评价，可是，看到以后，却有说不出的高兴。当他在懋功以南大

路旁初次看见第三十军的时候，这支队伍正通过他的面前，开往天全庐山方面，抵御追军。他们都身体矫健精神饱满，每个战士都背有百颗左右的子弹，机关枪齐全，还有用驴马拖的成箱的机关枪子弹以及大大小小的迫击炮。战士们隐避敌机的动作和战斗行进的队列等等，都使他深信这是极具战斗力的劲旅。战士们满脸笑容，每个人眼中都充满了对中央和第一方面军的热爱，他们找一方面军的士兵攀谈，并将他们背的干粮，分给一方面军的战士。他们对穿得象火伏头的总司令，严肃的敬礼，热烈的欢呼。他们满口说的都是称赞中央红军，高叫“欢迎中央红军”、“拥护中共中央”、“拥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拥护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等口号，因此，他和其他的中央同志们都异常兴奋，喜出望外，认为四方面军确是一支中共所领导的基干红军。

朱德通知我，当天上午九时在老毛住所举行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商决军事问题。他说我对西北情况知道最多，今后作战要靠四方面军卖力，而我又是他们爱戴的领导人，应当根据一、四两方面军的情况以及国内外的形势，向会议提出意见，他相信我的意见必会受到会众尊重。他也谈到中央政治局的先生们，虽然在红军中混了一个时候，对军事究竟懂得不多，只要老毛恩来和我都同意某项军事计划，别人是不会有异议的。他知道政治局委员们都希望从速北进，不愿在这个少数民族地区久留，他本人也觉得北进意见是对的。

我在这次与朱德的谈话中极力安慰他，称许一方面军

的英勇坚强，并说当年红四方面军脱离鄂豫皖西进到通南巴时，也是狼狈不堪，今天一方面军所遭遇的敌军压力更大，长征达八个月之久，仍能保持这副骨架，要算是惊人的成绩了。而且四方面军正缺乏干部，一方面军多余的干部，可以抽调到四方面军来任职，四方面军也可以拨一些士兵和弹药补充一方面军。一、四方面军完全是一体，这些事都是四方面军干部们所乐为的。

我也详细告诉朱德四方面军现在的实力。当时四方面军人数在四万五千左右，步枪两万多枝，人数远超过枪枝的数量。这是因为川北的情况特殊，获枪颇感不易，而兵源的补充倒不是困难的。因此，四方面军直属机构人数很多，例如工程营、宣传队、妇女队等人数都不少，各军师团的担架队运输队等所谓杂务人员也都很多。此外，我还详尽说明了四方面军的各项优点和缺点，优点是作战英勇，官兵团结，军事政治纪律严明，长于夜间行动等等；缺点是枪弹百分之七十都是土制的，干部因作战伤亡过多，甚感缺乏，官兵文化水准很低等等。总结这些优缺点，我坦率的指出四方面军因与川军作战太久，战斗力已不如鄂豫皖时代那样强劲了。

我也曾向朱德吐露我的心境，我强调这多年来中共叠遭挫折，老同志已是不可多得，如今，我们在懋功相会，更应痛定思痛，团结一体。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都是拥护中共中央的，并不因为这些同志很久没有跟中央同志一块工作而有所疏远。我又详细告诉他，四方面军如何努力策应一方面军，但在一、四两方面军能否会合尚成问题的

时候，我们曾根据自身的处境，决定了一些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计划。

我们这样谈着，不觉东方已白，朱德起而告辞，说彼此都要休息一会，九时还要参加会议。临行我向他说到我们不妨多花一点时间，多开一两次会议，以便我们中间的意见沟通得更好，而且初次会面的一、四两方面军的一般干部们，也能有机会互相了解。这样，以后一切就易于进行了。朱德走后，我休息了不到三个钟头，九点钟的时候，我就去参加军事会议。

上午九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和我六个政治局委员以及参谋长刘伯承，齐集在毛泽东的住所举行军事会议。首先由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他说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在根据我们自身的一切情况，也只有这样做。我当即发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张闻天起而答复：在他们没有离开瑞金以前（约十个月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离开江西苏区后，即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现在无法通电报。

毛泽东谈笑风生的说下去。他说他打开地图一看，西北只有宁夏是富庶的区域，防守那里的马鸿逵部，实力也比较薄弱。莫斯科既有这样的指示，虽然事隔多时，相信仍会从外蒙古方面来策应我们，那我们也不怕外蒙与宁夏之间那片广大沙漠的阻隔了。

他自己问自己：“为甚么我们要到宁夏去？”他自己答

复说：“主要是蒋介石的飞机和大炮厉害，现在蒋介石得意，我们倒霉。他耀武扬威的找我们打，我们不中他的鬼计，偏不和他打，我们不动声色的跑到宁夏，背靠着外蒙古，看他还有甚么办法？”他继续说明：我们的同志们不肯老老实实的承认飞机大炮的厉害，现在我们只有变个戏法，也到外蒙古去弄点飞机大炮，来回敬蒋介石。如果没有飞机大炮，那就再不要说“打倒蒋介石”这句话了。

他加重语气继续说：“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是有被消灭的危险的。”他说到宁夏去必须由四方面军担负掩护的责任，这样，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也可以掩护中共中央和多数干部安全到达宁夏地区。如果在宁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干部，也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种籽，将来还可以再起。他还说这是他的冷静想法，也许被人视为右派，但他请求我们慎重考虑他所提出来的计划。

毛泽东这篇富于风趣但又非常沉痛的讲话，当时给我的印象不是反感，而是同情。他所提出来的计划，没有着重说到陕北，没有说到“北上抗日”，因为当时我们是在被隔离的状况之下，对于“抗日”一事确实非常茫然；他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志丹、高岗以及徐海东两部会合，因为刘志丹高岗的名字我们那时都不知道，徐海东部究竟存在与否，也成疑问。自然，后来所发生的中共中央与张学良、杨虎城的合作以及西安事变等，更是没有料想到。我当时真是慎重的考虑他所说的话，我觉得这个计划有优点也有缺点，我的心情是忧喜参半的。



我继起发言，将我所知的西北情况和我的想法报告出来，供同志们参考。我说我们在西北的活动，可能有一个计划：一是以现在我们所占领的地区为起点，向川北甘南至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可以名之为“川甘康计划”；二是移到陕甘北部行动，夺取宁夏为后方，以外蒙古为靠背。这就是毛泽东所提出来的“北进计划”；三是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以新疆为后方，可以名为“西进计划”。我提出资料，阐释这三个计划的优点和缺点，我说着的时候，大家都一边听一边在翻阅地图。

关于第一个计划，我指出，川陕甘康这一带边境地区地形险要，军阀的实力又薄弱，不能一致行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似亦不能大量用在这个地区，因为地形险要，敌人飞机大炮的威力也不易发挥。四方面军的战士多出生于通南巴，对这一带的情形较为熟悉。同时，这是产大米的区域，生活习惯与我们南方人比较接近。第一方面军经长途远征，也可以利用这个地区暂时休养生息。但这个计划也有缺点，万一情况不利，我们可能被逼退到西康，那里尽是藏族，人口稀少，粮食不足。与蒙古、苏联距离较远，没有后退之路。总之，这个计划，优点是易于执行，缺点是没有可靠的后路。

接着我说明第四方面军的同志们五月间在江油地区时，因不能确知第一方面军是否会很快的渡过金沙江大渡河北上，曾制定了一个建立川甘康边区新根据地的计划：在政治上，建立一个西北联邦政府，制订一个适宜于少数民族的纲领；在军事上，我军不难从茂县北川，向东面川

军作战，打回江油富庶之区，向南可以在天全庐山一带活动，北面胡宗南部虽占据了平武松潘等重要地区，但敌军防线空隙甚多，我们不难进入甘南地区，那里也是人口较多的地方。

关于第二个计划，我首先追述一年以前徐海东部的事情。该部由鄂豫皖区西移到陕西地区，其意向显然是要到川北来与我们会合，我们从情报知道他沿秦岭到达了陕甘交界的山岳地带，后来为敌军所阻而渡过渭水折往北面，从此没有下落。四方面军在今年之初，曾进入汉中的宁羌地区，除主要是为打击胡宗南部，为一、四两方面军向北发展做些准备工作外，还想借此探听徐海东部的踪迹，当时曾准备派一个支队到陕北地区去与徐海东部取得联系，后因不知徐海东的确实所在而没有实现。

我们在宁羌地区时，曾考察过陕甘北部和宁夏一带的情况。从这里去宁夏，愈往北走，愈是毫无掩蔽的黄土荒山，我军易于遭受敌机的袭击。陕甘北部地广人稀，粮食情况远不如川陕甘边远一带的丰裕。宁夏南有黄河，东西北三面都是大戈壁，我们进到那里，易于被敌封锁。何况黄河的阻隔，渡越的困难甚于长江。就由于这些情况，红四方面军自脱离鄂豫皖以来，总是要靠向南方。

接着我指出，我军若进到川陕甘北部和宁夏地区，优点是我们可以南下威胁兰州西安潼关各线，东向可以进到山西绥远地区，还可以问鼎中原。可是，缺点是退路不好，西北面是广大的沙漠。如果莫斯科真能经过外蒙古策应我们，如当年对冯玉祥的西北军一样，那末，沙漠也许不足

为虑了。

关于第三个计划，我首先报告，我们从情报中知道，苏联的飞机和军队，曾支持新疆省当局平复马仲英部的叛乱<sup>②</sup>。从这个消息看来，苏联在新疆有相当的力量，新疆当局似持亲苏立场，如果我们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去，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以保全较多的干部和军队，撤到新疆的安全地区。缺点却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如果蒋介石封锁了河西走廊，苏维埃的旗帜就只能暂时在昆仑山阿尔泰山一带飘扬。

我还说明要实行这个西进计划，先要做一番准备工作。从这里到河西走廊去，要渡过黄河，还要与回族的骑兵纠缠。所以我们最好先执行第一个计划，暂时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以便有时间整理我们的部队，训练对骑兵作战的战术。如果我们经过试验，能够实现川康计划，那又何必北进或西进；如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行北进或西进仍未迟。即使那时北进路线被敌封锁，仍可西进，因为西进路线是敌人所不易封锁的。

我所提出这三个可能的计划，虽包括毛泽东的北进计划在内，但也冲淡了毛泽东的靠近外蒙的唯一主张，也许这是使他不高兴的原因。他批评我的川康计划，认为事实上会使一、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据他考察所知，西康地区只有二十万人口，不能供养红军，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他认为，新疆倒是红军可以得到休养整理的地方，只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同时他对我的北进到宁夏陕甘北部所应顾虑之点，也不能有

进一步的解释。

毛的发言有些节外生枝，也表示出毛泽东太敏感，对我不信任。他对我所叙述的红四方面军在今年初北向汉中宁羌地区行动，考查北进可能并企图策应徐海东部一事，有些怀疑。他说：“可惜了，那时你们已经到了汉中，为何不继续北进？”他继续说，如果那时我们真的北进，我们就不能在懋功相会，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还要多走几千里路去追寻四方面军。毛当时说这些话的语气，显然是讥讽我并无策应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的诚意。

毛的这些话使我心情上的感觉很不愉快。我觉得他在游击战争中养成了一种疑忌心，所以对我的所作所为，也不用善意去推测。我当时并未戳穿这一点，我只说明我们四方面军的同志们知道一方面军将会渡过长江北北上时，即以策应一方面军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到宁羌地区，主要是企图打击在那里的胡宗南部，也是策应一方面军的一个行动，并无远离一方面军北进的意思。现在我们终于在懋功地区会合了，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都引以为快。毛听了这些解释，也未再置一词，谈到旁的事去了。

我们的会议一面讨论，一面交换情报，侧重研讨毛所提出的北进主张。我们都觉得如果在陕北地区有些游击基础，那将是北进计划的一个优越条件。但张闻天等却说，中共中央对徐海东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陕北地区，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陕北一带是否有其他的游击队等，均毫无所知。即使杨虎城剿共不积极，与四方面军有过联络，他们也是第一次由我口里听到的。至于莫斯科的态度，在事隔十个

月以后的现在，能否仍照前议，通过外蒙古予我们以援助，也没有人能确切说明。会中还有人认为，可能因外交形势的变动——当时我们约略知道日本正侵略内蒙压迫外蒙的事情——，苏联透过外蒙古援助我们的可能性，便不能不加以慎重考虑。

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多表示现在我们的着重点是避开战争，找寻一个能有较长时间休养生息的地方，到甚么地方都好，只是不喜欢这个吃糌粑的区域。他们虽然大多数表示支持毛的主张，但也没有否定我的西进意见。

我表示，现在我们的目的既然是避战和争取较长时间的休息，而苏联是否能通过外蒙予我们以有力援助又在未知之数，那我们就不如详细研究一下西进计划。也许到新疆去是上策，因为那里能获得苏联助力的成份较多，而且蒋介石的部队也不容易开到新疆去。

这就是后来中共记载中所谓北进和西进之争的主要经过。

会议一连开了三个多钟头，并未达成确定的结论。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毛泽东以主席的身份宣布：“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再从长研究吧！”不料毛的这句“从长研究”并未兑现，我们以后一直没有再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毛的北进主张便当作多数赞成，开始实施。这样解决问题的方式，也许就是中国人避免争端的办法，不过中共一向不是如此的，历来会议对重要问题，总是要经过确定决议的。这次违反常例，后来事实说明中共中央在我未到抚边前，即已决定了北进，可是并没有告诉我，只作一番形式上的讨论，

又不好公开否决我的意见，如此而已。

散会后，我回到住处。午餐时，我的秘书长黄超将一份中共中央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给我看。这份油印的刊物是中央到懋功后的第一次出版物，刊物上第一篇文章便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所写的《列宁论联邦》一文。这篇文章的大意说，列宁曾反对“欧洲联邦”，因此西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再则这个所谓西北联邦政府，也违反了中共中央的苏维埃路线，在此严重关头，居然提出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无异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我看了这篇文章，非常生气，我知道中共中央一到懋功就赶着出版布尔什维克报，发表反对我的见解的文章，这决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推测一定是中共中央曾经开会慎重商讨，决定“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才会由凯丰署名发表这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的论点立足不稳，列宁虽反对欧洲联邦，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面建立联邦是不正确的，但他并未根本反对联邦制。现在西北联邦政府，主要是承认西北少数民族的自治政府为联邦之一员，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上也提出过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个口号，这与列宁之反对欧洲联邦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慨叹中共中央的留俄人物，竟生硬的拿着列宁的教条来任意批评我。

黄超又告诉我，这份刊物是一方面军一个干部私自交给他的，中共中央在两三天以前发行了这个刊物，规定只发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看。我听了黄超这些话，心中更为不安。我觉得中共中央是不能将一、

四两方面军分开来看待的。通常如有人这样做，就要被认为是搞小组织的行动或者是违背组织原则。中央从前继立三路线之后，便是王明等米夫派当权——即王明路线。一九三一年春我在上海的时候，已曾有过初次的领教，现在又在懋功再度出现了。

恰在这个时候，张闻天来了。我将这份刊物给他看，并问他：“中央机关报发表凯丰这篇文章，用意是不是要展开西北联邦政府的辩论？”如果是这个意思，那我就准备做篇文章答辩，因为我觉得凯丰并未提到西北的少数民族，也没有确切表示赞成民族自治、承认少数民族可以自己组织单独的政府，他只是不顾实况生硬的引用列宁的话，来反对少数民族与汉族组织联邦政府的权利。

我又问张闻天：“这篇文章是不是根据中央的决定写的？如果是，为甚么不等我到了抚边，让我有机会参加讨论之后，再行发表？又为甚么我已到了此地二十小时，还不拿一份给我看？难道在中央机关报上可以随便公开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政治主张？通常是在一位政治局委员不服从多数决定，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才会有这样的事。我已公开提到西北联邦政府这个问题，而其他政治局委员并没有发表批评的意见，现在却在机关报上公开登载出来了，为甚么要这样做呢？”

张闻天避免答复我的问题。他虽担任中央书记的重任，但态度显得相当暧昧，他当时面色也非常尴尬。他为教条主义所束缚，仅说凯丰所引证列宁的话是对的，但也觉得这件事处理得有些不当。他吞吞吐吐的表示，现在一、

四方面军急须一致行动，不宜讨论这些引起争执的问题。他口头上称许我和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但又不愿用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褒扬四方面军。

我和张闻天的谈话还没有结束，周恩来走进来了，张闻天就乘机告辞。周恩来当时避免谈论党内有争执的问题，仅以军事委员会一个实际工作者的身份和我说军事问题。他拿一份电稿给我看，内容是：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除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主席外，加派张国焘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所有军队，概归军委指挥；原一方面军改称左路军，由彭德怀、林彪任正副总指挥，聂荣臻、邓小平任正副政治委员；原四方面军改称右路军，仍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周恩来说明这个决定在我未到抚边以前业已作出，现在不过是通令全军知照。我欣然表示赞成，认为这是我们会师后统一指挥的当然步骤。

当天下午，周恩来又拿着另一电稿来了，电稿内容是指挥军队行进的。内称：左路军的一、三两军由现驻地向毛儿盖集结，五、十二两军暂留大金川的党坝一带，右路军的第三十军由懋功北进到卓克基地区，仍以一部向懋功警戒；徐向前、陈昌浩即将茂县北川部队撤至岷江以西，暂驻卓克基毛儿盖以东一带地区；第四军仍驻松潘附近，但以毛儿盖为后方。各军均在指定地点，待命行动。

我看了这个电稿，当即表示：“上午会议结束时，毛不是说还要从长计议一下吗？但这个电稿无异是说今天上午的讨论已经终结了？”周委婉向我说这个稿子已经毛慎重看



过，其他政治局委员不愿在西康地区久留，也都赞成早点这样办。至于研究北进或西进，到了毛儿盖还可以从长讨论。我听了周的这些话，觉得如果我反对这个电稿，那就必须坚持留在岷江左右两岸地区，而我当时是不愿使自己与所有政治局委员对立的，因而向周恩来表示，既然大家都赞成，我自然不能独持异议。

当时一方面军经过长期行军，狼狈情形自不待言，纪律也很废弛，仅就我亲眼目击的两件小事，已可见一斑。我在五时左右和朱德等十余人在抚边街外散步，一方面军几十个战士正在围攻约有十余条的牛群，他们想射杀一条以佐晚餐，费了十余发子弹，才将这条牛射倒，其他的牛因受惊狂奔，引得许多藏人都在那里怒目旁观。

这件杀牛的事即成为我们的话题。朱德在那里叹息，一方面军的纪律是废弛了，为了杀一条牛，竟浪费十几发宝贵的子弹，而且这种杀牛的方法，只有引起人民的反感。我也说到这里的藏人通常有几十条或上百条的牛群，才算是富有的。如果只有十几条牛，可能还是一个穷人，四方面军一向只打藏族土豪的牛，不打穷人的牛。现在那些战士们所围攻的牛群只有十几条，是否属于土豪的财产亦大有疑问。而且四方面军已学到杀牛的方法，他们会引导牛群分开来，然后用绳子将牛拖倒，再行宰杀，那就一颗子弹也不费了。

晚餐时，又发生了另一件与牛有关、而且显系违犯纪律的事。秦邦宪的卫士提着一块牛肉到我的住所来，要求和我的通讯班换子弹，他们彼此因言语不通，引起了争执。

我的通讯兵向他说明这是违反军纪的事，四方面军的军纪是不准战士以武器弹药向人换东西的，即战士之间私相授受也是不准许的。秦邦宪的卫士在那里嚷着说，用牛肉换子弹是很公平的买卖，现在你们不肯，显然是四方面军的战士不把他当自己人，瞧不起一方面军，瞧不起中央等等。他就这样老羞成怒，一路叫骂着出去。

我听见他们的争执觉得好笑，但没有出面干涉。接着我的通讯连连长向我报告这件事的经过，认为一方面军的战士确是子弹太少了，因而他提议由这一班通讯兵抽出两百发短枪子弹，送给中央的卫士们，以免引起误会。我觉得这个连长很识大体，欣然表示赞成，他也就照这样做了。这件事秦邦宪知道了，他没作任何的表示，也许他认为这是无关重要的事。

饭后，秦邦宪找我谈军中政治工作的问题。他虽然做过三年中央的书记，也遭受过遵义会议的贬斥，看来历练似仍不多，说话直率倒是他可爱之处。他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小伙子，喜欢玩弄小聪明，仍不改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那种“二十八宿”的神气。他说起话来，满口这个同志那个同志，充分流露出莫斯科的韵味，我则多少保有点中国的传统风格，称呼各个同志往往照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前的习惯，如对毛泽东只称他的别号“润之”，对朱德称“玉阶”，有时，还在他们的别号之下加上个“兄”字，或者“老兄”。这使秦邦宪有些不顺耳，他撇开正题，质问我：“想不到你还喜欢称兄道弟？”他并且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惯，与中共布尔什维克的意思极不相称。

我听了他这种小题大做的质问，有点哭笑不得，我只得像教小学生一样向他解释一番。我指出称兄道弟是中国民间表现友爱的传统，与国民党军阀作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种称号表现彼此间的平等关系和亲切友爱，其意义是与“同志”相同的，因而中共初期也常称兄道弟。国民党军阀虽然也称兄道弟，但那里有甚么真正的兄弟之义。

秦邦宪这一箭落空之后，接着又来第二箭。他指出中央在军队中改正了官长与士兵间的阶级观念，而代之以同志的亲切关系。如军师团长改称指挥员，伙伕马伕改称炊事员饲养员等，而四方面军却仍援用军阀时代的老名称，有所谓“军长”“师长”乃至勤务兵，伙伕马伕等。特别是“勤务兵”的称呼会使他们有“马弁”的感觉，马伕的称呼会使他们感觉自己所做的是贱役，他质问我：“难道援用这些旧的名称，不会保留旧有的军阀观念吗？”

我继续解释，沿用旧名称不一定是保留旧观念，如果他详细去考查一下四方面军的内情，就会发现官兵之间是充满了同志友爱的。拿一个团部为例，团长团政治委员和他们的勤务兵马伕，生活完全打成一片，他们一道睡觉吃饭，彼此互称小名浑名，说话谈笑毫无拘束，这些情形在军阀的军队中是不可能有的。我们决不能因为四方面军仍援用旧有军队的名称，就认为它是保有旧传统。何况我们并未接到中央有关这方面的改革的命令，如果我们自己根据新概念制定一些名称，那可能与中央制订的有些出入，那末，今日我们在懋功相会，作为政治部主任的秦邦宪，便会以为四方面军妄立名目，迹近造反了。

秦邦宪自认“布尔什维克”只他一家，那里还会有第二家分号。他以为四方面军长期脱离了中共中央的领导，自然缺乏布尔什维克的气味，也自然是军阀了。他继续挑战，指斥四方面军的官长对士兵，仍采打骂手段，这就是军阀统治的象征，他曾看见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高声怒斥他属下的一名士兵，因而他认为四方面军官兵之间缺乏同志的友爱，官长对士兵缺乏说服教育的精神，所实行的自然是军阀统治。

我对他这种诬斥四方面军的说法，表示抗议。我指出四方面军官兵，彼此充满友爱和民主的精神，各连官兵不仅生活打成一片，而且一般士兵对于连内生活常常开会讨论，他们的意见，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官长爱护士兵已经蔚成一种风气，优待新兵，救助伤病兵等，都做得无微不至。我还举出一个事实来证明这一点：杨虎城部的一位代表，从汉中翻过巴山到通江来，经过我们在巴山的前哨连，目击前面的哨兵穿的是狐皮或羊皮大衣，而连长和排长则只穿棉袄裤，认为这是红军与军阀军队最大的不同点。

我也承认四方面军中仍有打骂现象，但这是个别的，并不是普遍的现象，更不能因此就认为是军阀式的统治。我指出红四方面军的打骂事件，在鄂豫皖时很少发生，到川北后有些增加，这与新兵太多和强迫戒烟等事有关。我也说到一方面军中也还有个别的打骂现象，但我决不因此就说一方面军是军阀统治。

我劝告秦邦宪不要有这些误解，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隔

阅，并建议他提出建设性的工作计划，决定积极奋斗的目标，增进两军同志间的谅解，纠正两军中的一些缺点。我着重地警告他，如果他企图根据这个或那个理由，指责四方面军是军阀主义，那是不公平和有害的。可惜秦邦宪没有接受我的意见，后来就在这些问题上，形成了一、四两方面军的对立。

接着张闻天又来了，继续我们午间未了的谈话。我们谈起党的工作情况，我照实告诉他一些四方面军中党的工作的实情，他却不愿多谈中共中央自一九三一年迁到瑞金以后的演变，仅向我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没有甚么不同的意见，从那时起，中共中央主要考虑的都是军事行动问题，大家都推重毛泽东主持其事，这次两军会合军事行动的命令又已发出去了，一切似乎都很顺利。

我则总括了到达抚边以后所经历的一切，向他提出概括的意见。我首先说到苏维埃和红军所受的挫折，不能都归咎于敌人飞机和大炮的厉害，这样认定的必然结论，将是中共命运注定了要失败。我问他为何不从政治上去寻求原因，例如苏维埃运动的政策是否正确等。我说根据我的经验，苏维埃和分配土地并没有能发动广大群众，倒是红军军事力量的壮大和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却能轰动一时。我问他有甚么理由肯定苏维埃政策一定正确，肯定西北联邦政府的政策一定不正确。

我继续指出，由于我们的政治观念僵化了，军事观念也就随之僵化。我们死守着一个公式，认定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和一切作为是正确的，无可怀疑的，只是敌人的飞机

大炮厉害，我们打不过，因而要避战，要到外蒙古去或到新疆去。可是一般同志可能不这样了解，他们会问在北川和茂县地区，我们有打击川军的机会，为甚么要退到岷江以西，集结到毛儿盖，又往那里前进？

我问张闻天，为甚么我们不从政治上去寻求解救的方法？难道政治方面就没有增强我们力量的步骤了吗？一九三二年我们到川北的时候，觉得我们的力量不能再打了，但我们补救的办法不是绝对避战，而是提出入川纲领、人民政府和其他政治办法，不久以前我们又提出争取建立川甘康新根据地的前途和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的主张。我着重指出，采取政治方法，甚至是让步的步骤，如对少数民族宽大和强调抗日等问题，在原则上不但应该允许，而且应该切实执行。

就因为这些情形，中央死死抱住苏维埃这个左的躯壳，实际执行的却是军事上极右的退却路线。这样，中央的多数同志自然就会觉得我的意见是多余的，甚至觉得张国焘是机会主义，红四方面军是军阀，甚么入川纲领、甚么西北联邦政府，都是大逆不道。可是，中央忽略了一些他们所谓的“小问题”，即无论走到西北任何地方，都会发生苏维埃旗帜是否适宜和如何处理少数民族的问题。

我再三强调党内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没有能够作适当的解决，目前中央又只注意军事行动，不谈政治问题，这是极可忧虑的现象。值得忧虑的是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遭受惨败，不易翻身，并将引起一、四两方面军的隔阂和党内纠纷。如果我们能根据实际情况，摆脱

既定公式的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许为时还不算太晚。

张闻天听了我的话，仍不作肯定的表示，只说政治问题须俟军事情况稍有转机时才能讨论。他也表示忧虑，深恐党内发生纠纷。他没有批评我的见解，只劝我忍耐，不要提出引起争论的问题。我们一直谈到深夜，没有任何结论。就由于张闻天这种拖延的态度，使事态在暗中恶化起来。

第三天清晨，抚边的要人们开始向毛儿盖移动，毛泽东因急于到毛儿盖去策划北进的事，先行启程，其他中委们也在当天陆续出发，我因为尚须处理一些事件，准备翌日前去。

就在当天早上，邓发找我谈四方面军建立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的事，他说政治保卫局的军中任务，是严防奸细、制裁反革命反党言行及维护军纪党纪。因此，中央政治保卫局在一方面军建立了直属中央的独立工作系统，从军师各高级指挥部直到连队，每级都暗中派有政治保卫局人员，名义上隶属各级政治部，实际由中央政治保卫局指挥工作。此外对干部还实行监视制度，各级干部的警卫员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训练的，平时保卫长官的安全，附带监督长官的言行，如遇长官有反动行为，警卫员得紧急制裁。邓发夸耀他的工作成绩，达成了巩固党对军队领导的任务，特别提到第七军长李明瑞在江西苏区企图逃亡，就是由他所训练并派到李明瑞身边的警卫员枪杀的。

我听了邓发的话，心中有说不尽的反感，认为这是会

使中共变质的行为。根据中共党章，党员是因信仰主义自愿入党的，中央是由党员选举出来的。现在由中央设置政治保卫局来监视党员的言行，那不就成了由中央统治党员的党吗？各种可怕的流弊均会由此发生，斯大林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他利用特务系统，统治俄共，杀害几十万同志，其中包括大多数的革命元勋。现在中共的斯大林门徒，也如法炮制，中共前途，势将不堪设想。

我平心静气对邓发说明了我的所见。我告诉他四方面军没有政治保卫局独立的工作系统。我们在鄂豫皖时曾研讨过这个问题，认为军事干部最大多数是党员，除正常的政治工作外，用不着派人监视。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和党的组织，就经常注意军中的政治状况（其中也有少数人兼任政治保卫工作），一般军官又有政治委员监督。如果再在各级军事单位中派些监视人员，在各级干部身边又派些警卫员，这在组织上是不合理的，也会引起被监视者的不安。邓发认为这是中央的既定制度，四方面军不能例外。他要求我介绍他属下的人员到四方面军去，立即建立独立的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并下令分批调集四方面军原任警卫员的可靠党员，交他训练后仍回原职。就为了这件事，我在抚边第一次说出了“不”字。我告诉邓发，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只是中央一员，并无权下命令。

午饭后，中央各要人都陆续走了，这使我松了一口气，因为在他们未走以前，他们车轮式的跟我谈，简直弄得我有些头昏眼花，而谈话的结果又多是令人不满意的。在军事计划方面，因茂县北川和懋功以南地区的放弃，失去了



向东向南发展的机会；而向北发展，又须到了毛儿盖以后才能作具体决定。在党内政治问题方面，议论虽多，但亦毫无具体结果。因此懋功之会，在我看来是失败了。

午后我才有机会与四方面军的干部接谈。由懋功北移到抚边来的第三十军的干部们，多对这次一、四两方面军的会合表示忧虑。他们告诉我，第三十军与第一方面军的林彪部初在懋功以南的大路上相遇时，双方是非常亲切的，中央各要人初次看见第三十军的时候，也曾多方赞许第四方面军，可是这种友爱的气氛，不两天就改变了。

四方面军干部们说的话，大致有这样几点：一、一方面军的干部总是说蒋介石的飞机和大炮厉害，四方面军还没尝过这个味道，当初一方面军的力量远较四方面军为强大，尚且不是敌手，何况区区的四方面军，我的同僚忧虑这种失败主义情绪，会影响四方面军的士气。二、一方面军的干部，有些发表诽谤我的言论，不是说我是老机会主义，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所不信任，就是说西北联邦政府这一主张，是右倾的具体表现。这一点引起了四方面军干部的反感，他们和我一道奋斗多年，他们的体验直接否定了这种诽谤。三、中央曾派遣一些调查人员到第三十军中去调查实况。这些调查者往往夸大第四方面军的缺点，特别是找到几个军官骂士兵的例子，就泛指第四方面军有浓厚的军阀习气。四、那些调查者往往利用四方面军一般干部只知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名字，而不知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名字这一事实，硬说第四方面军不尊重中央，甚至说，这是张某人故意这样干的。

第三十军政治部一位负责同志，曾将他与一方面军同志的谈话，记录下来交给我看。这份记录就包括了上述各点。根据这份记录看双方的对话，表示第四方面军的同志颇识大义，所有解释，入情入理，而第一方面军的同志则不免吹毛求疵，显有成见。我看了这份记录，觉得错误不在我们这一方面，也不在一方面军，只是中共中央的领导有了问题。当时中共中央的同志与第一方面军是混在一起的，因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分辨不清，认为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机关。我所遇到的同志们对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或多或少表示失望。他们多说到四方面军一般战士，以前对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都信仰得了不得，如今会合接触，便觉得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指责第一方面军纪律废弛，乱打土豪，对藏族的态度不好，一路他们都看见过打骂藏人和私拿藏人东西的事情。也有人对中央少数人坐轿子的事表示不满，认为这是不爱护战士的表示，甚至有人说中央对第一方面军的领导是偏重于控制。

第一方面军也有些人不满中共中央的领导，往往私下向第四方面军的熟识同志透露他们的意见。他们描述此次长征，中央领导着第一方面军，一路都是避免战争，养成了一种丧失斗志的心理，如今还不知跑到那里去？他们大致认为，“我能往、寇亦能往”，不能老是乱跑，应使全军得到休息整理。他们希望一、四两方面军精诚团结，不愿因中央的偏见损伤彼此间的关系，这种爱党的热忱，促使他们希望四方面军的干部们，能够拿英勇奋斗的精神，去影响中央这种颓唐的气象。

有人直率指出中央急于控制第四方面军的意图，当中央要人们初次看见第三十军的时候，也曾一时兴奋，但四方面军所表现出来的气象，旋即引起他们的不安。因而中央一到抚边，便举行政治局会议，大致决定下列各点：一、为了不使四方面军瞧不起中央，中央和第一方面军的所有同志，不应向四方面军干部说起一方面军的不幸遭遇、和中央内部有过的纠纷等等，只应说中央和第一方面军过去有过的好现象。二、四方面军远离中央，由机会主义者张某领导，那里会合乎理想，因而决定在布尔什维克报上发表文章，批评西北联邦政府，一面派人考察四方面军的内情，以坐实他们的军阀习气。三、与张某会面时只谈军事问题，不谈政治问题。改任张国焘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实际由中央直接指挥第四方面军，立即实行北进。

我把同志们所告诉我的故事，与我这两天来的亲身经历互相印证，大体都是事实。我觉得中共中央由于苏维埃政策的错误，招致了军事失败，如今只有乞怜于控制手段。我也觉得这是毛泽东等老游击家和张闻天秦邦宪等留俄派，联合一起对付我的局面。我相信我有责任纠正那些同志的错误，挽救中共的失败。我相信在此严重关头，不宜爆发党内争论，内部一致高于一切，也觉得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其中也不乏深明大义的人，如朱德的态度就是好例子。我要尝试一下用较温和的办法，来谋取改革的实效。

因而我向四方面军的同志们表示，中共中央经过长期艰苦遭遇，可能已形成一些错误观念，如今我参加中央工作，可以力谋改善。我们应在党内团结和一、四两方面军

密切合作的前提下，提供我们的意见。同志们也不可对集中毛儿盖准备北进的军事计划，过分表示怀疑。因为，即使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也比党内发生纷争要好些。我劝告同志们冷静忍耐，以便我有转圜的机会。

第三天清晨，我摒挡一切，也向卓克基出发了。我们从历年错误政策中和游击战争中所积累下来的毒瘤，从此日渐发作，而懋功三天之会和我此后较温和的努力，事实证明是药不对症的。

- ① 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动时，我和朱德在广东东北的梅县三河坝分手，从此，他即带着一千多人的部队，在粤赣边区打游击。一别八年，至此我们才重逢。
- ②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新疆盛世才部撤回迪化，马仲英即通电拥刘文龙为主席，要求盛世才退出迪化，盛世才敕平马仲英叛变的战事就这样发生了，一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盛世才获得苏联的支持，才把马仲英打败。

## 第三章

# 毛儿盖会议

党内歧见迅即发展为全面性，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指责中央的领导不正确，中央的多数人则坚持中央的政策完全正确，不稍让步。毛儿盖会议原是企图弥缝歧见，但又因中央多数过份坚持己见而宣告失败。这就使党的处境更形恶化。

中共中央多数以毛泽东为首，原冀迅速北进，但因川甘边境情况不明，胡宗南部控制了松潘及其以北一带要冲，我军不易顺利通过，所以在卓克基北部地区停留下来。他们一面命令先头部队查明北进道路，一面电令徐向前陈昌浩等四方面军的重要干部赶来会晤，以解决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四方面军的一些实际问题。

我离开抚边到达卓克基东北中央驻地时，我的住处竟被安置在离其他中央委员宿营地有好几里路的村庄上，没有甚么中央的人来找我。我似是已被贬斥了的人员。我保持冷静，一切不闻不问，乐得暂时休息一下。不两天，徐向前陈昌浩等四方面军的干部们陆续赶来了，他们都来看我，我告以抚边会谈的一些实况，并要求他们服从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直接指挥。

当时，由于一、四两方面军的干部接触较多，双方隔阂日甚一日。一方面军干部不但抹杀了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经历，而且作了各种不必要的批评，如说四方面军脱离了中央的正确领导，不免有军阀习气等等。四方面军干部也忽视一方面军的光荣纪录，同样作些不必要的批评，例如说他们丧失斗志等等。这些批评激起了感情作用，在感情冲动之下，一切是非黑白反而模糊了。

这些现象的形成，显然中共中央要负责任。他们没有充分认识中央现在是寄居在军队之中，任何党内歧见都易转化为两军之间的隔阂。他们北进之心太急，一切草草了事，忽略了使两军互相了解的必要。他们对中央的威信估计过高，忽视了一般同志的不满情绪。

四方面军的干部纷纷向中央质问，其要点大致是：为甚么中央要急于北进？为甚么放弃茂县北川和懋功以南一带向东南发展的据点？何以见得在这一带多留几天就会被敌人封锁、成为瓮中之鳖？为甚么不抽出时间好好开几次会议，将一切问题讨论清楚？为甚么不先了解四方面军的情况，就批评它的领导？一、四两方面军初会，为甚么不让两军干部互相了解、互相学习？为甚么中央要在一方面军干部中散布不满四方面军的闲话？这一类的问题都是中央要人们不易解释清楚的。

因为这些问题得不到解答，他们进而批评中央歧视四方面军、不将它当作嫡系部队；中央领导有了毛病，因而做事章法很乱；北进是逃跑，“我能往，寇亦能往”是人人皆知的简单道理，这不过是牺牲军队，让少数人逃到外蒙

去的做法；中央批评四方面军的领导，无非是偏见作祟。四方面军干部特别反对中央对我的歧视，表示只有我能代表四方面军多数同志的意见。

张闻天和秦邦宪等利用他们与陈昌浩在莫斯科同为“二十八宿”的关系，坦率的问陈昌浩：“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者，为甚么四方面军的干部不追随中央而要追随张国焘？”陈昌浩告以过去对张某的批评是不公道的，张领导四方面军，不仅正确有功绩，而且为一般同志所爱戴，如果中央歧视张国焘同志，将引起四方面军的重大反感。这些留俄派的分化活动，就这样不能收到实效。

朱德等觉得事态严重，乃从中调解。他也坦率承认这次两军会合没有弄好，主要是由于北进的决定太促，两军没有互相了解融洽的机会，以及中央有些人任意批评等等。他忧虑同志间的隔阂将影响军事指挥，甚至要给未来军事行动带来不良后果，因而他提出了军事统一指挥的方案。

军事统一指挥方案的要点是：强化红军总司令部的机构，由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负责指挥全军。以后关于战略问题由总司令部拟定，提交军事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核准施行。这个方案并未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讨论，仅以政治局委员一致同意的名义发表出来（中央政治局当时不愿举行会议，似是避免谈到政治问题）。我为了团结，也就欣然就职。由于这个方案，使这个酝酿中的风潮，暂时和缓下来。

我们内部的气候是改变了。团结一致一时是高于一切的要求，中央要人中有人向我和四方面军的干部们恳切表

示，他们已经相信我在四方面军中的威信是多年奋斗的自然成果，不是与中央对抗或抹煞中央而形成起来的，此后，将互相信任，共同策使工作进行。我也在四方面军的干部会议上发表演说，号召团结。可是这种团结的气氛，并未能抑制少数人根深蒂固的偏见，统一指挥方案立即又遇到了实际上的障碍。

我开始在总司令部和朱德一道工作，原来朱德这个总司令不过徒拥虚名，只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一员，并无独立的职权和机构。我加入进去之后，也并未根据统一指挥方案予以调整，一切仍如旧贯。中央军事委员会和总司令部名虽为二，实则仅为一个机构。参谋长刘伯承，副参谋长叶剑英、左权，作战局长张云逸等均无变动。只有总政治部代主任秦邦宪不愿继续代理，改由原任副主任的李卓然（留俄留生）代理。原隶属于我的军分会人员，概行并入右路军总指挥部，以增强他们的领导。我们——总司令部——拟俟他们改组完成之后，再行酌调一些人员参加总司令部的工作。

我当时最注意的是一、四两方面军的团结，因而我任总政委以后，立即下令由右路军四个军中各抽调一团补充左路军，使一、四两方面军互相了解，彻底合作。这个措施确曾引起同志们的兴奋。左路军得到这四团的补充，不仅人力增加，尤其是这四团都带有较多的子弹，可以使左路军得到不少助力。这也是左路军后来战斗力增强的一个主因。我之所以不积极改组总司令部，也不立即调用四方面军的人员参加司令部工作，也是示人以无我的精神，使



今后工作进行，能够团结无间。

我要求中央军委和总司令部职权划分，工作程序确立。所有原中央军委机构概属总司令部管辖，各单位直接秉承总司令总政委之命处理工作，一切军事命令都由它下达。中央军委原属中央政治局，对总司令部居指导地位，负责审查核定总司令部所拟的军事计划和重要人事变动，不再直接发布军事命令。

可是，毛泽东破坏了这个统一指挥方案。他这个军委会主席过去是独断一切的，总司令等于虚设，现在他仍不稍变动。他迳行核阅所有军事单位的文件，无论是情报、作战计划、军队行政，以至人事调动等，同时又迳行批定办法，然后才交我们执行。这不特使总司令总政委变成了幕僚人员，简直就是由他一个人唱独脚戏。

毛泽东这种作风最为参谋长刘伯承所反对。刘伯承认为近代战争是有组织的战争，不能凭一个人的才智去处决。他素来主张，作战计划应先由参谋长根据情报局长所提出认为正确的情报，交作战局拟具方案，再由参谋长召集有关人员并征询政工人员的政治意见，拟定初步计划，送总司令总政委批准，提交军委会讨论，或径由军委会主席审定，然后由总司令部下达命令实施。我支持刘伯承这一见解，认为我们如能这样做，不仅可使军事指挥具有更高的效率，而且可以免除许多党内纠纷。

毛这种独断独行的作风，似已成为积习。在这点上，他和蒋介石一样，不唯紧紧握着裁决权，而且有发号施令的欲望。换句话说，他不特执行最后的决定权，而且往往

不让任何同志有建议的机会，就径行予以指示。毛自负有过人的军事天才，常以德国近代军事家毛奇自比，他在江西苏区时就曾因此和周恩来刘伯承以及德籍军事顾问李特闹得不可开交。遵义会议以后，周恩来做他的副手，也是受尽委屈。

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并不是一个精明的独裁者。他富想像力，反应也非常灵敏；他的思维有时也会走到很离奇的境界，甚至流露出神话式的言论。他缺乏组织才干，遇事不愿作精确的计算。他所表示的意见，有时是模糊不清的。他常用情感丰富的语气，为他的“天才主张”作辩护。

他也是特殊的军事第一主义者。他推崇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缺乏近代的军事知识。他鄙薄当时军事典籍所载的一切，认为都是陈腔滥调，他要不受拘束的发挥他的游击天才。他所拟具的军事命令大多是一些“训令”，常用激动的语句，描述某一任务的重要，要求受令者迅速执行，而指示各个军事单位分别负担某些具体任务时，则常是很笼统的，似是让各单位自行相机处理。

一般说来，我们当时都是一些游击专家，多少与毛泽东有相同的气质，不过他在这方面发挥得最明显，连我们都有点觉得他太离谱了。我曾多次和他谈论这方面的问题，觉得要与他沟通军事上的见解极不容易，特别是想形成有组织的统一指挥，更是困难。

毛泽东不仅不遵守军事统一的指挥方案，而且发动对四方面军的批评攻势，这就使各项调解努力均无成效。中央政治局突然通知召开政治局和军委会的联席会议，讨论

内容我事先毫无所知。与会人物除两机构的委员以外，尚有徐向前陈昌浩和军委会的主要参谋人员。主席毛泽东宣布开会后，即请徐向前报告四方面军的军事状况。徐向前当即发表了一篇朴素的报告，其内容除了我在上面已经说到过的四方面军的情形外，他还就四方面军战术方面的优点和劣点，加以补充。他的报告，不仅没有一句话牵及党内歧见，而且态度公允，措词坦率，充分表现出共产军人的典型风格。

毛泽东听了徐向前的报告后，不再详究，即开始批评。他指责四方面军在军事上犯了两大错误：一是放弃了原有的川北苏区，没有留置足够的兵力和强化游击部队，保卫那个基地；二是没有使用足够的兵力控制战略要地松潘，致令北进计划受到重大阻碍。他不仅没有一句话抚慰四方面军多年的艰苦奋斗及其策应一方面军的努力，而且径直要求会议接纳他的检讨意见，作为定案。

我当即起而答辩，指出川北苏区固应保卫，松潘亦应当控制，但这决定于四方面军的力量，而非决定于主观愿望。我并且说明，我们当时的主要努力是策应一方面军，而我们的兵力有限，不能过份分散使用。如果中央并不以为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的行动是多余的或错误的，就不应苛责四方面军不能完成力不胜任的其他军事任务。川北苏区即使当时留置了较多的兵力，事实上也不能达到保卫的目的，而一方面军当时能否渡过大渡河顺利到达懋功，尚成疑问，四方面军果真全力北向夺取松潘，中央不会批评我们隔岸观火，看轻忧戚相关的大义？

我的发言只有陈昌浩附和。毛泽东仍坚持己见，他似乎是为批评而批评。其他的到会者始终不表示意见，似乎无人愿意卷入这个争论的漩涡。那次会议并未形成决议，只是充分暴露了毛的企图。

那次会议的经过更激起了四方面军的愤怒，有的认为中央始终歧视四方面军；有的主张作一次全面的检讨，不仅要检讨四方面军，也要检讨一方面军，更要检讨中央的领导是否正确；有的表示中央的所作所为不公平、偏私和感情用事，其目的无非是玩弄打击四方面军的手段，来掩盖它领导的失败；有的忧虑失败主义笼罩了中央，除了制造党内纠纷外，不会有甚么新生之路。

这样，我们在卓克基耽搁一个多星期，一切情况都未可乐观。中央在避谈政治的烟幕下，继续从政治上打击四方面军及其领导层，引起四方面军干部的不满。两军的关系不能改善，北进的军事行动也陷于停顿。我曾提议由四方面军担负进攻松潘地区和打开北进道路的任务，但毛不表赞成。他信赖叶剑英，率领林彪的一部份部队，试图占领北进的通路，可是疲劳未苏的一方面军，又无力迅速达成任务。

中央机构和军事首脑部门旋即北移到毛儿盖，但北进的路线仍未查明，还须等待一些时间。我于是主张利用毛儿盖停留的几天来澄清党内的歧见。我所建议的要点是：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检讨党的全盘工作和当前军事问题；由政治局召集两军高级干部会议，统一意志并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政治局果然不得不定

期举行会议，这是我们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唯一的一次正式会议，后来中共称之为毛儿盖会议。

政治局会议举行的地点是在中共中央机构驻扎地、离毛儿盖约二十里的沙窝。这里四围皆山，山上树林茂密，山沟中有一个藏人的小村庄，自成天地。当天晚上七点钟的时候，我和陈昌浩偕十余骑兵由毛儿盖附近策马赶去参加会议。我们到达沙窝山口时，张闻天已在山口外迎候，他告诉我们：“这是一次秘密会议，陈昌浩不能参加。”我虽指出陈昌浩系中共中央常委，可以列席会议，但他仍不接纳。于是陈昌浩只得暂驻在山口外放牛亭里休息，等我会后一同返回原驻地。

我和张闻天还有一个跟随我的卫士，步行进入山沟，沿途通过好几道岗哨，哨兵使用特殊口令，显得戒备森严。当时中央机关另设了一个中央纵队司令部，负责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当晚全村周围警卫密布，如临大敌。我笑着向张闻天说：“中央机关自行警戒得如此严密，那就不用着总司令部耽心它的安全了。”张闻天听了我的话，面色显得有些尴尬。

会场设置在一间喇嘛庙的外亭中。到会者有毛泽东、朱德、秦邦宪、张闻天和我五个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王稼祥二人因病请假），列席者有邓发、凯丰二人，另由中央书记处秘书长王首道担任记录。会议开始后，毛泽东便拿出一份预先拟好的决议草案交给我看。

这个文件不很长，要点是：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已获得重大胜利，红军在反

围剿中也获得重大的胜利；中央在过去一个时期中曾发生军事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已经适当的将它纠正过来了；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所执行的都是正确的路线；全党全军都应团结在中央的周围，继续为苏维埃中国而奋斗。

我读完这个文件，递交给其他到会者阅看，他们回答已经看过了。看情形他们不仅看过，也许还讨论过，只我一个人不知道罢了。会场气氛，好像有些紧张，每人的面孔都是冷峻的，当主席张闻天请大家讨论时，竟无一人发言。当晚会场外警戒的森严和会场上同志们的紧张表情，使我想起了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sup>①</sup>。

我第一个发言，为了要转变这种气氛，语调甚为轻松。我表示我们之间发生歧见，是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梁山泊的好汉不打不相识，争争吵吵并无关系；我们都有多年奋斗的经历，寻求谅解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而我们的目的，本来就是想要获致谅解，并不是要扩大分歧。

我惋惜我们没有在抚边初会面时，就痛痛快快地把问题谈清楚，因而酿成一些不必要的隔阂，甚至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言论。譬如有人说张国焘是军阀，要凭借军事实力要挟中央；也有人肯定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或者说张国焘自视资格老，瞧不起所有政治局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的名义之下，摧毁整个中央；也有人引经据典的说西北联邦政府反叛苏维埃；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完全抹煞军委会主席和整个中央的职权等。凡此流言，似乎把我描绘得不成样子。

我说到这里，毛泽东插言说：“这种流言是很多的，譬

如有人说我是曹操，中央成了汉献帝。”接着他又表示有人相信中央的政治路线错了，现在只是用军阀官僚的手段来统治全党全军，这次会议正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继续发言，指出政治路线可能是错了，也可能是共产国际错了，也可能是我们执行错了，也可能是时移势易而必须改变。但是，我们要求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决不等于推翻整个中央。我认为我们都经历过惊人的艰苦奋斗，都为共产主义卖过一番气力，党不能舍弃我们，我们也不能舍弃党。第六次大会的时候，就有人说犯过错误的同志，仍是党内最好的同志，而且这样的同志，现在更加少了。因此，我们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不要把责任问题牵连在一起。

对这个预拟的文件我提出批评，并提出我的建议。我指出这次会议，也许不宜冒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但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所有苏区都丧失了，红军遭受重大的损失，我们退到了藏族地区，这些失败的事实是无法否定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飞机大炮的厉害，也不能当作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我认为，主要还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有些倒果为因。

我讥讽这次会议如此严密，而且预先拟好了决议草案，不但是故作神秘，而且会妨碍彼此间自由交换意见的机会。我要求将这件预拟的草案暂行搁置一旁，先不受拘束的加

以检讨。我希望同志们不要用有色眼镜来看我们提出的意见，不妨先就事论事研究一下。

为了统一党内的意志，我主张召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并说明我在鄂豫皖和川北时，曾屡次举行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成绩都很美满。特别是现在一、四两方面军的干部互有隔阂，对中央也有不满，这样，扩大的会议更有必要。我们不用惧怕这种会议，认为一定会吵架散场，如果我们现在研究好一致的意见，提交高级干部会议讨论，解释一些过去的误会，嘉许两军奋斗精神，提倡互相学习，反而会收团结的实效。

中央应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工作，这可以巩固中央的领导作用。我指出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也不全是六次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朱德均非六次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委），非中央委员列席政治局会议更是常有的事。如果我们从一、四两方面军遴选少数干部列席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军委会和其他中央机关的工作，将有百利而无一害。譬如我自己是中央一员，但常被视为是第四方面军的代言人，我们为何不让四方面军的干部，直接向中央表达他们的意见？

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和吸收新人参加中央工作，只是实施党内民主，并不是甚么推翻中央领导的阴谋。我说明我提议的高级干部会议，其职权可以从长计议，它的作用，有时可类似于中央扩大会议，有时则只向中央提供意见。现在中央事实上与全国各地组织隔离了，实际只是指导一、四两方面军，因而由一、四两方面军的干部组成高级干部



会议，是合法的，也是必要的。如果有人过度敏感，以为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将由四方面军的同志占多数，不免是想入非非。我可以声明，四方面军的同志决不会在高级干部会议中要求占多数，只是想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而已。

最后，我着重指出，实施党内民主，将使党内各项歧见易于解决。例如军事行动问题，经过一次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以后决定下来，将来在执行时可以表现更大的决心与信心；反之，如果中央拒绝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不让新人参加中央工作，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问题也不让同志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这就无异阻塞了团结之路。

继我发言之后，到会者纷纷表示支持这份预拟的决议草案，其中仍以毛泽东说话为最多。他首先表示苏维埃运动的政策是共产国际决定的，经过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决不能说它错误。他强词夺理的硬认苏维埃运动是胜利，不是失败。他表示如果我们现在说苏维埃运动失败了，将使一般同志失望。而且今后无论到甚么地方，也要将这面苏维埃旗帜高举起来。

毛泽东更拒绝了我的全部建议。他表示中央是全国的，不仅是一、四两方面军的，因为还有二方面军和全国白区秘密党的组织，因而中央的政治路线，不能由一、四两方面军来检讨。他反对举行任何性质的一、四两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也拒绝任何同志参加中央工作。他认为现在是在军事行动中，不能谈甚么党内民主，一切只有以中央的命令行事。

我们虽各持己见，但仍互相要求谅解。那次会议的重

大缺点是：没有人提出在政治上的做法，连我这个反对中央政治路线的人，也没有从积极方面提出主张。我们曾谈到抗日问题，但没有人说到应将苏维埃的现行政策，改为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们没有想到可以在抗日问题上找到我们的救生圈。会议上有人提到一九三二年中央曾发表北上抗日宣言，要求全国各军队停止进攻红军、一致抗日。但我们都相信蒋介石不会因这个“一致抗日”的口号，就停止对我们的进攻。

不料正当我们为苏维埃运动政策是否正确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斯大林在莫斯科已经悄悄放弃了这个“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法宝，使出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武器。一九三五年夏季，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七次大会，主席第米特洛夫在他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殖民地应建立反帝的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中国要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接着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sup>②</sup>，主张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由于毛泽东等死守着教条不稍让步，会议终于无功而散。那次会议没有讨论到军事问题。我曾声言，只要党内政治问题获得适当解决，军事计划上的歧见也就不难冰释。但我的话未为到会者所重视。会上没有人再提起西北联邦政府问题，显然对少数民族政策无人感觉兴趣。看来这次会议的性质专是处理内部争端问题，但内部争端也未因这次会议而获得解决。不过毛所提出的决议草案也未付诸表决，大概是因为不愿会场空气过份紧张罢。

深夜三时左右散会之后，我步出沙窝山口，与陈昌浩会晤，并告以会议的经过。陈昌浩非常难过，很激动的问我：“为甚么中央这样顽强的抹煞四方面军一般同志的意见？如果你进一步明确宣布中央政治路线完全错误，中央领导破产，将会发生甚么后果？如果这样做，是不是会逼使中央让步？”

陈昌浩这些问题，更加引起了我的许多感触。我想起近代史上太平天国以及国民党内争的往事，总觉得中共不应重蹈它们的覆辙。我慨叹中共中央在挫败中酿成了颇深的自卑感，竟固步自封，不敢与一般同志交换意见。我并不后悔我所采取的较为温和的态度，因为大敌当前，如果内争激化，无异自取灭亡。就由于这些心理因素，我和陈昌浩仍然主张继续采取寻求谅解的态度。

翌日，陈昌浩便约张闻天恳谈，用意是想劝张闻天接纳一些我所提出的意见。在座适有一位四方面军的军长，他听了这些纠缠不清的谈话，颇感不耐，因向张闻天坦率表示：中央领导错误，他这个党员再也不信任中央了。张闻天立时面红耳赤，出声不得。陈昌浩随即加以解释，这不过是党员个人的直率表示，请张闻天不要介意，但后来张闻天即据以指斥四方面军是军阀集团。

我也曾访问在疗养中的王稼祥，希望他能发挥若干斡旋作用。他在江西苏区时，为敌机炸弹所伤，洞穿了大肠，经过手术治疗，用橡皮管接通腹部排泄，从江西直到这里，都在担架上过生活，一直靠鸦片来减轻他的痛苦，当时他已经是一个身体瘦弱的大瘾客。朱德当时正为自己无力调

解而懊丧，力恳王稼祥出任鲁仲连的角色。王虽系留俄学生，但教条主义的气味并不浓厚，而且在休养中也较能冷静的考虑问题。

王稼祥向我表示愿尽全力，调解党内歧见，认为没有甚么不可以谅解的。他指出我和四方面军同志先后向中央所提出的要求，都是可以理解，大多是合理的。他要求我暂勿批评中央的政治路线，留待以后再行检讨；现在先设法举行一次比较扩大的干部会议，吸收四方面军少数同志参加中央工作，以期党内意志渐趋一致，军事行动也能顺利进行。我鼓励他的这种努力，但后来也没有甚么结果，原因何在，我就不得而知了。

军事情况更是严重。由于我们放弃了茂县北川和懋功以南地区，敌军虽无继续进逼迹象，但我军已处于不利地位。毛儿盖、卓克基一带地区是半耕半牧的藏民集居之所，人口较少，粮食不足。如果我军在这一带停留久了，就会发生供应短缺的问题。我们从抚边往卓克基到达毛儿盖，已费了三个星期以上的的时间，当时已是七月间了。我们如果再停留下去，敌方更会调集较多兵力，封锁我们，不让我们走出这个区域。同志们对于这种军事行动的停滞不前，更为耽心。

为了挽救这样的局势，我终于提议暂行搁置党内歧见问题，专力寻求军事出路的办法。我提议红军全部迅速进入甘南岷县临潭一带地区，再依情况决定北进或西进。总司令部率领现驻毛儿盖以西的原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两军，经刷金寺北进，为全军左翼；徐向前、陈昌浩率原

四方面军为全军右翼，抑制松潘及其以北之敌。彭德怀、林彪率所部为中路，掩护中央各机构；董振堂、罗炳辉率所部殿后。所有各军均进入战斗准备地位，听候总司令部命令行动。

我所提出的军事计划，显然合乎当时情况的需要，且自认是大公无私顾全大局的想法。我军在这一带，万万不能集中在一块窄小地区，为地形、房屋和粮食供应的限制所束缚。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的左翼军要通过一片草地，行军的障碍自然很多。徐向前陈昌浩的右翼军担负着对敌作战的任务，只有原一方面军所负担的任务，比较轻而易举。中央机关的安全，也在这个计划中完全照顾到了。

毛泽东等人很高兴，赞成我的计划，一般同志也引为欣慰。大家似觉得北进的军事行动，并未因党内歧见停滞下来，也有人觉得中央各巨头聚集在毛儿盖，貌合神离，相持不下，究竟不是一个了局，现在分开行动，无形中免除了一些是非。我和朱德偕参谋长刘伯承以及少数参谋人员立即西行。从此，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军事方面去了，毛儿盖会议所没有解决的党内争执问题，也就暂时搁置下来。

- ① 刘邦破秦，入咸阳，自知实力远不及当时的项羽，乃还军坝上，以待项羽。项羽听到刘邦定关中的消息，果率大军至新丰，召刘邦宴于鸿门，由部将项庄在席前舞剑，拟乘势杀害刘邦，这是一个紧张惊险的场面。不过刘邦终于乘机逃去了，这就是所谓《鸿门宴》的故事。
- ② 《八一宣言》全文见胡华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二六三页至二六九页——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一年第九版。

## 第四章 分裂

毛泽东等破坏了中共和红军一致行动的最高原则，私率一、三军团单独行动，结果造成中共和红军的分裂。历史如系事实的写照，应大书“毛泽东分裂了中共和红军”。但中共的记载却说那次分裂应由我负责，这是颠倒是非的说法。

一九三五年七月间，我们总司令部由毛儿盖西行，翻越一座大山，折而向北，费去约五天的时间，到达刷金寺。这一带山峦起伏错综叠杂，山谷中溪流很多，北流者入黄河，南流者入长江。刷金寺便位于黄河水系的支流上。我们在这次旅程的最后三天，通过一望无际的草地。在我们行军的经历中，这还是初次尝试。

这一带还只是西草地的边缘，漫山遍野都是青草，五颜六色的花朵点缀其间，确也壮观。所经道路都是由畜群践踏而成的小道，往往是几十条小道平行着。河流没有经过人工修理，顺着地势弯弯曲曲到处泛滥；每遇天雨，较低洼的地方便成泥沼。我军通过那些泥沼地带，人马稍一不慎，便可能直陷下去。

这个草原上每隔三百里左右，总有一座著名的喇嘛庙，

庙的周围有几十上百的喇嘛住宅，间或也有少数民房和商店，形成一个村镇。喇嘛庙似乎是社会的中枢，它是藏民拜佛的圣地，也是一切政治社会活动的中心。藏汉人民的羊毛粮食等货物都在这个村镇里交易。草原上丛林山洼地带，常有一些牧民用木材搭成的牛羊棚，供人畜休息和过冬之用，平时，牧民只是逐水草置帐篷而居。

我军通过草地，主要是与自然困难作斗争。我军战士虽有携带三天以上干粮行军的成规（一方面军原无带干粮的习惯，会合后也跟我们会了），没有遭受饥饿的威胁，但沿途宿营，却是一个莫大的困难。喇嘛庙固可借用，但每隔三四天的路程才有一座，而我们露宿的工具，又极不完备。病兵掉队者为数颇多，不易救助，往往不得已而遗弃他们。一般战士对于这些遭遇，颇感不快。

我们在刷金寺停留了两三天，积极查明北进道路。这一带的地形，我们是十分陌生的，原有地图又错误百出，一切须从新考察研究。刘伯承参谋长费了很大的气力，广询当地人民和喇嘛，才拟订了一个北进略图。

我和朱德于是根据刘伯承所提供的资料，下令全军北移，以甘南的岷县临潭一带地区为目的，各单位所担任的任务和行进路线都有明确规定。其中最主要之点是：徐向前陈昌浩所率两军应先行进袭松潘北面之敌——胡宗南部，打开右面的北进通路，并保障全军的右翼。

我们总司令部率部按照计划，由刷金寺向上下包抄前进，不料走了一天之后就遇着大雨，我们深恐为水所阻，积极冒雨前进，夜晚支起军毡作帐篷，露宿在水地上。果

然，第三天下午，玛楚河上游的一个支流，横阻在我们的前面，它原不过是一条小河沟，深不过膝，现在河水陡涨，深逾一丈，宽达三百米，我们无法通过。看形势几天之内河水没有退落的可能，附近百里地区以内，又找不出任何渡河工具，而我们的干粮又吃了大半，我们无计可施，乃决定回师刷金寺。

我们把为水所阻的情况，电告毛泽东等和其他军事单位；并电令各军暂停前进，俟总司令到达刷金寺后，再定下一步骤。我们花了三天时间回到刷金寺，归途中雨虽停了，但部队显极疲劳，疾病增加，非休息一两天不可。

就在我们为水所阻的那一天，徐向前陈昌浩率部攻下了松潘北面约一百里处、胡宗南部驻守的一个要塞，守军一团，大部被歼灭，残部逃松潘，我军北进道路已完全畅通无阻。

我们回师刷金寺的当天下午，接到徐向前陈昌浩的急电称：“一、三两军团违抗总司令部暂停前进的命令，私自北进”。接着他们又来了好几个电报，其大要是：毛泽东因徐陈已打开北进通道，左翼又为水所阻，不能再事等待而坐失良机，竟自动直接下令一、三两军团，以“北上先遣队”名义，单独向北挺进。毛等此次行动，完全是秘密的，事先并未通知徐陈等。

徐陈来电中还描述毛泽东此次行动的不当，谓先一天晚间，中央各机关和一、三两军团乘夜秘密移动，一、三两军团原担任的对敌警戒任务，未作交代，就撤守了，使四方面军的某些驻地完全暴露，易受敌军攻击，等到徐陈



发觉了这件事，一、三两军团的殿后人员，才告诉他们这次行动是奉有中央的直接命令的。

毛泽东等的这次异动使我们为之大哗。我们在刷金寺的有些同志坦率指出：这是毛泽东使出了金蝉脱壳的诡计：他利用四方面军经过重大牺牲所打开的北进通路，悄悄溜走，再也不管其他大多数同志和军队；他使用北上先遣队的名义，暗中挟带着中央机关和各要人，要蒋介石误认中共重心仍在毛儿盖，进攻的箭头不会指向他那个支队。毛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失败观念支配了他，二是“宁肯我负人，不肯人负我”的权谋思想在作怪。就由于这种心理因素的主宰，所有共产主义的原则和道义观念，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只有毛泽东会玩这一套，现在看来，两军会合后，他所玩的尽是权术；死硬的幼稚的教条主义者，不过是供他利用而已。

我和一些负责同志冷静考虑之下，认为这样的分裂行动是不对的。红军各单位分开行动，中央随同任何一部分红军行动，虽是常有的事，但总该根据计划，顾到全局，而且对内不应守秘；尤其是在党内有歧见的时候，更不应这样做。如果毛泽东等事先将单独北进的行动，告诉徐向前陈昌浩，或事先与总司令部商讨，他们决不会受到阻拦，也许还可以得着较妥善的处理。如今毛泽东等私撤防线，秘密北进，显然是不顾大局的自私行为。

朱德也同样认为这种秘密单独行动是不应当有的，因为这不仅没有顾到党的团结，而且抹煞了总司令部的职权，也没有照料到徐陈部的安全。但他以毛等进到甘肃地区以

后，蒋介石还是不会放松为理由，希望一般同志，仍能大事化小事，弥补这个裂痕。

总司令部旋即电令各军事单位力持镇静，并指出毛泽东等的行为虽破坏了党内团结的原则，但对军事行动还不会发生不良影响。各单位应将当前敌情迅速电告，总司令部将在刷金寺停留三天，以便根据变动了的情况，决定今后军事行动的步骤。

第二天我们接到徐陈来电，谓林彪曾电告他们，北进途中，有一座悬崖险桥，现有一连人防守，即将北撤，要徐陈在一天内派部队赶到接防。徐陈认为这座险桥位于二百里外，决非一天所能赶到，因未派兵前往。同时我们又接到董振堂罗炳辉自卓克基来电，谓懋功以南一带的敌情，尚无任何变化，南面的敌军仍集结在雅安一带。

我们旋又接到徐陈来电，谓毛泽东单独北进的行动已引起北面敌军的注意，如我军跟踪北进，不仅不能衔接上一、三军团，且可能遭受敌军顽强阻拦。徐陈的主力现正与松潘胡宗南部相持，且有约八百名伤兵急待安排，他们如分重兵去控制松潘西北及北面一带通路，则毛儿盖后路难免被敌抄袭。因此他们的部队只有暂时坚守阵地，以毛儿盖为后方，候命行动。

第三天我们总司令部才接到毛泽东的来电，大意是因时机不可失，乃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现已进到岷县南部地区，盼总司令部率各军跟进。这是分裂后我们所接到的第一个电报，但这个电报既未告诉我们他们今后行动的步骤，也未告诉我们北面一带的敌情，因而我们不能据以

行动。

根据我们当时所知道的情况，认为继续北进的时机已经失去，敌方已有足够时间派兵扼守甘南一带战略要地，北上几条要道中的一些险要桥梁，可能已为敌人破坏，因而拟定暂行南进的计划。我们电令各军事单位，做些准备工作和迷惑敌军的姿态。总司令部也就率所部向阿坝移动。

我们西行三天，通过草地，顺利到达阿坝。这里是这一带藏族的中心，西部草原南边的一个名城，有“藏族成都”之称。阿坝的大喇嘛庙建筑雄伟精致，极为壮观。这个大喇嘛庙的两侧，还有几个较小的喇嘛庙，四周有千数的喇嘛住宅和上百户的店铺，结成一个长方形城市，大小等于内地的一个普通县城。这里附近是一片平坦地，平静的大金川穿流其间，河边有大片的青棵地，周围有更广阔的美丽草原。我们到达这里时，喇嘛大多已逃亡了，留下的粮食却能供我军几个月之用。

我们在阿坝继续研究我军今后的行动计划。阿坝向北直通甘肃西面的夏河，沿途都有喇嘛庙，可是易为河水所困，我们不能由这条路北进。不过我们既已到了这里，就应了解一下这个大草原的秘密，为将来行动作准备。

我们继续获得消息，证实那时北进是很不利的。敌方已知毛泽东等所率的北上先遣队，只是红军的一小部分，判定我军大部分仍将继续北进，因此敌方正调集军队，驰至川甘边境各要路截击，企图将我军截为两段，使之不能衔接，然后分别予以歼灭，而敌人的主要力量，又是用来对付我们这方面的。同时，我们的南面，敌军有些已经调

离，绝未猜测我们会乘机南下。这时已是八月，瞬届秋凉，北进又会发生战士服装缺乏的问题。

我们于是决定暂行南下，我们的计划是：乘敌不备，南下成都西面的天全庐山一带地区，在那里补充冬季服装，在不利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缩回西康藏族地区过冬。我们觉得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较好的做法；而且这是一个大规模的行动，既可以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我们这一方面来，因而减轻对北上先遣队的压力，也可以造成明年春夏之交我军北向的机会。

我们在阿坝停留了几天后，沿大金川南下卓克基，准备在卓克基举行一次重要的干部会议，讨论党内问题。徐向前陈昌浩等奉令率部向卓克基一带集结，仍留少数部队在毛儿盖一带，牵制松潘之敌，原驻卓克基一带的董振堂罗炳辉部，则以一部占领懋功以南的要地，为南下开路。

我们由阿坝沿大金川南下行军颇为顺利。一般战士都觉得愈往南走，境况愈要好些，士气很盛。我们离开阿坝草地，迅即进到了大金川的山峦地带。大金川的水流在高山峻岭之间，形成激流，两岸就是我们南下的通道。沿河较平坦地方，都有村庄或集镇，这就是农畜产品集散之地，也是冰雹最多的区域。我们在那里经过的时候，曾遇到不只一次的冰雹，每年庄稼往往为冰雹所毁，这也许就是这一带开发不易的原因之一。

不几天，我们到达了卓克基。各军重要干部也都如期赶到了。这里虽仍是藏族地区，但也杂居着不少的汉人，农业比较发达，较之毛儿盖阿坝一带，更适合于我们的生

活。这一带的人民与红军也相处得较为融洽，很少人逃避我们，我还看见藏族在田野间举行盛大的跳舞会。

我们旋即在卓克基举行高级干部会议，讨论毛泽东等的分裂行动问题。在卓克基市镇上一栋房屋的大厅中，齐集着各军政首脑同志约三千人，心情显得悲痛而愤慨。陈昌浩首先报告在毛儿盖的一切经过，说明总司令部移到刷金寺后，他和徐向前与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委员相处得很融洽，遇事互相商量，并无争执，毛泽东等北逃的那一天，行动却是突然的、秘密的、不顾信义的，也是破坏党和红军的团结的。

接着，第五军团和第十二军出席这次会议的同志们，也纷纷指斥毛泽东等行为的不当。他们指出第五军团和第十二军同属一方面军，以往遇有重要军事行动，都曾事先获得通知；但这次毛泽东等私率一、三军团北上，却并未通知他们，发言的人对于这一点，一致表示愤慨。有的坦率指出作为中央的领导者，不应有这种破坏党纪军纪的行动。

在讨论中，到会者一致判定毛等此次分裂行动，是破坏了党的团结和红军一致行动的原则，其根源是失败主义和游击积习，以致堕落到这样的程度。其中最愤慨的言论，直指这是阴谋诡计、自私的、不名誉的、不道德的、中共红军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可耻行为；多数则表示不愿再承认这个失去信用的原有中央。

朱德在这次会议中，神情显得懊丧，对已经发生的事认为不应当有，表示惋惜。他这样着重表示：“事已至此，

同志们不会承认原有的中央了，但希望留下将来转圜的余地。”

我在发言中除说到一些重要经历外，又着重指出：任何团体都可能积累一些错误，一时显得黑暗，但我们自信有方法纠正过来。我们将不因毛等的分裂行动而稍有气馁。我们将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更有信心地奋斗。一、四两方面军的同志们，将团结更紧，争取军事胜利。一俟适当时机到来，我们将举行党的代表大会，或党的扩大会议，改组中央。目前，同志们应团结在这个高级干部会议的周围，信任总司令部的领导，暂不接受原有中央的命令。

这次会议通过了两个重要决议：一是不再承认原有中央，另行成立临时中央。到会者并一致推举我为这个临时中央的书记，俟到了适当时间，再行召集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成立正式中央；电告毛泽东，此后我们虽不再接受原有中央命令，但军事行动仍互相配合。二是由总司令部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指挥全军；各军概依总司令部命令行动；原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升任为总政治主任，参谋长刘伯承兼办红军学校；徐向前陈昌浩率原四方面军向天全庐山一带地区活动，董振堂罗炳辉率所部巩固懋功和卓克基一带后方，期能建立川康新苏区。

这就是中共分裂的主要经过。我当时想起了中共中央各负责人分途奋斗多年，在懋功高高兴兴的会合，又在毛儿盖突然分离，不禁感慨万端。我也觉得事态发展至此，中共中央固然难辞其咎，但莫斯科的死硬作法，确是逼使我们走到这个牛角尖的主因。其实，我们中国共产主义者

无论在一起或暂时分离，总是背靠背在作战；我们有争执，但也互相依存。我们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生存与死亡，我们主要的努力，也始终是对付敌人，任何时候，也不会因内争而忽略了对外。因此，这次分裂也不过是中共奋斗史上的一个插曲。

# 第十九篇

## 由分到合



# 第一章

## 在西康

分裂风潮之后，继之而来的是党内团结的迫切要求。毛泽东从毛儿盖策马北溜，卓克基会议群情愤慨。这两幕连台戏是分裂的高潮，也惊醒了我们这些游击英雄。每个人都从心底深处喊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分裂，而是团结”的呼声。敌人的压迫，使我们必须弥补分裂所造成的创痕。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指示中共改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又清除了我们内部分歧的根源。任弼时贺龙所率领的第二方面军，辗转来到西康地区与我们会师，也促进了内部的团结。一九三六年夏季，我们由西康向甘陕北进，党的组织和红军各单位，又在陕北的保安重新合而为一了。

卓克基会议之后，我们的主要注意力转到了对敌作战方面。我们不愿老在内争问题上纠缠，因而并没有强化临时中央的组织和作用。它的存在似只是一个名义，它没有机构，没有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也没有对旧的中央委员有所制裁。这样做，自然是顾到朱德所说留下转圜余地的意见。而且，我们觉得不承认原有中央和建立临时中央，只是辨别是非、申张正义的行为，并不是存心分裂，也避免个人权力之争。

我们忙着作南下的动员工作，“打到天全庐山吃大米”，是我们当时激励战士的口号。这对于两个多月没尝米味的红军，特具吸引力。我们的南下纲领是：“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平分土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愿与川军划分防区，互不侵犯”等等。我们再没有提出建立川西新苏区或西北联邦政府等类的主张，因为觉得这是要等我们在天全庐山立定了脚之后，才能决定的。

总司令部所指挥的军队，仍是一、四两方面军（中央机构和一、三军团虽然北上了，第五军团和第十二军以及总司令部属下成百的工作人员原均属一方面军）。即将到来的战争，需要 we 和衷共济来应付。任前敌总指挥的徐向前，更觉得内部团结是今后克敌制胜的要图，他对过去的分裂行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四两方面军同志间的隔阂，极为难过。他也责备中央巨头们领导无能，希望彻底改善。

我们将党内团结工作列为第一要务。如果继续指责过去中央在两军会合后，只知批评四方面军，抹煞它一切的功绩，赏罚不明，以致引起同志间的隔阂，酿成这次分裂，是不足为训的。我们今后要改弦更张，重视同志们的努力与贡献，褒扬一、四两方面军过去的英勇奋斗，反对彼此间的任何门户界限。我们要求同志们互相学习，互相谅解，互相结交，纵有检讨批评，也要出之于善意。

我个人对于这次团结工作，特别重视。我向四方面军一般干部讲话，极力褒扬一方面军过去的英勇，累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知识，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大家应一视

同仁，彼此要携手前进。这类的话我也曾向一方面军的干部讲过。我还访问了董振堂罗炳辉等原一方面军的将领，征询他们对于军事问题党内问题的意见。这些努力多少收到了扫除隔阂的效果，例如董振堂就郑重表示，过去中央老把他当作投降过来的将领，似乎不把他当“自己人”，今后既能够一视同仁，他也敢于负起责任指挥作战了。

我们这样努力了几天，便出发南下。我军由卓克基经懋功，迅即攻克了宝兴县城。宝兴是个小县，位于懋功以南大山的出口处，过此往天全庐山，便是比较平坦的地带。天全庐山在这多山的四川，是一片不小的冲积地区，土地肥沃，气候和暖，盛产大米，相当富庶。

当时四川已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控制，追随一方面军入川的国民党中央军，分驻在各战略要地；我们要跟这些装备较好的军队周旋，这和我们初入川北时与川军作战的情况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我军进到宝兴时，先是与川军作战，一经接触，就给我们打垮了。我军乘胜占领天全庐山大部分的乡村地区，这两县的县城当时尚在川军手中。

这一带的战斗中，蒋介石的飞机发挥了较大的威力。我军向天全挺进的那天拂晓，川军防线完全被击破，我军正乘胜沿着山岭要道向县城追击，可是到了九点钟，敌机分批飞临我们上空，作地毯式的轰炸，阻遏了我们的攻势。事后检讨，我军这次三百几十名伤亡中，竟有近三百名是敌机轰炸下的牺牲者，同时，在这次战役中，敌人所建立的碉堡阵地，威力较前也大有进步。这些迹象显示，敌人

是利用江西的剿共经验来对付我们。

我们觉得飞机与碉堡确非我们的力量所能摧毁。过去一方面军在江西对敌作战时，曾采取“斩乌龟头”的战术，即乘敌人飞机没有出动的时候，用迅速的手段，消灭敌人伸出碉堡以外的兵力。但这种战术终于不能发生大效，结果江西苏区为碉堡所困，最后，不得不突围西行。毛泽东也曾斥之为“错误的防御战术”。

我们不愿重蹈江西苏区的覆辙，决定我们在天全庐山的军事行动是暂时性的，不在这里建立川西苏区，我们在这一带的主要任务是解决补给问题。因此，我们一面集中最大限度的人力和畜力，将打土豪得来的稻谷运往宝兴以北的山地去，一面在各个集镇上，搜购布匹棉花赶制冬衣，准备不得已时退回懋功。

战局渐渐不利于我军，不久在江西对共作战甚久的薛岳、周浑元两个纵队<sup>①</sup>，集结到了我军的正面，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手段，向前进逼。我军与之交锋，占不着便宜。我们素来避免打没有胜利把握的仗，也不愿持久消耗，乃退回宝兴以北的山区。敌军也不再深入，他们不敢蹈险和我们在山地争胜负；同时，他们也以为把我们围在山地，终有一天会因粮食不继而自趋崩溃。

我们的南下计划，显然没有甚么收获，不到一个月便结束了。这似乎证实了毛泽东所谓“敌人飞机大炮厉害”的话。我们当时曾详加检讨，认为敌方在军事上占压倒优势，这是从来没有人否认过的，不过我们现在所处的区域，相当辽阔，决非敌人所能封锁。兼之区内地形险要，交通阻

塞，敌人决不敢深入进袭。因此我们大可安心在这地区休息过冬，决不会成为瓮中之鳖。

一九三五年九月间，我们回师懋功及其西大金川沿岸一带的集镇<sup>②</sup>，原驻在丹巴的刘文辉部，在我军压力之下，向泸定溃逃。我们总司令部驻在靖化党坝地区。这时东南面的敌军离我军有百里以上，不能直接威胁我们。

我军的困难是粮食供应不足，引起藏人的反感，当地藏族与汉人之间原有隔阂，藏人一向痛恨汉族的侵略。红军进到藏族地区后，毛儿盖东北面的藏人曾与我们发生过许多次的冲突。他们不仅阻拦我们这些外来之兵，尤其不愿我军分享他们不足的粮食。我们在这一带驻扎久了，与藏人争食情况，日渐严重。我们避免与藏人冲突，不愿在此驻留太久，以免消耗这一地区的粮食太多。

藏族头人为了保护他们的粮食，往往集中数百人与我们的搜粮队对抗。我们住在清化的时候，就曾发生过好几次类似的冲突。藏人的队伍是乌合之众，随集随散，不能持久，我军从不妄施攻击，只是予以监视，听其自散。我们也曾向藏人解释，我军不得已才掠取他们一部分的粮食，决不愿置他们于饥饿的境地，更不会横施压迫。这样的解释收效很微。我们只有适可而止，在一个地方住了几天，就又迁往别一个地方去。

我们这群人特别坚强，不怕一切困难，老在寻求生存之道。我们的苏维埃运动，已经支离破碎，内部又告分裂，而且困处边隅，粮食不济，藏人的抗拒，更使我们汗颜。但我们并不绝望，还是抖擞精神，积极进行部队的训练工

作，以为将来作战的准备。

我们的训练中心是红军学校，由何畏任校长，刘伯承任总教官。何畏那时仍在养伤，事实上不能多管事，刘伯承则负着实际责任。这个学校有一百多名学生。多数是从四方面军调来的营连长，也有少数当过师长或军长的干部。重要战术教官是张宗逊、郭天民、唐天际等。教学原则是教官和学生共同学习，理论与实际并重，往往一个课程之后，便由教官和学生们率领附近驻军，实行演习。

这间学校的训练条件，还不算坏，不仅教官优良，而且有适当的课本。我们在鄂豫皖办红军学校的时候，没有自己的课本，只有借用国民党的课本。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时曾译印了莫斯科出版的《苏联步兵操典》和《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两本书，可是经过长征的灾难，这两本书已难找到了，幸好有一个一方面军的下级干部，经过千辛万苦，才保存了这两本书。我当时发现了，读了一遍，视为至宝，立即翻印，作为这个学校的课本。

这间学校的训练方针是注重红军的正规化。刘伯承这位独眼将军是四川老军官出身，无论军事学识和实际经验，在我们朋辈中都要算是杰出的人才。他又是中共干部在苏联陆军大学唯一的毕业生，回国后即出任红军参谋长职务以迄于今，所以他对红军的一切了如指掌。他素来主张红军干部要学习正规战术，游击经验只能配合使用。他讲话爱用尖刻的词句，常常批评游击作风，连毛泽东他也要讽刺一番。

刘伯承这个正统派军人，在授课时经常假定两个同等

人数、同等装备的敌对军事单位，对阵的时候，胜利将属于勇敢坚韧和战术较优者。这种思想原是无可非难的科学分析，也合乎共产主义者所推崇的辩证唯物论。可是我们的红军与敌军相较经常处于劣势，因而素来提倡英勇坚韧和协同一致，重视出奇制胜的战略，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游击观念”，过分强调超人和少数集团的优越作用，以为物质力量不足重视。

刘伯承的正规战术思想，终于与游击观念发生冲突。红军学校的学生余天云，是游击观念最强的一个，他是农民出身，聪敏倔强，以战功由士兵而升连长排长，一直升到军长。他做过好几年团长，也做过短时期的师长军长，就因为师军长的职务，需要较高的军事知识，所以调他到红军学校受训。他这个高级干部，就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争执，这种争执发展成为违反学校纪律的事件，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表示不服，因被判处短期禁闭。

余天云事件发生后，我即驰往红军学校召集所有同志举行会议，并发表演说。我指出一般同志不应自满于游击战术，应严肃的学习正规战术。我特别推崇刘伯承的军事知识，说到我自己和一般同志都得向他学习，他在刷金寺时所发表的、所有红军干部都须再教育的演说，我是完全赞成的。我还说明教师与学生之间可以自由讨论，从前是如此，今后也应如此。不过学生们应该虚心学习，不要固执己见，以免妨害学习和违犯应遵守的纪律。我赞成学校当局给予余天云的处罚，但要求一般同志继续敬重他并帮

助他学习。

红军学校这个风波算是平息了，多数师生原不赞成余天云的见解，经过这次教育之后，学习的进行显得更为顺利。我和其他同志也曾安慰余天云，他虽郁郁不乐，似也再无不满意的表示。不久，红军学校由党坝向丹巴移动，余天云竟在途经大金川激流时自高崖跃下自杀了。

余天云的自杀事件，立即震动了一般干部。有的埋怨我和学校当局对他处罚太严，使他感觉这是一种不能忍受的侮辱。有的批评余天云太过倔强和骄傲，游击观念太深。甚至还有人以为余天云事件，证明红军干部特别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军阀习气相当严重。平心而论，余天云不过是毛泽东的缩影，性格倔强骄傲，重权术，不择手段，两人同样坚持游击观念，也以同样理由与刘伯承发生战术思想的争执。两人都自视为游击天才，神圣不可侵犯，不过一个土头土脑，一个多点斯文，因而一个愤而自杀，一个老是运用奸诈，横行霸道。

为这件不幸的事我发表了沉痛的演说，要求同志们从这件事汲取应有教训。我首先痛悼余天云之死，褒扬他过去的战功，他曾几次负伤，不惜个人牺牲来为革命争取胜利。但我也着重指出自杀行为之不当，一般同志要经得起批评和处罚的考验，红军同志养成轻生观念，是要不得的。我重复阐明红军纪律应当严格，高级干部也应同样遵守，处罚并非侮辱，乃是实施教育的一种手段。

我们也探讨了余天云自杀的思想根源。我指出共产主义者相信以少数领导多数实行革命，因为他们自信能够依



据自然来改造自然，因此不少同志过分强调共产党改造自然的作用，这多少是唯心观念的作祟。过去中共历史上，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都犯了这类性质的错误。尤以在游击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负责人，特别是毛泽东，都不免受这种唯心观念的影响。一般同志更被游击观念所支配，老是觉得个人的英勇与计谋，会产生超乎想像的决定性作用。余天云虽没有自私的军阀观念，但确实以游击英雄自命，因而一受到批评，使他脑海中的天经地义发生动摇，便愤而自杀。这是不足为训的，同志们应引以为戒。

根据目前情况来检讨，余天云的自杀事件使我想起一九五五年高岗的自杀，两者在性质上有某些相同之处，但我当时对余天云，倒没有想到、更没有说到他以自杀来反党。

我们的教育工作，是克服了重重困难而进行的，余天云事件足够说明此中困难的深度。我和一般高级干部曾详加检讨，认为严格的教育仍应继续施行，但方法应有所改善，即对一般同志，不可轻易处罚，应多注重说服与批评，对游击观念也不可一概抹杀，要潜移默化、以正统的军事知识徐图补救。

我们当时是想利用这段休养的期间，借训练工作使我们的知识能力大大提高，因此，我们不惜采急进步骤。但事实上训练工作须较长时间才能收效，我们这次努力，也就由于时间的限制，虽有相当成就，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一九三五年十月底，我军翻越万年雪山（即大雪山）

到达道孚、炉霍、甘孜地区。我军在大金川流域和懋功一带停驻了一个多月，从天全庐山运进来的粮食已经吃光了。当地的粮食，又因红军在那里先后驻扎了约四个月，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我们要迁地为“粮”。道孚、炉霍、甘孜是川藏大道上的要镇，人口较多，我们估计那一带的粮食可供我军过冬。而且时已深秋，再不迁移，待到大雪封山，那就无法翻越这座大山了。

我们选择了由丹巴通道孚的一条捷径，向西进发。翻越大雪山，须费两天的时间，第一天进到山腰雪地边缘露宿，第二天上午，翻过海拔七千公尺左右的山顶，再下山到了山脚才找着村庄驻足。山顶空气稀薄，通过时呼吸困难，我们都带有生姜一类的强心药品，为临时救急之用。全山白皑皑，我们步履稍一不慎，便可能发生雪崩。幸而我们事先作过充分的准备，所以能够顺利通过。

这一带喇嘛的势力特别盛大，尤以黄教的势力最强。道孚一个最大的黄教喇嘛庙，就有八百多个喇嘛，街道上到处都可以看见穿红袍子的喇嘛，喇嘛庙里有维持纪律的铁棒喇嘛，那些在街上闲逛的喇嘛们，听见铁棒喇嘛来了，就吓得四散躲避。喇嘛庙和喇嘛住宅建筑都较精美。喇嘛庙很象一间学校，喇嘛们经年累月在那里念经。有时喇嘛也像是一支有组织的军队，大多会使用武器，经常作有组织的军事行动。喇嘛在当地居民中，无论知识和能力都较超越，人民畜牧、营建、医病等，都得依赖喇嘛。大喇嘛如活佛呼图克图更是政教合一的首脑。

一妻多夫的制度盛行于这一带，但妇女的地位却又特

别低。藏人兄弟数人往往共娶一妻，她周旋于这些兄弟之间，要维持他们的和睦，如发生争风吃醋的事，不问原因何在，概归咎于妻子。妇女出街要戴面罩，而且有些还毁了容（所谓毁容，就是故意将面部割破，涂上黑灰，变成黑疤）。喇嘛们在街上逛游时，妇女们要远避，否则就被视为不道德，如果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竟引诱喇嘛们注视，那更是邪恶之举。凡是引起争风的妻子，或引起喇嘛欲念的妇女，往往送去当尼姑。道孚市郊的一座小山上，便有一个规模颇大的尼姑庵，住满了这类尼姑。

藏汉两族间的关系十分恶劣。从满清到民国，统治者传统的歧视藏族。那时统治西康的军阀刘文辉，尽量搜括藏人的钱财。汉人在此经商者，也多用欺诈手段图利。我和一些藏人及喇嘛们谈及这些事，他们大多叙述怎样被汉人撵到山里去的故事。

藏族的文化较低。藏人一年四季，不分冷暖，总穿着一件油渍的羊皮统子，这件皮统子往往重达三十磅，成了他们日常生活很大的负累。他们虽有自己的文字，但结绳记事的方法，还是很普遍。而且文字也极不完备，很多较复杂的概念，就无由表达出来。譬如“团体”这个名词，在他们的文字中就没有。我和他们研究，藏文中只有“一心一意”这个名词，较接近于“团体”这名词的意义。

我们既履斯土，就得尽量取得当地人民的谅解和合作。藏族自治政府经过我们的推动，在各地组织起来了，但大多只是一个空名义。藏人始终不完全了解红军，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掠夺粮食的可恶汉族，但是我们对他们的态度

和藹，又使他們驚異不解。甘孜的活佛是這個區域的“神”，他曾這樣表示對我們的觀感：“如果紅軍處境好一些，不會比劉文輝壞，可是它現在窮困，搜括超過了劉文輝。”活佛的這句話，適當的描繪出當時我們在那一帶的真象。

我們在西康停留的期間——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六年六月——前線大致沒有戰爭。駐在康定的劉文輝部與我軍隔着折多山對峙，相安無事。我軍向西伸展到金沙江的左岸，西藏達賴喇嘛屬下經英國訓練的少數軍隊則駐防右岸，彼此也從未向對方射擊。蔣介石、劉文輝也曾利用少數藏人，組成游擊隊向我軍搔擾，但這些受蔣介石利用的藏人，往往被藏人視為“藏奸”，沒有群眾基礎，經我軍予以打擊，也就煙消雲散了，其他藏人的零星反抗，我軍多數是用政治方法來解決。

我們仍是集中力量，進行部队的訓練工作，主要是使一般戰士了解西北情況和對騎兵作戰的戰術。我軍大致可以在西康地區長期停留下去，但為了解決糧食困難，我們須花很多時間來從事農業生產。這樣，會使我們的戰鬥部隊，轉化為屯墾軍，因而放棄對全國革命的領導任務，這自然非我們所願。有鑒於此，我們乃仍照預定計劃進行，奪取甘肅的河西走廊和新疆，與在陝北的紅軍成犄角之勢。訓練工作便是根據這種方針來進行。

這段時期，我們發展了軍隊中的“文化娛樂工作”，主要是原一方面軍政治工作人員的貢獻。一方面軍是在江南的湘粵贛一帶革命中心地區發展起來的，參加這支隊伍的知識分子較多，所以軍中的文化娛樂工作，也較為發達。

当时我们总部驻扎在炉霍喇嘛庙里，门口有一块大广场，主持文娱工作的李伯钊女士（系留俄学生，任总政治部文娱组主任），常常率领文娱队<sup>③</sup>在那里表演。我和朱德等就常同战士们一道欣赏。他们所表演的短剧、舞蹈、歌唱等，当时鼓舞了战士们热情，即使到了今天，回忆起来犹有余味。

这里气候寒冷，布匹棉花，少得可怜；但羊毛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商店仓库，喇嘛住宅，处处堆满着羊毛，多数没有经过加工，主要是因交通不便，多年囤集，卖不出去。我军战士都忙着将羊毛加工，纺成粗糙的毛绳，再织成衣裤以及袜子等。一九三五年十一、二月间，我军各连队几乎都变成了一个羊毛纺织工厂。不久，全军服装都是各种颜色的毛织品，其中以白色最多。我们对纺织羊毛多方鼓励，用教练品评、竞赛展览等方法，来促进战士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就这样圆满的解决了我们的冬服问题。

在“吃”的问题上，我们花的力量还要多些。当地的青稞大体是由我们统制，实行定量分配，奖励节约，反对浪费。每人的青稞分配量，多数时间是每天一斤。宰牛统制得更严，奖励制牛肉干，以便一条牛能供一连人约一周之用。粮食加工的工具很缺少，经我们分配，由军队和藏人轮流使用，但仍不够分配，战士们有时要将没有加过工的青稞煮熟来吃。

蔬菜在这一带亦极缺乏，生产量供给藏人已感不足，我们来了之后，每天吃的都是青稞牛肉牛酪之类，没有蔬菜是相当严重的问题。所幸当地盛产一种野生的根科植物

名叫人参果（也许西游记上所说猪八戒吃的人参果，就是这一类东西），可以佐餐。我们用竞赛的方法，鼓励战士们去搜掘，每人每天可掘得十几斤或更多些，最高纪录曾达到五十斤。人参果和青稞煮在一块吃，相当可口，而且也很富营养。不过我们人数太多，这种野生植物，经过我们大量搜掘之后，不久也就稀少了。此外，我们也派战士去猎禽兽和打鱼，但藏人迷信甚深，看见我们的战士去渔猎，往往有不乐意的表示。

一九三六年春夏之交，我们还组织了一个野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在漫山遍野的野草之中，搜寻一些可以吃的东西。委员会有二十几个人工作，以朱德为主席，委员之中包括老农和医生等。他们从野草中找出了可以佐餐的二十二种野菜，解决了我们缺乏叶绿素的问题。有一次委员会判定某一种野草是可以吃的，先由少数人试吃，结果试吃者竟发生昏迷现象，经过急救，才告无恙。在二十世纪中，这种神农尝百草的办法，似令人发笑，但这种冒险犯难精神相当可佩。

愈是落后的地区，疾病的威胁愈是严重。藏人对于疾病根本无法抵御，有时整个村庄，竟被某一种疾病完全吞噬了。藏人对于人畜疾病的处理，只知采取严格的隔离方法。一个病人常被他的家人安置在一间单独房屋内，家人都不去看护，只按时从门洞中用长棍竹竿，送进一些食物饮水之类的东西，由病人自行取食。病人能否痊愈，只凭他本身的抵抗能力。如果他病故了，家人们便将他的尸体焚化，甚至连那间房子，也一并焚烧掉。某一村庄发现了

传染病，全村的人往往就弃村逃亡。这样的隔离方法，又养成了一种特殊的道德观点，即人们对害病的家人，假若留恋不忍去，或愿尽看护之责，则视为不合道德。而遗弃病人，反视为是理所当然。

我军在藏族地区，曾受到伤寒病的严重威胁。患病的人数不少，时间也拖得很久。从一、四两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直到我们离开西康地区，这种病魔老是在与我军为伍。所幸我军还相当注重卫生，伤寒病的传染速率，受到了相当的抑制，其他传染病也没有大规模的发生过。

在福建漳州基督教医院服务过的傅连璋医生，对于这次防御和医治伤寒症，有过极大的贡献。在高原地区，空气稀薄，又缺乏燃料，我们烧煮食水，往往不易达到一百度，因而不能将水中的细菌全部杀灭。傅医生认为，食水不洁是引起伤寒及其他病症的主要原因。我们根据他的指示，在火炉旁安置一个牛皮风箱，增加火力，使食水能煮达一百度，这样，不仅可减少伤寒症的蔓延，同时也减少了其他的疾病。

我们缺乏药品，对于伤寒病无能为力。傅医生便采用中医的医治方法，救活了不少人。从此，这位不重视中医的西医生傅同志，也就对中医发生很大的兴趣。后来他在上海著名的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说明他用中医方法，曾治好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伤寒病患者。他现在任中共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特别热心提倡中西医学并用。

那次的伤寒病牺牲了我们成百战士，其中有好几个是师团长级的干部。还有一位无线电侦察专家蔡同志，他是

福建籍的知识青年，聪敏而有毅力，自鄂豫皖起他就担任对敌的密电侦察工作，建树极多。他与我不仅是同事，而且是好友，他的死亡，在友情上我固然十分伤感，而且使我们军中少了一双千里眼，尤为令人痛惜。

- ① 每个纵队约有三师人。
- ② 即党坝、靖化、巴地、丹巴等集镇。
- ③ 我们那时文娱队的组织，多临时吸收战士们参加，但指导人员则多系原一方面军政治工作人员。



## 第二章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九三六年初，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林育英，从莫斯科回到陕北。他带回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决议的要旨，重建了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我们这些中共巨头们虽是闹翻了，红军也分成两部分分别行动，但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继续恶化下去。卓克基会议后，毛泽东等接到我们另行成立临时中央的电报，亦没有作意气用事的不满表示。从此，我们彼此在电讯上都避免用刺激对方的言词，不再提起过去纷争的事。我们会师后所编定的新电码稳妥可靠，电讯畅通，我们据此互相报告情况，措词都相当诚恳。也许是由于分裂的痛苦和不幸的遭遇，把我们大家都锻炼得更心平气和了。

毛泽东等自毛儿盖率一三两军团北进，人数约一万多一点（原一三军团和中央机关人数约为七千五百，加上自四方面军抽调补充四个团的最大部分，所以应该有一万多人），沿途遭遇敌军的截击，损失惨重。他们于当年十月二十日在陕北瓦窑堡附近，与原在陕北的徐海东刘志丹两部会师，那时一三军团所剩下的人数似已不到四千人<sup>①</sup>了。

毛泽东等到达陕北后，曾多次来电，描述他们的处境，字里行间，虽有些掩饰和夸张的地方，但他们所遇艰难困苦以及损失惨重等情形，也溢于言表。我们曾去电安慰并祝贺他们与陕北红军的胜利会师。此外，我们亦将我在上面所说的各种遭遇，电告他们。他们的回电也表示出互谅互勉的意思。

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sup>②</sup>，大意是：他和王明等曾参加一九三五年七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月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隔，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

我接到这个电报，一时喜出望外。立即回电表示欣慰，并请他暂留陕北，以免途中遭受袭击的危险，彼此可用电讯商谈各项问题。林育英同志系湖北籍的知识青年，林彪的叔父，他和他的弟弟林育南都曾与我共过患难。他于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共后，即随我从事职工运动，也曾在汉口一间工厂里做工。一九三三年他代表中国工会到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工作，成为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的一员。他回陕北后，为了保密的理由，他用“张浩”的名字出现。

接着，林育英的电报源源而来，主要是告诉我们共产国际改采新政策的经过，并提出党内团结的步骤。林育英说到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政策的改变时，曾指出由于国际

形势的变动，主要是希特勒的崛起，共产国际乃改变了它原有的政策。现在在全世界号召各国共产党与其他反法西斯蒂的政党和人民，联合组成“反法西斯蒂的统一战线”，又名“人民战线”，这是要各国共产党与他们本国的反法西斯蒂的资产阶级乃至反法西斯蒂的政府，形成某种形式的合作。即使这种合作极不稳固，也是当前与法西斯蒂斗争中所急需的。

林育英又指出共产国际认为中国正遭受日本的严重侵略，中共应联络全国人民，包括抗日的资产阶级各军队各政党，形成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一点上，他阐明了各项细则，也曾将《八一宣言》的要点电告我们。他主要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否定了原有的苏维埃运动，现在我们主要的口号，已不是“打倒蒋介石”、提倡“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等，甚至也不是“反蒋抗日”，而是“联蒋抗日”、“抗日联合政府”和“一切为了抗日”。这些就是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侵略和汉奸的主要内容。

林育英这些电报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改变了，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中共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林育英的来电也说到毛泽东等陕北同志都已同意了这个新指示，如果我们也同意，就可据此立即对外展开活动。

我们当时对于这些新消息极为兴奋，一致赞成这个新政策。这在中共的发展上，似乎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当中有人对“联蒋抗日”这句话感觉惊奇，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多数同志则觉得我和其他四

方面军的领导者，似有先见之明；我们提出过的入川纲领、西北联邦政府和在毛儿盖关于苏维埃的争论，都一一证明我们的想法是对的。也有人说到如果共产国际这个改变政策的消息早点传达到中国，又何至有毛儿盖的争论。更有人以为陕北现在得风气之先，他们既与共产国际联络上了，我们也就不必旧事重提，斤斤于谁是谁非，大家团结要紧。

我当时百感交集，我衷心拥护这个新政策，认为和我一向的想法，在原则上不谋而合。现在苏维埃走到了穷途末路，非有这个改变不可。我也慨叹中共所经过的一切遭遇：最初主张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sup>③</sup>，不久就由于国际指示，改采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这种不合理的右转政策，使我们碰得头破血流；接着又急剧的向左转，走苏维埃的道路，又碰得头破血流；如今再回到了我们的起步点，是历史的讽刺，也是我们的悲哀。

我们经过郑重的研讯后，曾复电林育英，表示对新政策一致热烈拥护，当即策划实施，请他转达共产国际。我们为这个新政策能够与在陕北的同志合力推行，在电文中没有提到已往的争执。不过关于联蒋抗日是否可能，确是我们的最大疑问。我们推测莫斯科与南京之间，外交关系大致已有改善，因而会有“联蒋抗日”这句话。我们为了不愿对新政策稍示疑虑，就连这一点也不提了。

林育英鉴于全党政见已趋于一致，复电提议党的统一。他指出过去毛儿盖的争论以及后来两个中央的对立，虽属不幸，但在他看来，这是苏维埃政策应改而未改以前的难免现象。现在不宜争辩已往是非，应急谋党内统一。陕北

同志已同意他的建议，双方中央都不再以中央名义命令对方，由他暂时担任双方的联络人。他的任务是根据这个政策，使双方行动密切配合起来。

林育英还说明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决定不再干涉各国共产党的组织问题。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概由其中央自行解决，共产国际只在政策上予以指导。根据这个决定，他认为中共内部争执和中央领导问题，应由我们自己设法解决。因此，他提出了上面的建议。他热诚的希望双方就这个问题表现出独立解决的能力。

陕北方面曾由张闻天具名来电，表示同意林育英同志的建议，我也复电表示赞成。我在电文中说：我们现在既然要联合一切力量抗日，内部团结自属首要，决不能对外讲联合，对内部专讲斗争，忽略了党内民主。林育英再三来电提及，莫斯科的中外同志们，都十分敬佩我们的艰苦奋斗精神，现在又能解决内部歧见，他极感兴奋。从此，我们与陕北同志正式决定以林育英同志为联络人，双方各自展开新政策活动，俟适当时机到来，再召集党的会议，解决一切。

林育英此后的来电最重要的一点，是转达了莫斯科对西进计划的指示。他说到川康地区红军打通新疆的计划，已得到斯大林的赞许。斯大林认为如果中国红军能够控制新疆和甘肃河西一带地区，苏联将予以必需的军火供应，并协助训练工作，使成为一支劲旅。因此，他表示我们应从速有所行动，西进与否，概由我们依据军事实况自行决定。

林育英传达给我们的这个好消息，对我们有极大的鼓励作用。我们推测，斯大林赞成这个西进计划，因为他觉得避免与蒋冲突，实现联蒋抗日，应是当前急务。我们也觉得过去党内争执的裂痕，还需要时间来弥补。如果我们能实现西进计划，与陕北同志暂时保持相当距离，无形中就是让时间来冲淡彼此间的隔阂。因此，我们便积极准备西进计划的进行。

陕北同志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初，所找到的对象，不是蒋介石，而是张学良。因此，中共的政策也就随着这一事实而有所变化。换句话说，原来的“联蒋抗日”政策，变成了“联张反蒋抗日政策”。

当时我们在西康，目光所在主要自然是西南方面的实力派。我们曾多方设法，经过康定，向四川和云南一带的军人活动，要求他们一致抗日，共御外侮。但我们的努力，不是落空，便是毫无反应。反之，陕北方面，却找着一个军事巨头张学良。这种事态的发展，使我自己党内的地位开始转居劣势。

一九三六年一月间陕北同志们来电，报告他们在上年底与张学良部作战，曾俘获张部团长万毅，他们待之如上宾，并根据新政策，向他痛陈联合抗日的重要。最后他被感动了，誓言回到西安，恳求张少帅停止剿共，一致对日，如今万毅已被释回西安去了，希望能有结果。

奇迹果然出现了。万毅的活动打破了他们各方奔走迄无头绪的沉闷局面。过了一些时候，陕北来电，谓已接到万毅的信，说明张学良经他的苦谏，已答允考虑停止剿共，

要求陕北从速派人到西安去与张学良接洽。现陕北代表④已秘密前往了。

我们复电赞成这种做法，但也指出应设法多方联络，对张学良左右的不少复杂分子如亲日派等，应特别警惕。我们并重复向他们提供了我们已往与杨虎城有过的关系、居间拉拢的人名、以及其可靠程度等等的情报。

陕北后来几次来电，都说明与张学良接洽的情形。他们主要指出，张学良确有进步，真诚抗日，张的部下分新旧两派，旧派保守，不愿抗日，其中甚至有人与日本勾结；新派（万毅即其中之一）对抗日极具热忱。张与日本有杀父之仇，又受蒋压迫，现在完全信任新派，很希望能摆脱蒋的控制。他对与中共联络的事，非常恐惧，深恐走露秘密，凡此，足见他本人可以信任。

陕北同志主张以张学良为唯一的联络对象，与其他军人联络的事都可由他去进行。这样比较稳妥，也可消除张的疑虑。他们来电曾举例说明张学良曾问我方代表，是否与杨虎城有联络，我方代表表示他为唯一的对手，与杨虎城并无联络。张学良听了大为高兴，并表示他一切都有办法，即对四川军人他也有联络，要求我们不要直接接头。这个电报的用意，自然是要我们不必再向四川军人活动，因此，对杨虎城已有过的或将有的联络，也要暂时瞒着张而进行。

陕北与张学良的关系，日益密切。据陕北电告，张学良的计划是以西北为根据，与蒋介石对抗，他认为“联蒋抗日”不可能，只有形成西北单独抗日的局面，“反蒋抗日”

才有前途。他最重视我们能拉拢他与苏联的关系，以期获得苏联的实际援助。他不重视红军的力量，认为在“反蒋抗日”中起不了大作用。他要求现在川康地区的红军，迅速开到西北来，不要再与四川军人纠缠。

一九三六年五月间，陕北同志与张学良的联盟秘密建立起来了。陕北电告决与张学良共建西北反日局面（即指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并指出张有英雄主义色彩，主张抗日反蒋并重，企图成为抗日的唯一领袖。陕北的同志们认为这种野心大可予以利用，如果西北抗日局面有所成就，莫斯科也将会赞同，而且，目前中共处境困难，已无可选择，只有走这条路。

我们觉得这种政策带有投机色彩，是否有胜利的前途也很难说，但只要是有益于红军的生存与发展，也不妨试试。于是便复电表示赞成，但指出西北抗日局面，须有一个明确的纲领，应包括中共主张在内；其次应将西北抗日局面看作只是发动抗日的力量，尽可能避免大规模的内战。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增强自己的实力，并打通新疆的道路。这样，可以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陕北旋亦复电表示接纳我们这些意见。这就是“联张反蒋抗日”的最初经过。

一九三六年六月间，贺龙的二方面军和萧克的第六军，与我们在西康地区会师了。他们是大江以南的一支孤军，与我们和陕北方面，早已失去联络。贺龙等仅仅从敌人的情报中，获悉红军大部都已向西北方向转移，因而他们也由湘鄂川黔边区向云南西北部行进。他们向西北兜的圈子，比一方面军还绕得大，沿途所遭受敌军的截击和所经历的



艰险，也是十分惊人。

我们一直注视贺龙萧克两部的动向，也像已往策应一方面军一样，多方设法予以策应。一九三六年四月间，我们从敌人情报中，获悉他们正在向云南的大理前进，因判断他们是企图沿雅砻江向我们靠拢。总司令部因派遣几路部队，前往康滇边境策应，两军卒于雷波以南地区会师。

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在雷波的会师所引起的欢腾，不亚于一年前在懋功的会师。总司令部派去的部队，阻挡了云南卢汉部和四川刘文辉部从东南两方面直向二方面军的追击。二方面军因此得徐徐向北，移到雅江和新龙一带地区休息。这在二方面军一般同志看来，四方面军充分发挥了休戚相关之谊。

当时，贺龙萧克两部已合而为一，统称之为二方面军。原二方面军是由贺龙夏曦分任总指挥与政治委员，夏曦在云南途中溺死，第六军原由萧克任军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这两部分的实力原有两万人左右，到达西康地区时，剩下约五千人。他们在夏曦去世后，合并为一，仍以贺龙为二方面军的总指挥，萧克为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原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关向应兼任副政治委员。两部因人数已减，乃缩编为三个师。

我们有过懋功会师不愉快的经验，所以这次特别谨慎，除彼此互相关切外，没有任何互相挑剔的地方。而且两军的驻地相隔甚远，没有彼此联欢的热烈场面，自然也减少了磨擦的机会。

二方面军的领导人物以任弼时为重心，他留俄回国后，

任少共中央书记，一九二七年以拥护共产国际反对陈独秀著称。中共第六次大会时，被选为中央委员，后来升任为政治局委员。他原富有青年气味，经过许多磨练，已显得相当老成。当时他已蓄起几根胡子，我往常叫他做小弟弟，现在也要笑着叫他做“任胡子”了。贺龙当时亦已经看不出任何土匪气味，简直是一位循规蹈矩的共产军人，一切听由任弼时指挥。萧克将军倒很像个文人，爱发发牢骚，但也不坚持己见。关向应原也是少共的小伙子，这时仍富有青年气味，不遇着大问题，例不轻易发言。

我们在炉霍欢聚一场，大家一团和气。不过二方面军一般干部，对一方面军的离开江西，不无误会以至怨言，尤其对夏曦过去的领导深表不满。夏曦也是“二十八宿”之一，曾在二方面军中大事肃反，误杀了一些好同志，因而有些同志认为这是中央为留俄派把持后的“德政”。他们对于一、四两方面军会合后所发生的一切，也极表关怀。但我们觉得这些过去的事，此时不宜多谈，应根据新政策，以谋今后的发展。

任弼时等人直至此时才知道中共已改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他们研究了我和陕北间来往的电报，并了解由“联蒋抗日”以至“联张反蒋抗日”的真相。任弼时对于这些变化，起初也感到有些尴尬，觉得他已往反对陈独秀的主张，现在却又走回陈独秀时代的老路。但旋又觉得这既是共产国际的决议，应当毫无保留的接受。他对于陕北已与张学良发生联盟关系一点，也认为中共方面只有采取一致的步骤。一般说来，二方面军的同志是在整个政

策已经改变之后和我们会合，所以只须表示支持新政策，就再没有异议了。

任弼时本人对于毛儿盖的争执特别感觉兴趣。不惜花很多时间，分别和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和我详谈，搜集有关资料，研究这个争执的症结所在，我曾笑问他是不是想做“包丞”<sup>⑤</sup>，他也不完全否认这一点，表示他是一个没有参与这一争端的人，现在研究一下，也许将来可以为大家和好尽些力量。

任弼时将他研究的结果告诉我，大致指出下列各点：（一）四方面军之策应一方面军是真诚互助的行动，不能说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早有反中央的倾向；（二）双方都有成见，最先表现这种成见的，却是凯丰的文章；（三）一、四两方面军彼此的批评很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平的；（四）没有改政治路线以前，毛儿盖的争执势所难免；（五）毛泽东等自毛儿盖率一三军团北上，没有事先通知我和朱德等是不适当的。但他觉得这件事的酿成，一方面是毛泽东等人的疑忌太多，另一方面也是四方面军的反对呼声，加强了这种疑忌；（六）卓克基会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似乎太过分了。

任弼时认为这是一次严重的教训，值得大家警惕。此后，我们不要算旧账，他并决定以调人自居，不偏袒任何一方，愿为大家的和好而努力。我对于他这种热忱，极为感动。至于他的意见，我当时未置可否。后来，我们在陕北没有见过面，也没有听见他有甚么不满意我的表示。也许他说过的这些话，后来被陕北同志认为不合时宜，因而

没有尽力的机会。

疲劳的二方面军在西康地区已休息了一个月了，向西北行动的计划，迫不及待，我们乃决定全师北进。决定由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率二方面军和罗炳辉军为右路，出甘肃的岷县、静宁，进到海原一带的甘北地区。总司令部则率原四方面军和董振堂军为左路，经岷县，取道洮西通渭，折而向西，夺取甘肃的河西走廊。

上述的军事行动计划，在军事上说来，是企图拥有西北的一大片地区，即以陕北的红军居右翼，红四方面军在夺取河西走廊之后，居于左翼，二方面军在到达甘北之后，则居左右两路的中间地位。在政治上说来，是增加我们与张学良联盟的资本，即红军不是局限于陕北的弹丸之地，而且握有甘北甘西一带地区，这不仅可为西安的张学良保障后方，而且可以打通往苏联的道路。

陕北同志赞成我们这个军事计划，一直在催促我们北进，似乎没有我们的实力作资本，就不能形成西北的抗日局面。二、四两方面军的同志都很满意这个决定。在二方面军来说，他们居于中路，无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都可起桥梁作用，而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觉得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磨擦。可是，后来的事实发展，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这是四方面军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

- ① 毛泽东等所部抵陕北时，所剩人数，从未正式公布过。据史诺的《西行漫记》（中译本第一四四页）说是剩了两万人，显有夸大。我所采用的数字是后来我到陕北时，同志们口头告诉我的，似较接近事实。
- ② 林育英来电的时间可能是一九三五年底的几天，也可能是一九三六年初的几天，我不记得清楚了。
- ③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说：“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全文见胡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参考资料，第六九页至第八四页——上海商务一九五一年第九版）。
- ④ 最初是何人去的，我已记不清楚了，可能是叶剑英，后来是由周恩来代表的。
- ⑤ 包丞是宋代的一位以刚毅峭直著称的官吏，仁宗时除龙图阁直学士，历知开封府，这是一位妇孺皆知守正不阿的人物。

## 第三章 北上

一九三六年七月间，我们开始执行上面所拟定的军事计划。后来由于军事上的演变，第二方面军全部和四方面军的一部（第四军第三十一军）转往陕北，第四方面军的另一部（即第九及第三十两军）与董振堂的第五军团进到了甘肃的河西走廊，但为马步芳的骑兵所击败，残部逃往新疆。

我军这次由炉霍甘孜走出藏族地区，沿途行军极为顺利。刘伯承贺龙任弼时所率的右路军东往毛儿盖，折而向北，进入甘肃的岷县。因原驻松潘的胡宗南部，已撤往天水，所以右路军没有遇着阻拦。总司令部暨左路军东向，经刷金寺，上下包座，前往岷县。这时天气晴和，翻雪山，越草地，毫无困难，也没有甚么人掉队。去年阻隔我军北进的那条河，这时水深不及膝，我们涉水通过那里时，真有不胜今昔之感。

我们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要口号是“北上抗日”，希望沿途驻军，不要阻拦我们，大家枪口对外，共御外侮。我们这些宣传，多半是抽象的口号，当时并不知道，自然也不会利用日军在华北内蒙的种种侵略行为，和各地蓬蓬勃勃的抗日运动，以及国际间对中国的同情活动等等为题材，

来发挥宣传的效用。但这些口号对红军本身确有振奋士气的作用。

陕北同志对于我们的北上行动极为兴奋，他们每天都发给我们一些乐观口吻的电报，内容大致有三点：一、西北抗日局面即将实现，杨虎城张学良均有默契，俟机而动，这两部份的军队及其他同情抗日的部队，决不会真正和我们作战。二、目前西北方面蒋的嫡系部队已经减少，尽可大胆前进，不致有任何阻拦，三、把陕北同志向全国所发表的各种反日文件转告我们，衬托出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八月间我军从岷县西南，走出崇山峻岭和草地，全军皆大欢喜，岷县一带是甘南较富庶之区，集镇村庄，星罗棋布，人烟稠密。吃厌了青棵牛肉的我军，这时可以大嚼面粉蔬菜，自是特别愉快，而且附近几百里地区，敌军防务相当空虚：驻岷县的鲁其昌部系杂牌部队，战斗力薄弱，只能据城防守；驻天水的胡宗南部，又为我右路军所牵制，因此，军中就有人发生留恋这个地区的念头。

我们总司令部仍本原定西进计划行事，陈昌浩率先头部队一度围攻岷县，不克，伤亡四百余，消耗了大批弹药，乃率部经通渭，进占会宁县城，并勘察兰州东北靖远的渡河地点。徐向前率主力驻扎在通渭，监视天水之敌。总司令部则驻岷县附近，直接指挥一个军，向临潭及其以北地区挺进，以勘察兰州西南面的渡河地点。

就在这个时候，陈昌浩提出了改变整个军事计划的建议，他主张我军应留在甘南地区。他由会宁前线，专程赶

返总司令部与我面谈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的军事行动延误了约两个星期。

陈昌浩受到陕北电报的影响，过于乐观，对西北的抗日局面，估计过高，而对蒋介石控制西北的能力和剿共的决心，又估计过低，他主张四方面军应在甘南建立新根据地，与陕北苏区互成犄角之势。对于党内的政治情况，他又感到忧虑，指出陕北已与莫斯科发生联系，又快要与张学良杨虎城组成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在政治上显然已占上风。他提议召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确定红四方面军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并要我驰往陕北，解决党内争执问题，以期四方面军不会受到莫斯科的歧视，在中共党内和未来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内获得适当的地位。

这是我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的意见冲突，而且发生在这个紧急关头，自然是一件颇伤脑筋的事。他的心情显得矛盾，他一面很敬重我，并且非常珍视我们这些年来无间的合作，另一方面觉得我有不满共产国际的表示，而他则正想避免这一点。他指出我已往预先见到苏维埃政策的错误，这虽是正确的见解，但在莫斯科看来，不免是对共产国际的信仰不够坚定，这会影响四方面军的前途。我认为这时来讨论改变军事计划，会贻误戎机，但仍答应同他去通渭召开高级干部会谈。

我们由岷县前往通渭开会的时候，军事情况已有不能乐观的迹象，右路军经天水附近北进时，曾遭受胡宗南部的截击，颇有损失，正向靖宁以北地区急退，因此我们的东面顿显空虚。又据情报，胡宗南、朱绍良、关麟征、毛



炳文等部敌军正向天水平凉西移，蒋介石并严令他的这些嫡系部队迅速截击我军，阻止我军与陕北军会合。

通渭会议根据这些情况，研讨军事计划，认为停留在甘南地区甚不合算。我们认为蒋介石既能调动十几师的嫡系部队到甘肃来，那末张学良的西北抗日局面，能否形成就似乎有大疑问了。如果我们停留在甘南，在不利的情况之下，会被逼退往毛儿盖一带去，而“抗日”的口号已经叫出，再往南退就会影响士气。如果我们突破敌人的包围，向陕北前进，沿途会受到敌军的截击，而且所有红军都挤到缺乏粮食的陕北，反而引动敌军集中包围一处，自然更为不利。

这些情况摆在我们面前，陈昌浩便撤消了他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提议，认为应照原定计划，迅速从靖远渡河西进。他这样很快的接受会众的意见，使得大家都颇为高兴。但多数干部不满陈昌浩这个冲动的主张，指责他独断的进攻岷县，使第九军蒙受创伤，是违背原有军事计划的行动；接着又按兵不进，要求举行会议，延误了渡河的时机。这件事破坏了高级干部间的和谐，也种下了西路军失败的根苗。

关于解决党内争端问题，多数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对于这一点，我声明我主动的去陕北，足以表示内部团结的诚意，一俟西进计划顺利实现，我决这样做。我也说到共产国际已知道我们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又批准了我们的西进计划，两个中央对立的形势也已

解除了，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持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

由于陈昌浩这一主张所召开的通宵会议，许多事经过研讨和解释，结果相当圆满，我们在全军中展开宣传，指出我军的西进计划正确而又合时宜。在政治意义上说来，我们如握有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可以保障未来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后路，并接通与苏联的关系。在军事意义说来，可以分散蒋的兵力，河西走廊、陕北和西安三点，将使蒋在甘肃的军队处于多面受敌的境地。我们现在所应努力的是迅速渡河，训练对付骑兵的战术，以及与回教人民建立友善关系等工作。

于是，我们的军事行动展开了，驻在岷县附近的军队向会宁集结，原驻会宁的军队，则进占了靖远县城，控制了这一带的黄河沿岸。当时彭德怀为了策应我们，已率部进到甘北的同心城海原一带地区。徐海东的第十五军则进到打拉池地区，打拉池与会宁相隔不过二天的路程，彼此信使往返，大家都为之兴奋万分。

靖远虽是渡河的好地方，但渡河工具缺乏，使我们不能迅速渡河（这一带黄河上的渡船是牛皮做的划子）。驻在兰州隶张学良麾下的于学忠部没有跟我们接触，黄河的西岸也无敌军防守，可是河中没有牛皮划子，靖远附近又找不出造船的木料，我们乃在会宁城内拆卸一些建筑物的木料，用人力运到靖远造船。

蒋介石侦知了我军在靖远渡河的行动，一面派飞机轰炸渡口，一面严令各军迅速向会宁靖远前进，企图乘我军

半渡时截击。我军渡河工具极少，又要慎防敌机的轰炸，因而每晚只能渡过千人左右。当时左路军的人数约为三万五千人，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渡过去的只有第九军第三十军第五军团、总司令部的直属机关、和徐向前陈昌浩的总指挥部等共约两万多人。我和朱德率总司令部人员、红军学校大部学生以及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在会宁通靖远的大道上，节节抵抗敌军的追击。

敌军的兵力愈集愈多，分路攻击的行动愈来愈积极。我军在会宁靖远大道上的掩护阵地，悉为敌军所攻下。敌军的另一部并进占了靖远城，控制了渡口，我们至此不能渡河了。我和朱德乃令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移到这条大道的东北面，以打拉池徐海东部驻地后方，这样我们的西进计划，便没有能够全部实现。徐向前与陈昌浩率已渡河各单位，在河西开始了单独行动。

一九三六年九月底，在打拉池一所城堡式的建筑物内，我和朱德等会见了徐海东，这位四年不见的老战友，仍是一位天真可爱的小伙子，他一看见我，欢喜得拥抱着我，恍如见着他的母亲一样，他和朱德虽系初次见面，但也表现得异常亲切，像是多年的老友。我和朱德都高兴万分，我当时激动得不知说甚么好，只是拉着他的手笑个不停。顷刻之间，徐海东军部的同志们，官长士兵们，都围拢着我们，纷纷争问别况，俨然是一个大家庭欢乐团圆的场面。

我们与徐海东讨论当前的军事情况，告诉他靖远的渡口已为敌军攻占，第四第三十一两军急须从陡城堡及其以北地区渡过黄河，请他速派人前往那一带考察地形敌情和

渡河工具等，并向靖远会宁方面警戒，严防敌军的进击。我们总司令部准备在打拉池驻扎一个时期，处理这一渡河的军事行动。

徐海东部侦察的结果，认为继续渡河已不可能，陡城堡已为敌占领，敌机沿河搜索，河中没有任何渡河工具，而敌军胡宗南的一部正由兰州循甘新大道，开往武威，马步芳的骑兵也正由西宁北移，其目的都在截断我军西进的道路。此外我们南面的敌人，也正向打拉池、海原、同心城、豫旺一线进逼，企图歼灭我在河东的部队。

徐向前陈昌浩来电希望我们能继续渡河。于是他们一面以第九军掩护总司令部总指挥部各直属机构向古浪挺进，另一面则由徐陈两人率领第三十军及第五军团，北向占领景泰、一条山一带沿河阵地，俾能掩护我们在石佛寺附近渡河。

我们根据当时的情况，电告徐陈二人，渡河已不可能，要他们率已渡河的部队，单独行动。我们指出在敌军压迫和缺乏渡河工具的情况下，时间上已不允许第四第卅一两军安然渡过黄河，如果他们仍徘徊河边，势将进退失据，应即率全部，迅速行动，占领古浪武威一带地区，集中力量，控制甘新大道，以武威以西的适当地点为后方。至于总司令部，将督率第四第卅一两军及彭德怀徐海东等部，尽量在打拉池海原同心城地区，抑制大部份敌军，以期减轻对西路军（即徐陈所部）的压力。

从此，徐陈所率的西路军便与我们分道扬镳了。他们遵照我们的电令，由景泰沿长城往古浪以北的土门子，直

趋武威，我们则在敌军压力之下，由打拉池、海原、同心城，逐渐向东移动，靠近陕北苏区。

我们在打拉池停留了约两个星期，主要工作是牵制敌人军力的游击活动。我在军事倥偬之余，常与徐海东等老战友话旧，据徐海东告诉我，他现在的第十五军属下只有三个团，却号称三个师，每团人数约为五百余人，总共不到两千人，枪枝则有一千三百左右，全军战士之中来自鄂豫皖者为数已少，多数系在陕甘补充的，不过军事干部仍多，系鄂豫皖区的老战友，政治干部则大半由一方面军调来充任。他觉得他所率领的队伍，现在只有虚张声势，负担避实就虚的游击任务，如果要打硬仗，那只能算作一团人。

徐海东的奋斗经历，是一篇标准的红军军人的壮烈史诗。

他从鄂豫皖奋斗到那时，所经历的艰险尤过于我们，可惜他对我叙述的详情，我已不能全部记忆。他说一九三二年八月间我们离开鄂豫皖以后，许多老战友如沈泽民、王平章、徐立清等都艰苦奋斗，直到最后一口气；郑位三、高俊亭、郭述申等则留在鄂豫皖区，从事游击活动，现在他们的生死，也不知道。他又描述敌人在鄂豫皖区的种种残忍屠杀行为。他自己到万不得已时，才率部离开那个可爱的根据地西行。

敌人屠杀行为的残暴，在鄂豫皖区可谓登峰造极。据中共现在所发表的史料，在鄂豫皖区被杀者有二十万人，为各区之冠。这一点从徐海东与斯诺的谈话中<sup>①</sup>也可见一

斑。我听见不少有关敌人在各个苏区的残杀行动，即在我们退出后的川北苏区，也制造了不少的“万人坑”，不过比之鄂豫皖区，亦是大巫见小巫而已。当权的国民党，也许以为杀人可以止杀，其实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古有明训的。

徐海东说到他的西行，也是受我们在川北发展的消息所鼓励。一九三三年间，敌方的情报屡次说到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很猖獗，他听到了，有说不出的高兴，率众西行来找寻我们的念头，也就油然而生了。一九三四年夏季，他带着两千多人，打着红二十七军的旗号，跨过京汉路，西向横冲直撞，沿途打了许多次大大小小的仗。他们到达陕西后，绕着秦岭山脉行动，队伍人数损伤了大半，子弹消耗殆尽，有时甚至无粮果腹，露宿山头更是平常事，而且通往川北的道路又被敌军控制了，乃不得已渡过渭河，向陕北发展。

徐海东等未到陕北之前，总以为那里是著名的土匪巢，不料到了那里之后，竟发现有共产党和红军，他们很快的就与刘志丹高岗等的游击队会合了，敌人的压力也减轻了，因此他们就在那里停留下来。陕北的游击区是很零碎的，主要的两小块，一在神木府谷，另一在保安靖边安边。一九二七年以后，陕西有些同志逃到这些边远地区，搅土匪，打游击，并不知道苏维埃和红军的章程，因而一切显得落后。那里的游击队，分子也极复杂，除了共产党员外，有土匪，也有非共产党的知识分子。

红二十七军到达陕北游击区之后，推行鄂豫皖区的经

验，红军和苏区都有可观的发展，声势为之大振。戴继英<sup>②</sup>聂鸿钧<sup>③</sup>目击陕北游击队内部复杂情形，急图建立坚强基础，便大张旗鼓整肃起来。陕北许多同志被当作土匪或反革命，有的被杀，有的被拘禁，有的经审讯以后释放。徐海东觉得戴聂二人做得过火了，太盲动了，没有充分估计到陕北的落后情况。整肃的结果，使陕北同志感觉不安，以为鄂豫皖来的老红军是压迫本地人的。

徐海东对于毛泽东等一到陕北，便能纠正戴继英聂鸿钧的错误表示敬佩。他说到毛主席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带着北上先遣队到达陕北，已是疲劳不堪，但一般同志素来对中央的信任很深，尤其是听到毛主席的名字便肃然起敬。毛主席等中央要人旋即纠正了戴聂的错误，将被拘禁的高岗等都释放了出来，而且极力号召同志们无论是由江西来的，由鄂豫皖来的，或者是陕北本地的，都应团结一致。这样做的结果，陕北的气象，为之一新。

徐海东还说到，自林育英到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展的情形，对党内团结有所帮助。他仍和在鄂豫皖区时一样，亲切的称我为主席，对我表示信任，并极力指斥那种诬我因个人权位而反对中央的传说之不当。但他特别重视党内团结，认为团结是生路，分歧是死路，他恳切希望我能到保安去与毛等握手言欢，这样，会使前方士气为之大振。

徐海东这个朴实的军人所说的这些话，显然是真情的流露，不仅可以信任，而且令人感动。我同样觉得戴聂的整肃工作是做得过份了，毛泽东等出而纠正是适当的。我

除了对徐海东表示这一点看法以外，也说到我正努力于党内的团结工作。

敌军已从陕甘公路进占海原县城，我们为了避免为敌军所包围，因东向同心城撤退。甘北地区，人烟稀少，粮食缺乏，河水含有苦涩的矿质，不能食用，人民储雪于窖，作为终年的食水，我军所到之地，迅即将民间窖水消耗掉了，这也使我们无法在甘北作久居之计。

在同心城一个大院落里，我和朱德率所部与彭德怀又重新会合了，我们一道盘桓了两三天。彭德怀那时担任前敌总指挥的工作，所有陕北的红军，统归他指挥，而且陕北苏区的南面，我军与张学良杨虎城部形成了休战状态，因而他能率领陕北红军的全部，以同心城为中心，分散在甘北一片很广大的地区内策应我们。

这是我与彭德怀第一次共事，我觉得他是一个富有作战经验也有政治欲望的一位军人，他处理军事问题显得精明机警，性格倔强自信，他爱谈政治，对于西北抗日局面，抱有极大的期待，他津津乐道他俘虏万毅的经过，怎样优待他、说服他，言外之音，似乎是他对这次的西北局面，有过莫大的功绩。我们大家似都有意避谈毛儿盖的往事，因而谈话气氛总嫌不够亲切。

毛泽东等知道我们从打拉池退到同心城之后，来电告诉我们的敌军胡宗南部主力正由南向豫旺县前进，企图抄袭同心城的后路，主张我军撤离同心城，向山城堡、洪德城、河连湾集结，以便在豫旺以东地区消灭进犯的敌军。他们并派周恩来驰至洪德城迎接我们，并与我们共商作战，我



们复电表示赞成这样办，并即率全军向洪德城移动。

在河连湾这个集镇的大路口上，我和朱德与保安派来的“迎接大使”周恩来握手言欢。周恩来是与张学良在延安谈判西北抗日局面的当事人，我们一见面，自然首先问到这件事。他对西北抗日联合政府能否组成一点，不作任何肯定表示，他说明这是要决之于张学良的。目前蒋的嫡系部队，为了要对付我们，云集在陕甘大道及东北一带地区，情况自然对张不利，张是否能有所发动，大有疑问。

张学良为甚么热中于抗日，周的分析比较恰当。他认为万毅的牵线，只是促成了我们与张的接触，而张的抗日决心，是有日本有增无已的侵略为其背景的。这位少帅遭遇奇惨，他那个著名的亲日派父亲被日本人谋害了，他也被撵出了东三省，而且代人受过被国人唾骂为“不抵抗将军”。他虽然担任着剿匪副司令的名义，而将却歧视他，似乎要让他的本钱——东北军——在剿匪中被消灭掉。这一切逼使他非抗日不可，而且他对蒋也有恶感。

周恩来觉得这些年来，中国的情形是变了，主要是日寇猖獗，触发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就拿这位张少帅来说，他父子两人是国人公认的亲日派，干过许多亲日卖国的勾当，又是共产主义者的世仇，他父子杀害了李大钊等同志，受帝国主义的指使一贯反苏，甚至发动过对苏联的战争，我们一向都觉得张学良是比蒋介石还要可恶的反动派，现在连他都被日寇逼得走投无路，反过头来要联共联俄，这是已往想像不到的事。此外，抗日怒潮弥漫全国，不久以前，西南军人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也藉抗日的名义反对

南京，甚至南京政府内部也有些人具有抗日的情绪。

他进而强调不能拿过去的眼光来看张学良和东北军，他指出张学良过去是一个染有烟癖的花花公子，现在却奋发有为。东北人都希望打回老家去，东北军就是体现这种愿望的部队。东北军中的青年军官最大多数是热情反日的，东北的青年，尤其是东北大学的学生，都群集到西安来，高唱流亡三部曲，这确是动人心弦，张学良本人便成了东北军和东北人抗日的号手。东北军中一些亲日派是失势了，老派将领如王以哲等支持青年军人抗日，即较保守的何柱国于学忠等也只得随声附和。

周恩来说到他与张学良接头的时候，张学良的态度很坦率诚恳，张以“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这八个字作为我们联合的基础。至于西北抗日局面这个概念，还是相当模糊，没有确定的纲领和做法，连这个“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名词，也只是我们方面提出来的，张未置可否。

不过他相信张学良是有办法的，会联络山西四川两广一带的实力派，也会根据各方的意见，拟定办法出来。譬如说张与杨虎城同处一地，本易发生磨擦，却彼此相处得很好，可以一致行动，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

我自从一九三一年踏进鄂豫皖区之后，老在偏僻地区打游击，与世隔离，已达五年半之久，时代的推演，简直使我成为一个孤陋寡闻的乡下人了。周恩来从偏僻的保安，通过西安这个小窗口，吸取了外来的阳光，他所知道的虽仍很少，所告诉我们的，也不免有些抽象，但已使我们觉得世界是真的变了，而他又确已得风气之先，我须急起学

习，赶紧拍去满身游击的征尘，换上知识分子的道袍，以适应城市生活。

当时，西路军的败象已经显露出来，我们在同心城时即接到徐陈电告，谓我第九军在古浪为马步芳骑兵所袭击，损失惨重，伤亡在一千以上，他们说明这次失败的原因是指挥的将领们不谙对骑兵作战的战术，第九军的主力布置在古浪县两旁的高地上。大路上的防御工事做得不够坚强，防守的兵力也单薄。敌骑因为冲进古浪县内的街道上，大肆蹂躏，损失最惨重的是西路军总指挥部各直属机构，参谋谍报人员死伤甚多，侦察电台和其他通讯器材，散失殆尽，这简直是使西路军丧失了作战不可或缺的听觉视觉、以及一部份的神经系统。

我们到达河连湾时，西路军告急的电报接踵而来，其主要内容是马步芳的骑兵得着古浪胜利的鼓励，到处展开对我军的袭击，使我军防不胜防，骑兵行动的迅速，又抵消了我军的游击专长。胡宗南部杨腾蛟旅已先我占据武威这个军事要地，阻梗我们向西发展的道路，西南军正拟由小路绕过武威，占领武威以西的永昌、山丹、张掖、酒泉等地。徐陈等所冀望于我们的是经常供给他们情报（因他们的侦察电台已丧失了），如有可能，自然希望给予其他军事上的协助。

西路军的处境，使我们大感忧虑，我和朱德周恩来曾再三商讨，想不出应援的办法。马步芳是效忠于蒋介石的，我们不能通过张学良去影响他。在军事上，我们自顾不暇，无法策应，我们只有暂时停留在河连湾，将我们的通讯电

台，临时改为侦察电台，供给西路军一些必要的情报，并另电保安军委会侦察电台，尽可能将情报供给西路军。

我们本身当前的军事情况也很紧张，当我军由同心城经豫旺县向山城堡撤退时，胡宗南第一军的主力即衔尾追击我军，正向山城堡压迫，我方的对策是实行坚壁清野，使敌军因粮食缺乏不能在这里久留。我们估计敌军有占领山城堡、河连湾、洪德城、环县、曲子镇以至通庆阳这条线的企图，那里是陕北苏区产粮食较多的地方，我们自然要在这里牵制敌军，不让他们实现这种企图，否则就连保安也要受到威胁了。

河连湾一带在陕北苏区看来，是较富庶的地方，实际上仍人烟稀少，粮产有限，不易长期供应我们这支大军。这里的河水虽已不苦，但仍是黄土高原的组成部份，稀疏的村落，粮食生产只有一些小米，畜牧以绵羊为主，运输多赖驴子。同志们大多认为这里的粮产，还不及西康地区，甚至有人设想到，如果在一年前我军果真全部自毛儿盖去到陕北，恐怕早就要饿死人了。

我们在河连湾山城堡一带与胡宗南部相持了近一个月，胡部终因食粮不济，向豫旺撤退。当胡部撤退时，我军乘势袭击，截掉他们一段尾巴，颇有斩获，俘获人枪各千余，河连湾的战事至此告一段落。周恩来将这次胜利的情形电告张学良，这对于不久以后西安事变的发生，也许不无影响。

这次战争的胜利，<sup>9</sup>周恩来的贡献最多，他熟习当地情况，实施坚壁清野的工作。他一面调度人力兽力来运输粮

食，供应我军前线，有时要从几百里路的远方运粮食来，另一方面他组织游击队赤卫军，到接近敌人地区去活动，将所有的粮食运出，并拉空那里的人力兽力，使敌人困于给养。敌人主要就是为了这一点，不能不向豫旺退却，俾能接近公路线，获取补给。

当前战事告一段落后，我和朱德周恩来即举行会议，检讨局势。由于我的提议，我和朱德率红军学校学生驰往保安，与毛泽东等会商今后工作，前线军队（包括我们率领的第四军及第卅一军）暂交彭德怀指挥，从此，总司令部便不直接指挥部队了。周恩来则须先赴各县，料理这次战争所未了的事务，然后再返保安。

从这时起，所有红军又开始合而为一了，为了这件事，我曾向红军学校的学生发表演说，解答他们的一些疑问。我向他们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情形，西路军的不幸遭遇以及党内团结的经过。我说明我到保安去，主要是促进党内团结，并设法供应西路军的情报，并呼吁一般同志，化除已往有过的歧见，与来自各处的同志精诚合作。党内问题自可由党内的会议解决，而红军则是一体的，不应有任何界限。

红四方面军自毛儿盖与一方面军分手，以迄现在我们北上再度会合，其间经过，大致即如上述。事实如此，是非得失，唯读者察之。

- ① 见《Red Star Over China, by E. Snow》亦愚译，急流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第二二七页至二三二页。
- ② 戴继英，湖北籍，系鄂豫皖区的省委员，任红二十七军的政治委员。
- ③ 蒋鸿钧也是湖北籍的同志，似是二十七军政治部主任。



第二 十 篇

国 共 和 解



# 第一章

##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幕，使整个时局为之改观：在国民党和南京政府说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转变为“团结内部，一致抗日”；在中共和红军方面说来，九年的苏维埃运动从此结束，中共成了一个特殊的在野党，红军及其所占领的区域，至少在名义上成为国民政府属下的一部分。这其间的经过，已有不少历史文献可供研究，这里仅就我个人所接触到的，略述一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sup>①</sup>我和朱德率总司令部直属机构人员到达保安。保安的红军学校校长林彪率领学生队伍到郊外欢迎我们，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要人也和在懋功初会时一样，站在学生们行列的前面迎候。在一个预先布置好的讲台上，我们都发表演说，互致祝贺。我的演词是强调对外抗日对内团结。那时我们所谈论的，不是那些过去的事，而是策划未来。

保安是我所见到的县城中最荒凉的一个。它的规模不及长江下游的一个集镇，而且经过历年的天灾人祸，房屋多已倒塌，我们来后立即发生住屋不敷分配的现象；我和朱德都分得了山边的一个窑洞，与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王

稼祥林伯渠等结邻而居。这些窑洞的前面，原有一条由商店住房所组成的街道，但那时房屋已是荡然无存，在废墟之上，已种满了各形各色的菜蔬。总司令部人员就只有各按工作单位性质，分别挤住在同类的机关里。我们所带来的红军学校学生，就合并在林彪所主持的红军学校里。

保安的荒凉和落后是特别引人注目的。这里几乎没有读书的人，满清的时候，保安的定额秀才，多是不识字的。直到那时，全县很难找出一个中学毕业生，这件事是我们谈论保安文化落后时所常提到的。这里人烟稀少，街上通常都是红军战士多于老百姓。据说这里的粮食，只要一年丰收，就够吃三年。可是这样的好年，却是难逢难遇。主持经济财政的林伯渠同志，就像周恩来在河连湾一样，聚精会神在那儿解决供应上的困难。

陕北一带是中国历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啸聚之所，它的各种条件，像大海中的一个避风塘，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们最初的目的如何，当他们处在逆境的时候，不是南走汉中秦岭巴山山脉，便是北走陕北，以待时机。这主要是地理的形势使然。

我在保安会见了林育英（我到时他因事他往，继闻我来保安，即忙赶回来）。他仍是和从前那样热诚朴实，说话的时候，全身各部都在用劲，似乎要将他心中所想的倾泻而出。他为了要完成两个中央的联络人的任务，对我和毛泽东等已往的英勇奋斗，倍加推崇，把我们比作玛瑙珠子，在未曾采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前，串拢这串玛瑙珠子的线断了，他自己好比是这根线，要重新串拢这些玛瑙

珠子。

他将他所知道的莫斯科情况告诉我，主要是说明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地位大为提高。自德共受希特勒的摧残以后，中共已成为共产国际中仅次于联共的第二个大支部，各国共产党对于中共这些年来所从事的苏维埃运动和游击战争，均表敬佩，认为是中共革命精神的惊人表现。中共在莫斯科的代表王明等，在共产国际的地位也随着受人重视。他们正宣扬中国革命的重要，唤起各国革命者与共产党人的支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亦已选举毛泽东周恩来王明和我四人为主席团委员。

我对林育英这个中共中央联络人甚为尊重。我将已往经历扼要报告他，并问他准备采取何种步骤，来弥缝过去有过的裂痕，并使中共中央的领导正常化。他告诉我现在陕北方面，军事党务仍由毛泽东张闻天分担军委会主席和书记的责任；他则担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目前最重要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到了适当时期，再行召集一次中共的扩大会议，解决党内问题。他认为这是他这个联络人应有的交代，并主张原任中央委员仍旧，不过未来的扩大会议，可以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工作。

除林育英以外，其他同志没有谈及已往的事，似乎每个人都在注视着陕北以外的情况。从保安这个角落里去看全中国，确是不容易的，人们在那里根据西安传来的或者从无线电中收听来的一鳞半爪的消息，作为谈助，多方推敲。

张闻天觉得这些年来，中国的情况是变化了，有些方面已有显著的进步。他告诉我他看到一些外来的书刊，有些新进的作者写出的文章，内容很充实，文笔也动人，相形之下，自感不如。尤其是近半年来流行的许多抗日歌曲，更显出艺术水准的进步。他慨叹这些年来我们在山中有些落后了。言外之意，非急起学习不可。

张闻天还特别提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京学生所发动起来的反日运动<sup>②</sup>。他所知道的虽仍模糊，但他指出当日本向华北发展，积极酝酿华北自治，曾激起北京学生的反抗。他觉得这个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不亚于“五四”运动。南京政府虽多方镇压，但这个运动仍是普遍到全国，而且学生们组织了民族先锋队，较之“五四”时期学生联合会的组织，尤为得力。

中共的白区地下组织是破碎了，不能领导抗日运动。自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转移到苏区以后，中共在上海等地的组织，迭遭破坏，有些地方根本没有组织了，另一些地方只剩下一些个别的党员，张闻天又说他一直企图找到那些地下组织的线索，但仍无头绪，那时所知道的只有刘少奇在北京活动，似能领导那里的同志，幕后指挥“一二九”运动。

但中共的政治影响还是相当普遍，许多脱离了组织关系的或者失去联系的党团员，以及一些同情共产党的人物，现在又是抗日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有些躲在上海等大城市的亭子间，做左翼作家；有些在群众性的团体中活动；有些混到国民党各军政机关，发挥微妙的作用。张闻天觉得

有些同志过去被视为投机分子或不可靠的分子，现在竟证明他们能单独奋斗。他也觉得中共中央须根据新的情况，从速整理白区党的组织。

张闻天对我们与张学良合作抗日的前途，不愿多表示意见，似乎也不抱乐观。他曾向我表示这些事都由毛泽东周恩来两同志在处理，前者在后面策划，后者在外奔走，并说：“老毛懂得旧社会旁门左道的那一套，让他去干罢！”张闻天说这些话，可能有多方面的意义，其中之一也许是暗示我不要去干预“老毛”所管的事。

毛泽东那时似乎是聚精会神注意“国家大事”。他笑着向我说：他是“买空卖空”，这句话的含义，似乎是说红军实力现在虽然不大，他却在和人谈大买卖。他根据他所知道的材料作各种推测，主要说到日本侵略东北和华北，破坏了远东的列强均势，引起英美苏的不满。国内的反日潮流，也深入到国民党军队里去了，看来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很难维持下去。

他说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时，也只承认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的默契是一项具体成就，可以称之为“张杨共三角联盟”。他推测将来西北抗日局面的发展，大致是由张学良与杨虎城选择适当时机，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南京自然不会接纳，其结果将在西安出现一个反南京的独立政府，这个政府能否存在，一面要有一个明确的抗日纲领，获得英美苏的支持和国内舆论的拥护；另一面要看张学良杨虎城能否联络各省的实力派和瓦解南京内部。至于几天后西安事变的发生，他当时似毫无预感。

毛曾表示莫斯科是支持中国抗日的，也会支持西北抗日局面。他说莫斯科从未肯定表示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但也未表示过反对，据他推测，莫斯科的来电曾表示，如果红军能由宁夏接通外蒙，或者经由甘肃河西走廊接通新疆，苏联将予以军火援助。这样，我们可以相信，如果能形成一个更广泛的抗日西北局面，那苏联更非援助不可。

当时中共中央没有举行过任何正式会议，似乎都将责任推在林育英身上，而林又不管事。对外关系，如西安的电报来往，完全由毛处理，他每次接到西安来电，就邀我们去谈论一番。这些电报有些是关于蒋氏将要在西安举行“剿匪”会议，指示“剿匪”机宜，有些是关于西安和其他地区抗日运动的发展情形，我们便据此谋求对策。我们回给张学良的电报则都是毛泽东的精心杰作，字里行间，极尽打气之能事。

我当时最注意西路军的情况。正在西移的西路军，沿途与骑兵苦战，虽曾获得好几次的零星胜利，但我方弹药消耗日多，有无以为继的情势。这种情形，使我十分焦虑，我研究各项情形，并试用各种可能方法，冀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予西路军以助力，以期挽回厄运。

我的心情当然是不愉快的，别人也不多理会。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内，每日都有谈话会，大家都避谈往事。毛泽东、张闻天等似因过去的分裂，心理上不无芥蒂，他们对援助西路军的事，并无积极表示，而且言词之间，总有些推推诿诿。为了挽救西路军的厄运，我只有耐着性子和各人商谈，但无法找出补救的办法，奇迹是不会从天而降

的。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近午，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我们阅看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其内容大致是：他曾向蒋痛陈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蒋则一味拒绝。他不得已实行兵谏，已将蒋氏及其亲信随员妥善看管，促其接纳抗日主张，不达目的不止。电报并说即派机飞延安，迎接共方代表周恩来等来西安共商大计，又说他和杨虎城的部队向西安潼关线集结，希望红军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衔接前进，以防不测。

这个突如其来的电报，使我们都大为激动。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有的人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平素持论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竟抢先表示：“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这时已经回到保安几天的周恩来较为冷静，他表示：“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们作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一直在那里狂笑的毛泽东也接着表示：“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我当时虽很激动，但仍冷静的说：“莫斯科对这件事会怎样看，我们不妨先推测一下。”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都表示应去电莫斯科请示。于是我们一面继续谈论，准备周恩来前往西安的事，一面草拟致莫斯科的电报。

我们商讨的结果，决定下列各点：一、致电张学良表示赞许，并保证今后行动，惟马首是瞻；二、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三人为代表经延安飞赴西安；三、电彭德怀等率部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挺进，沿途与友军密切联络；四、电在西安的联络人员，除对抗日宣言表示某些具体意见以

外，一切俟周恩来等到后再议；五、周恩来等在西安亦应俟莫斯科回电后再作具体表示。于是，周恩来等即赶往延安去了。

我们致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除报告西安事变的真相外，并指出这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拟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决裂，请共产国际从速指示。

西安事变，使我们一时为之扬眉吐气，似乎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我们希望张学良电令马步芳不可破坏抗日大局，应即对西路军停止作战，这件事张学良照做了，但马步芳并未接受这个命令。我们正为陕北的红军粮食缺乏担忧，如今部队南移，粮食和其他补给便都不成问题。而且国民党方面的剿共阵线，已告破坏，我们正可乘机进取。

西安的电报如雪片飞来，多数是报告拘留蒋氏等人的经过，以及南京方面的反应，及各项军事情况。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电报是张杨等十九人在十二月十二日所发表的通电<sup>③</sup>。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学良的来电对如何处理蒋的问题，颇表踌躇；对南京的军事压力，也颇有顾虑。毛泽东聚精会神在那里草拟复电，不是尊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便是赞扬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他的电文内说到严密看守蒋时有这么



一段：“我公顾虑周详，枭雄自难漏网；但诚恐有万一之失……”说到惩办蒋时又有这么一段：“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

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都觉得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异是养痍遗患。有的人主张经过人民公审，将这个反共刽子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

就为了这种主张上的不同，毛泽东与张闻天曾发生了争执。张闻天似是批评毛泽东对张学良的复电，措词不够坚强，正当他们争论的时候，我闯进了毛泽东的窑洞，毛正在怒骂张闻天，说张闻天过去在江西反对他的游击主张，现在又以书生之见反对他对张学良所持的态度，张闻天面红耳赤的默然走了。

毛泽东即向我解释他那些电文措词的用意。他表示他与张闻天的想法并无根本的不同，却在措词的技巧上发生了歧见。他说明他所草拟的电报，处处给张学良暗示，要他坚决对付蒋，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的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的。

这时朱德也来了，他打断了毛的说话，大声说道，爽爽快快的同张学良说，杀了蒋再讲其他。他说明的大意是，现在是千钧一发的时候，应当机立断，用不着等候莫斯科指示，来一个先斩后奏。毛听了朱德的话，微笑着安慰朱德说：我和你的意见并无不同之处，不同的只是方法；我

已着力暗示张学良应该如何做，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说出来。毛泽东又带点教训的口吻向朱德说：不要想得太简单和死板，你如何能断定张学良一定会听我们的话，对我们一点疑忌都没有么？

幸好莫斯科的回电于十三日的晚间到达了。这是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内容分为三段：第一段，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所制造的；并说明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里，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我们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力量，因之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苏联决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任何支援；相反的，现已明白表示反对态度。第二段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并说明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蒋释放。

一年以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曾对我们说明上述这个电报的来历。他说西安事变后，英美各国驻莫斯科大使，曾询问苏联外交部，苏联政府对此事的态度。苏外交部答以这是日本的阴谋，苏联既未预闻，也不赞成。接着斯大林便亲自草拟这个给中共的电报，并向王明解释，其大意是张学良份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

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在抗日中他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者<sup>④</sup>。

当然，在当时偏僻的保安，我们无法知道像王明所说的那些内情，因而这个电报之来，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都在沉思，毛泽东更是踱来踱去。有的表示西安事变分明是张杨共三角联盟酝酿而成的，如何能说是日本阴谋？有的表示长期内战倒是应该避免；有的表示如果将蒋释放了，他将会不顾一切的对付我们；有的表示西安事变如果得不着苏联的支援，那里会有胜利的希望？毛泽东曾很急躁的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就在这种气氛之中，会议无法继续下去，我们于是分开，各自去详加考虑，或者个别研讨，就这样费了一整晚的时间。我通宵没睡，花了很多时间与毛密商，我们一致认为如果不遵照莫斯科的指示行事，得不到苏联的支援，反而会被国内外各种势力围攻，后果是会很严重的。如果照这三点指示进行，张杨共三角联盟可能立即破裂，即使我们避免了这种破裂，和平解决以后，蒋氏的报复，将是难免。两相比较，第一条路是走不通的，极为显然；第二条路虽阻碍重重，也许能找出一线希望。

这是急如星火的事，我们于是在深夜重行齐集在毛的窑洞里，商决具体步骤。我们决定将莫斯科的来电立即转电周恩来，要他根据这个指示，向张学良试探，如果情形顺利，即照指示的原则进行，否则要为中共留出回旋的余地。

周恩来于十三日抵达西安后，与张杨商讨今后进行步

骤，张学良曾问及莫斯科有无电报指示？对西安的行动，持何态度？周认为张的这些问题，自然是寄望于苏联的援助，极为殷切。周接到我们的电报后，对莫斯科的态度也极表惊讶，但应允向张学良秘密试探。

周恩来于十四日与张密谈，迳行表示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最初的反应甚为愤慨，他似觉得为共方所卖，已往共方老是吹嘘苏联可以援助，现在他已势成骑虎，中共竟临阵抽腿，不兑现了。周恩来只得低声下气，百般解释，说明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事。苏联也有他的苦衷，例如外交的压力是不能不顾及的。中共决始终与他站在一起，凭本身的力量，来担当一切。现在事已至此，决不能互相埋怨，只有一本初衷，共策进行。

他们两人于是密商进行方针，周恩来曾向张学良表示，据他个人看来，在西安成立一个独立政府和对蒋制裁，都不能算是好办法。现在南京正在叫嚣讨伐西安，如果我们制裁了蒋，这将予人以口实，蒋的徒子徒孙们，将用报仇的名义与我们纠缠，这将是长期的内战，而且胜负未可逆料。周这些话，终于打中了张的心弦。

于是周进而表示，他个人有一种还不确定的想法，愿意说出来供张参考。周向张坦白说明，我们所需要的是全国抗日的局面，而不是偏处西安一隅的局面，因而我们所要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现在南京方面，也有人不愿意打内战，更有人不愿逼西安方面去制裁蒋。我们可以一面备战，一面与蒋谈判，如果蒋明白接纳了我们的主张，那他将来也难反悔。

张学良听了周恩来这些话，并未发生反感，反而向周说，这件事不能让外间知道，也暂不向杨虎城提及。他们两人先研讨具体办法，一俟稍有把握，再对外发表。于是他们商定如何优待蒋的办法，以及如何向蒋进言等。

这些经过情形周曾详电保安，并表示欣慰，认为和平解决有希望。我们接到周的电报，也为之高兴。乃决定坚决推动张杨走和平解决的道路。我们大家虽已这样决定了，但心中的疑团仍是存在。张闻天曾向我指出：“这是为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全部利益，不得不牺牲中共的局部利益。”他说明苏联大概是受了外交上的压力，不得不置身事外，可是将来蒋介石释放出去了，那我们可要吃大苦头。

十五日在林伯渠办公的窑洞里，我们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传达莫斯科的指示。我们这些政治局委员，都发言支持和平解决，我的发言自然也是支持和平解决，但说到和平解决的前途时，也同样表示未敢乐观；即是蒋在西安时可能答应我方的要求，但一回到南京，也可能借故翻脸，因此，我们须更加努力，团结内部，充实实力，准备应付未来可能的坏演变。就因为我说了这些话，后来被我的反对者断章取义、抹杀我号召中共内部团结的本意，诬指我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特别缺乏信心，甚至说我反对和平解决。这不能不算是“欲加之罪”了。

当时的局势相当微妙。最初是一片战争气氛，接着调和论调逐渐抬头。南京一时群龙无首，一般人估计蒋无生还之望，因而主张讨伐西安，当然其中也不无幸灾乐祸的企望者。西安张杨部的将领，也觉得既用非常手段扣留了

蒋，那里还能有妥协的余地；这种骑上虎背的情势，使他们有一不做二不休的想法。

但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始终对蒋没有采取完全决裂的态度。临潼华清池的枪声是过去了，他们侍候在蒋的左右执礼仍恭。他们所发出的通电，也只希望接纳八项主张，并保障蒋的安全。

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密谈，固是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一个直接原因，同时，当时的情势也逼使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南京的重兵纷纷开进潼关，飞机又在西安上空威胁，这使西安当局，大多觉得战争的爆发将不利于他们。各方实力派发给张学良的电报，也多持息事宁人的态度。因此，张学良的和平解决意向一经明朗化，调和气氛就代替了火药气味。

张学良所坚持的是蒋签字赞成他所提出的上述八项主张，蒋则为了政府和个人的威信，不能在挟持之下，有所承诺，坚持不允签字。端纳、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等奔走其间，多方调解，宋氏兄妹且表示蒋先生已应允了八项主张，如果一定要蒋亲自签字，心理上留下痕迹，反为不美。

周恩来曾致电保安，报告他与蒋氏长谈的经过。首由张学良说项引见，张对蒋说，委员长的一位旧属求见，请委员长予以接见，蒋氏未置可否。周恩来当即步入蒋氏的住室内，向蒋严肃敬礼，并仍依黄埔时习惯，称蒋氏为“校长”。蒋氏最初板起面孔不予理会，周即坐下来慷慨陈词，蒋氏则留心静听。周首先说明中共决无不利于蒋氏和

南京中央的想法，并希望一切和平解决，中共愿拥护蒋氏做全国领袖，实行抗日。周也乘势说明中共政策改变的始末，力证化除成见，团结御侮的必要。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他的陈词曾使蒋氏的心情渐渐平静，似也相信周的真诚。周恩来根本没有说要蒋氏在八项主张上签字的话，只在气氛轻松的时候，请求蒋氏有些指示，并与蒋氏略叙家常，说到其子蒋经国氏在苏联颇受优待，蒋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满口答应将助他父子团聚。

周恩来在报告中，解释他对蒋介石氏，始终恭顺恳求，未露半点要挟之意，为的是不留痕迹，以便有再与蒋氏见面的机会。周也说到蒋氏态度甚为得体，他只提及他的儿子，似是属于私人范围的事，但也微露国共和解之意。周希望国共十年战争，至此能是国共和解的起点。

张学良当时确是排除万难欢送蒋回南京的。杨虎城因不完全知道和平解决的底细，不免有所疑虑，有时甚至表示反对的意见，经张学良、周恩来以及调人宋子文等多方劝说，杨终于赞成了。蒋乃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乘飞机安然返回南京。

周恩来来电报告蒋离开西安的经过时，曾特别对张学良随蒋同往南京一事，表示遗憾。他指出张过于冲动，事先并没有向他说到要送蒋前往南京的意向，否则他会劝阻。蒋氏飞机将起飞的时候，他正和张学良站在一块送行，张说：“我送委员长。”便步上飞机，虽经蒋劝阻，但张仍是登机起飞了。周说明他当时真着急，但在稠人之中又不好说话。

周接着说明张学良走后，西安一片混乱，张事先没有任何的部署，任何人也不知道以后的做法。杨虎城已在自作打算，准备将他的部队，向安全地带移动。东北军更是群龙无首。少壮派军人于失望之余，迁怒于中共，说中共害了他们的“少帅”。如今张杨共三角联盟是完全解体了。主要是没有人作主，我们也找不出商谈的对象。

果然，东北军的少壮派鼓噪起来了。五十几个少壮军官，以死来威逼周恩来，他们持着武器，在一个会场中向周质问他们的少帅那里去了？他们说西安事变是中共挑动起来的，事后中共又提出和平解决的办法，出卖盟友，与蒋系人员，秘密妥协，牺牲东北军，以图自身的私利。从前共方老是说苏联援助，结果竟是骗人的，现在张少帅去南京，当然凶多吉少，东北军人也将死无噍类。这一切的一切，都要由罪魁祸首的周恩来负责。

周恩来面临着这种险境，施展出全身解数，幸而应付过去了。他态度镇静，措词诚恳，向会众说明：张少帅随蒋赴京，实出意外，他不赞成，但来不及阻止。他又说到如果我们内哄，张少帅的生命就会没有了，东北军也会完蛋的；如果我们团结镇静，蒋对我们的力量将有所畏惧，不敢为难你们的少帅；三角联盟也能继续存在，发挥作用。周并向那些愤怒的军人们誓言，中共决不出卖三角联盟，始终与盟友站在一条战线上，决不让少帅和东北军一方受害。那些暴躁军人终于在无可奈何之中不得不顾全大局。

至此，西安事变一幕便告结束了。被拘禁的蒋介石安然回到了南京。这一事变的首脑张学良，从此渡着长期不



见天日的生涯。当事人之一的中共，由与张杨共同反蒋，一变而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调停人，再进而南京谈判，以期达成国共间的和解。张杨共的三角联盟，因内部的混乱，再也不能有一致的行动了，西安事变的众多关系人都在洗刷自己的责任，以期蒋介石那根报复的棍子，不会打在自己的头上。更重要的是剿共的战争事实上是停止了，代之而来的是抗日战争。

- ① 我在一九三八年发表的告国人书中，曾提到我是在西安事变以前十天到达陕北的，那应当是十二月二日。
- ② 关于“一二九”运动的详情，可参看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一二九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
- ③ “双十二”张杨等十余将领发表的通电全文见：《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冯玉祥著，第四十九——第五十页，香港文化供应社，一九四九年再版。
- ④ 西安事变前，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已有改善这一点，David Dallin 在其所著《苏联与远东》一书中（见第五章——国立编译馆民国三十九年版）曾加阐述：而西安事变时，英美各国与苏联对远东的外交态度，渐趋接近一点，也可从王明这些话中窥其梗概。

## 第二章

# 延安百态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氏脱险，由张学良陪同自西安飞返南京，此举使西安的张、杨、共三角联盟立即陷于混乱，也令陕北中共内部大为震动，几乎无人不觉得将有大祸临头。乘此时机，毛泽东氏玩弄其“买空卖空”的手腕，抛弃一切道德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原则观念，不择手段，甚至无所不为的企求达到他的目的。这种目的，是防止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再继续剿共或逼降，以求中共的生存和乘机发展。这些又与毛氏奸诈地追求个人独裁的勾当纠缠在一起。应当说毛氏的努力，获得了相当的成就，中共终于喘过一口气，但从此毛氏也真正建立了个人独裁的基础。

只要约略研究一下当时中国的处境，人们就能了解，西安事变的始末，及其以后发生的种种情况，都是不足为奇的。当时日本的侵略，极其严重和迫切，使一切看来不可能的事，都成为可能。这其中主要之点，是中共得庆起死回生。换句话说，苏维埃运动，使中共濒于死亡的边缘，抗日不仅解救了中共的厄运，还给予它自由向前发展的机会。

这些事说来话长，恕作者不能一一论及，只能就个人所接触到的扼要叙述。大体说来，在西安事变以前，处于偏僻地区的中共，是被动的接受抗日的影晌。譬如说，中共曾主动的联络张学良，但也从这种联络，中共才从张学良那里了解了许多反日情况，特别是东北军人的反日情绪。当时少数美国记者，访问陕北，也使中共的要人们对国际友人同情中国人抗日的情况，略知一二。此外还有一些抗日消息和书刊流传到陕北，使张闻天辈模模糊糊的了解到，陕北以外的情形是进步了。

西安事变以后，中共的抗日运动，开始由被动转到主动，能够逐渐脱出偏远的地区，渗入到抗日的实际活动中去。这些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中共迁都延安，从此延安成为有名的赤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知道蒋介石氏已由张学良护送回南京，便立即将原驻扎在保安的中央机构，向延安迁移。这件事，中共中央早有准备。乘此西安事变刚结束之时，不动声色的建立起立足之地。

延安虽是一个县城，但地居陕北的中心，城内外的房屋与窑洞，足供中共中央各机关之用。这里对西安和各地的交通都很方便，而且有一个小型飞机场，张学良与周恩来的来往，就曾多次利用这个飞机场。当我们这些中共要人，从那不成样子的保安迁到延安时，心胸都大为开朗。一般人都认为延安是大有可为的地方，有人说，延安是一座历史名城，边防重地，有的人更说，这里可以招兵买马，广揽四方豪杰。

延安为中共占有，是它在西安事变中一个重要的收获。西安事变发动后，中共中央即应张学良的要求，将红军主力，移向西安附近前线，与张学良、杨虎城部队互相衔接。结果红军循延安通西安的公路线前进，以洛川为总司令部驻地，部队分布在洛川以南的前线，延安便成为红军的主要后方。延安以南的各县，仍归国民党西安省政府管辖，只是延安似是由于张学良的默契，交由中共自由处理。

延安自从中共中央迁入以后，就一天天热闹起来，主要是很多的青年男女学生，成群结队，不断的步行而来。也有一些抗日亲共人士，搭乘少得可怜的汽车从西安来。他们都把延安作为革命圣地，他们对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相当大的反感。他们主要指责国民党对日不抵抗，也不容纳他们有参加抗日的机会，因此他们寄希望于中共。但他们对中共的内情全然不知。就因为这些新客人之来，致使延安的住屋不够分配，后来中共不得不拨出大批房屋，交与抗日军政大学<sup>①</sup>来收容他们。此后中共中央机构迁到离延安远远的乡村，并新建了许多窑洞。

我多次同这些外来者接触，大半都是个人交谈，而谈话的内容，也多是有关时局的某些具体片段。我参加过文艺晚会，欣赏抗日歌曲和各种文艺表演，也曾参观那些年青人的体育活动等等。我觉得，他们比之“五四”时代的青年更实干。他们的抗日热情，使我对抗日局势，有更生动的了解。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忆对当时抗日局势所作推测的大致轮廓。我认为日本侵略中国，已引起美、英、苏等国的不满，他们同情中国，以各种方式支援中国抗日运动。

国民党南京政府，亦有可观的进步，向着中国统一方向前进了一大步。国民党势将奋起抗日，因已到了非干不可的地步。从这些年青人的表现看，中国形形色式的派系和人物，大体可以联合一致抗日。我对抗日抱乐观态度，因此，对毛泽东等所给与我的种种磨折，就忍受下去了。

此外，迁到延安的中共中央，经济生活上的困厄也获得相当程度的解救。红军驻扎在陕北边区以南地方，可以在驻地就食，延安归中共以后，其控制区域大为扩展，粮食也就成问题了。中共要人们，也不再像在保安一样，不是前方军队供应告紧，就是后方需求短缺，他们每天都为小米和蔬菜而奔忙。中共管理经济的人员，也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直向西方等城市搜购医院卫生材料、机械用品和零件，以及纸张文具等等，当时这种经济上的解脱，使人们都愉快轻松起来。

中共的要人们，对当时这些收获，曾加以大大的夸张和宣传，在这种乐观气氛之下，中共和红军内部各种隐忧，都给掩盖起来了。而且中共的要人们，都相约不要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以来的种种挫败与损失、红军里面纪律颓废和中共内部的争执、以及对国共合作抗日未可乐观等等，向那些热诚抗日的青年宣泄，以免影响他们对中共的向心力。

除以上所说这些欣欣向荣的表面现状之外，中共中央内部许多事却在暗中进行和演变。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似因一、四两方面军间的争执和对立已不存在，因此没有人用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也没有再举行过会议。处理西安

事变时，各巨头多采取协商的形式，反复讨论，颇费时间，使首当其冲的毛泽东颇感不耐。虽然我曾表示惟毛的马首是瞻，但他仍然感到不满足，非集大权于一身不可。因此在这紧急关头，一方面许多事急需处理，另一方面中共中央的组织又相当零乱，毛泽东便趁此时机，多方面混水摸鱼，以达其个人独裁的野心。

毛泽东先把军权集中于一身。当时红军主力，由彭德怀以前线总指挥的名义，率领着赴西安前线，毛利用这个时机，把中央军权包揽过来，一切由他直接发电指挥，因而剥削了总司令部的指挥权力。这些事，当时都偷偷摸摸进行。总括一句，是不再让任总司令的朱德和任政委的张国焘，获知红军主力的行动情况。其次，他利用保安县房屋不够和有些干部需要调往“抗大”学习的机会，逐渐把总司令属下的机构、参谋总部和总政治部等人员，并入毛所直接指挥的军事委员会。取消总司令部机构的事，是利用由保安搬迁到延安的时机来完成的。到了延安，朱德和我都变成了空头司令。朱德曾向我表示，老毛一向如此，就让他去干吧。

当时毛泽东最注意的是控制通讯机构，以达到封锁消息的目的——（一）所有中共中央与莫斯科来往的密电；（二）中共与西安方面的联络，诸如与国民党南京政府人员，张学良、杨虎城等部以及其他派系和人员的通信等；（三）军委会与红军各地部队的联系，凡一切命令指示、人员调动和军事情报等等，概由毛泽东一个人包办。这件事的完成，可以说毛泽东处心积虑已久，西安事变还未结

束的时候，他表现得更加急进，迁往延安的事，又帮助他在技术上掌握这些控制。

毛泽东利用这些控制，电令军队中的干部，参加“抗大”学习，并大事宣扬，果然大批干部要求学习，毛便乘机派进一些亲信和监视者。毛的这种做法，不仅仅是对付我和第四方面军，而且同样对付第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萧克以及正在二方面军中工作的刘伯承，他们都或多或少的变为空头司令。

中共中央迁到延安时，毛泽东已完全控制了外交权和军事指挥权，正在向各军中伸展其个人的权力。他又利用这种控制力，来指挥中共党务的进行，对张闻天等党棍，表现得颇为颐指气使。毛曾多次笑着向中共要人们说：让他自己来应付各方面，其他同志，大可多注意积极方面的工作，诸如争取和影响新来的青年人，注意党务和民众工作的发展，以及边区地方政治的改进等等。这就是毛泽东实施独裁开始时所放出来的保护色。

当时中共要人们，大多分散到各处工作去了。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林伯渠等，率领了大批干部到西安，接着又伸展到南京上海等地，有的与国民党办外交，有的作说客，有的乘机发展工作。彭德怀、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都赴前线工作去了。张闻天、凯丰为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而奔忙，林育英在那里内内外外，忙着布置职工运动。林彪等聚精会神办理抗日军政大学，不久担任法官的董必武也参加了抗大教育工作。一身轻松的朱德，忙着与那些新来的人接触，有时与一般青年人一起打球，一起唱歌。

我自己正为西路军的失败而忧伤，设法图谋补救，而当时我是被人孤立的对象。在这种形势之下，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管外交，坐镇中枢的毛泽东，因得毫无顾忌而大权独揽。

当时毛泽东最感头痛的是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可能对陕北发动报复行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由张学良护送返回南京，周恩来的急电，当晚到达保安，毛泽东显得特别焦急。他似断定蒋介石的报复必然会来，而且会很迅速和惨酷。他曾断断续续的表示，糟了！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目的无非是想减轻自己对蒋的罪过，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向中共头上？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么？这些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逼的和盘托出？再者，西安没有张学良，东北军将解体。张、杨、共三角联盟也已不复存在。蒋介石很快的就可以收拾张、杨在西安的势力。蒋介石的拳头，难道不会打到中共头上、再来一次从四方八面围剿我们么？

毛氏也曾故作镇静的说：大不了的事，也无非是打游击。接着又断断续续的自言自语，表露他的心情说：现在与过去，究竟大不相同，从前是硬打着苏维埃旗帜造反，现在是联蒋抗日和拥蒋抗日，总不能像张学良那样，再做些兵谏的文章。可在我们将要做的文章，应当有那些内容呢？如何鼓励士气呢？

当时在场的要人们都主张，先查明实况，再定大计。毛氏在这种言词鼓励之下，就接连不断要发电报与周恩来，



详细追问，周密指示，其内容要点，就是要找着蒋介石氏在西安的亲信，疏通一番，着重说明，中共事先并未参与西安事变的密谋，事后也是以调人身份，实现和平解决，使蒋氏可以安然返回南京。更重要的是指示周恩来与张、杨两方断绝明显的来往，要处处表示不和张、杨共同负责。而且要周恩来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件，可能的话，也请张、杨方面毁灭这些证据。

当时毛泽东与周恩来，一个在内策划，一个在外周旋，二人配合得很好。毛氏曾向周尽情吐露他心中所想的和企图做到的，周恩来则根据外面的实况，分别予以实施。周体会到毛的紧张心情，当时曾回电说：蒋自命英雄，他曾答应过的事，大致不会全部反悔。这个电报，对于当时的毛泽东说来，无异是一颗定心丸。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毛泽东抵达延安以后，对于国共和解，仍然疑忌甚多，缺乏信心。“买空卖空”的毛氏，为了实现他的目的，是无所不为的，也善于表演两面三刀的手法。他正在设法从各方面打击我，可是见面时，依然是像从前一样，笑逐颜开。当时我们虽会面多次，他已不让我知道机密事项，所谈多是泛论国共和解的事。至今我还记得当时谈话的要点。

毛氏从不提起张学良这个人够朋友。张虽在南京受审判，也从未将反蒋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反为中共开脱，力证中共并未参加西安事变的预谋，并自始即主张释放蒋介石氏。可是毛氏对张学良却只有责备，不是讥笑他无知冲动，就是说他虎头蛇尾。这种种表现都不免是对张落井

下石。

原来斯大林对西安事变所发出的那个有名的和平解决指示，和以后为此事发来的电令，都是暗示毛泽东要抛弃张学良，指责张学良为亲日派所利用，并要毛尽一切的力量与蒋介石和解。毫无疑问，毛氏当时无论愿意与否，只有遵命行事。但毛氏却不愿说西安事变是亲日派的阴谋；毛氏大概想到，如果这样说，连他自己也难免有亲日派的嫌疑。而且蒋介石将轻而易举，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改为攘外必先除奸，将中共当作日本奸细来讨伐。

当时，毛泽东指责张学良的话，最重要的是破坏国家纲纪。他描述十二月十二日清晨，指挥军队袭击华清池，使蒋先生受伤和死伤多人，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事，如果他自己事先知道的话，一定要加以阻拦。毛氏说这些话的意思，一面是向蒋讨好，另一面则是表示支持南京政府对张学良的处罚。这些得意忘形的说话，究竟掩盖不了出卖盟友的痕迹。

有一次，毛泽东同我聊天，他大发纲纪对任何政府和党派都是重要的议论，又进而以讥笑的口吻说：国民党内有个张学良，有个杨虎城破坏纲纪，人称之为张杨，共产党内也有个张杨，张就是张国焘同志，杨就是你的太太杨子烈同志，也有点破坏纲纪。我听了毛氏这种损人利己的鬼话，也就回敬他两句说话：你这样出力维护国家纲纪，“可敬！可敬！”尤其是这些“高论”出自井冈山“英雄”之口，更加难得，“佩服！佩服！”我这些讽刺他不配谈纲纪的话，曾使他表情尴尬，从此他的这种“高论”，似乎在人前收敛

了些。

当时毛泽东为了洗清与张学良、杨虎城过去的关系，实已无所不用其极。张学良的部下王以哲将军，政治立场较为亲共，曾屡电延安联络，其用意是想继承张学良与中共维持联盟的关系，但都被毛泽东托词拒绝了。周恩来在西安也采取同一步骤，再不和东北军人员来往；只秘密输送了几个不能在西安立足的东北军少壮军人，到延安避难。至于中共与杨虎城的关系，断绝得还要早些。就在蒋介石离开西安的时候，周恩来即与杨虎城谈妥，不再公开来往，以免引起蒋介石的疑忌。

当时与蒋介石和解是中共唯一的出路，关系中共的生死存亡，毛氏自然不敢怠慢。他收藏起他一向仇恨蒋介石氏的心情，采取伪善的面孔来应付一切。他试图抹去曾与张学良、杨虎城同谋反蒋抗日的种种痕迹，也绝不泄漏西安事变应和平解决，是出自斯大林指示的这个秘密。他一口咬定，中共中央是按政策行事的；进而说明中共政策，既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蒋抗日，乃至拥蒋抗日，自然不曾参预西安事变的密谋，自然坚持和平解决。他并且制造舆论，说甚么坚持政策是不容易的，内外都曾发生重大阻力，对外须冒险说服张杨，内则有张国焘等反对和平解决。毛氏这样做，一面是企图免祸，一面则隐藏着一些损人利己，落井下石，借刀杀人等等黑暗机关。当时我对这种现状感慨万分，认为一个“好汉”到了穷途末路，是会原形毕露的。

一九三七年正月中旬，蒋介石氏的意向，经由其与中

共接洽的代表人张冲<sup>②</sup>之口，告知周恩来。大意是中共及其军队如能诚意服从国民政府，将可获得改过自新的机会。毛氏知道了这一消息，才比较安静一些，一面电令周恩来继续与张冲商谈，一面将其注意力转移到党内斗争。国共之间，从此才有稳定性的停火，并且实际进行和解的谈判。

西路军的失败，对中共以后的发展，和当时的西北局势，都有相当影响，尤其使我这个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大受打击。中共党内斗争的矛头，因而就指向着我，打得我无法抬头，同时也暴露了毛泽东式的斗争，有其极为野蛮的成份。

西路军在古浪遭敌骑袭击，损失惨重，向西挣扎前进之时，其第五军团在酒泉为敌所消灭，军长董振堂阵亡，通往新疆的大道因而为敌所控制。再加战况逆转，弹药消耗到了不能与敌正式对垒的程度。在西安事变结束时，西路军在天寒缺粮和敌军压力之下，不得不南移祁连山脉，化整为零，从事游击活动。后来西路军只剩下四百多人，逃往新疆。此外还有一些小股，每股数人和十数人不等，向东渡过黄河，逃到陕北归队。如果说一方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只剩一副骨架子，那末西路军连背脊骨也被敌人打断了。

当时我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不愿诿过于人，从未指责过别人，只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我曾要求举行一次中共中央高级干部会议，来检讨西路军事件，但毛泽东等不予理睬。因此，

中共中央并没有对这一事件，作出结论，一切批评都不免任意为之。

毛泽东自然不会放松攻击我的机会，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便漫无拘束的乱说一通。总括起来，当时这些批评的言词大约有三个要点：（一）西进军事计划根本就是逃跑主义，至少是带有逃跑主义色彩；（二）张国焘对四方面军的领导完全破产，总之是一无是处；（三）西路军的失败很为丢脸，蒋氏将更看不起红军，在西安事变的今天，将诱发蒋氏的报复和进攻，遗害全党全军。

一班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们，主要是第四方面军的干部，则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划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他们对批评者答辩：（一）西进计划为莫斯科批准，如何能说是逃跑主义；（二）四方面军是中共的基干劲旅，如何能加以毁谤；（三）诱发蒋氏围剿之说是有意架祸于人，转移目标，将对外转到对内。甚至有些同志指责毛泽东垄断军委会的一切，不供给西路军所渴望的情报，实在应援不力。还有少数人指责毛氏阴险，幸灾乐祸，对四方面军毫无手足之情。这些指责，在当时虽不敢说有充分证据，可是，是非自在人心。

朱德当时的立场颇偏袒毛泽东，但对西路军的失败，持论还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根源于西进计划根本不对，应当认定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犯了战术上的错误。四方面军只半数渡过了黄河（第四和三十一军则被隔断在黄河这一边）自然减低了西路军的战斗力，

但不能说因为只半数渡河就注定了会失败，第九和第三十两军，加上董振堂的第五军团对付马步芳部，应当游刃有余。他批评陈昌浩勇猛有余，稳当不足，徐向前虽较稳当，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员的意见。他慨叹像红军这样一支破破烂烂的队伍，只要指挥者稍有失算，即使是多消耗了几枚子弹，都易招致灾祸。他相信如果张国焘同志过了河，决不会有古浪的惨败。因此，朱德肯定的说：西路军骤然没有老练指导者就近指示，兵力使用不当，不能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而且对骑兵作战技术不够熟练，这些才是失败的主因。

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虽然没有定论，但毛泽东、张闻天等都利用这一失败事件，发动反张国焘的斗争。反张国焘的斗争早就在暗中进行，等到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国共可以和解的消息传来之后，便大规模展开了。毛泽东、张闻天等认为当时既无内战的危险，正是整肃内部的好时机。展开斗争的目的，据说是恢复遵义会议以后原有中央的威信，行使完全职权，并将张国焘逐出中央，然而其实质就是建立毛泽东的独裁。

毛泽东、张闻天等的第一个步骤，便是调走持论公允的林育英。西安事变时，林育英显然已受到毛泽东等的排斥。约在一九三七年的一月中旬，张闻天便提议派林育英到国民党区域从事职工运动。我当时曾表示反对，认为他是调解党内纠纷的当事人，应暂留延安。张闻天曾说，林育英有些神经病，他过去所说的话不能算数。我当时曾质问张闻天，难道当时在陕北各中央委员，联名发给我的

电报，主张两个中央暂时停止职权，由林育英任双方联络人，也不能算数吗？张闻天听了，苦笑着说：老毛说不算数，我也没有办法。

我当时即与张闻天恳谈，曾指出下列各要点：（一）现在党内纠纷很容易解决，只须由林育英这位中央联络人，召集一次中央委员会议，一切都可以有妥善的交代；（二）中共中央改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之后，过去因苏维埃政策所有过的争执，已告消失，而且经过西安事变，新政策执行已有相当成绩，我将在会议上，表示撤消我有过的反对意见，并正式提议，由遵义会议所选定的中央政治局，恢复全部职权；（三）我对西路军失败，负有严重责任，将正式自请处分。

我又笑着对张闻天说：“张国焘已经被打倒了，用不着在这紧急关头，大张旗鼓斗争一番，如果否认过去所说的话，不明不白的将林育英同志调走，这未免太失信于党和同志们了。”张闻天当时一言不发，后来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接着反对张国焘的斗争就轰轰烈烈的展开了。这是舍弃正当的道路不走，向失意者发挥一下斗争的残忍性。从此林育英便由张闻天以中共中央书记的名义派走了，此后，我再也不知道林育英生死存亡的下落。

反对我的斗争，号称自下而上发动起来的，其实拆穿了，都是见不得天日的把戏。首先由任中共宣传部部长的凯丰，召集一些秘密会议，每次参加会议的人，十人或八人不等，都是经过事先选择，必须不是亲张国焘的人，而且希望参加者都能成为斗争张国焘的积极分子。身材矮小

的凯丰，是著名的米夫党徒，无论做事或写作，都显得极为低能，却自诩为党内斗争专家。确实，他背诵几句教条，扑击他所要斗争的目标时，往往失去理智。在这种斗争张国焘的秘密小组会上，他往往高声狂叫，从头至尾数说张国焘的罪恶，常被同志要求他提出一些事实证据出来。也有些参加过这些会议的同志，将经过约略告诉我，甚至直率表示，不直凯丰之所为。

抗日军政大学被选定为斗争张国焘的中心，事先经过缜密的布置，将其他各班与红军干部班分别隔离，以免红军内部情况，为外来的人所知。学校中的武器，扫数被收藏起来，以免在斗争中，发生动武事件。红军干部班的各个单位，都事先布置了斗争张国焘的积极分子。张闻天、凯丰，这两个斗争专家，为这次斗争的指导者，抗日军政大学的副校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则是实际指挥人。毛泽东并没有亲自出马参加斗争大会，但他是幕后的舵手。林彪也摆出他那校长的姿态，表现置身事外的样子，不公开卷入斗争漩涡。其他中共的要人们，则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

斗争开始的时候，有些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来到我的住处，其中有人就说，这种斗争根本不对，也有的说，四方面军的干部也有错处，强调学习的重要。我则告以这样的斗争，实在不必重视。共产党人的党内斗争，应系本于原则的政治斗争，绝不可以毫无原则地作人身攻击和侮辱毁谤的勾当，现在他们搞的斗争，内容并不纯正。洁身自好的同志们，切不可效尤。



我也向来访问我的同志们说，现在共产党人的党内斗争，往往超越轨道，虽有充足的理由，也不易获得人们的谅解。譬如我本人现在处境极不利，其基本原因，是党内斗争并不是以真理为依据，而是随斗争形势和力量对比而转移。在毛儿盖的时候，我有充分理由批评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可是现在形势不同，毛泽东等首先接通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上，又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盟，经过西安事变，可望与国民党和解。这些成就，改变了我反对毛泽东的意向。何况，西路军又遭受如此惨痛的失败，我正引咎自责，无意与他人辩论是非。因此我希望一般同志，专心学习，检讨过去工作的错误，再不可有反中央的表示。

也许就因为我这些劝告，原一方面军中少数支持过我的干部，如李卓如、何长工等，以及四方面军绝大多数干部，都采取了忍让的态度。即是表示拥护中共中央，诚意检讨过去工作中犯过的错误，不再说批评中共中央的话。但是斗争的进行，实在太离谱了，不仅这些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侮辱，而且发生了不应有的事故，这些事情，下文我还要略略说到。

那些斗争专家们，一开始就煞费苦心的搜集关于张国焘“罪证”的资料，他们积极的广泛进行，但结果当然不免失望。张闻天、凯丰等向他们的助手示意，最好能够找到张国焘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反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罪证”。当时曾有人质问他们，这些是属于中共中央内部的事，可否请张闻天等指示一点大略经过。这一问可窘

住了张闻天，他只得说，他所要知道的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张国焘私下向同志们说过些甚么话？最好能找到他亲笔写的片纸只字。这种先作结论，再找证据的做法，实在是很不合理的。

他们忙乱了一阵，所找到的所谓证据，多是有利于我，而不利他们自己。当中还发生了一些小小的笑话。譬如有一位同志报告说：张某人在西康的时候，接到由陕北用电报发出的“中共告国民党人书”，张某曾当着部分同志面前，讥笑这篇文章是套用韩愈祭鳄鱼文的老调，足证张某人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篇文章是毛泽东自己写的，毛当场承认确是套用韩愈，张某人说的话并不错，怀疑的人倒是不够程度了。

在这件事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据说还是毛泽东自己出来收的场。毛泽东曾对他们说，他自己不只一次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张国焘和陕北中央委员一样，完全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如何能够找些零星材料便把前言翻案呢？毛氏又对他们指出，反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根本就不能拿出来讨论，不能公开去说的。于是毛便讥笑那些斗争专家，不要自讨苦吃，还是在别的问题上去找斗争的“罪证”吧。

张国焘是右倾机会主义，对四方面军的领导破产，反党反中央等等，在斗争专家们看来，这些罪名已成定案，而且西路军的失败，他们更认为是证据确凿的证明。于是他们进一步又企图在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中，多找些张国焘领导破产的“罪证”，但他们这些努力，不仅徒劳无功，

反引起复杂的争辩。这些争辩显然不利于毛泽东、张闻天等所把持的中共中央。因此他们就来个武断的办法，肯定张国焘的“罪过”是分裂中共中央，罗织了所谓反党反中央的极端“罪状”。这些“罪状”据称是源出张国焘的“土匪主义”和“军阀主义”。因为“土匪主义”才会猛烈反对中央；因为“军阀主义”才会企图篡窃中央。他们以为用这个简单的逻辑就可以掩盖一切。

张国焘“罪名”的要点，既已确定，因此斗争的重点，就转为争取四方面军干部的支持。斗争专家们大声疾呼，四方面军的干部回到中共中央领导之下，检讨过去的错误，再不要受张某人的影响，坚持错误下去了。但这个号召并未发生良好效果，因为有很多干部，主张要检讨错误，应当是全面检讨，而不应该片面检讨。说穿了，就是要检讨毛泽东等所领导的中央是否也有错误。

这样一来，斗争就转入到最野蛮的阶段。罗瑞卿、莫文骅等率领着一群斗争打手，分组或者个别实行向四方面军干部展开斗争。他们盛气凌人的审问被斗争的人，问些毫无道理的问题：诸如“你乱杀过人吗？”“私自打过土豪吗？”“强奸过妇女吗？”“说过甚么反中央的话或做过甚么反中央的事吗？”等等。

这样的斗争方式，可说极具侮辱性，与当时国民党审讯“共匪”毫无差别；曾引起四方面军干部极大反感。被斗争者理直气壮的声称，他们是不可冒犯的红军战士，决不愿答复这一类问题；有些声言自己身经百战，受过多次战伤，早已将生命贡献于中共，决不承认是“土匪”，也不能

受侮辱。这些严重的抗议，并没有令毛泽东及其爪牙们有所觉悟。终于引起了“抗大”内部大多数学生们的鼓噪。许世友、王建安等十几位原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领导着四五百位学生，企图立即行动起来，脱离抗日军政大学。他们的作法，虽未公开言明，但显然是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相对抗。

这件事使延安大为震动。为了平息这次风潮，朱德、林彪邀我去“抗大”讲话。在抗日军政大学的操场上，我向全体学生严肃的发表演说，指出所有“抗大”的学生，中共党员，都不可有违反纪律的行动，但是党内斗争也应当在正轨上进行。每个同志，不管来自那一军，都应检讨过去有过的错误，也有权利义正词严的拒绝那些不应有的指责。如果问题不能在“抗大”解决，也不可违反纪律，每个同志都有权将问题向上级党部和中共中央提出，甚至向共产国际控诉。

我这次演说，实际平息了“抗大”学生的反抗行动，但把我当作罪犯和人质的毛泽东看来，我的言词仍然是富有反抗性的，因而更加采取高压政策。毛泽东并不遵守诺言、立即释放当时已被捕的许世友、王建安等十几位高级干部，反又逮捕了更多的人。被捕者总数达到四十人以上，概交由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审讯处理。

原任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当时任红军学校副校长的何畏也被捕了。何畏自始即站在反抗这种斗争的立场，为四方面军的领导辩护。何畏出身工人阶级，在红军中战功显赫，负伤十一次之多，毛泽东等也轻易奈何他不得。他

并未参加这次抗大学生的反抗风潮，但为了许世友、王建安等人的被捕，表示抗议。他愤慨申言，中共中央和“抗大”都变质了，变成了类似北洋军阀的统治。他要向共产国际控诉，否则他就要脱离共产党，因此何畏被秘密逮捕。之后，张闻天曾向我解释，何畏身体残废，且有战功，本应曲予优容，但他心情恶劣，可能自杀，故暂行看管，并不交法院审讯。我因不愿加深党内危机，对张闻天只有怒目而视，忍耐着一言不发。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次周恩来遇险的事件。大约是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左右，周恩来坐着一辆卡车，由延安前往西安再转南京去办外交。当这辆卡车走出延安约三十里路的地方，即遇到土匪的袭击，周恩来和十几个护卫他的武装卫士，受了一场虚惊，结果折返延安。这件事被那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疑忌多端的泉雄猜测，认为系一严重的政治阴谋。他根据护卫周恩来的卫士、和驻守出事地点及其附近的部队都属于原四方面军这一事实，推断周恩来的遇险，可能出自我的指使。

当天晚上，延安宣布戒严，形势十分紧张，我的住所被重兵监视着。午夜，我从梦中惊醒，发现护卫我的一班卫士，都沿着我的住所围墙里面布防，我急向卫士班长询问原委，据他告诉我，他们看见墙外周围，都由政治保卫局的保卫连包围住，他们持枪对着我的这所住房。而别的地方，好像没有军队行动，因此，班长判定这是对我的谋害。所以，他暗令全班卫士在围墙内站岗，以防万一。他曾命令全班，誓死保卫张主席，任何人若靠近主席的住房，

即可开枪，并准备通知驻在附近的警卫营（原属四方面军的）前来救助。

我因问班长为何下达这样的命令和如此紧张？他说：他们对于“抗大”的斗争，早已非常愤慨，而且警觉到有人蓄意谋害张主席，自愿不顾生命危险，也不事先请示，自己负担全部责任，因此下了这个命令。我沿着住房的围墙内，观察一遍，月夜中，看见那个保卫连，离我的住房，约有四五十米的距离散开，似是持枪休息待命。我当即告诉那位班长，看来这连人不会有甚么异动，你们应立即撤防，无论发生甚么事情，都须依据我的命令行事。相持到次晨两点多钟，保卫连终于撤走了。

第二天早上九时左右，张闻天来访我，说了一些不相干的话，但也掩饰不住他那满脸尴尬的表情。我和他照常周旋，绝不提起昨晚发生的事。于是，他的表情似乎稍微平静些，径向我说：昨天周恩来同志的遇险，现在已证明是土匪的骚扰，他还说明附近原四方面军的驻军极为得力，穷追那些土匪，结果活捉到几个，土匪的口供，都承认是普通的拦路打劫，并不知道是周恩来路过。我听了，满不在乎，仍是谈笑自若，满天阴霾，就此轻松的消散了。

这类事连续发生，使我痛心已极。我决心搬出延安城，再也不愿问党内的事。我在延安近郊，游山玩水，并寻觅适当的住所。结果，在延安北面的山上，找着了一所破庙，其中有一个石头的窑洞，可供居住。我督率我的卫士们去修理，不仅使窑洞焕然一新，而且在庙的左侧，还开辟了一个小广场。不到两周，我就迁到新居去了。

我觉得中共正在沿着斯大林的轨道前进，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斯大林曾杀害大批的革命元勋，现在中共也正在逼害四方面军的有功将领。斯大林曾利用基洛夫被刺身死的事件，诬陷他的反对者，现在中共也利用周恩来遇险的事件，企图诬陷我，如果不是那些土匪被四方面军活捉了，可能形成冤狱。我已往对这种不顾信义的党内斗争所表示的抗议，都已证明无效，现在就是再说话，也是无济于事。共产主义的踪迹已杳，剩下的只是权术与斗争，这种权术与斗争，并已被视为维持毛泽东权力的天经地义，对红四方面军和我，所加的甚么“军阀土匪等类的罪名”都是可笑的诬蔑。

毛泽东虽蛮不讲理，但计谋也不完全得售，因而转过笑脸迎人的姿态。在周恩来遇险事件后，毛泽东轻松的向我表示，被批评为军阀、土匪，实在无关重要。他说他参加中共以来，曾三次被开除中央，受过八次严重警告，幸好还没有闹到反中央的地步。他进而表示，说到土匪军阀习气，连他自己都有一点。他在一九二七——二八年采行烧杀政策的时候，曾下过杀死地主全家的命令，其中还有几岁的小孩子哩，这些往事，现在想起来，很感难过，但这不正是军阀土匪习气的表现么？

毛泽东这些话，显然是希望我承认所加于我的“土匪军阀习气”的批评。我当时对他的伪善，很感气愤，向他表示：你是游击先进，经历过烧杀政策的时代，一九三一年，四中全会后，我到鄂豫皖区去担任领导的时候，烧杀政策早已过去了，我根本没有直接下令杀过人；反对中央虽然

有过，这不能与“军阀土匪习气”相提并论。而且国民党正在骂我们是军阀土匪，我们如果竟糊里糊涂地自己承认起来，岂不是“不打自招”吗？

林伯渠当时采持平态度，有一次他邀我共进晚餐，向我表示，中共领袖们各有长处，也各有缺点，过去所发生的事，也各有是非。现在大家应顾全大局，个人只好委屈一点。他并申明这些话不只对我个人如此说，对毛泽东同志也这样说。主要用意是要大家体念时艰，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纠纷。他这些话对我当时抱定委曲求全的主意不无影响。

负责审理四方面军被捕干部的董必武，更在事实上缓和了这个斗争。他和那些被捕者一个个亲自谈话，结果证明何畏、许世友、王建安等反对者，并没有组织性的行动，他们的背后也没有人指使和操纵，只是对于抗日军政大学的斗争方式表示不满，因此愤而反抗。董乃将多数同志释放，少数人判处短期禁闭。最高的处罚没有超过三个月禁闭。被判禁闭的人，都是提前释放，所有被释放者，仍回到军政大学继续学习。

抗日军政大学的斗争，发泄仇恨心理仍在持续，但因掀起过大风波，于是在斗争方式上，不得不较为缓和，把重点转移到原四方面军的干部，要他们承认过去反中央的错误。这样，原四方面军的少数干部如傅钟、王维周等，就转而批评四方面军领导者某些过失，其他多数人则表示愿意在整个中央领导之下，积极学习。这样，抗日军政大学内的反抗气氛才逐渐消失下去。



毛泽东张闻天等于是召集反张国焘的斗争会议，这个会议当时虽是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名义召开，但实际上多数重要人物，如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任弼时等，以及董必武、林伯渠、林彪、罗瑞卿、莫文骅等主要当事人都没有参加，参加会议的二十多个人，多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

会议开始，首先由凯丰作反张国焘的报告，他说了些中共中央政治路线一向正确和批评我反中央的不对之后，就解答抗日军政大学学生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他说到抗日军政大学内有些学生，指责中央歧视四方面军的干部，不把他们当同志看待，简直比对俘虏还不如，斗争的手段又是违反共产主义的道德。对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凯丰竟引证斯大林说过的话，来证明反对党内左倾和右倾的错误，要采取惨酷无情的斗争手段。这段话简直是文不对题，对于对待同志不如俘虏的指责他无词以自解。

凯丰又进而解答有些学生所提出的，不应抹杀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和张国焘的领导在鄂豫皖苏区和川北苏区所有过的成就等类问题。他表示四方面军对于中共和苏维埃运动确有过极大贡献，但这并不能减轻张国焘的“罪过”。四方面军能有这些成绩，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领导正确；尤其是已去世的沈泽民，能够坚持布尔什维克的方针；而张国焘却是一贯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沈泽民在莫斯科受过纯正的列宁主义的熏陶和布尔什维克的锻炼，无疑能把握正确方针。张国焘虽做过不少的事，但其底子则是机会主义，不能不带有土匪和军阀习气，得着机会，就要

大反中央……。

凯丰这位斗争主将，花了很长时间来答辩这些问题。然后他说到西路军的失败，认为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四方面军一般干部不够布尔什维克化，只有董振堂受过较多布尔什维克的薰陶，可是他死难了。董振堂之死，应由张国焘的错误负责，无异是把他陷害死的。于是他像疯人似的提高嗓子喊道：“我们应当要张国焘抵董振堂同志的命！”凯丰在结束讲话时，又狂叫一些“土匪”“军阀”和“反中央”等类字句。

凯丰这篇主控词实在太不高明，引起了不少反感。在座的毛泽东听了曾面露不悦之色，似乎他觉得这还是米夫派的老调，与在江西苏区时反对他自己那些言词相较极相类似。张闻天则在那里着急，似乎认为凯丰堕入了答辩的陷阱，反而放松了控诉的主题。其他的到会者大多表情冷淡。我这个被攻击者反有轻松之感，觉得这样野蛮和低能的攻击，如何能伤害我。的确，凯丰就在这次表演失败之后，再也不易往上爬了。

张闻天为了补救凯丰控诉之不足，抢先发言。他面色阴沉，目光藏在那副近视眼镜的后面，像背讲义一样的念他的演说词，其大意是说张国焘的错误已发展成为“反党的张国焘主义”：第一是军阀主义，第二是土匪主义，第三实行分裂中央，这些不特是错误，而且是罪恶，应该受到党纪的制裁。

毛泽东的发言，有些故示轻松的姿态，不断的格格发笑，也似乎在那里自鸣得意。他说话的大意是：张国焘这

位老朋友，我知道得最清楚。他一向有反中央的倾向，曾是“小组织的老祖宗”。此外他根本就没有说到甚么“罪状”，就进而表示现在形势对国焘同志不利，同志们都在批评他，有甚么办法呢？他于是冷笑着，劝告我就认个错罢？

朱德态度严肃的发言，显然带有沉痛的心情，他说话的大意是：卓克基会议成立临时中央，他曾劝阻，现在似乎大家都知道错了。在他看来，国焘还有一些当年北大的气味，受五四运动时科学与民主以及胡适之等所提倡的实验主义学说的影响，因此，他遇事要明辨是非曲直，引起了一些对别人和对自我的麻烦。朱德特别提到我的北大气味，其用意究竟是不赞成那些“军阀土匪”的指责，或者是说我还有一些资产阶级的余味，那就不敢断言了。

我的答辩相当简单。我首先承认成立临时中央的错误，并指出我又夸大了中共中央政策历来所犯的错误，现在事实证明，原有中央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中，表现了积极性，而且获得了可观的成绩，因此，我们早已取消了两个中央对立的状况。现在我正式接受那些反中央的合理批评，并愿承担我所应当负担的反中央的全部责任。此外我还声明两点：一、中共的苏维埃政策走到了穷途末路，应当改变政策，在未改变的时候，党内发生歧见，不足为奇，现在怎样可以毫不顾及中央的基本原因，竟一味用高压手法。二、对我个人所受到的指责，我不愿答辩，但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决不可抹杀，而且应当老实承认红四方面军是中共属下一支有教养的、有纪律的工农红军劲旅。

我刚说完还未走下讲台的时候，有一位老井冈山干部周昆同志，站起来喊叫：“这那里是承认错误，拖出去公审罢！”周昆系毛泽东的老友，年龄虽不到四十，但已暮气沉沉，这次喊叫倒也颇有精神。我还是耐着性子回答说：也好，我愿先听听你的控诉词，我已承认了我应当承认的错误，如果周昆同志还要横加攻击的话，恕我也有尽情答辩和反击的权利。在周昆没有继续发言的片刻，会议主席就宣布散会。

第二天上午九时，中共中央以政治局的名义，根据斗争会议讨论的结果，由张闻天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其要点是反对反党的张国焘主义，并说明这一主义包括军阀土匪的残余思想，最后竟致分裂中央。我依时到会，看了这个决议草案后，冷笑着向张闻天说：反中央是事实，处罚听便，何必又来个莫须有的张国焘主义。我等候了一会，毛泽东等不知何故，都没有来，我就先走了。后来我始终未再看见过这个决议案，据说语气比原文改为较为温和了，主要是将反党的张国焘主义，改为张国焘的反党路线，只有批评没有处罚。

这次斗争显得有些虎头蛇尾，最初是张闻天、凯丰等在那里叫喊“罪恶”、“制裁”、“抵命”、“公审”等等，实际上他们也准备至少开除我的中央委员，但最后却以一个冲淡了的决议案了事，我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职位仍保留如故。据可靠消息，此中原委是由于共产国际曾来电反对，理由大致是张国焘已往功绩俱在，为中外知名的中共领袖之一，不能采取组织制裁；同时国共和谈，又遇到

暗礁，如果决裂，还是需要张国焘和四方面军干部去重赴疆场。

经过这场斗争，我搬到新居，我的心情有极大的变化。我独自隐居在那里，闭门谢客，连电话都不装置，我游玩于山水之间，俯瞰延安熙熙攘攘的情形，冷静旁观。在中共的舞台上我名虽演员，实际上只是观众之一罢了。

我回忆已往，觉得过去我不赞成这个或那个政策，反对这个或那个措施，为这件或那件事奔忙，都不免是枝枝节节之事。我讨厌斗争和权力那些东西，觉得只是一些可笑的玩意儿。我觉得世界上甚么事总有它黑暗的一面，政治就包含着罪恶，革命也不一定就是圣洁。至于那些为了某种政治需要，不惜抛弃道义的行为，更是可鄙。我当时还没有决定脱离我自己所造成的圈子，但已经体会到这黑暗面的威胁，使我意识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缺陷实在太，这极端反动的专制独裁会毁灭一切理想。

我在山上住了一个多月，中共中央虽然照常发给我开会通知，和政治局各项文件，我总是置之不理，不去出席，也不告假，这是我的无言抗议。可是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扰乱了我的幽静。大约是四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毛泽东率领着所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来访我，我们相见握手问候。他们满面笑容，赞赏我的住所是世外桃源，并表示有一难决的事特来请教。我也答礼甚恭，表示有劳各位大驾。

我们在窑洞外院里，围绕着一张方桌坐满了，毛泽东拿出一张周恩来拍来的电报给我看，其内容大致是说：南京准许共产党人自新的条件是精诚悔过，服从三民主义，

恪遵国法，严守军令，并要立即改编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停止赤化宣传，放弃阶级斗争<sup>③</sup>。经商谈结果，南京已允在陕北苏区范围内，设立特区，归陕西省政府管辖，特区设行政主任一人，其人选由我方推荐，由陕西省政府呈请国民政府任命，特区内所有行政体系单位概按国民政府的规定办理。周电并称，对方不能再有让步，只能表示是否接受。

我一面仔细阅读这个文件，一面在推敲这些政治局的巨头们光临的用意何在。他们似乎是在等着我先表示意见，我仰着头淡淡的说：“我在想当年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对德和约的情况。”我这句话使毛泽东高兴起来，他说：“英雄所见略同。”会议于是热闹起来了。大家都表示如果不接纳，后果究竟是应该严重考虑的。

大家都在追溯过去，推测未来，以毛泽东发言为最多，总括起来，大致有下列各点：

一、蒋介石究竟搞些甚么名堂，还是捉摸不定，可能有抗日的倾向，但也可能要压迫抗日势力。若就前者来说，表示西安事变中南京的主和派（抗日的）显然得势，讨共派（亲日派）受到了若干打击。现在“安内”、“剿匪”这类的话比较少，抗日的声浪比较高。蒋本人也痛恨日本。对付西安事变的关系人，蒋氏曾用各别击破的手段，首先是张学良受审和被管束，再是张杨部队被逼撤离西安和被分解，蒋的中央军已大量进驻西安。但蒋仍指我们为反动派，并没有完全放弃消灭我们的企图，我们仍须花许多力量，推动他走上抗日的道路。

二、中共中央一直推动蒋介石抗日，二月十日中共中央曾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表示国内和平统一的愿望，但国民党置若罔闻。周恩来在外奔走，与张冲一直保持联系，经过张冲与蒋接头，准许中共投诚自新的原则是确立了，但国民党的态度还是盛气凌人，周恩来往往会听到这样的话：“中共只有毫无保留的投诚，否则就会被消灭。”毛泽东说周恩来办外交所受的气，更甚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后，我在广州所受的。

三、毛泽东讥讽蒋介石和国民党有“阿Q”精神。分明是抗日势力逼得他不能剿共，却要摆出中央那副臭架子，满口“根绝赤祸”、“中共输诚”。其实口头和书面虽搞得煞有介事，实行起来只是潦草敷衍。毛认为蒋和国民党硬要做“阿Q”，那我们就让他神气活现自我陶醉好了。而我们所要的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实际效果。

四、中共中央可以回电周恩来，接受所谓投诚条件。我们所赞成的是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以后三大政策为基础的三民主义，这与现在国民党的反动作为有所分别。所谓改编红军，取消苏维埃和停止土地革命等，这本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应有文章，我们早已提出来了。此外，我们还可以提出抗日的积极要求，如抵抗日本侵略，保障言论集会自由，释放政治犯等。我们要坚决主张的是中共的独立，红军的实力和陕北这块地盘的维持。

五、我们答应了国民党这个阿Q所提出的条件，但还可以采取拖延的策略。国民党提出这些投诚条件，用意自然在彻底消灭我们，我们可以利用这样那样的理由，使国

民党不能对我们的红军，加以改编或调散。我们仍然可以要求陕北特区直属国民政府，力争特区人员的调动由我方推荐的权利，苏区内已经分配了的土地，不能再发还原主，地主民团势力不能让他们再起来，只要能拖到有一天抗日战争发生，那就一切迎刃而解了。

六、我们觉得接纳所谓投诚条件，也有危险的一面。抗日战争如果一时不发生，蒋介石就有翻脸的可能。如果他雷厉风行的执行这些条件，派人来点验红军，实行渗透，并任意调遣，同时派大批特务渗到陕北特区下层机构里，实行捣乱，那我们就拖无可拖了。不过我们退到最后阵地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奋起反抗。而且我们由此也能获得一些时间，来充实自己的力量。

七、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严重关头，需要全党一致慎重应付。国民党那些准许中共投诚自新的话，若传到一般同志耳朵里，可能引起内部纷扰。中共中央委员们应竭诚合作，耐心说服各级同志。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要推动国民党抗日，防止它向我们进攻，就更需要全党钢铁般的团结。

我表示赞成这样的做法，并指出我已经做了一个时期的越王勾践，只有再继续做下去。毛泽东听了我的话拍手叫好：“对！就让蒋介石做阿Q，我们来做勾践！”于是我们决定了复周电文的原则，接受国民党的条件，会议也就在一团和气中结束了。这也是我在西安事变后所参加过的一次最有效果的会议。

这次会议使我已经冷寂的心情，又有些热烘烘起来。我觉得政治局委员们到我这里来开会，大概是鉴于几次我



未参加中央会议，所以过来迁就。而且这样一件重大的事，我的意见如何，他们视为是重要的。会议中一切表现，大致也是寻求谅解，无形中弥缝了过去斗争的裂痕。我既已表示了共同负责的态度，就应考虑今后应否去参加中央的会议和工作。我当时决定还是保持原有态度，再不受那些阴谋家的摆布，我虽然可以参加一些工作，但决不再参加政治局会议。

那次会后不过数日，抗大教务长成仿吾，邀我去讲授政治经济学，他告诉我这是一个高级班，学生四十余人，都是各地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其中半数是大学已经毕业的，程度最低的也是大学经济系三年级的学生，不用说他们对经济学已有相当的知识。不过他们所学的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要我去讲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我于一九二八——三〇年间，在莫斯科读了约两年马克思《资本论》，对于经济学的造诣很浅。而且多年厕身军旅，书本早已扔开了，因而我向成仿吾表示我这半罐子水，如何能讲经济学。成仿吾极力要我担任，并说如果我不肯教，再没有别人可以担任，这样，我只好勉为其难了。

那时，各地的青年学生，涌来延安的大量增加，学生们和从前一样，背着自己的行囊，不辞跋涉与艰险，从遥远的各方奔向延安。再有些是经过千辛万苦，才到达目的地，还有些中途被国民党拦住了，甚至有些遭到拘捕和杀害。他们将延安看作是抗日圣地，“抗日的到延安去！”这句话，成了青年人的口头禅，国民党压迫青年的政策，也无异为丛驱雀，为渊驱鱼。

中共中央将这些投奔延安的青年都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去学习。到了四月间，外来学生的数目已有一千几百人了，抗日军政大学随之扩大，城内校址不敷应用，乃扩至城外飞机场附近，学校的设备极为简陋，教员教材尤感缺乏，而学生人数和班次又日在增加。毛泽东在那里讲授哲学和战略问题，后来他所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等文，就是以这时的讲稿为基础的。张闻天、凯丰讲列宁主义党的建设，朱德则担任游击战术等类的课程，所有中共中央重要人员，大致都担任了繁重课目，我算是参加较迟的一个。

我讲经济学，每星期九小时，分排在三个上午，要在三个月之内授毕。这是一个繁重和几乎吃不消的负担。我搜集了在延安可能找着的经济学的书籍，日夜准备我的讲稿，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

在飞机场附近的一个课室里，学生们带着他们自备的小凳子，分别排列坐在那里听我讲课。课堂内除了一块黑板之外，没有任何设备，学生们都按时来上课，除疾病外，不会有人缺席，他们都埋头摘记我所讲的话，心无外骛，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也都是关于经济学范围内的。他们觉得他们是自动学习，似乎延安一切生活上的不舒适，都毫不影响他们的求知欲。

我这样努力了三个月，幸好完成了任务，如果不是芦沟桥的枪声，改变了我的教学生涯，也许我能成为一个经济学教授。四十多个学生和我相处得水乳交融，彼此坦诚相对，连师生间的矜持也没有了。学生们觉得我是他们所

遇见的经济学教授中最能干的一个，学校当局也把我当作一名好教书匠。我虽自知仍不过是一个经济学的学生，但这些鼓励也颇使我自慰。

这种极度热烈的学习气氛，使我忘记了辛苦，生活上也不感单调。工作之暇，常有学生到我的住所来，教我唱抗日歌曲，他们也不以我这个学音乐极为笨拙的学生而讨厌。我的同志们和学生们，有时来陪我散步和漫谈，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常成群的来探望我。我下山上课的时候，也常有些人围着我谈天。我当时的原则是，遇着党内问题，就只笑而不答。

由于大批各地前进学生涌到，多数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那时已使整个延安的气氛为之一变。他们带来各大城市的消息，开展了在延安的那些游击英雄们的眼界。人们无论在接谈中、文化娱乐中，以及公共活动中，再也不谈那些长征的单调故事，一切都以抗日为主题了。各地社会状况，也渐为人们所知悉，外来的影响日甚一日。中共少数白区地下工作人员，如刘少奇等，秘密来到延安，更使中共巨头们直接受到影响。

刘少奇于四月间由白区来，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很长的书面报告，他描述各地抗日运动的澎湃，指出中共在抗日领导方面太没有力量，中共的白区工作十分破碎。他推究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是中共的政策一向犯着左倾的错误。在他看来，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对国民党政策和领导工农群众的政策，便已左倾多于右倾。后来在苏维埃时代，更犯着严重的左倾错误，以致抹杀了日本灭亡中国的危险。

因而，他要求中共的政策，要从实际上迅速转变过来。

刘少奇这个万言报告书，曾引起中共中央的不安。张闻天等那些留俄派，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主张，因为刘少奇竟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主要也是犯了左倾错误，这无异是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洗刷，而且否定了整个苏维埃运动。他们指责这种主张是反共产国际的，反中共中央的，是受着张国焘思想的影响。甚至有人说，刘少奇比张国焘还要坏。

刘少奇当时态度极为谨慎，避不与我接触，以免沾染上反党的张国焘路线的嫌疑。我从不到延安城去，更没有参加讨论刘少奇主张的会议，不愿重新卷入这个争论的漩涡。毛泽东似比那些留俄派老于世故，他和刘少奇较为友善，觉得刘并没有反对中央的野心，因而他极力斡旋，调解刘少奇与张闻天等人间的意见冲突。

此外，刘讲话的时机，似也较恰当。中共中央正在采取退让的步骤，接受国民党提出的投降条件。人们觉得如果在这时反对刘少奇所提出的意见，未免难于自圆其说。结果，在中共政治局的会议上，刘少奇虽受到张闻天等人的批评，但因获得毛泽东的支持，反而得以参加政治局为委员，并负责指导整个白区党的工作，这是毛刘在政治上合作的开始，后来，他们在一九四二年，便共同开展了反对米夫派的整风运动。

中共渡过它的极危险时期，实在幸运。它接受了国民党所要求的投诚条件之后，国民党果然并未严格执行，而中共在宣传上，反着着占先。

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时期任务》的报告。其中第六段说明：“目前的阶段，是新时期的第二个阶段……如果前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和平，则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民主。”<sup>④</sup>毛泽东的这番话是表示国共间的和平已经实现了，现在是中共向国民党争取民主的时候了。

当时延安上空的阴霾在逐渐消散，人们都在和平民主和抗战三个口号之下活跃。中共中央正在具体的研讨如何促进国民政府民主化，指派我写了一篇评论国民党宪法草案的文章，主张放宽民主自由尺度。同时，周恩来在南京牯岭一带，也要求共产党有代表出席十一月间国民党所召集的国民代表会议。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企图使中共能成为一合法的政党。

- ① 抗日军政大学，在保安时原为红军学校，迁到延安后，始正式定名为抗日军政大学，分设有好几个部门：（一）红军干部班；（二）由国民党区来的抗日青年训练班；（三）专业训练班，如汽车、通讯、工程、卫生等等。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该校红军干部班的学生，大约超过八百人，由四方面军来的干部，为八百人中的过半数。
- ② 张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懂俄文，为蒋介石与苏俄和中共间之拉线者。
- ③ 这些条件就是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根绝赤祸案决议（全文见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东方杂志》第三四卷第六号）中所规定的四点。
- ④ 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四六页。

第二十一篇

抗日战争

# 第一章

## 洛川会议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战争在芦沟桥爆发了。七月十七日，蒋介石氏发表了有名的庐山谈话，声明中国局势已到了“最后关头”，提出了关于保全华北领土主权的四点最后立场<sup>①</sup>。七月二十八日，八月一日，日军先后攻占平津，并沿平汉津浦平绥三路，进攻保定、沧州、南口等地，八月十三日进攻上海。这些就是八年抗战的最初几件大事。

当年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就日军进攻芦沟桥事件，通电全国，主张全民族实行抗战，不让日军占领寸土尺地。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事发表宣言，声明与国民党共赴国难，以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为共同奋斗的总目标；并郑重声明下列四点诺言：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所必需，本党愿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终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国家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

担任抗日前线职责。在这个宣言之后，还明文宣称：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sup>②</sup>。这两个文件，象征着中共极力促进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决心。

我们在这里不必着重叙述抗日战争的实际经过，却亟愿对当时情况，略加分析，特别是中共抗日政策的实际形成及其演变的经过。当年八月二十日左右，中共中央在洛川所举行的中央扩大会议，曾因抗日政策，引起严重的争论。毛泽东、张闻天等，或明或暗的一意孤行，也使我这个反对派被逼不得不离开延安。在本篇里所要说到的，只是抗日战争开始时的一段经过，也许可以对了解中国时局的未来发展，给读者提供一些线索。

日本侵略中国的步骤，是太急进了，逼着中国人民不计成败，团结一致，奋起抗日。当时许多想像不到的事，都成为可能。例如抗战以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及国共实行和解等等，都非一般人始料所及。芦沟桥事变后，由于战事的发展，给中共游击战争以广泛发展的机会，毛泽东得以因利成便，走上统治中国的王座，更是人们所预料不到的。

当时人们的抗日情绪达到了沸腾点，延安自然也不例外。毛泽东等利用这种兴奋的情绪，大声疾呼——在全国范围内，抗日不分党派，只要抗日，便是一家人。在中共红军内，毛泽东同样号召抗日高于一切，并说明现在我们对国民党和蒋介石都讲团结，中共内部更应不分彼此，



忘记过去的党内斗争，一致团结为抗日而努力。这些号召，不仅激励士气，而且这顶抗日的大帽子，可以掩护一切。主要是使野心家，能在这顶大帽子之下，实现自私的勾当。

有识之士，对抗日前途当时都不敢过分乐观。他们强调，中国不得不抗日，与其不抵抗而亡国，不如起而抵抗，也许还有一线生机。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及时得到友邦的援助，不愿在日本军事压力之下，中途与日本妥协。他们不希望亲日派或对日妥协分子，乘机抬头，并相信抗日势力的团结能够压抑投降论者的言论。这些善良的希望往往集中到一点，即是抗日无论如何艰巨，最重要的是全国抗日政府的体系，能够始终维持不坠。即使中国受尽折磨，只要统一的抗日政府存在，将来总有翻身之一日。

这种忧时忧国的论调，在延安也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慎重提出过。但毛泽东等不予重视，中共的要人们，也和普通群众一样，高呼抗日必胜，抗战到底，反对唯武器论，反对抗日缺乏信心等等。他们口中所喊的，与他们心中所想的并不一致，这是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的。

当时国共关系，相当微妙。这两个由敌而友的新伙伴，一面高唱共赴国难，竞相表演友好的姿态，另一面是同床异梦，互相猜疑。这些勇于内争的角色，在民族大义面前，似都缺乏应有的气魄。

芦沟桥战争发生之初，毛泽东等很耽心南京不能坚持抗战，因此在在为南京政府坚持抗日打气。当年八月初，中日战争正在华北大规模进行，于是毛泽东等放心了。他公开表示：“蒋介石这股祸水终于撞向日本那边去了。”张

闻天也很得意的说：“抗战终于爆发了，蒋介石已无力危害我们。”这些话不仅反应出国共间多年的怨仇，而且暴露出对内仍重于对外的想法。

七七事变以前，南京政府，大体上没有干预延安的事。抗战爆发后，双方接触频繁，大概南京政府也想知道一些延安的内情，陕西省政府委任了一个延安县县长，径来延安就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也派人到延安，设立县党部。南京政府曾屡次催促，中共军队从速改编，开赴山西前线，并准备派联络参谋到延安来。这些事曾引起毛泽东等的极大反感，认为是渗透捣乱行为，不利于中共。毛泽东、张闻天等开始夸大其词的说：“蒋介石对外虽然抗战，但对内依然是像以往那样反动。”因此他们断言，国民党抗战不会有好结果，不是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便会中途妥协。他们开始扬言，中共所领导的军队，不会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平等待遇；如果听任国民党将领们的指挥，那末，红军可能被送到前线去充当日军炮火的牺牲品。如果中共所领导的军事力量被牺牲了，国民党便会乘势压迫丧失了军事本钱的中共。这些想法，就是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后来在洛川会议所提出的中共抗日政策的出发点。

七七事变后，我这个住在延安城外山上的人，仍然没有参加中共中央的会议，也不愿预闻中共中央的事，但常被邀到延安城内去参加时局的讨论。我回想中共这多年来，搞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现在回过头来，国共第二次合作，反对日本侵略，奋斗目标，仍然是民族主义，换句话说，就是不使中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对此我曾感慨万端，深

深觉得，中共一向都为左倾空谈所误，现在如果还不老老实实做些抗日工作，很有可能成为民族的罪人。

从这些思想出发，我曾向毛泽东、张闻天等，先后表示过我对抗战的基本看法。我们谈到国民党问题的时候，我曾说到国民党能这样坚决抗战，已属难能可贵，而且可能在对内政策上有若干改善。谈到国共关系时，我也表示，国共第一次合作，是两党完全混在一块，因此吵闹不休，现在国共两党的界限分得很清楚，适宜于互相竞赛，可以避免彼此间的许多冲突。说到抗日前途时，我主张中共应采取积极政策，团结抗日势力，促进国民党政府的进步，务使日本侵略不易得逞。这些初步性质的谈话，当时还未引起辩论和争执。

抗战初期，到处一片热烈气氛，人们都为抗日热情所鼓舞。南京西安等地的使者，上海等地的新闻记者，不断的访问延安。其中最重要的，是南京派来的一个军政视察团，由十余高级军政官吏所组成，其使命又与国共合作大有关系。我被邀和毛泽东、朱德、刘伯承一同招待这些使者，极尽地主之谊。我们论调一致，强调拥护蒋委员长抗日，表示共赴国难，抗战到底的诚意。

当时毛泽东对国共合作抗日的真意何在，还没有完全表明。延安情况，也还有点五颜六色，譬如军人服装就不一致，有国民革命军的，也有原来工农红军的。毛泽东就有两顶军人便帽，一项是新制的国民革命军式的，有外来客人时，他便戴上；一项是原有的红军帽，有红五角星徽，参加中共内部会议或到“抗大”讲话时，他特别戴起来出台。

当时许多人因为军帽不一致，常避免戴帽，毛氏的举措，特别引人注目。也许毛氏要借此表示一下他有表里不一的两套。

当时毛泽东聚精会神处理红军的改编工作。七月下旬，南京与延安间，往返电商有关这件改编工作的实际处理办法。南京方面所注意的是迅速完成改编工作，以便中共军队能开赴前线抗日。毛泽东所注重的显然不是迅速开赴前线，而是如何保护他唯一的本钱，使红军不致在改编中受到损失，更企图运用这套本钱以备将来夺取天下。我一直没有预闻这些事，毛氏也有意瞒着我进行，但从许多事实中可以看出他的企图。

这次改编工作中，毛氏完成了他对红军的控制。这自然是他第一个要达到的目的。驻屯在延安附近的红军，主要来自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和陕北本地。这些军队系统不同，地域及语言各异，军事干部便不能任意安插。以人数而论，四方面军的人数最多，陕北本地人次之，第一和第二两方面军的人数较少。毛泽东将这些军事干部混合运用，使其互相牵制。再又强调党的领导，广泛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各级政治部和军中特工组织的职权都提得很高。

毛泽东所企图达到的第二个目的，是对付南京的压力，使红军虽经改编，仍不致为广大国民革命军所消化，要留有自由发展的余地。当时毛氏向南京所呈报的红军总人数是四万八千多人，连延安的后方人员，亦计算在内，其实作战部队只三万多一点。南京方面却只承认改编人数为两

万多。这个争执的着眼点，自然是部队经费和一切补给种类的数量问题。为此毛氏曾多次电南京的周恩来和西安的林伯渠，分别向南京军事委员会和西安的行营提出种种要求。毛泽东不厌其烦的如此做法，不仅为了增高红军的地位和获得部队所需较多的物质，而且对红军内部来说，可以证明他正向南京争取平等的待遇。

其实毛氏所愿意接受的，只是改编之名，他要保留红军的一切成规。他耽心红军干部会受到国民革命军薪给制度的影响，因此他极力鼓吹红军配给制度的优良，官兵生活平等的重要。国民革命军实际上并没有甚么国民党的领导，也不重视政治工作，毛氏惟恐受到国民党这些影响，因此特别强调红军原有的领导和政治工作体系，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

在毛泽东看来，游击战术是对付日本侵略者的不二法门。但提起对日军打游击，自然就联想到要建立敌后根据地，不用说毛泽东自然很重视此点。他当时正忙着调动大批“抗大”学生（多半是从外边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分派到红军各部，参加政治部的工作。其目的是使这些知识青年，将来到了抗日前线能够开辟敌后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组织抗日地方武装，解决军队物质需要，组织民众团体，办理“抗大”分校等等。

当时直接对日作战的有关工作，许许多多亟待进行，毛泽东都因忙不过来，压后办理。那时我曾当面对毛氏说：我们的军队从前都是惯打内战，对日作战都很外行，我们应当使我军的指战员了解一些日军的情况，特别是对日军

打游击应注意的事。毛泽东虽然表示赞成，但一直未有采取具体步骤切实进行。后来还是周恩来在洛川会议的时候，才组织训练班，研究日文、日军文告和日军动态等等。

中共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到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才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以命令发表，但早在当年七月下旬，南京与延安间大致商拟定案了。其要点是朱德任八路军的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指挥。八路军编为三个师，番号是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林彪任一一五师师长，贺龙任一二〇师师长，刘伯承、徐向前<sup>③</sup>分任一二九师正副师长，因为国民革命军没有政治委员制度和名义，因此八路军中的政治委员，就成了没有经过任命的黑市委员了。

八月上旬，日军向平津以南进攻，山西已受到威胁；南京急电八路军，催促即开山西前线，受阎锡山指挥，阻止日军前进。周恩来也由南京来电，要求八路军遵命迅速开往，表示抗日的积极态度。毛泽东代朱德草拟复电，老是借故推托，不是说补给尚待充实，就是说编制工作尚未完竣，要求展缓出发。

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战事正大规模的进行，八路军出发山西前线的事，似乎不好再拖延了。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立即举行一次扩大会议，以便在八路军出发前，决定中共在抗日时期的全盘政策。这个议案决定后，毛氏即电周恩来、秦邦宪等赶回参加。我事先不知道这个召集扩大会议的决定，毛氏因约我面谈，正式通知我这一决定，并邀我前往参加。我当时毫未迟疑的答应了，因为我想到，

无论如何对抗日总应表示积极，因此应当参加这一会议。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左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延安南九十公里的洛川县城附近一个村庄内举行，因称之为洛川会议。洛川当时是陕北边区和国民党地区交接的地方，洛川县县长是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所任命。城内和交通要道上，驻有少数国民党军队，洛川四周乡村则系八路军重兵屯集之所。这次扩大会议在这里举行，是便于八路军的中共将领们参加，和举行各种军事干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约二十人，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各部首脑外，有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朱德等重要军政干部。

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首先在会议上提出抗战爆发以后中共基本任务的报告。他说明已往中共的方针是推动国民党抗战，现在抗战既已成为事实，就应从根本上考虑中共在抗战中的任务。他认为国民党的抗战，只是片面的和军事性的。国民党的本质仍属反动：它包办南京政权，抗战更会增强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反对民主化，不敢动员民众，反而多方抑压，也并未放弃消灭中共的野心等。而且蒋介石随时可以与日本妥协，调转枪头，对付中共。因此，国民党不是为了真正的全民抗战，而是为了维持反动政权的单纯军事性抗战。

由此，他认为中共的任务，既要与日本侵略势力作战，又要反对反动的南京统治。他引证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采取使沙皇政府失败的政策为根据，认为中共在抗战中的基本策略，应该一箭双雕，使日本和蒋介石和一切反动势力相继失败，最后胜利归于劳苦工农大众和中共。

张闻天似是鉴于一九二二——二七年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争夺国民革命领导权的做法曾遭失败，这次如果再提出争夺抗战领导权，未免语义含混，将来难免重蹈覆辙。他强调中共的抗日政策是十足的失败主义策略，因此肯定必须使蒋介石失败，使日本和蒋介石等都因战争而瓦解。张闻天还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其内容和他的演说词相同。这个草案提名为中共抗日的根本任务，失败主义的策略为其内容的重点。

毛泽东继张闻天之后发言，表明支持张闻天的见解，接着对中共和八路军应采取的实际策略，详加阐述。他认为日本军事势力远胜中国，抗战决无幸胜之理。前此中共强调武力抵抗日本，并不是认为就此可以打胜，而是为解决国内矛盾所必需。

现在抗战既已爆发，就应冷静认识，抗战是艰巨的任务，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只有在持久抗战中，中共能采取正确的策略，才能使中国人民有获得胜利的希望。

他警告会众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危害，将远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他主张八路军应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毛泽东接着强调中共和八路军应该绝对的维持独立自主。他说明八路军此后仍应完全遵照中共中央军委会的指



示行事，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各战区司令长官对八路军有任何命令，都应先报告延安，听候处断。凡是不利于八路军的任何命令，概应用各种借口，予以推脱。

红军虽改称为八路军，但其内部体系，一仍旧贯，不得有任何变更；尤其要严防国民党渗透到红军里来。中共所发展起来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切，都须根据延安的指示处理，自成体系，在国民党区域内的中共组织，除少数人员可以露面外，仍须保持地下组织的特性，展开对国民党的政治批评。尤其要反对汉奸和妥协活动，以期达到争取民众的目的。

我当场听了张闻天、毛泽东的言论，觉得他们把底牌揭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遭到蹂躏，民族大义也不受重视，抗日烈火也并没有改变这两个自私的阴谋家的心肠。我决定不顾后果、仗义执言，首先指责张闻天的谬论。按照中共的不成文成规，每逢当权者提出政策后，反对派或被视为反对者可优先发言，以便正反两面意见都能供会议讨论。

我继起发言，首先针对张闻天所说过的话，指出现在的抗日战争，不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我们这次是民族自卫战争，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的争霸战。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并没有与沙皇建立起对外的民族统一战线，因此主张要沙皇失败；现在我们已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是不能提出使蒋介石失败的主张的。

我接着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将经历一个历史时

期，应与抗日战争相始终，甚至要延长到抗日胜利以后。试想蒋介石如果中途与日本妥协，对中共产有百害而无一利，首先日本的压力会完全落在中共身上。中共既然与蒋介石氏同舟共济，就不能有别的选择，只有推动他们抗战到底，影响他在内政上实施若干改革和求得进步。根据目前情况，蒋介石若失败，中共也难逃失败的厄运，因为彼此命运是联在一起的。

因此，我提出胜利主义的策略来与张闻天的主张相抗，并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使日本侵略失败，抗日的全体中国人，不分党派，都应获得胜利。现在大家为抗日努力，将来都应该分享胜利的果实。至于那一个能在抗日竞赛中，走在前面，要看各自努力的程度而定，并相信中共决不会落后。

我发言后，周恩来针对毛泽东的发言，表示不同的看法。他主要说明蒋介石既已抗战，就决不会中途妥协。他从蒋介石个人倔强性格和当时国内外的形势来分析，认为毛等这种顾虑并不存在。他也强调中共应从积极抗战中，来提高它的政治地位，尤其要顾到我们过去所说的话，过去我们一直说中共与国民党精诚合作，共谋抗日胜利，八路军将开到抗战的最前线去，担负冲锋陷阵的责任；现在，我们不好在事实上有所表里不一的表现。

他接着指出中共和八路军的独立自主，只能就相对而言，不好公开违抗南京的命令。他提出许多方法可以实现相当的独立自主，例如我们可以向南京公开说明，应按八路军的游击专长，来分配它的作战任务。在敌后抗日游击

根据地中，也可以在形式上奉行国民政府的法令，而实际保留我们自己的精神。他不赞成八路军专打避实就虚的游击战，这样会被人认为抗战不力，他主张在有利情形之下，可以与日寇进行较大规模的运动战。即使八路军在这种运动战中，蒙受相当的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这可以在全国人民面前，证明我们努力抗战。

接着，其他到会者或多或少的表示对张闻天、毛泽东的意见，不能完全同意。有的说到我们所提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实行时不好变化得太快。有的说到仍应委曲求全，力争抗战胜利。有的说到绝对的独立自主不易实行。有的说到八路军将来在 frontline 作战，不能限于只打游击战。

毛泽东看形势不对，于是提议休会三天，以便各同志能多方考虑和互相商谈。这是毛泽东的一种惯用手法，遇到党内有争执的时候，不愿让大家面红耳赤的争论下去，就用休会来作转圜。实际却是停止讨论，仍然依照他自己的主张行事。果然在休会期内，毛张等人企图贯彻他们的主张，频频与重要将领们接触，连周恩来都极少参与。我更十分清闲，很多事都未与闻。

当时周恩来、凯丰和我住在会场所在的村庄上，毛泽东、张闻天等则分住在附近驻有八路军的村庄上。在休会三天期内，毛泽东等忙着与军事干部举行各种会议，周恩来、凯丰和我则没有参加。周恩来从未斗争过我，因此我们见面照旧谈天说地，凯丰这时似也不完全同意毛泽东等的做法，常邀我下象棋谈天，似乎要冲淡一下前此对我的不客气。周恩来稍微忙一点，但也常有工夫参加下棋。此

情此景，足见恩来、凯丰的遭遇也和我相似，多少被关在门外了。

三天后再复会。毛泽东首先报告，谓现在大家的看法已大体归于一致，他并据以拟定了一些方案提出讨论。他所提出的第一个文件是《抗日救国十大纲领》<sup>④</sup>，其内容清楚的表示出中共和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并对国民政府的民主化的要求有较具体的说明。其次的一个文件是中共任务的决议。其中并没有要使蒋介石失败这一类的话，只强调中共力争全民抗战和抗战的胜利，反对汉奸妥协派，并防止南京的妥协倾向。此外也没有中共绝对独立自主的话，而是强调中共八路军应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下行事，八路军主要是进行游击战，只在极有利的条件下，才进行较大规模的运动战等等。

这两个文件讨论的结果，经过一些小修改，便一致通过了。在讨论时，周恩来曾表示赞成这两个经过协商和修正的文件。我虽事先并未参与这两个文件的草拟工作，也表示现在这两个文件没有甚么重大的语病了。张闻天一言不发，似特别以我批评过他，因而取消了他提出的决议草案一点，深表不满。这次讨论，也是后来毛泽东对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的作法的开端，或者说假联合真斗争还更正确些。

接着，会议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首先是一些人事的调动，如那些人到国民党区域去，那些人上前线，那些人留在陕北等。继之议决了八路军中政治工作的纲要，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办法等等。此外，讨论得特别多的是八

路军出发前线的步骤问题。毛泽东极不愿意八路军三个师同时开往前线，他觉得这样会被国民党集中使用到一个战场上，无法不作阵地战。他主张这三个师循不同的道路，先后开往前线，以便分散打游击。在陕北方面还应以编组未竣为借口，留驻两个旅，以资巩固，以免国民党乘机派军队来驻防。这些问题也都次第顺利地解决了。

最后，毛泽东、张闻天共同提出了要我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职务。他们先后说明这个职务原是由林伯渠同志担任的，并已呈报南京，但仍未获得正式任命。现在林伯渠事实上担任八路军驻西安的代表，与西安行营联络，解决八路军的补给问题，无法抽身回到延安来。他们还认为由我担任这个职务，无论对内对外，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迟到了几天的秦邦宪，是劝我担任这个职务的最积极的一个。他在懋功时，原是首先向我斗争的，这时他的意向有些转变，也许他在西安事变后，担任周恩来的外交助手，见闻较广了。他向我说由于已往的党内斗争，外间已知道一些我们内部有过分歧的情形，现在我能出任边区政府的主席，外间一切流言，就可不攻自破了。他认为这个职务只有我能担任，因为我的名字在外间易于通过。他更强调现在我们的军队即将出发作战，如果我担任这个职务，同志们都会觉得党内分歧已不存在了。

我当时曾以个人能力有限为理由，极力谦辞。秦邦宪更进而说到他们都信任我，而且相信我的能力，能胜任愉快。毛泽东、张闻天等又相继表示他们完全信任我，并保

证凡边区政府所管辖的事，无论对内对外，概由我主持，党决定全力支持我，再不让同志们因过去了的事批评我。他们而且说现在中共内部更要团结一致，来应付这个抗战局面，所以不要我再推辞。

我不好固辞，于是提议林伯渠同志仍是边区政府主席，在他不能视事的期间，暂由我代理。大家同意我这个办法。会议就在大家和好的气氛中，宣告闭幕了。

- ① 蒋的庐山谈话全文要点见张其昀著《党史概要》第三册，第一一四三页至第一一四六页——台北文物供应社民国四十一年初版。
- ② 中共所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全文，见胡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三五四页至第三五六页——上海商务，一九五一年第九版。
- ③ 徐向前在西路军失败后，经过极其艰险的历程，于“七七”前返抵延安。
- ④ 全文见胡华主编前书第三五六页至第三五九页。

## 第二章

# 边区政府

这一章自然是叙述我在边区政府任内（一九三七年九月至一九三八年四月初）这段时间遭遇的种种经过。中共中央为毛泽东、张闻天所包办，抹杀洛川会议大家所表示的反对意见，不顾抗日前途，推行反蒋重于反日的政策。他们在洛川会议对我所表现的友好姿态，完全是虚伪的，实际上他们不断的打击我、排斥我甚至暗害我，使我这个边区政府主席不能有任何作为，他们的手段甚至使我达到窒息的程度。

洛川会议后，我返回延安即搬到边区政府居住和办公。中共素来不讲究官府仪式，而且在抗日的紧急时期，说干就干，丝毫不容推诿和耽搁。边区政府急需改组，是洛川会议所认可了的，我的最初任务是研究采取何种步骤，以实现改组的决议。

根据国共和解方案，国民政府只允许中共在陕北设立一个特区行政公署，其首长的名衔为行政公署主任，属陕西省政府管辖。首长人选由中共推荐，其编制则按国民政府法规办理。七七事变前，中共曾向国民政府要求，这个特区应归国民政府直接管辖，但未得到允许。抗战爆发后，

中共更进而要求陕北特区政府组织应等于一个省政府的组织，也未得到国民政府的允许。这个案件始终是一个糊涂案件，我极力考察也找不出任何有关的文件为凭。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前，就决定了自行组织陕甘宁边区政府，其编制完全按照国民政府属下一个省政府的编制。据说这样做蒋介石氏会默认。

因为改组的原则没有确定，陕北这个政府机构，还保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老规模，但它已残缺不全；大门口没有招牌，印信还是老式的，原任主席林伯渠，已经半年没有视事了。边区政府属下，有秘书处、内务、财政经济、教育三个委员会和政治保卫局等五个机构。秘书处之下，只有交际科有实际工作，由伍修权负责，直接由中共中央指导。内务委员会委员长蔡树藩（他因受伤失去了一只手），只做些抚恤和优待军人家属的工作。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委员算是林伯渠兼任，那时因他不在，由其副手曹菊如代理，每月的经费收支，概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指导。中央政治保卫局由周兴负责，事实上直隶中共中央，边区政府不能过问。只有徐特立所主持的教育委员会，有些工作可做，较为活跃。

徐特立这位老教育家，在我们同志中是较年长的一位，提倡新文字极为积极。他和林伯渠等人鉴于中国文字的艰难复杂，力主将中国文字拉丁化，并在陕北试行了近两年。他们认为在陕北这个文化落后的区域，正好推行拉丁化运动。徐特立为了推行文字拉丁化，曾和毛泽东多次纠缠；我任边区政府主席后，便成为他纠缠的主要对象。



他一面编印拉丁化教材，训练教师人才，督率陕北各初级学校实施，一面以“传教士”的精神向我宣传，希望我积极支持他的主张。如果我向他说到拉丁化尚未十分成熟，一时不易推行等类的话，那他非跟我辩论一个通宵，是不会停止的。

除了徐特立的理想主义而外，边区政府的内政困难不胜枚举。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当时的一般真象。徐特立属下的一位得力助手，原系延安地方上老办教育的人，他有一位太太，两个小孩，新近又生了一个孩子。他在教育委员会工作，除吃饭以外，一向是不支薪的，因而他的太太和小孩们均在家里无以果腹。但边区政府穷得要命，没有津贴职员家庭生活的办法。结果还是由徐特立教育委员会职员伙食尾子中抽出少数的金钱，来暂时津贴他。

毛泽东也曾说过要使边区政府成为国民政府下一个模范单位，它的设施须作为许多敌后游击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指南，但他并不了解政府机能的范围和内容，实际上只想使边区政府能在某些方面装点门面（这也许是毛氏不能很好统治一个国家的基本原因之一）。毛泽东等中共要人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错误观点，大别之为下例各点：一、他们忽略了许多历史教训乃至列宁的遗训，不将政府机构看作最重要的和最有效能的工具，或者换句话说，只有夺取政权的抱负，没有好好运用政府机能的知识。二、他们太重视党的权力，而又不了解党与政府的正确关系，因而党部对政府工作干涉太多。三、由于革命实行中养成

了许多粗糙的革命观念、游击思想、不合理的平等观念等，无法深刻认识法律和制度等的重要性。

当时边区政府的改组刻不容缓，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无法澄清，在十分草率的情形下，组成了新的阵容。九月中旬在中共中央认可下，边区政府实行改组：张国焘任主席，陕北老干部潘自力任秘书长，马明芳(陕北老干部)任民政厅长，曹菊如任财政厅长，刘志丹之弟刘景范任建设厅长，新由国民党区域来的文艺作家周扬任教育厅长。从这名单中，人们可以看出陕北色彩加重了，编制则大体仿效国民政府的法规。

改组后的边区政府立即召集一次县长会议，所有陕北二十二个县长都参加了。当时我和我的同僚们，都很注意研究当地实况，但结果一切都茫茫然。原来陕北只存在一些游击区域，毛泽东等到陕北以后，也只挂起一块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招牌，为了解决军队的供应，一切现炒现卖。因此这个素来不平静的区域，从国民党到中共，历来都是一团糟。没有人口统计，甚至谁也不知道较确实的人口概数；从政府工作的各方面去看，都找不出一些可靠的成规。因此我们只有缩小范围，研究一下陕北老百姓的负担。以前收税的方法极不一致，征收、捐献都有，贡献劳力的如替军人家属代耕等等也不少。总计起来，一个老百姓所要付出的，占他所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二强。不待说这个数字是极不精确的，我们就根据这一数字，草拟收税的办法，认为老百姓的负担不应超过百分之二十二。

边区政府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整理财政及增加收

入。以前最主要的收入，是从鸦片烟而来，陕北北面三边一带，盛产鸦片，历来这些鸦片都东向输往山西等地；原有一些军人和地方恶霸以及鸦片烟商人，经营这批买卖。当林伯渠主理财政的时候，曾向这些贩运者征收过境税和出口税，此外中共没收来的和征发来的鸦片烟扫数出口。至于其他商业税的收入就少得可怜了。大约在西安事变后边区政府才在三边一带禁种鸦片，而且抗战爆发后，山西成为中共的友邻，怎好意思再把鸦片烟推销到山西去。边区的财政收入，因而大减，非急谋补救不可。

征收救国公粮法规的制定，便是建立财政基础的一件大事。我曾根据陕北及其他苏区以往征粮办法，拟具这个法规草案。详细规定，我已不能记忆，其要点大概是：凡各农户收成仅足供一家之用者免征；超过一家最低限度之需要，即按其超过部分之多寡，用累进法征收救国公粮。一个富裕的中农，收成平均每人在二千斤上下，大约征收百分之二十，至于地主富农每人平均收成在四千斤以上者，征收额约为百分之四十。奖励农民按粮价折合现金缴交，这样可以免除农民运送粮食的劳力。各县职员薪金，如遇现金不足时，则改发粮食。各县均须按法规设置粮食公仓，储粮以供军用。

以抗日名义来征收救国公粮，而法规又很简便，富有伸缩性，易于实行。在当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抗日口号号召之下，农民是特别踊跃缴纳这种公粮的。救国公粮，实在就是统一的农业税，其所以规定以实物缴交为基础，是因鉴于抗战发展下去，货币可能混乱和贬值。后

来，在八路军所到达的地方以及许多敌后游击根据地，都实行过这个办法，收到很大的成效。国民政府对这个法规也甚感兴趣。

由于征收救国公粮和其他财政方面的改进，边区政府的收入日渐增加。一九三七年九月，边区政府收入不足七万元，十月增至九万余元，十一月增至十六万余元。十一月的收入已能供给陕北党政机关的需要，而且收入仍在上升。鸦片烟税日渐退居不重要的地位了，实施禁烟的阻力也减少了。

此外，那次县长会议，还有不少的决定，主要是规定各县政府与边区政府的关系，各县政府及其属下各级组织的大要和工作方针等等。同时边区政府本身及其所属各厅的职权工作方针等等，都有扼要的规定，以期建立一个新的秩序。

由于我在党内的处境，对于自己工作的成就不敢存有什么奢望，但也希望边区政府的例行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可是事实上除了征收救国公粮和增加财政收入，很少遭受干扰外，其他各项工作几乎都行不通，虽然经过我和其他的当事者据理力争，屡次抗议，但中共中央那种侵犯边区政府的职权，遇事横加干涉的作风，早已成为积习，无法改变。我现在只略举几件事，来说明这种真象。

任民政厅长的马明芳熟悉陕北地方情况，他就任之始，锐意整理各县政府的组织和工作，他可以直接向张闻天等进言，也与中共陕北特委书记郭洪涛等关系密切，曾向他们要求重视各县政府的工作，和不可随便调动各县政

府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他们的应允，但执行起来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共中央和他所属的各部门，总是向下级党部下命令，发通知；中共陕北特委除将中共中央文告转到下级之外，他本身也有不少的命令。这些中共党内的文告内容，漫无限制，不仅包括了边区政府的工作，而且内容混杂，实行的方法，又多是由党部动员民众，而不是依据边区政府的法令。为了这些数不清说不尽的紧急动员，往往胡乱调动干部，陕北特委甚至各县县委，都可以任意调走各县政府的重要干部，而马明芳事先并不知道。经过两三个月后，马明芳向我叹着气说：我实在没有法子来建立民政工作的新秩序。

洛川会议原决定抗日军政大学，培养军政干部，党校培养党的工作干部，另成立一个陕北公学，培养财政经济、教育、卫生等专门人才和其他各项边区政府所需要的工作人员。而且准备将来在敌后，也可以逐渐办理这三类学校。边区政府改组后，陕北公学的招牌是挂起来了，学生也有八百多人，但边区政府不能过问，完全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而且学校的课程也是列宁主义、党的建设那一套，变成了另一个党校。洛川会议原来企图训练一批行政工作人员，来与国民党相对抗的本意，现在也不再提起了。边区政府属下的教育厅，也无法提出教育计划和预算。原有的一些小学和补习学校等，仍由各县、各乡村政府自己设法维持。而新任教育厅长的周扬，见人就爱说左派作家运动和文艺思想等，他个人对演讲写文章甚有兴趣，似乎对于地方教育工作不很了解，也无兴趣。因此，徐特立

办教育的时候，对中国文字拉丁化运动做得有声有色，周扬接任后，拉丁化运动就随之而消沉了。周扬也没有提出任何教育计划，这也许是在现实情况下不得不如此。

任财政厅长的曹菊如对于收入增加，颇感兴奋，拟于当年十一月份起，建立边区政府的预算制度。他根据实况，建议除中共中央每月所需要的经费之外，剩余的由财政厅支出，为发展边区政府工作之用。到了十二月初曹菊如大体知道收入有十六万之多，径向中共中央组织部请示，谁知组织部长根本不同意曹菊如的计划。组织部长的指示，除了上一个月维持边区政府所需要的经费外，所多出的十余万元，概交中共中央，为发展革命工作之用。曹菊如回来向我报告这件事的时候，使我很愤慨，准备为这件事抗争；曹菊如反劝我说：他们这种作风很难更改，从前林伯渠同志为此不知受过了多少气，结果也没有办法，现在还是遵命行事好了。

中共中央对财政的观点既然如此，便很难建立一个适当的薪给制度。毛泽东非常欣赏他的工作人员只发给伙食费，每人可以分给一点伙食费的尾子，作为零用钱，并认为这是最好的配给制度。这种配给制度，自然滋生不少的贪污和浪费，譬如赠送就相当普遍。主持对外贸易的叶季壮和他的助手们，经常能从陕北以外带回许多赠送品，毛泽东所需要的烟、酒、药品、补品等等，是经常供应无缺的。中央一级的其他干部，也经常可以获得一些他们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这种从江西苏区所带来的作风，显然为陕北当地干部所仿行了。

任意增加人民负担的作风，往往被利用为满足地方干部个人的需要。陕北各县及各乡政府内的干部往往有较好的享受，多半都是利用职权而得来。替红军家属代耕的制度，曾盛行于各个苏区，我在鄂豫皖的时候，曾研究如何加以限制，以防并非红军的干部，也利用这种代耕制度，来满足他们的家庭需要，增加人民的负担。陕北许多地方干部甚至本地中共党员，也获得跟红军家属一样的代耕，个别的严重例子就像一个地主有一群农奴一样。不合理的配给制度，必然腐蚀所谓革命精神，滋生苛捐杂税、贪污、浪费、和各种各样的官僚主义。

政治保卫局的工作，直属中共中央，边区政府从不过问，但它的工作范围实在太广泛，许多事均需与边区政府接头，而且很有一些麻烦不易解决的事。日军进攻太原，太原吃紧的时候，陕北边区北面榆林地区，国民党驻军中一位师长派了他的副官长，护送该师军官眷属约二三十户人员，道经延安南下，返回关东地区的老家，自然沿途要经过政治保卫局检查站的检查。这位副官长来访我求情，他首先把该师的证件及公文给我看，声言他所率领的全部是军官眷属，携带的也是各人行李，只是榆林地方现金难得，各家不免储藏少数货品（意即指鸦片烟土），请求我优待他们免于检查放行。我问明同来的保卫局人员，这一行人确系军人眷属，携带的又是少数货品，我即应允优待，免于检查放行。依据法令，鸦片烟土原应没收，如今以优待友军的名义而放行了，政治保卫局总觉得失去了一笔可观的私有财源，因而暗中总在埋怨我“讨好军阀”。

新成立的建设厅，工作尚无头绪，任厅长的刘景范虽然有点花花公子型，但也很想做一番事。当时拨归建设厅管辖的是一大批生产合作社、互助社等等。刘景范研究了一下，提议加以整理，因而召集了一次各社的主任会议。原来这些社的成立，最先是优待红军烈士家属的；也有一些是由残废军人组织起来的；久而久之参加这些社的，也有不是烈士家属，有些也是有相当生产力的人，并有很多已经有生产事业，总计这些社的数目约有一百多个，人数约三四千(详数记不清)，分布陕北边区各地。这些社的经费，完全由边区政府供给，总支出为数不少，名之为津贴，即是边区政府津贴有功人员及残废军人之意。

刘景范主持这个会议，我也曾亲自参加，会上决定采取生产节约方针，实施整理。规定有些社可以成为真正的生产合作社，只需由边区政府供给一些生产资料，就可以自给自足；有些社可以部分的自给自足，只需部分的津贴；有些还需要原有的津贴，甚至还要增加一点。这样做不仅使这些社都在生产上有出路，而且可以节省大批经费，原则上也符合中共中央生产节约的总方针。谁知张闻天不问情由竟以中共中央书记的名义下令否决，其理由为：这是优待烈士的津贴制度，不能以节约的名义加以更改，应维持原状。

在中共中央很多次无理干涉边区政府的工作中，以这次干涉建设厅的事最为荒谬。我当时曾十分愤怒的说：“这是仇恨我、打击我、和阻扰边区政府工作的小人行为。”但我当时也极力忍耐，因为我已厌恶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两面



三刀，根本不愿同他们共事了，也不再把他们视为同志，并准备自求解脱。

我当时所受的委屈实在太多了，干扰边区政府工作本极平常，但对于任何富有责任感的人，总想做一些份内所应做的工作。现在，对边区政府一些例行工作也横加干扰，当然引起我最大的反感。我所受到的其他打击，更有甚于我以上所说的，下文我还会扼要谈及。

毛泽东、张闻天不仅干扰边区政府内政方面的工作，也同样扼杀边区政府的外交活动。陕北边区政府，是唯一被外间所承认的一个地方政权机构，到陕北接洽的人员以及外来的公文，除了少数应由中共中央处理、或由八路军驻陕北办事处分别处理外，极大多数都应该由边区政府主席、秘书长和秘书处承办处理。但毛泽东、张闻天的偏窄自私和毫无远见，使这项外交工作不仅非常混乱，而且延误停滞，并使中共遭受损失。

名义上归边区政府秘书处管辖的交际科，事实上却归中共中央指导，它的表现显得神秘莫测，说穿了它就是直属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局一个分支机构。这些人处理工作的方法，总是从窄隘的特务眼光出发。根据毛泽东、张闻天的意旨，例如被认为是中共朋友的外来人员如民主人士梁漱溟和左倾军人何基沣等，就受到热情的招待（江青当时是不为人所注意的受招待的文艺人员之一）。至于其他来访者所要接洽的事，多数是不得要领而去。

毛泽东、张闻天最怕我利用边区政府主席的职位来建立对外关系。毛泽东斗垮我的手段是很毒辣的，不仅使我

在中共党内不能抬头，而且利用外力打击，破坏我在中共以外的信誉。他们向外散布谣言，诬指我反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将过去苏区一切坏事，都说成是张国焘的所为（特别向那些同情中共者散布）；甚至七七事变后，为了拖延八路军的开赴前线，还说些张国焘部下不愿抗战、大军无法迅速开拔等鬼话。毛氏用心无非是愚弄别人，替他拔去他自己的眼中钉。后来毛氏又利用我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向交际科人员说，当心张国焘勾结国民党人危害中共。因此，不少的人前来边区政府求见我，多被交际科托词挡驾了。有少数无法拒绝的新闻记者来见我的时候，交际科事先并不告诉我这些新闻记者的来历和求见目的，使我难于应付。

延安的访问者中有一大批来自邻近的地方，特别是山西战事吃紧的时候，从山西来的客人和从北部榆林绥定而来的客人，不是来视察就是有事接洽，如关于彼此间交通联系，工商事业及学校的迁移，后方办事处的设立，家眷的安置，难民的接待等等。其中来接洽的人物有军政机关的代表，也有山西方面的高级将领，这些事都被交际科搞得一塌糊涂。交际科人员弄得无办法时，就推脱责任，胡说边区政府及其属下的各级政府组织不健全，客人所要求之事，实在无法做到。这些作为，显然没有顾到中共与外界，在共同抗日中具有休戚相关的大义。

绥定地区的行政专员兼绥靖司令何绍南，奉蒋介石委员长的电召，由绥定乘飞机前往南京。何绍南因此电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我，告以某日下午飞抵延安，在延安住宿一

晚，次日起飞南下；我当即复电表示欢迎。毛泽东对何绍南在延安之停留多所猜测，认为一定是奉蒋介石之命来探听虚实，但似也觉得这对国共合作将有关系。当我率领边区政府几位重要工作人员，在机场欢迎何绍南时，毛泽东也率领着大批人员来了。当晚边区政府设宴招待何绍南，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要人都都赶来参加。何绍南表现得有点目空一切，他摆出陆军中将与国民政府要员的架子，只愿和边区政府主席对等欢谈，似乎不愿与中共中央有任何接触，对毛泽东等表现相当冷淡。

这件尴尬的事发生后，我即请交际科长伍修权去请示毛泽东，告以何绍南的态度或者仅是摆官僚架子，或者故意做作，来试探我们内部的情形。至于他所要知道的事，第一是延安近况，以便向委员长报告，第二是万一日军侵犯到黄河边，绥定地区和陕北边区如何对敌作战和相互联防等，究应如何应付，请毛主席指示。毛泽东对此始终对我没有任何答复。不料第二天上午送走了何绍南之后，国民党肤施县县长，偷偷告诉我何绍南就住在县衙门内，毛泽东于当晚十时曾亲往拜访何绍南，一直谈至次晨二时左右，他本人始终在旁。那个县长向我形容说，最初那位何专员仍然是摆架子，但敌不过毛主席精明，何专员后来也就软下来了。毛主席曾详细叙述八路军和陕北边区的近况，托他转呈蒋委员长，并对蒋委员长充分表示仰慕之意。

如果不是那位县长告诉我，我真给蒙在鼓里了。毛当时对蒋没有好话说，总是形容蒋的军队不能作战，一定

经不起失败而投降日本；现在对何绍南却又表示得这么好，显然是欲利用何绍南去骗骗蒋介石。至于他始终不让我知道和预闻这件事，似乎也没有别的解释：第一他要垄断对外关系，不让我参预，第二也许因为何绍南的态度，使他怀疑我与国民党人暗中有所勾结，他必须单独去查一查。

叶挺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新四军军长，负责改编散在湘鄂皖豫赣闽粤一带的中共游击队，以便开往前线抗战。叶挺没有到延安以前即表示我是他在延安的唯一老朋友，他并不认识毛泽东，总希望我能帮他的忙，从中说合。毛泽东、张闻天等也觉得新四军的前途，系于我向叶挺的一言，因此希望我能鼓励叶挺，站在中共一方面来处理一切。

叶挺抵达延安，首先来看我，向我表示了他的真正意向。他原系中共党员，在广州暴动之后，即已与党脱离了关系；此次献身抗战，愿助一臂之力，但他不知道中共是否能再信任他。他这个新四军军长是国民政府所任命的，而他将要指挥的部队，又是属于中共的，因而他特来延安试探。他希望我这个老朋友，能为他考虑一下，究竟这个职务是否可以干下去。

我鼓励叶挺担任这个职务，告以中共不仅不会歧视他，而且会把他当作国共间的一座好桥梁。我建议他采取诚恳积极的态度，径与负责军事责任的毛泽东商谈解决编组新四军的实际问题。他们的商谈结果是圆满的。叶表示接纳毛的建议，以项英为新四军的政治委员，陈毅为副军长兼第一纵队长。湘鄂赣闽粤皖豫一带游击队，编为六个纵队，

概由原有的游击领袖任纵队长。至于军部内的组织应仿照八路军的建制，其各单位首长人选如参谋处、军需处、军医处等概由叶挺选任。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方面的交涉，亦由叶挺负责。这就是新四军编组的开端，也埋下此后国共两方在大江南北展开军事斗争的祸根。

叶挺在延安的时间虽然很短，但也听见一些毁谤我的言论，他似乎并未理会。毛泽东也从未邀我参与商讨新四军的改编工作，我也乐得置身事外。叶挺离开延安前，曾将经过的详情告诉我，再一次表示他指挥的是中共的军队，又要挺身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交涉和领款，将来恐怕会两面不讨好。当时我也不好多说，只得淡淡的表示你已经费了许多力，只有向前走去再说。

洛川会议后，中共中央对抗战的态度，相当不可捉摸。中共中央政治局有三个多月没有举行过会议，当时多数政治局委员不在延安，剩下的只有毛泽东、张闻天和我三个人。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经常举行，由张闻天以书记身份主持，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各部部长为组成分子，我也曾出席过一两次会议，都是讨论各部门的日常工作，从未讨论过抗日的局势。因此，延安对抗日的动向，只可在毛泽东、张闻天的言论中去找寻。

洛川会议否决了抗日又反蒋的政策，毛泽东、张闻天究竟不好公开违反；但仍然是阴一套，阳一套的作法。延安在外表上到处是抗日口号，热热闹闹，中共中央内部却有点阴阴森森的，似乎对抗日前途毫无信心。随着抗日军事的不利发展，批评蒋介石的话便增加起来，不是说国民

党军队如何不中用，便是说南京的妥协派如何活跃，妥协倾向如何增长。当南京将要失守的前夕，张闻天曾对我说蒋介石快要投降日本了，看那些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存有奢望的人，还有甚么话可说。

周恩来在洛川会议后，本应速往南京，但他却借口随八路军到山西前线去了。当时毛泽东希望周恩来常驻南京，除了了解情况和办理交涉外，八路军还有一些物资没有领到手，特别是南方各省的中共游击队，毛泽东原来要求完全由中共人员领导，因周恩来没有去南京交涉，结果南京径派叶挺以新四军名义实行改编。毛泽东曾说周恩来不遵令速往南京，延误了大事，外交人员有点不如意就自由行动？那怎么可以呢？

周恩来这种举动，显然是不满意洛川会议。他似乎相信毛泽东、张闻天虽然表面有些让步，但实际还是坚持己见，他如果贸然赴南京，处境将很尴尬。他不动声色说先到山西前线去看看，帮八路军总部办点外交，然后从山西直往南京。可是周恩来在山西前线耽搁了三个多月，毛泽东虽屡电促其速往南京，周总是借故迟延。直到毛泽东去电召他回延安面谈后，周恩来才遵令返回延安。

九月二十九日，八路军的一部，在山西平型关曾予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这是中共所领导的军队，在抗日战场上第一个大功绩。日军于九月十三日占领大同后，南向太原逼进，抗日军凭险节节抵抗。平型关之役，是林彪所部抄到敌军侧后，实施攻击。敌伤亡颇重，稍向后退；林彪部伤亡也在千数以上。八路军这一次的表演，是得力于周

恩来在前线的鼓励。延安接到平型关胜利的消息之后，曾大事宣传；一般人也感觉到八路军不仅可以从事游击战，在运动战中也已获得胜利。但毛泽东却电令前方将领，以后应避免这种牺牲重大的战斗。

洛川会议后，八路军陆续开往山西前线，毛泽东那时聚精会神指导这个军事行动，强调独立自主和只打游击两个原则。毛泽东有点怕周恩来在前线搞风搞雨，也不放心那些大大小小的军官，惟恐他们充当抗日英雄。到这年十一月九日，日军占领了太原，那时八路军大致都转到敌后去了。一一五师林彪部转移到同蒲铁路以东，正太铁路以北一带的太行山脉，向河北地区发展。一二〇师贺龙部在同蒲路以西晋西北地区打游击。一二九师刘伯承、徐向前部正向晋东南长治地区发展，并准备向河北、河南、山东一带的敌后打游击。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心情才比以前轻松了。

当时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四周苦战了约三个月，许多战绩可歌可泣，直到这年十一月初才被逼向后撤退。连山西的阎锡山在太原失守后，也宣称要在山西守土抗战。毛泽东从来不谈友军抗战的事，我从未听见他赞扬和鼓励过这些英勇抗战的表现。当南京失守，国军向后撤退，形势相当混乱的时候，毛泽东曾得意的描述他的抗日观感。他认为蒋介石等如不投降日本，可能将整个中国的领土断送与日本，可是日军只能占领一些大城市及重要交通线，中共所领导的游击战争，就可在广大敌后地区发展起来，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国才能翻身。因此，整个中国会被蒋

介石断送，将来中共又可以从日本手中夺回来。

我听了毛泽东这种议论，真有点毛骨悚然。我想到中国为甚么要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共为甚么不积极支持蒋介石坚持抗战，为甚么不积极维持抗日的国民政府，为甚么不同抗日友军密切合作；如果全中国都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中国人容易翻身吗？我为此曾经愤怒的感到，毛泽东的想法和由此出发点而来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帮助日本侵略，毛泽东将会遗害中共和八路军以及整个中国，简直是一个披着共产主义外皮的汉奸。

反对张国焘的斗争又重新被掀起来了，这是由检讨陈昌浩应负西路军失败责任开其端的。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后，化装逃到他的家乡湖北，企图回到鄂豫皖苏区去。抗战爆发后，他于八月间潜行来到延安。他见着我时羞惭满面，自承应负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听候党的处罚。他闲住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有时写些有关抗日的文章。

十一月中旬，中央书记处召集中共延安积极分子会议，检讨陈昌浩的错误。毛泽东、张闻天选择这个时机来展开党内斗争，是因上海太原等地相继失守，八路军已转入敌后，抗日形势果不出他们所料。反对我的斗争虽在当年二月间已告一结束，但暗中反对我的宣传，是一直没有停止过的。上海、太原失守后，毛泽东、张闻天径指我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表示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抱有右倾观念，对蒋介石亦有投降思想。据他们看，足见反党分子又在新的形势下从事反党，非重重予以打击不可。

斗争陈昌浩的会议，连续举行了约一个星期。参加这



个会议的有五百余人；多数是延安以外来的小伙子，党校、抗大、陕北公学等校的党员学生，少数是延安各机关的干部。在张闻天直接领导之下原系要批评陈昌浩的，但重点却逐渐转到我身上，主要内容还是土匪、军阀、反党那一老套。那些党校学生往往不根据事实，任意攻击和诬蔑，似乎中共的一切错误，都是出自四方面军和张国焘、陈昌浩这班人，中央的领导则是完全正确的。

我为了表示抗议，没有参加最初几天的会议。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我曾出席作一个总的答辩。我首先指出这次检讨西路军失败经过，又牵涉到过去一、四两方面军对立的往事，真是遗憾。我说明当年红军的西进计划和西路军的失败，有很复杂的经历。陈昌浩同志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在红军中不但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对党对红军也都有过惊人的贡献。四方面军在西进的艰苦战争中，牺牲惨重，一般将士，英勇奋斗，真是可歌可泣。同志们若不研究这些情况，批评一定不会中肯，许多言词都成了牛头不对马嘴的空谈。至于两个中央的对立，我早就承认了错误，请你们相信我，为了团结，我所承担的责任，超过了我所应当承担的，而且这是早已过去的事。如果不是抗战发生，也许我早离开了中共的领导岗位。

抗战发生，我不计已往一切，挺身而出为抗日做些事。在洛川会议上，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包括担任这次会议主席的张闻天在内，都要求我出来担负边区政府主席的职务，并鼓励我，说过去对我的斗争早已结束了，在此抗日紧急关头，决不会旧事重提了，他们表示信任我，使我能安心

工作。同志们批评我的话，我不愿多加答复，仅指出某某几点显系毫无事实根据的。我要请你们设身处地想想，你们将我痛骂得不成样子，我这个边区政府主席还能够做下去吗？我还要请问你们，在此抗日紧急关头，你们没有将时间用在准备抗日的工作上，却费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这里大声疾呼的围剿我，究竟你们的目的何在。

在我发言以后，继起的发言者指责我承认错误并不彻底，没有放弃反抗的武器；也有人说，为了中央的领导威信，要求我多承担起一些错误的责任。另外有一个在中央书记处新任工作的后进小伙子（我并不认识他），起而发表攻击我的言论。他凭空的说：金子是发亮的，但并非一切发亮的东西都是金子；苍蝇也是发亮的，张国焘同志便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一个苍蝇。任会议主席的张闻天并不制止这样的谩骂，反而表示欣赏。这就使我怒不可遏的离开了会场。

会议结束后的次日，毛泽东约我去谈话，张闻天已先我在座。他们两人笑脸相迎，对我的辞职表示挽留；并且解释这次斗争会，原是检讨西路军失败的经验，不料又牵涉到两个中央对立的事，请我不要介意。我深恶他们这种表里不一致的虚伪把戏，我也想到因我昨天在会议上的发言，指责了他们毫无信义，使他们不好等闲视之，故又来一次请我原谅，其实他们反对我的阴谋，绝不会改变的。当时我若坚持辞职以示抗议，那就当面闹翻了。我那时还不愿那样做，因此也不再提辞职的话，当场敷衍了几句，也就罢了。

在这次谈话后，我又同张闻天会见过两三次，我自然必须要把边区政府的工作向这位中央书记报告，可是张闻天摆出他书记的臭架子，蛮不讲理的打官腔，有点像恶婆婆折磨媳妇似的。这种小人行径，我虽然有点生气和好笑，但也忍着不说甚么。当年十一至十二月之间，我可说受尽了折磨，边区政府的工作受到严重的干扰，一个星期的反张国焘斗争会以及许多暗中的麻烦，这些事都是由毛泽东在后面撑舵，而由张闻天在前面喊打喊杀来进行。

甚至我的太太和我不满十二岁的儿子，都受到他们的歧视和侮辱。我的太太与我离别了约六年半，我的儿子在武汉时代和我分手，相别已超过十年，他们于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先后来到延安；彼此都历经艰险，劫后相聚，不仅我们自己愉快，我们的好朋友都深深为我们祝贺。但窃据了党权的阴谋家，并不肯放过，用打击我太太和儿子的手法，以增加我的痛苦。

我的太太本是老中共的党员，列名为中共妇女领导干部，当我从上海到鄂豫皖苏区，她留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机关的机要工作。因为当时在上海的中共机关屡次遭受破坏，她幸而逃脱了被捕被杀的危险，最后与中共失去了联系。她历尽艰险，方得改名隐藏于上海一间高级女子助产学校习医，将近两年。抗战爆发后，她才与中共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取得联系。她来到延安，并写信回湖北枣阳县家中接儿子来延安相聚。我的太太到了延安，立即担任边区政府内工作人员训练班的教育工作和边区医院的助产工作。她的工作繁重，超过一个普通党员。可是中共中央组

织部，以必须调查她失去党的联系后的经历为理由，不允许恢复她的党籍。当时归队党员，大多不需要这种所谓调查，就可恢复党籍，需要调查者，显系含有怀疑和不信任之意，这使我那热诚和爽直的太太，颇感气恼。

那时我的儿子小学尚未毕业，延安并无适当的学校可以容纳他，因而暂在陕北公学低班就读。不久干部子弟学校成立，他就首先转入该校。这个小孩子很活跃，喜欢唱歌和表演，为学校主持人目为难得的童星，参加过几次儿童表演。有一位文艺工作者，曾因犯重大过失受过我的处罚，他那时成为张闻天的马仔。他作弄我的儿子，派他演反派张慕陶，扮成奇形怪状的汉奸样子。我事先毫无所知，等我走到文艺会场的时候，一群人正在捉弄我的儿子，毛泽东也正在那里凑热闹，奸笑着说张国焘的儿子扮演张慕陶，再适合不过。我恰恰走进去，目击这种情形，就将孩子所戴的假面具撕掉，牵着他离开会场，一面走一面高声申斥说：野蛮、残忍、禽兽不如。

经过以上我所扼要叙述的那些事情，我没有与那些阴谋家公开闹翻，不能不说是忍耐的奇迹。我此后再不愿同毛泽东、张闻天等会面。十一月间，我就有计划的将边区政府主席职责，推交秘书长代行。任秘书长的潘自力为人很正直，与我共事相处很好，他目击党内情况，知道了我的意向之后，感到责任重大，因而不动声色向中共中央请求调换工作。这个时候，边区政府在延安南门外，建筑了一排窑洞，大致已经完工，需要搬迁。搬迁的主要用意，是企图减少日机轰炸的危险。我虽已消极，但因工作不能

停顿，还是如常的照料我所应做的工作。

十二月间潘自力调走了，原任交际科长的伍修权升任秘书长。伍修权接任之初，特务派头十足，借故把替我收拾办公室的一个小勤务捕去了。这显然是对我施的下马威；他大概企图从小勤务口中，讯问出我的“反党行为”；无异明白表示他是来监视我的。数日后，伍修权的态度竟有些改变，他遇事向我请教。为甚么有这个改变，我始终不明白。这也许有多种原因：其中的一个似是伍修权研究了边区政府的一些文件，看出我们所提议办理的事，都是出自善意，并非前此他用有色眼镜所观察的可比，显然不是甚么“反党阴谋”；而且中共中央的干扰，并不一定合理，有些显有偏见。

边区政府主席的职责，我逐渐把它转移到伍修权身上。首先请他代替我和张闻天及其他中共中央各机关首长接头，商决边区政府的工作，我指出这对他自己固然是驾轻就熟，对工作进行自会较为顺利，他欣然允诺。这件事的解决，对我来说，真是如释重负。接着又将其他各项我所应当做的事，一件件交代得清清楚楚，逐渐由伍修权代策代行。伍修权很热心工作，连升三级，边区政府整个工作完全由他处理，他表现得有点踌躇满志。而我正感到轻松，为我后来脱身出走，准备了条件。

这件事同时也证明那些阴谋的独裁者，妨碍我正正当正的做边区政府主席，甚至连我在边区政府做一个苦力，他们也不放心。他们要我做一个俘虏，在监视之下听从他们摆布。当时即使我做一个安份的傀儡，恐也难逃清算斗

争的灾难。毛泽东对意见不同者的阴毒，再加上斯大林反托派的疯狂，实在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延安已是冰冻的时候，王明、陈云、赵云（即康生）三人坐着一架苏联的军用运输机，自莫斯科飞返延安。当年八月二十一日，中苏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接着苏联供给中国一些飞机，以抵抗日本的侵略，新疆成为中苏交通的孔道。苏联派人在迪化、兰州等地协助管理空军基地。王明等便是由莫斯科经由迪化、兰州等空军基地，飞返延安。

当时南京已失守，国民政府正迁往重庆途中，中途停留武汉，因而武汉一时成为临时首都。周恩来为了要赶往武汉，在王明等到达前的几天，自山西前线回到了延安。那天下午，周恩来正在我的办公室谈天，忽听见飞机声，虽没有警报发出，我们也颇疑为日机前来轰炸，因而出外观看，一架飞机出现在天空，绕着延安城，越飞越低的在那里打圈子，似是寻找机场。我们两人即向飞机场走去，途中我问周恩来是甚么人物来了，他答说到了机场就知道，似乎他也没有预先得到消息。

我们到达飞机场，毛泽东、张闻天等也同时来了，我们站得远远的；机场已有相当的戒备，似乎都不知道飞机里面载的是甚么人物。大概毛泽东早已接到了莫斯科的电报，告以王明等要来，毛并未公布；王明等回来的确实日期和如何来法，连毛泽东也不知道。直等到王明从飞机走出，陈云、康生也跟着下来，我们才急步向前，彼此握手拥抱。当时一堂欢叙，所谈都是高兴的事。我已有八年没

有看见王明，陈云大约十二年没见，康生也有六年半了。叙起旧来，材料当然特别多。这种欢欣鼓舞的气氛，似乎以前延安从未有过。

座中，不记得是那一位提到，以后莫斯科与延安间可否通航，以便运输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来延安。毛泽东闻言大感兴趣。王明立即解释说：根据中苏谅解，苏联空军飞机在中国境内，只供国民政府调遣；他们这次乘空军飞机来，是秘密的和非法的行动。王明继续说及：他们在兰州等了几天，等到今天天气好才上机，一路由飞机师按照地图，好不容易才摸索到了延安上空，低飞到看见延安城门口的大标语时才降落机场。因此王明指出由苏联飞机运输军火来延安的事恐怕办不到。毛泽东听了感慨再三的说：拿那么多军火给蒋介石，为甚么不可以少少分给我们一点。

由于这些人的到达，即于次日上午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且连续举行了三四天。首先由王明发表长篇演说，内容是莫斯科首脑部对于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一些新见解。他首先指出现在抗战，确是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关键，国民党既已积极抗战，中共便应主动的与之密切合作。他又说明中国抗战的成败，具有国际的重要意义。如果中国能够充分发挥抗战力量，给日本以长期有力的抵抗，这将使日本无力向苏联进攻，对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大大有利。

他着重说明中共在民族严重危机中，与国民党再度合作，不能抄袭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这次的国共合作应力求其稳固与久远，彼此互谅互让互助。中共既是主动的

与国民党要好，就要抛弃已往国共间的仇恨。如一个国民党黄埔出身的军官，掌握着军队的实权，可是他过去也曾杀过许多共产党人，我们应该将他的那份旧账置之度外，与之真诚合作。因为只有握有军事实力的人，愿意抗战，抗战才能长期继续下去。

王明还从另一个原则来阐明这个问题。他指出中共不应自视为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旧公式已不适用于今日。中共应更大胆的将自己当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党；它不仅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也代表所有人民和中国整个民族的利益。他说明这不是放弃阶级观念，而是进取的精神，也是共产国际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要求各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蒂的人民阵线中，所应持的基本态度。

他继续说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彼此在政治上的距离是缩短了；它们同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党，只是在社会问题上，彼此有急进缓进之分罢了。至于国共之间争夺政权的问题，那是遥远将来的事，中共也应主动的把这个问题，推到抗战胜利以后去。

王明这些话使毛泽东的神情，显得有些尴尬，似是受到当头一棒。他也许想到他已往所发表过的言论和所做的一切，竟与莫斯科的见解大有出入。现在莫斯科，竟要他与国民党形成长期而巩固的合作。

我当时觉得莫斯科这些见解，至少比毛泽东的那些主意要高明些，但王明没有一句话说到中国可以走民主化的道路，一切设想仍是站在独裁立场上，来些策略的改变。莫斯科大致不相信中共能够在短时期内，获得抗战的领导，



而莫斯科又需要中国的抗战能够拖住日本，因而要中共与国民党竭诚合作。

我们向王明问及国际的真实情况，大致着眼于中国抗战能够得到一些甚么国际支援，英美等列强与苏联是否能联合起来干涉日本的对华侵略。王明表示并不乐观。他说明日本正与德意拉拢，形成国际间的法西斯蒂阵线。现在法西斯蒂的势力很嚣张，威胁苏联与中国的生存；英美法等民主国家是否能够拔刀相助，还是不可捉摸。这样的国际形势，便是莫斯科要我们进一步巩固抗日统一战线的主要原因。

王明暗示这个策略上的变动很为重要，而且是出自斯大林本人的意见。他曾当面问过斯大林：中共应当遵照你的指示与国民党合作抗战，但你和共产国际过去对中共所作的指示，是否仍然有效？斯大林曾答以那些过去了的话，应束之高阁，不再理会它。（主要是指有关中共独立发展，与国民党争领导和进行斗争等主张。）

据王明表示，斯大林的意见是要中共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努力，不必为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已往的公式所约束。斯大林曾说：“中共现在需要游泳过一个很宽的海，不能有旁的选择，只能凭你们自己的努力，你们是否不会中途溺毙，那是他所耽心的。”

毛泽东听到这里，显得面有得色。也许他想到斯大林的见解，竟与他自己原有的见解相反，这如何是好？现在有了依靠自己努力这一原则，岂不是有了解脱的办法。毛泽东以后批评王明，只知联合国民党，犯了右倾机会主义

的错误；而他的正确主张是对国民党一面联合，一面斗争。后来毛泽东与王明间的斗争，从这次讨论起即种下了祸根。毛的武器是强调马列主义中国化，依据中国实际情况行事，反对王明那种国际派邪说。

王明的这项政治报告，毛泽东、张闻天和其他的人一样，都当场表示完全赞成，似乎他们在洛川会议上所说过的“使蒋介石失败”、“中共独立自主”、“扩充实力与国民党较量”等等言论，都未曾说过似的。我们继续讨论其他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拒绝与陈独秀恢复合作的问题。

一九三七年十月间，罗汉来到延安，他以陈独秀代表的身份，与我们商谈合作。罗汉是我在五四运动时即在一起共事的老同志老朋友。他与毛泽东也有旧谊，后来脱离中共，成为陈独秀托派中一个重要角色。他这次和我会面，说到陈独秀先生过去对中共的贡献，两个儿子为党牺牲了，陈本人又被国民党判了十年徒刑，不久前才获释放，以及陈一直坚持社会主义的立场等等。他并指出托派内部意见不一，派系甚多，但陈独秀先生和其他多数重要人物主张与中共恢复合作。他还说明陈独秀先生等是坚持抗战的，赞成中共现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认为国共既能恢复合作，社会主义的老同志们更应重新团结在一起。我表示欢迎陈先生等的这种意向，要罗汉径与毛泽东商谈。

毛泽东同情罗汉这种活动，觉得中国的托派不能与苏联的托派相提并论，根据罗汉的表示，就与托洛斯基的死硬态度有所不同。他似也怀念陈先生的旧谊。他曾向我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

毛还说到从前我们搞苏维埃运动时期，在肃反工作中，犯有很多错误，现在斯大林老在闹肃反，恐怕错误尤多于我们。现在我们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

由于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张闻天也只好遵照实行。张闻天和罗汉多次商谈的结果，形成了十九个条件；其主要内容是托派坚持抗日，拥护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现行政策，在言论上和实行上均将有明朗的表现；托派中愿意恢复中共党籍者，须公开脱离托派并承认已经参加托派的错误；不愿恢复中共党籍者，可以与中共在党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战政策。中共中央也不再对抗日的托派人物采取敌视态度。

这件案子拖延到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才提出讨论。王明知道了这件事，不问情由，便声色俱厉的表示反对。他指出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斯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用字典里最恶劣的名词，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来攻击托派，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

我们曾在会议上说过一些陈独秀与托洛斯基究竟有所不同等类的话，也有人提到：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但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

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王明这些斩钉截铁的话，使大家为之默然。从此，在中共宣传上，陈独秀就变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了。

为了这件事，王明还发了一篇大议论。他向我们说明了苏联肃清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的经验教训，指出联共内被整肃的那些知名人物，叛国罪都是证据确凿的。他说根据这个经验，任何党员，不管他对共产主义信仰多深，过去有过多大的功绩，只要有反党倾向，就可能走到叛党叛国。他又说到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曾利用各种机会，阴谋反对苏联和联共；甚至利用清党，故意制造供词，陷害了很多好同志。王明不说斯大林疯狂的清党曾杀害了很多同志，反说是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实施陷害，这真令人毛骨悚然。

王明说明在原则上中共决不能与叛徒恢复合作。他指出资产阶级的政客们，蒋介石及其党徒们，和法西斯蒂党徒们，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点，他们反共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不能直接影响共产党内部。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我们可以与这些原非同类的人物，暂时的或较长时期的合作。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党人较为接近，一直阻碍共产主义的发展，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至于托派布哈林派以及其他左的右的反党派系和倾向，与共产党更为接近，腐蚀我们的内部，是较社会民主主义者尤为危险的敌人。清算这些叛徒，在使共产党净化这一点上，斯大林发展了列宁主义，也是斯大林理论的精华。

王明还进而主张加强对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的斗争。他说明联共内部有大量的托派和反党分子，难道中共内部就太平无事吗？中共内部必然暗藏着许多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只是我们两条战线的斗争，不够彻底，没有发现出来罢了。因此，现在决不是与陈独秀恢复合作，而是加紧反托派。在抗战时期，必然有些叛党或离开党的分子，企图再行混到党里来，我们决不能宽容他们。现在党内有过反党行为和思想不纯正的同志们，党对这些人也不应轻轻放过。

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上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我当时就料定王明斗不过毛泽东。

在我们讨论组织问题的时候，王明事先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提出一张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共十六人的名单。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中共中央的人选，在一九二八年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已迭经变更。不少同志原非中央委员，亦权宜提升为政治局委员。这时，中共中央认为一时还不能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而王明觉得有些人应当参加中央政治局，因而采取了非常手段，提出这个名单。

可是毛泽东对于王明这种单独举动，似感不安。王明所提出的名单，在人选上只增加了和他同回国的赵云陈云两人，其余多是旧人，不过将席次略加调整而已，所以原

则上毛是赞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没有征求他的同意。因而毛极力推崇王明为中共中央领袖，并说自己在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上和反托派斗争上，都没有把稳住这个舵，愿意减轻自己的责任，力主将王明的名字列为第一名。经王明极力表明，他之提出这张名单，决无“夺帅印”的意思。毛知道了王明的真意之后，没有再发言，名单也算通过了。

身为中央书记的张闻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单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现似有取张闻天而代之的意向。张闻天却在那里一言不发，除了表示过赞成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政治主张外，从不对实际问题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谈到改选书记的问题。

我当时心灰意懒，已不大愿与这一群人为伍，因而置身事外，没有卷入争论的漩涡。我在王明的名单中的名次，仍被列为第三名，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王明在解释他安排这个次序的理由时，曾说到我是国内外知名人物，在中共有不可磨灭的地位，但也讥讽我犯过另立中央的重大过失。我觉得王明的主要意思，是在重新责备我，为了不愿重提往事，我只好缄口不答。

陈云和赵云两人较之王明似是老练些。他们说话的态度相当谦虚，往往对王明所提出的意见，略加补充，对我们这些在国内奋斗的巨头们，他们则常表示推崇，因而他们在大家欢迎声中，就任政治局委员，并分担组织部长和政治保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两个重要职务。后来，毛泽东斗争王明的时候，他们两人也没有被牵涉在内。

王明反托派的矛头，竟是指向着我的。在一次我和王明的单独谈话中，他问我毛儿盖会议争论的症结究竟何在？我答：“除批评党中央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军事领导权。”他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我：“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

我切齿痛恨的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王明回答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他接着说明在莫斯科的大清党中，证明我与托派并无联系；可是不能因此说我所信任的左右中没有托派，也不能说我自己不会受托派的利用。他还说到与我接近的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在莫斯科经过几次清党，都没有露出破绽。他一直有些怀疑，这次他在新疆，将他们逮捕审问，果然他们直供不讳，都是托派，自然也只有把他们惩之于法了。

我耐着性子向他指出刑讯逼供，难免冤枉好人；从前项英在江西苏区厉行肃反，采取审问逼供手段，有些供词竟牵涉到他自己，这才使他觉悟过来，供词是不可尽信的。我们为甚么这样丧失自信，觉得到处都有托派在作怪呢。我们的国家很可能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我们一面要团结一切力量来抗日，一面又要大清托派。如果我们把许多同志当作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大概看见我神色愤怒，言词犀利，因而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

王明向我宣泄的事实，和他那种要追随斯大林肃清托

派的意向，使我受着极大的刺激。李特、黄超是从一九三一年起和我一道工作的，李任参谋长，黄任秘书长。李原系列宁格勒军政大学的毕业生，黄则在上海做学生运动，系学生会的一个活动分子，他们在到鄂豫皖苏区以前，我原不很熟识，中共中央却举荐他们可以任要职。我们这些年的共事，我深知他们为四方面军工作，出生入死，贡献极大；他们最后在西路军中，经过无数艰险困难，率领数百人逃亡新疆。他们只是在毛儿盖时曾指责过中共中央的领导错误，这大概就是他们致死之由。

至于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是较有学识的留俄学生，也是我的老朋友。俞秀松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为人守正不阿。周达文与瞿秋白同系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的毕业生，对俄文和俄国问题的研究都有相当的造诣。董亦湘与沈雁冰同系商务印书馆编辑，研究文学，亦有相当成就。他们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反对过米夫，也与王明等人斗争过。他们在列宁学院毕业后，被派在新疆工作，似系避免与把持中共中央的米夫派直接接触。这次王明路经新疆，手执上方宝剑，竟陷害泄愤，这真是暗无天日了。

我认为王明效法斯大林那种疯狂的清党作风，将使中共堕落得不成样子。他从莫斯科带回来的与国民党密切合作的抗日主张，与我素来的见解相接近，但他并不是从中国的民族利益出发。事实上他将斗不过毛泽东，也难收到预期的效果。他反对与陈独秀等重行谅解合作，确是明显的反动。他在新疆杀害李特、黄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同志，更是不可宽恕的罪恶。一九三〇年底王明等



米夫派曾用残酷的斗争手段，断送了何孟雄一批老同志，现在竟进而杀害对中共当权者持有反对见解的同志。这就证明斯大林的魔影，已变本加厉的随着王明到中国来了。

由于这种重大的刺激，我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脱离中共。我觉得一切都超过了讲理的范围，也无法申诉，而且再也无申诉的必要。在抗日战争的紧急关头，我只有采取“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打算，跳出这个圈子，也许能做些我想做的事。

当时，抗日局势使中共的当权者，不能为所欲为。南京失守以后，国民政府将与日本妥协之说颇盛，王明认为事态严重，自告奋勇赶往武汉，企图与国民党建立较密切的合作，以挽救这种中日妥协的可能危机。不几天（一九三八年一月间），王明、周恩来便启程前往武汉。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与王明间意见的出入，也有待调整。我这个挂名的边区政府主席，也还有装点门面的作用。所谓进一步肃清托派或者受托派利用者的这类斗争，似乎时机尚未成熟。

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三月间，延安气候寒冷，朔风怒号，人们活动减少，一切显得平静。旧历过年期间，延安和别的地方一样，大家都在休息庆贺春节。王明、周恩来离开了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停开了，没有发生甚么特别事故。我决意脱离中共，寻找最近的机会离开延安。这虽是一次冒险，可是心情感到特别轻松。我对延安的一切已不关心，每天再三思考的已是如何能实现我的决定。

我这十八年来的革命生涯，酸甜苦辣都尝尽了。远的

不用提它，一九三七年二月间，那种背信弃义，蛮不讲理的反张国焘斗争，使我下定决心，不再过问中共中央的事。谁知抗战爆发，又因我的抗日热情，复使我跳进了原来的火坑。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等违反抗战利益的阴谋和口是心非的对我实施种种迫害，使我进一步打算脱离中共，但因种种牵挂，一时不易抉择。从王明的表示中我清楚知道莫斯科和延安一样黑暗，斯大林清算的魔爪和毛泽东阴险的毒手，都会向我飞舞，事机紧迫，乃决定脱离中共，离开延安。

王明为甚么将在新疆谋杀李特、黄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五人的事告诉我；为甚么硬说毛儿盖的争执，是托派暗中作怪，为甚么武断的说我受托派的利用。这些盛气凌人的话，直接向我表示，难道是他的幼稚吗？难道是恐吓我吗？王明须赶往武汉，阻止中日妥协，维持国民政府的抗日局面，促进国共合作——这些是王明认为头等紧急而重要的事——这才把反对我被托派利用的斗争压后。也许因为中共中央内部情形复杂，有人劝告刚从莫斯科回来的王明不可太冒进。但王明已杀害了五位中共重要干部，如果他不斗争我，诬我受托派利用，他又何能交代？

这次政治局会议，使毛泽东、张闻天大伤脑筋，王明的矛头正打中他们的要害。毛泽东紧紧掌握他的实力，对八路军各部的指导和大批人员派遣到前线去等等工作，一点也不放松。他预料王明在武汉的活动，不会有甚么大的成就。他暂时一声不响，和我遇着的时候总是谈些轻松的

事。张闻天有点感到自身位置难保，一切不敢像从前那样放肆，遇着我的时候，虽然不说甚么，但多少改采尊敬我的姿态。陈云和赵云都是初来，遇事向人请教，不愿随便说话。我那边区政府主席的职责，伍修权代理得相当顺手，他很少来麻烦我。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能安静的设计走自己的道路。

我悠闲自得，有时驰骋山野，在农村中留连一番。有时携带我的儿子或偕同一些青年，郊游谈天，我那座山上的故居，是我们常到之处。我参加文艺晚会和观看球赛，非常热心，常常和小伙子们打成一片。我的太太不仅工作繁忙，而且因怀孕呕吐不适，我此时也有工夫陪伴她，分担一些她的工作。在训练班讲粗浅的课，与人下棋以及参加晚餐会等等都是我所高兴的。如此，我渡过了颇为安静的在延安的最后三个月。

这个时期，我回想的事特别多，似乎也应当略略提到。

中共是变了质，完全变质了，离我这个创始人之一的最初理想，已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共在它的短短的历史中，经过国共合作，苏维埃时期和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三个主要阶段，其领导人物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米夫派直到毛泽东，本书中都有扼要的叙述。读者从我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他不择手段，追求他个人的胜利，这是不折不扣的反动的帝王思想，与近代共产主义思想毫无共同之点。毛泽东在共产主义思想掩护之下，包含着有游击观念，农民意识，霸道策略，这些货色也与共产主义不甚相容。

整个共产国际同样完全变质了，它早已脱离了从马克思以来欧洲工人运动的轨迹，变质为斯大林式的独裁。斯大林的恐怖主义，在清党中杀害了以百万计的人民和革命分子，这显然是专制魔王之所为。即使那个亲苏联的邵力子叙述斯大林的残暴时，也曾向我表示：斯大林杀害这许多党人，世所罕见，中国历史上的暴君，杀害大批功臣的也有，但很少杀害这么多文人学者的。

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和中共的党章，共产党组织是信仰相同的志愿结合，党组织对于党员的最高制裁是开除党籍，党员也可以自动脱党。如果根据这样的民主性原则，就没有所谓叛党、叛徒等类的罪名，也没有比开除党籍更严厉的处罚。只因国内外共产党都变了质，王明才敢在新疆杀害重要的干部，否则他会受到杀人犯一样的判罪。

至于说到抗日，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当参加的，根本不分共产与否。中共作为一个组织，可以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我单独行动，也可以与国民党及全国同胞合作抗日。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种种约束，人们还可以完全站在民族大义上发挥他们的抗日力量。那种脱离了中共便不能抗日，甚至被指为反动、反革命、叛徒或汉奸的说法，完全是中共的独裁偏见，也是对人们的愚弄宣传。

我不能领导中共向正当的途径发展，也不能阻止中共的变质，深感惭愧。我曾枝枝节节的有过许多次的反抗，都遭受到挫折，足证我无力挽狂澜于既倒。难道我要像布哈林等人那样，听由斯大林杀害吗？因此我脱离中共，离开延安，完全是必要的，也是应当采取的正义行为。我有

权利单独行动，自动脱党，不与残忍阴谋的独裁者为伍。但从当时环境说来，脱党是严重的事，我需要机密处理。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我因前往中部县参加祭黄陵之便，离开了延安；从此与中共告别了。黄帝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祖宗，其陵墓位于延安西安间的中部县，每年四月四日都要举行一次盛大的祭礼，例由国民政府派大员主持。这一次的祭礼是由国民政府特派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主祭。我以边区政府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在抗战后的第一年，这种祭礼显有奋发民族意识的作用，我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共，虽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义。

我从中部县出发经过西安，到达汉口，这是我脱离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旅程。在汉口的时候，周恩来、王明、秦邦宪等曾对我的脱党行动加以阻难，但我意已决，无法挽回，因而他们发表指责我的文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都相继宣布开除我的党籍，这些事都不必细说了。我当时发表了一篇告国人书，现附在本书之末，以供读者参考。这个文件是我脱离中国共产党的声明书，标志着我的共产生涯，至此已告结束。但我在这里必须声明一句，这是一个抗战时期的文件，他的内容只反映出当时的情况和我的处境。

# 张国焘敬告国人书

## 并与中共同人商榷抗战建国诸问题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印行

抗战发生，国步艰难，有识之士，企认救亡图存，惟有举国一致，精诚无间，抗战到底，始克有济；而达到此目的之最重要条件，端赖民族意识之高度发扬，牺牲精神之百倍提高，本人于四月初自肤施到达西安时，适得读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认为深合国家民族之迫切需要，而其吁请全国人士共同奋斗之至诚，亦复溢于言表，尤深感动。因即离陕来汉，冀与此间中共中央负责诸君详为商讨，期于抗战建国事业，更作进一步之最善努力。不意商讨未竟，即受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之处分，并造作种种澜言（如加本人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抗日团结等不经之词），当即就本人政治意见，简略有所声明，其要点有四：

（一）本人素具抗战到底之坚强决心，和抗战必胜之坚强信心，对于中国抗战建国之光明前途，并无丝毫失望，本人更愿贡献一切，为国家民族效力。

（二）当此国家民族危急存亡关头，本人认定国家民

族高于一切。

(三) 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中国国民党为主持抗战建国大计之领导中心，蒋先生为全国唯一之最高领袖，此三点中共中央亦不否认；中共中央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方针，自是中共中央的进步，本人亦表赞成，但深觉如此还是不够。因主张中共中央对于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应即为更恳切之响应，以达更进一步之精诚团结和增强抗战建国力量之目的。

(四) 本人曾本上列主张，用至诚态度，与中共中央诸君初步商讨，未蒙采纳，今后仍望中共诸同人，对于本人上列主张，深切考虑。

以上之简略申明，本人自信对于当前政治需要，尚无不合之处；乃近见武汉中共负责人公表函件，对于本人主张与行动，续有诋诽，综其所述，无非蔑弃真理，偏执己见，甚至不惜虚构事实，颠倒是非，以遂其抹杀政治商讨，维护局部利益之私图。如此，足征中共负责诸君，对于近代政党党员应具之自尊心，未甚重视，政治道德，亦鲜顾及，此本人深为惋惜者也。

当此抗战建国之严重关头，本人深信每一政治战士，在国家民族至上之原则下，均有放弃过去一切成见，端正其政治趋向之必要。并应全国上下，精诚团结，努力完成复兴民族之大业。据此观点，愿就本人与中共间政治上分歧之点及因此而引起之争论，略陈梗概，邦人君子与中共诸君幸垂察焉。

关于中共政治路线之全盘检讨，因范围过广，此处暂

勿深论；仅就目前整个民族迫切需要之抗战建国基本观点，加以考察，本人确切相信中共政策错误之发生及其过程，实非偶然，而且这一错误过程，直至今日，还未停止，这是本人不敢苟同的主要所在。

中共的政治路线，向来是环绕着一个错误轴心而转动。这个错误轴心的构成，可从下列诸点，加以简略说明：

第一，中国原是一个经济落后的与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散漫的农业为组成国民经济的骨干，纯民族工业的比重，颇为低下；因此革命的任务，对内是铲除封建残余，改正土地关系，完成国家的统一，对外是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之经济特权与政治特权，争取领土主权之完整，与政治上、经济上之完全独立自主：这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内容。关于这一点，在中山先生与越飞君的联合宣言上说得最清楚：“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概括言之，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全民性的国民革命，任务是内求统一，外求独立，而就革命动力言，城市市民与乡村中小地主及自耕农都占极大数量，这些阶层对外积极反对侵略，对内并不代表妨碍统一之封建势力，所以除去封建的旧势力而外，广大国民群众都是这一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和拥护者。

中国共产党虽亦见到这些基本问题，而并没有深切的了解；因此，经常以急进的主观上之幻想，代替中国社会



发展之客观条件，机械地了解民主革命的阵容，只有循着苏联十月革命的唯一途径。更错误的是不了解革命客观形势，基此而采用诸多错误政策，客观上对于可能参加的广大革命力量，竟予以过当的摧折，直至九一八民族危机之严重性明显呈现时，仍是如此，而在今天，亦未曾表里一致地改正过来。

复次，中国国民党领导之对内统一运动，其目的原为反对封建割据，亦系形成全民对外之先决条件，应当确认其为进步的革命步骤。中共昧于此义，贸然将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勉强地予以联系，并强调阶级斗争愈深入，民族解放愈迫近成功之说，处处以阶级利益抹杀民族利益。这一切与国民革命不能调和之基本观点，在理论与事实两方面，均已确证其误。

第二，以上是说明中共对于国民革命理论的错误见解，基于此种见解，于是对于中国国民党之认识，亦极不正确。中共初则认三民主义为反动思想体系，而认国民党只是代表地主资本家的阶级政党，继又认国民党为法西斯主义之分派，国民政府为亲日卖国政府，但就三民主义的本质言，就国民党的组成成分而言，就国民政府及蒋先生之过去政策而言，此诸估计显非事实。中国国民党实继承中国革命史上之优良传统，它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创立中华民国，北伐后逐渐完成统一中国的任务，迄今尚担负着神圣抗战建国的重任。即以此次抗战而论，举国上下，一致奋起，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将士牺牲者为数在五十万人以上，尤复再接再厉。此诸明显事实，无论何人，均不得不承认

此为蒋先生领导成功之明证，国民党革命精神发扬之实例。尤有进者，蒋先生为举国一致所公认之最高领袖，当此国本飘摇，千钧一发之际，挺身肩负此民族兴亡之重责，忠诚谋国，中外同钦；凡我国人均不应借口某些枝节问题，吹毛求疵，别谋发展，以快私图。所以那些认为国民党具有两面性，在目前抗战是革命的，抗战胜利后是不革命的谬误观点，不仅否认由抗战胜利而展开之革命光辉，而且对于正在进展中的抗战建国之伟大工作，亦必然予以严重损害，此则可以断言者！

第三，中共对于中国革命之错误判断，对于三民主义国民党及其领袖之固执成见，于是形成其一般策略路线的连串错误，中共本身组织之缺陷与退化，亦随此错误路线而愈益充分暴露出来。

中共策略路线错误之具体表现，即为不顾革命所需要的客观条件而争取领导权的斗争。自民国十六年以来，中共更提出苏维埃政权口号，采取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暴动政策，争取所谓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十年以来，现已证明，所谓苏维埃口号完全与民族利益背道而驰。就共产党本身组织言它久已退出产业区域，走向偏远地带，失其应有之群众基础，它已起了质的变化，已经不是甚么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断的在进行军事阴谋与暴动，以从事持久的阻挠内求统一与外抗强敌的斗争。

第四，抗战发动以后，全民族之迫切要求，为精诚团结，一致抗日，中共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形式上改编红军，取消苏维埃政权，停止土地革命，表示服从中央

政令，但实际上仍然因循其固有错误思想与派别成见，严格维护其小组织的利益，因而减弱现阶段抗战建国的神圣工作。自中共牢不可破的成见看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两个以上不同政治团体的暂时联合，此政治团体乃基于其社会基础之不同而所代表之阶级利益亦异，“国民党是代表地主资本家的政党，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两者间之利害毕竟是不能调和的，这里便隐藏着过去历史重复的根源。吾人近来习闻的中共宣传，有所谓“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共同纲领”等说话，仍不免是一种争取领导权之陈旧思想，毫无放大眼光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己任之气魄。保存实力，保持边区政府与某些游击区域的特殊地位，以徐图发展，乃其真正目的所在，抗战合作不过为达到此目的之宣传手段。据中共之意见，所谓民族统一战线，诸凡与其意见相左之抗日分子，皆放在统一战线之外，而一切打倒；所谓合作，凡中央政府管辖之地，皆任其作误谬宣传，而陕北边区则视外人租界封锁尤严。如斯作法，岂以为人尽可欺耶？窃意中共诸君如果承认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与目前民族危机的严重，统一意志，抗战建国之万分必要，则应毅然决然放弃这些成见与作法，开诚布公，与国人相见，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根据上面的分析，本人站在抗战建国的基本观点上，愿作下列提议，希望中共同人予以善意考虑。

第一，中共同人只有在确认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之原则下，真诚拥护蒋先生领导的抗战建国运动，毫无保留地实行三民主义，务必言行合一，不再作与此相违反的宣

传和组织；基此立场，中共同人应自动破除门户之见，泯灭界限，与国民党党员同在蒋先生领导之下携手前进！

第二，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国民政权和军队应完全统一。第八路军，奋勇杀敌，深为国人所赞许；但望中共同人能根本破除“抗日联军”之成见，使八路军国军化，如此一面可增强抗战建国力量，减少一切不必要之顾虑，一面于彼此融化之过程中，互相交换经验，则今后裨益抗战实力，当非浅鲜。边区既不可当作中共之根据地，也不应形成特殊区域，更不宜自定法律，深闭固拒，排除异己，效法军阀割据；总之，边区政府现已无存在之必要，应即还政中央，以昭大信于天下。在中共所领导之游击区域，亦应秉命中央，充分发挥其抗战作用。

第三，一致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从事实践中央之外交政策。

以上三点，即本人前次申明所谓“更进一步之精诚团结”的具体内容。

本人与中共历史关系甚深，由于近廿年之经验教训，愈使我深刻地理解中共政策之不当，尤其是抗战发生以来，国家民族危如累卵，更不愿躬睹此错误政策之继续存在。尤忆民国二十四年夏毛泽东领导之一方面军与本人所领导之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当时曾发生不同意见，毛泽东等估计长征是胜利，主张应北进出陕西，形成川陕甘根据地，重建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本人彼时估计长征是失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前途早成过去，吾人应在川西和西康地区或甘肃西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

与中央军之休战，再图举国一致抗日方针之实现。因为两种主张未能一致，遂致形成中共之分裂。是年十二月间由于共产国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之决定，遂使此种争论渐次减少，终于形成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会合。

本人到达陕北时，恰是西安事变前十天，西安事变是由于中共“抗日反蒋”之宣传主张而来，其实质则系军事阴谋，本人事先并未与闻。西安事变发生后，延安方面中共负责诸人均不免有情感冲动之主张，当时特别冲动者，另有人在，事实昭然，当可覆按。嗣后决定采取和平方针，本人与中共其他负责人均一致赞成。而且基于此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方针，使本人与毛泽东等的意见接近起来，这是一贯的事实。于此可见中共公表文件，所谓本人当时坚决主张内战方针之说，完全是别有企图之造谣。在这一期间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本人曾在原则上表示完全赞成，但认为更须彻底执行，方能挽救民族于危亡，因而认中共彼时所执行者仍感不够。

由于统一战线方针，致使本人与毛泽东等的意见接近起来，又因为毛泽东等对于此一政策之执行，仍系深怀成见，貌合神离之作法，致使本人深为不满。特别是抗战发动后，毛泽东等所保持的独立自主，别立门户，不以国家民族为重之精神，引起本人与毛泽东等之间，许多争执。故此次毅然离开延安，来到武汉，这完全是基于共赴国难之坚强信念，光明正大之举动，中共同人原无所用其疑虑。乃中共负责人不加深察，对于本人此次参加抗战建国之积极行动，妄肆攻击，横加诬蔑，充分发挥其非政治的，偏

狭自私的，阴谋煽陷的宣传，企图对内压制中共党内之自我批评，对外敌视一切拥护中央领导，努力参加抗战建国之分子。凡此一切，均可视为中共对于团结抗战缺乏诚意之表示。至于其劫持本人之种种非法企图，原属陈周秦等少数人之无理举动，识者自有公论，不足深辩。

总之，本人自弱冠以来，目击国势凌夷，奋起救国，不计其他。献身革命，垂二十年，对于中共政策之形成，未能及时纠正，自然亦负有某些连带责任。然生平言论行动，素为国人共见共闻，此次举动，纯出爱国至诚。为爱护中国同人，更为爱护中国革命起见，本人赤诚披沥所抱之见解，深愿社会人士予以明察，更愿中共同人本自我批评之精神，弃文过饰非之谬习，憬然自悟，纠正中共现行一般政策之错误，在国家民族至上之原则下，努力抗战建国，庶中国革命大业，迅底于成，此不仅个人之幸，抑全体民族之福也。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六日